

目 录

|学会之声|

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薛 潮 /2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丛书”总序

薛 潮 /8

|专题研究|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专辑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12

孙中山与上海城市品格

熊月之 /29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与上海同辉映

戴鞍钢 /32

上海对孙中山的纪念与缅怀

廖大伟 /34

孙中山寓沪生活二三事

徐 涛 /37

“回望 1949：为新中国奋斗”专辑

伟大抉择 中共中央来电(1949 年 1 月)

/40

立场坚定 支持解放事业(1949 年 2 月)

/44

栉风沐雨 力助中国福利呼吁会(1949 年 3 月)

/48

春晖之心 救济申城“三毛”(1949 年 4 月)

/51

战胜黑暗 迎接上海解放(1949 年 5 月)

/54

欢迎中央特使 响应北上邀请(1949 年 6 月)

/58

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1949年7月)	/62
欣然北上 两条革命洪流汇合(1949年8月)	/64
参加新政协 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9月)	/66
参加开国大典 走向人民的时代(1949年10月)	/69
加强中苏友好 开启新中国外交活动(1949年11月)	/72
团结全世界妇女 为世界和平而奋斗(1949年12月)	/75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专辑

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的重要功臣

——詹姆斯·贝特兰 朱玖琳 /78

保卫中国同盟在汉口的代表

——王安娜 朱玖琳 /88

保卫中国同盟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伊思雷尔·爱泼斯坦 沈海平 /98

保卫中国同盟编外战友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徐涛 /111

保卫中国同盟荣誉会员

——埃德加·斯诺 王成至 /119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骨干

——耿丽淑 徐锋华 /128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创始人

——路易·艾黎 王建明 /136

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

——马海德 王婉如 /147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加拿大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 郑培燕 /158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罗马尼亚医生

——柯列然 孙娴静 /168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德国医生

——汉斯·米勒

沈海平 / 175

「口述纪实」

保卫中国同盟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

金星 / 188

「档案选编」

耶鲁大学神学院藏范尼·波默罗伊·布朗档案中的

宋庆龄书信(一)

宋时娟 译 / 210

亚利桑那州图书馆藏宋庆龄相关信函选译

郑培燕 译 / 242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宋庆龄与中华救济团档案选译

王婉如 译 / 285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藏宋庆龄致迈克尔·哈里斯书信

霍媛欣 译 / 312

「海外译文」

魏璐诗回忆录《游走在历史的边缘:忆我在华岁月》选译

黄立派 译 / 318

Contents

Voice of Association

Speech at the 4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6th Council of Shanghai Soong Ching Ling Study Association

Xue Chao / 2

Preface to *Soong Ching Ling and Her International Friends Series*

Xue Chao / 8

Featured Studies

Features on *Sun Yat-sen in the Memory of Shanghai*

Sun Yat-sen in the Mem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Soong Ching Ling Study Association

Shanghai Museum of Sun Yat-sen's Former Residence / 12

Dr. Sun Yat-sen and the Character of Shanghai

Xiong Yuezhi / 29

The Development of Shanghai: An Echo of Sun Yat-sen'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Dai Angang / 32

Commemoration and Reminiscence of Dr. Sun Yat-sen in Shanghai

Liao Dawei / 34

Anecdotes of Dr. Sun Yat-sen Living in Shanghai

Xu Tao / 37

Features on A Look Back at 1949: Fighting for New China

A Great Decision Made Upon the Call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January 1949)	/ 40
Firmly Supporting the Cause of Liberation(February 1949)	/ 44
Working Hard for China Welfare Institute Appealing Committee(March 1949)	/ 48
Offering Motherly Love to Waifs in Shanghai(April 1949)	/ 51
Defeating Dark Forces and Welcoming the Liberation of Shanghai(May 1949)	/ 54
Welcoming Special Envoy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Responding to the Invitation to Go North(June 1949)	/ 58
Saluting Victory of the People and CPC(July 1949)	/ 62
Going North: Two Great Revolutionary Forces Merged(August 1949)	/ 64
Joining in New CPPCC and Discussion on Founding of New China(September 1949)	/ 66
Participating in Founding Ceremony of New China and Heading into People's Era (October 1949)	/ 69
Enhancing Sino-Soviet Friendship and Starting New China's Diplomatic Activities (November 1949)	/ 72
Uniting Wome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Fight for World Peace(December 1949)	/ 75

Features on Soong Ching Ling and Her International Friends

James Bertram—An Important Contribut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Zhu Jiulin / 78
Anna Wang—Representative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in Hankou	Zhu Jiulin / 88
Israel Epstein—The Youngest Member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Shen Haiping / 98
Agnes Smedley—Non-staff Comrade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Xu Tao / 111
Edgar Snow—Honorary Member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Wang Chengzhi / 119

Talitha Gerlach—Backbone Member of China Defense League’s Shanghai Branch	
	Xu Fenghua / 128
Rewi Alley—Founder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 Movement	
	Wang Jianming / 136
George Hatem—Representative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in Yan’an	
	Wang Wanru / 147
Norman Bethune—A Canadian Doctor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Who Helped China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Zheng Peiyan / 158
Bucur Clejan—A Romanian Doctor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Who Helped China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Sun Xianjing / 168
Hans Müller—A German Doctor of China Defense League Who Helped China Against Japanese Invasion	
	Shen Haiping / 175

Oral Documentary

China Defense League and Yan’an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Jin Xing / 188

Archive Anthology

Soong Ching Ling’s Letters from the Archives of Fanny Pomeroy Brown Kept in the Yale Divinity School(I)	
	Translated by Song Shijuan / 210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Soong Ching Ling-Related Letters Kept in Arizona State Library	
	Translated by Zheng Peiyan / 242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the Archives of Soong Ching Ling and U.S. China Relief Mission Kept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S.	
	Translated by Wang Wanru / 285

Letters from Soong Ching Ling to Michael Harris Kept in the Memorial Museum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Xi'an Office

Translated by Huo Yuanxin / 312

Overseas Work in Translation

Selected Translation of Ruth Weiss' Memoir—*At the Edge of History: My Life in China*

Translated by Huang Lipai / 318

学会之声



在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薛 潮

2020 年 6 月 30 日

各位理事,同志们:

本届宋研会恭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不仅是我们党和国家、我们全体党员同志、我国各族人民、海内外同胞百年一遇的重大历史时刻,更是我们宋研会难得一遇的重大历史时机。我们一定要以更加优异的成绩,为迎接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作出贡献。

下面我围绕宋研会上半年的工作,下半年的工作,特别是宋研会迎接建党 100 周年倒计时一周年的工作部署与要求,讲三点意见。

一、上半年工作回顾

今年上半年,宋研会按照中央和市委的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年度各项工作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 6 个方面:

(一) 持续推进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整理研究工作(简称 203 项目)

在去年工作基础上,今年一季度顺利完成 203 卷 1.7 万页英文档案的翻译、文件编目和数字化工作;初步开展档案研究,完成案卷提要和研究价值编写。二季度联合中福会、市档案馆全面启动 203 档案解密和划控工作,目前进展情况顺利,为下半年完成 203 档案报批开放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组织落实《上海宋研会微信公众号 2020 年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专题系列推出计划》

1—6 月完成了贝特兰、王安娜、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诺 5 位国际友人的微信公众号编写、推送工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三）全面启动“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史料调研工作

今年 4 月先后赴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本市相关单位开展史料调研,就合作开展“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史料发掘、参与课题研究、支持协助宋研会赴外省市和国家机关开展史料发掘等工作,达成诸多共识,确立了合作工作方向与相关安排。

（四）全面启动“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课题研究工作

今年 1—4 月,通过工作途径,完成市孙宋文管委各部门、各单位和中国福利会 10 个课题的落地工作;通过线上沟通交流,完成北京宋庆龄故居管理中心、《今日中国》杂志社 2 个横向合作课题的落地工作;5 月下旬和 6 月上旬先后赴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课题协作调研,完成本市 3 个横向合作课题的落地工作;在 15 个课题全部落实的基础上,6 月 5 日召开“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课题研究工作动员会,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工作部署和要求。6 月下旬完成横向合作课题协议书签订工作,建立“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总课题微信交流群,确立课题研究沟通交流机制,全面启动课题研究工作。

（五）按照中央、市委工作部署,积极推进“四史”学习教育活动

5 月起,先后举办宋研会“四史”专题学习日,邀请中组部陈燕楠同志来沪为宋研会理事、会员作《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专题讲座;举办宋研会和上海大学理论学习中心组联组学习活动;协助市委组织部老干部支部赴宋故居开展“四史”学习教育专题党日活动;积极参与上海社科界“四史讲堂”协办工作,并承办了第 2 期,为上海各界作了“宋庆龄与新中国”专题讲座;应上海图书馆党委邀请,为上海图书馆“四史”学习教育报告会作了“宋庆龄与新中国”专题讲座。

（六）推进《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中长期规划》重要项目“宋庆龄文献数据中心”建设工作

上半年与上海图书馆党政班子多次沟通协商,围绕发挥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学术研

究、宣传教育、文物文献优势和上海图书馆资源、技术、平台及品牌优势,共同建设上海“四史”学习成果展示平台和上海图书馆红色文献揭示展示的试点平台——宋庆龄文献数据中心,着力推进上海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和构筑现代化国际文化大都市,达成全面、高度的共识,6月24日宋研会与上海图书馆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和《合作项目协议书》,正式启动“宋庆龄文献数据中心”建设工作。

以上六个方面工作,是我们宋研会今年上半年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全体理事会员共同努力下,在全市相关单位积极支持下,坚决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各种困难,不畏艰险、砥砺前行、勤奋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来之不易的。

二、宋研会迎接建党100周年倒计时一周年工作部署

(一) 宋研会迎接建党100周年工作总目标

以传承、弘扬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思想精神为主线,持续两年聚焦“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核心课题,推进相关课题研究和史料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以专题研讨会、专题纪念画册、专题电视片等形式,全面、深刻揭示我们党在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斗争中,宋庆龄与我们党风雨同舟、同心奋斗的革命经历、独特作用、重大贡献、历史地位、精神实质以及当代意义,鲜活、立体诠释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同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内在联系与重要价值,坚定、鲜明阐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结论和时代认识,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奋力担当新时代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 宋研会迎接建党100周年主要任务

围绕宋研会迎接建党100周年工作总目标,完成“三个一”重点任务:

1. 组织召开“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专题研讨会

以“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课题研究和史料发掘工作为基础,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开展“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专题研究,于2021年6月,组织召开“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专题研讨会。

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专题研讨会,以研讨成果发布和汇编的方式,凝聚研究成果和社会共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2. 编辑出版“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专题纪念画册

以“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课题研究、史料发掘工作和专题研讨会成果为基础,编辑出版《永远和党在一起——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暂名)专题纪念画册,形成“留得下来、填补空白、国家需要”的研究成果;结合专题纪念画册编辑和出版工作,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宣传。

3. 制作“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专题电视片

以“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课题研究、史料发掘工作为基础,深入挖掘“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课题核心内容和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思想精神实质,联合摄制一部角度新颖、立意深远、史料丰富、引人入胜的专题电视片,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媒体等多种途径,广泛、深入开展宋庆龄思想精神的宣传工作。

宋研会迎接建党 100 周年主要任务,除了这三项重点任务之外,还有一系列相关任务,都很重要,需要我们统筹兼顾,同步推进。

三、宋研会迎接建党 100 周年工作的总要求

(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四史”学习教育重要讲话精神,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要时代意义。

在迎接建党 100 周年到来之际,宋研会全体同志要立足更高站位,进一步加强学习,认清形势,提高认识。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领会十一届市委八次、九次全会精神,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要牢记宋研会的初心使命和本届宋研会肩负的重要任务,牢牢抓住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重大历史机遇,充分认识宋研会迎接建党 100 周年工作目标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努力实现三项重点任务,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迎接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强化使命、责任、担当,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宋研会工作。

(二) 坚持两年贯穿一条主线,深入挖掘宣传“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思想精神的内涵与实质。

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思想精神的内涵与实质,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坚持以传承、弘扬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思想精神为主线,深入挖掘宣传“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思想精神的内涵与实质,持续两年聚焦“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核心课题,坚决按照《课题计划》及其五个节点工作要求、按照《史料工作计划》相关部署,全力推进相关课题研究和史料发掘工作取得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

要深刻认识和加强“四史”学习教育与宋研会开展“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课题研究和史料发掘工作重要关系与内在联系。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波澜壮阔的一生,不仅见证了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而且也在“四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毕生的追求和光辉历程,她“永远和党在一起”的思想精神,正是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最生动最鲜活的内容和教材,是我们宋研会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的特色和重点。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四史”学习教育活动重要契机,认真、积极、主动、持续、创造性地做好宋研会迎接建党100周年的各项工作。要用好用活身边的、生动的、鲜活的学习资源,拓展学习形式,夯实学习成效,以“四史”学习教育推进课题研究工作,以课题研究深入促进“四史”学习教育,形成良好互动关系,努力讲好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上海故事、讲好宋庆龄故事,为全党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为迎接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 坚持“学术强会、开放强会、实干强会”精神,努力形成宋研会为主、凝聚社会力量协同攻坚的良性工作局面。

要坚持“三个强会”,充分发挥好宋研会全体理事会员及其单位的主体作用、秘书处的引领作用、市孙宋文管委和中国福利会的支撑作用、两馆一处的基石作用。要建立健全、充分发挥“三家合作机制”“五个合力机制”“会校会所合作机制”“海内外交流合作机制”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好社会合力作用。要把内部力量、外部力量和一切积极因素、有利因素、优势资源都调动起来,形成宋研会为主,凝聚社会力量协同攻坚的良

性工作局面。要凝聚在宋庆龄的旗帜下,紧紧围绕宋研会的工作部署,用心用情投入工作,严谨认真高质量的完成相关任务,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同志们!最后我再想强调一句:我们宋研会每一位同志,有生之年能够恭逢我们党的百年华诞,见证决胜全面小康、走向民族复兴,这是一件多么荣幸、多么令人激动和鼓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更加昂扬奋发、追求卓越的工作作风,拿出我们最出色、最亮丽的工作成果,为建党 100 周年,作出我们宋研会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丛书”总序

薛 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中,曾得到过许多坚持真理与正义,热爱和平与进步的国际友人的同情、支持和援助。他们带着坚定的理想、博大的胸怀和顽强的意志,不远万里,不畏艰险,来到中国,积极献身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他们把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把个人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用青春、热血与生命,谱写出了一首首动人、壮丽的国际主义赞歌。2019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衷心感谢他们为中国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翻开国际友人在中国的奋斗史,我们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宋庆龄有着重要关系。他们前来中国,或者来到中国之后,或是受到宋庆龄独特的身份、地位和崇高人格的感召,或是在宋庆龄的直接引领下,积极投身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为中国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宋庆龄团结引领国际友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奋斗牺牲的光辉历程和卓越贡献,构成了我们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前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相互激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任务。

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就要讲好宋庆龄的故事,讲好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的故事,讲好宋庆龄团结引领国际友人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拼搏奋斗的故事,这是我们上海宋庆龄研究会新时代的新使命新任务。有鉴于此,我们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时刻,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牵头组织,推动社会各界协作,推出“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丛书”。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系列丛书”由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的协作单位承担编写出版工作。先期将推出路易·艾黎、马海德、斯诺、爱泼斯坦等与宋庆龄关系比较密切的国际友人的书籍。主要记载宋庆龄与这些国际友人的关系历程,侧重宋庆龄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自身奋斗的重要节点。我们相信,这些也是读者们普遍与迫切希望了解的内容。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将宋庆龄与其他国际友人的书籍陆续推出,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宋庆龄、了解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作出我们的一份奉献。

向宋庆龄同志致敬!

向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致敬!

专题研究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专辑^{*}

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是他人文精神、家国情怀的孕育之地,而上海是中山精神发扬光大与国际交往的通衢大道。上海在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里留下了许多他革命的足迹。这些不仅是上海这座城市对孙中山先生的重要记忆,更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

对历史的最好纪念,就是铭记历史、深悟历史,并用行动书写新的更为壮阔的历史。“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文献史料展,通过挖掘研究孙中山在沪重要革命史事与史迹,拓展研究孙中山在沪新文献新史料,深化研究孙中山与上海相关学术观点,来体现上海城市精神与孙中山纪念的时代记忆。

一、寻考史迹,挖掘研究

孙中山与上海关系十分密切。在其 40 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曾经 20 余次来到上海,并在上海留下了丰富的革命史迹。这些史迹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具有重要地位,

^{*} 2020 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 95 周年,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弘扬其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档案馆联合主办,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承办的“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 95 周年文物文献展”,于 8 月 11 日—11 月 12 日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举行。为了详实解读展览,全方位展现孙中山在上海的足迹以及他与这座城市的关联,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会长薛潮在“新时代·新海派——第十九届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海派文化与香山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上海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的主旨发言,上海历史学界各位专家应邀在《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刊发了系列文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见证了孙中山在沪革命、工作与生活的峥嵘岁月,深刻揭示了上海城市文化与中山精神的深刻关系。目前,已考证出直接与孙中山相关的史迹有 66 处,有些已经消失在城市改造中,有些仍然屹立在上海各处。这些历经沧桑的百年老建筑,如今大多数已成为国家级或市级保护建筑,承载了上海这座城市对孙中山先生的记忆与纪念。

(一) 在沪寻求上书门径,开展革命活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正式开埠。至 19 世纪末,上海发展成为远东首屈一指的近代化大都市,同时也成为国内革命党人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运动的前沿阵地。在辛亥革命之前,上海成为孙中山了解国内外政治形势的视窗和在东部沿海一带开展革命的据点。

1885 年 4 月,19 岁的孙中山离开檀香山经日本至上海,由吴淞口登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时值中法战争结束,因痛愤中国不败而败,孙中山立志报国。1894 年春夏间,孙中山携在家乡拟就的《上李鸿章书》经吴淞口赴沪,寻求上书门径。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决定以武装革命推翻清政府。1895 年至 1911 年,孙中山多次经由吴淞口赴上海秘密开展活动。如 1900 年 6 月 14 日,由日本乘船经吴淞口赴香港协商“两广独立”;1905 年 10 月 11 日,由日本乘船在吴淞口会见法国驻华武官布加卑,商讨派员调查南方革命运动;1906 年 6 月,在吴淞口约见熊克武、秋瑾、高旭、柳亚子等人,了解内地革命情形。由此可见,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吴淞口是孙中山进入上海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之一。

孙中山在沪寻求上书门径期间,结识了不少对他革命事业颇有助益的沪上名流,如时在上海轮船招商局任职的郑观应,盛家的盛宙怀、盛宣怀,清末思想家、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传教士宋耀如等人。宋耀如被孙中山称为二十年始终不变的“革命隐君子”,他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贯穿其一生。1894 年,孙中山与宋耀如、陆皓东三人在上海宋宅(虹口东有恒路 628 号 C,今虹口区东余杭路宋耀如旧居)“屡作终夕谈”,后来孙中山称此为“初谈革命”。有人称“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计就诞生在上海虹口宋宅”,可见其对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孙中山在海外流亡期间,多次秘密来沪都住在宋家。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中,宋氏家族成员的支持与追随,无疑是最坚定、持续

时间最长的。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开展了广泛的革命宣传。1905年9月,中国同盟会上海分会成立,由蔡元培任会长。1906年初,上海分会并入江苏分会,孙中山任命高旭为会长;在上海及周边开展反清革命活动。1911年7月31日,陈其美、宋教仁等又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其秘密接洽机关设在北浙江路821号(今浙江北路61号)上海湖州旅沪公学。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适应了革命形势的要求,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实际上担负起指导长江中下游革命斗争的重任,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 在沪筹建临时政府,商议国家大计

1911年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宣传革命。他得到消息后,随即赴英、法等国开展外交活动,以争取各国对革命派的支持。不久,孙中山回到上海,与革命同仁筹商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哈同花园、宝昌路408号孙中山行馆、扈虹园、沪宁铁路上海站等地见证了这一重要历史转折。

1911年11月24日,孙中山由法国马赛乘邮轮启程回国。12月25日上午,孙中山抵达上海,从海关码头登岸后,立刻乘坐汽车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哈同花园,会见伍廷芳、黄兴、陈其美等人,询问上海的情形及湖北现状,并于次日在哈同花园出席了上海各界代表的欢迎宴会。席间,黄兴、陈其美、宋教仁商举孙中山为大总统,向各代表示意,并决定召开会议商讨。哈同花园又称爱俪园,原址位于今天延安中路1000号上海展览中心,它曾是哈同夫妇的私家花园,也是当时上海社会名流、政要等经常聚会的地方。孙中山此后曾多次到哈同花园活动:1913年6月15日,他在这里参加章太炎与汤国梨的婚礼。1912年4月6日,他在这里出席统一党欢迎会。1916年11月24日,他与友人在这里参加吊唁黄兴的活动。

1911年12月25日下午4时,孙中山在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安排下入住宝昌路408号(今黄浦区淮海中路650弄3号),作为其在上海的行馆。12月26日晚,孙中山在此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胡汉民、居正等出席。会议主要商讨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重大方案,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与总统人选等问题。在会议中,孙中山以其主张的总统制力驳宋教仁的内阁制,在政体问题上获得

了多数人的同意。孙中山虽然在行馆仅居住了7天,却完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构建及政体的确立,因此意义重大。

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2月30日傍晚,他在上海扈虹园出席广东旅沪各团体为他举办的庆祝宴会,伍廷芳、胡汉民等人参加。31日下午6时,孙中山等人在扈虹园出席香山同乡的欢迎宴会,席间由王云五代表全体致贺词,孙中山作答。扈虹园建于20世纪初,位于老靶子路111号(今武进路453号),为广东赵姓富商所建,俗称“赵家花园”,现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孙中山曾多次出席在扈虹园举办的活动。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在沪宁铁路上海站乘专车前往南京,并于当晚11时,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上海出发前,驻沪各军队、团体、沪军都督、上海民政总长等均赴车站欢送,上海市民在车站附近观看。同行者有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苏都督庄蕴宽等。沪宁铁路上海站1908年建成,1916年更名为上海北站,现址为天目东路200号上海铁路博物馆。

近代中国的国家构建以及社会转型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孙中山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便是在政治上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的清王朝,建立起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制政府。从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前在上海的活动经历可见,孙中山及其革命同仁对民国政治制度的构建过程是在上海确立的,由此可见上海对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具有重要意义,亦可见上海的革命资源、政治环境对孙中山政治生涯的重要性。

(三) 在沪考察倡办实业,立志强国富民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并于4月3日回到上海,向社会宣布将从事“社会革命”,着力宣传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之后,孙中山赴上海各地及全国其他地区考察实业。

1912年4月6日上午,孙中山偕孙科、孙毓、孙婉及宋蔼龄到江南制造局考察实业,江南制造局总理李平书及海军总长刘冠雄等接待。孙中山一行还出席了海军部的宴会,陪同者有蔡元培、王宠惠、廖仲恺、唐绍仪、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江南制造局是清末著名的官办军事工业之一,位于沪南高昌庙(今世博园区浦西园区),在辛亥革命时承

担着军火制造和修理的任务。

1912年4月17日,孙中山出席在张园安垲第举办的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被公推为会长。孙中山在此次会议上展开演说振兴实业、实行社会主义、举借外债等问题,称“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张园是清末民初上海私家花园中三大名园之一(另两家为愚园、徐园),其旧址位于今威海路590弄,孙中山多次到这里参加活动。

1912年4月18日开始,孙中山赴福建、广东、武汉、天津、北京、山东等地考察。7月17日,孙中山被中华民国铁道协会选举为会长;9月9日,被袁世凯特授“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孙中山回沪后,他于11月14日在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A字第36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所,亲任总理,开始筹划全国铁路建设。

1912年12月4日,孙中山与陈其美、李平书等人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愚园,出席实业银行、信成银行等举办的欢迎南洋华侨大会。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讲,力主联合国内数十家银行与法国资本家合资创办一所大银行,发行债券,以利于引进外资。他指出:“吾国政府与六国银行团磋商借款,受种种之挟制,要求非分之权利,其原因亦因国中无极大银行,担任借款之能力耳……将国中数银行联合而成一巨大之银行,发行债券,任外资之输入,则全国金融枢纽,操之于己,即政府借款,亦可担任,不致受非法之要挟,而利益亦不致入外人之手矣。”可见其创办银行之初衷。愚园旧址位于今南京西路、常德路、愚园路一带,现址为商业和住宅区。

1916年,孙中山又计划筹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同年12月,孙中山联合虞洽卿等人联名呈文北京农商部,申请在上海成立交易所。直到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建成开业。这是我国创办最早的综合性交易所,地址位于今延安东路110号四川大楼。

筹建全国铁路、计划引进外资、创建大型联合银行、成立物品交易所等实业建设思想与社会实践,无不体现出孙中山“振兴实业以裕民生”、立志强国富民的爱国情怀。这些考察及实践活动,也为其后来撰写《建国方略》、勾画实业救国的宏伟蓝图奠定了基础。

(四) 在沪筹划反袁斗争,捍卫共和制度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刺杀于沪宁铁路上海站。正在日本考察的孙中山闻讯后立即回到上海,于1913年3月在上海外滩31号横滨正金银行召开会议,募集反袁革命资金。7月12日,孙中山在沪发表讨袁通电,“二次革命”爆发。反袁斗争失败后,孙中山由上海流亡至日本,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设本部于东京。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孙中山于4月27日从日本启程回国,亲自指挥讨袁斗争。在反袁斗争中,陈其美在上海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5年9月底,孙中山派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潜回上海,策划革命起义。10月,陈其美在环龙路100弄设立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陈其美策划了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肇和舰起义、沪陆海军起义等革命事件,对革命党反袁斗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寓所内被袁世凯指派的特务刺杀身亡。下午,孙中山不顾自身安危前往陈其美寓所祭奠,并亲撰祭文。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旧址位于今南昌路100弄5号,现为民宅,是黄浦区文物保护单位,陈其美旧居已拆除。

1916年7月6日,黄兴从日本回沪养病,居住在福开森路(今武康路)393号。1916年10月30日,黄兴病危。孙中山闻讯后,亲自前往黄兴寓所慰问。10月31日,黄兴逝世后,孙中山又多次至黄兴寓所参加治丧会议。12月,黄兴灵柩归葬湖南,孙中山前往执紼,并步行至金利源码头为其送行。黄兴旧居人称“黄公馆”,现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革命党上海总机关部、陈其美旧居、黄兴旧居等,见证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沪开展反袁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

(五) 在沪总结革命经验,发表救国演说

孙中山曾在演说中提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进而提出了“革命成功全赖宣传主义”的口号,认为“一文笔胜于三千毛瑟枪”,可见其对舆论宣传的重视。孙中山在沪期间,多次赴沪上各处进行演讲,以宣传其革命救国思想。

1912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举

办的武昌起义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说,阐述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号召学生坚忍冒险、发愤求进:“须有冒险心、坚忍心,协力赞助政府,以造成地球上头等大国。”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成立于1905年,由留美归国的复旦公学校长李登辉担任会长,朱少屏为总干事,董事有颜惠庆、伍廷芳、宋耀如等人,是上海最早为留学生服务的机构。它曾将20批勤工俭学留学生送往法国,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早期中共领导人都曾在其帮助下赴法留学,接触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培养了骨干力量。后迁到卡德路(今石门二路)191号。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卡德路191号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作了题为“救国之急务”的演讲。

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应上海社会党本部邀请,在中华大戏院及众舞台剧场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说。演讲内容有社会主义之源流、派别、马克思集产社会主义之学说、社会党应有政治上之活动等。孙中山在演说中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此由社会主义精奥复杂,非但我国人未窥底蕴,即欧美人亦多不了了。然社会党成立,而社会主义之精髓未得,则此社会主义有流弊随之,此不得不与诸君研究者也。”中华大戏院位于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大新街。演说后,孙中山修订出版了《社会主义的精义》一书。

1919年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出席会议。8月5日,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部闭幕式会议在上海南京路先施公司屋顶花园举行,孙中山出席会议并作演讲,强调“革命党只能革命”“革命为‘革命党’毕生唯一的事业”。先施公司现为南京东路690号上海时装商店,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环球中国学生会与中华大戏院建筑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先施公司建筑仍然屹立于上海南京东路上,而孙中山的救国演讲,则永远留在了上海城市的记忆中。

(六) 在沪探索革命新路,酝酿国共合作

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入住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1918年至1919年,孙中山思想理论在此发展成熟,完成了重要著作《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1920年11月,他在此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1922年8月,在此会见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3年1月,在此会晤苏俄特使越

飞,商讨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孙中山逐渐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思想。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以这三大政策为基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之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保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顺利发展,成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莫利爱路孙中山寓所即今天的上海孙中山故居,这里作为孙中山宋庆龄婚姻生活见证地、《实业计划》成书地、国共合作的酝酿地而永载史册。宋庆龄在1958年为《孙中山故居》一书所作的序言中称:“这个纪念馆是富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曾经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取得胜利,而为建设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在这条道路上,中山故居象征着重要的里程碑。”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直至1937年11月离开上海赴香港。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将此寓所捐赠给国民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地。

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正式通告将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中国国民党规约》,设国民党本部于上海环龙路44号,总理全党事务。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环龙路44号改设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被称为“国共群英会”,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向警予等人都在此工作过。环龙路44号旧址位于今南昌路180号,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孙中山在沪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史迹地。

在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会面期间,还有一个史迹地值得一提,即汇中饭店。1923年1月17日,越飞抵达上海后入住汇中饭店。期间,越飞多次与孙中山会面。1月26日,两人在上海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也加快了他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汇中饭店位于今中山东一路19号和平饭店南楼,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曾在汇中饭店出席同盟会本部举行的欢迎会,并在此发表国内首次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赋予了汇中饭店以革命意义。

二、发掘馆藏,拓展研究

上海不仅有众多的孙中山史迹遗址,还有着丰富的孙中山文物文献史料。《上海

城市记忆中的孙中山》文物文献展从沪上4个方面征集文物,挖掘与整理孙中山在沪重要文物文献共345件,其中实物197件,图片148件,首次展出近30件,并对这些珍贵文物文献史料进行拓展研究,以全面展现孙中山在沪的革命事业。展品的4个主要来源为:“两馆一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馆藏文物精选,4所高校(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校史馆馆藏精选,上海图书馆馆藏孙中山宋庆龄报刊文献资料,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孙中山纪念性文献史料等。另外,上海市政协办公厅、上海中山学社也为展览提供了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在孙中山纪念日的相关文件及图片史料。

(一)“两馆一处”馆藏精选

本次展览汇集了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3家孙宋纪念地的重要文物文献,从不同方面印证孙中山在沪的革命生涯、生活岁月及其社会影响。

1. 孙中山撰写、珍藏的书籍及题词。孙中山曾说:“我一生除革命外,惟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够生活。”入住上海寓所后,宋庆龄常陪同孙中山一起到棋盘街书店选购书籍。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有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藏书共计5000余册。本次展览的书籍以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特色书籍为主,有孙中山珍藏的1922年尼克博克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本《实业计划》,在书中孙中山系统规划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孙中山题赠宋庆龄的《孙文学说》;孙中山亲自校阅过的《建国方略》,该书由《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三篇著作汇集而成,于1922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展览还首次展出了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时所用的参考书:1918年上海出版的黄浦江水利委员会著《黄浦江水道测量报告第2号》,192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黄郛著《战后之世界》,1913年上海《中国公论西报》[The National Review(China)]出版的《中国的铁路附地图》(The Railways of China with Map)。这些书籍反映了孙中山在革命低潮寓居沪上著书立说的历史岁月,体现了孙中山哲学思想和实业建国思想的飞跃发展。展览还展出了1924年出版并由孙中山题写书名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是1924年孙中山在

改组国民党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后出版的系列书籍。

另外,展览首次展出了孙中山书赠伯陶《天下为公》字、孙中山书赠黎仲实《博爱》题词。其中,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来源于《礼记·礼运·大同篇》,体现了孔子大同思想对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影响。这些均是研究孙中山思想的重要文物。

2. 孙中山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1918年入住莫利爱路寓所后,孙中山、宋庆龄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港湾,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家庭生活。展览展出了孙中山、宋庆龄使用过的中西餐具、木棋盘和围棋、锡壶,孙中山宋庆龄在寓所使用的煎锅、冷水壶、绣花被套枕套,孙中山设计并穿过的中山装等文物。孙中山长期为革命奔波,生活极不规律,最终患上严重的胃病,宋庆龄悉心照料孙中山的饮食起居,使其身体状况有明显的改善。孙中山生活简朴,不抽烟,不喝咖啡,平时常喝白开水。展览展出了孙中山、宋庆龄使用过的玻璃冷水杯以及招待客人用的烟灰缸。这些孙中山曾经使用的日用品如今仍然保存完好,成为体现他和宋庆龄在沪日常生活的生动见证。

3. 体现孙中山逝世后对后世影响的文献史料。孙中山逝世后,孙中山的形象和精神仍然影响到政治、市政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在政治方面影响深远,这从宋庆龄撰写的手稿中可见一斑。五卅惨案发生后,宋庆龄强烈谴责英、日暴行,并指出“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1925年6月7日宋庆龄在莫利爱路寓所致杨杏佛信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复印件),请他帮助修改宋庆龄就五卅惨案接受记者采访等稿件。6月18日,宋庆龄化名“宋琼英”在《民族日报》发表《孙中山先生与“五卅”后之民族独立运动》一文,指出“努力推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反抗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的唯一途径”。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分别在上海和武汉实行屠杀中国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反革命政策。1927年7月,宋庆龄在汉口撰写《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抗议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径。不久,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上海《晨报》先后刊发了英文全文和中译文全文。1928年8月21日宋庆龄致杨杏佛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藏原件)表示:“只有共产党能实行孙博士的主义”,她坚定地实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览展出的宋庆龄上述书信和文章,体现了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革命原

则和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和实践者。

在市政建设方面,1927年7月,为打破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垄断上海城市中心的局面,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根据孙中山《建国方略》的思想,提出了“大上海计划”。1929年7月市政府会议正式通过“大上海计划”,将江湾一带划为市中心区域。该计划于1930年上半年开始实施,其间因日本侵略而被迫停工数次,1937年淞沪会战后被迫中止。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珍藏了宋庆龄收藏的带有“大上海计划”建筑图案的明信片。

在社会生活方面,孙中山影响极为广泛。1927年北伐军攻克上海后,孙中山生前喜爱穿着的“中山装”随着革命潮流迅速成为沪上各界人士的穿着时尚,不少青年以穿“中山装”表示自己是真革命者。孙中山生前曾大力提倡国货,中国民族资本家便用孙中山形象作为提倡国货的象征,亦为其商品做宣传,如中山牌香烟、纪念钟表等。1925年9月3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中山牌香烟广告。20世纪20年代,德商礼和洋行发行了孙中山纪念表广告单。民国时期上海还出现了带孙中山头像的座钟、印有孙中山邮票的信封和明信片、黎锦晖于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逝世而创作的《总理纪念歌》唱片等,都体现了孙中山符号对上海社会生活的影响。1935年,漫画家陈青如在《今代漫画选》上发表了漫画《中国最著名的山》,画中先生问“中国最著名的是什么山?”学生回答“孙中山”,可见孙中山形象对民国社会生活影响之深远。

(二) 4所高校校史馆馆藏精选

孙中山先生始终关怀和爱护青年学生,注重培养青年的知识和学业。鲜为人知的是,孙中山和上海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华东政法大学4所高校都有一段关系。展览首次梳理了孙中山与上海4所高校的历史渊源,并展出书信、题词、历史图片等相关文献史料。

1. 孙中山与复旦大学。辛亥革命期间,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被迫迁至无锡办学,后因政局更迭,经费无着,师生流离。1912年3月,孙中山为复旦学生拨款1万银圆作为复校经费,指拨徐家汇李公祠堂为复旦公学校舍。同时,孙中山受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以及于右任等邀请担任校董。马相伯等人在信中称:“复旦为东南巨校,坐视沦替,情所不安……兴复不易,亟待扶持。伏以显示学林泰斗,薄海倾心。敢为吾徒,乞赐

栽植。倘荷不鄙,许为复旦校董,时时督教,以所不及,不胜大愿。”1923年,孙中山还应复旦师生之请,题写“努力前程”4字,发表在当年的《复旦年刊》上。为庆祝孙中山于1921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学校校务会议决定每年的5月5日为复旦校友节,可见其对孙中山的缅怀之情。

2. 孙中山与上海交通大学。1911年、1919年,孙中山两次受邀到南洋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发表演说,激励了一大批交大师生毕生投身实业报国,致力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其中在1911年,孙中山受校长唐文治之邀,演讲铁路对中国经济和国防的重要性,他介绍自己的铁路建设思想,并勉励师生们立志终身为发展实业、振兴中华而服务。20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为学校学生刊物《南洋》杂志题写刊名,为学校最具影响的体育社团技击部刊物《技击部成立十周年纪念册》题写“强国强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交大师生于3月23日在上院文治堂举行追悼会,特邀恽代英、章太炎等发表演说悼念孙中山。

3. 孙中山与上海大学。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这是一所由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大学,云集了当时上海国共两党精英,于右任任校长。1923年9月,孙中山应上海大学评议会邀请,担任学校名誉董事。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决议“每月补贴上大一千元”为办学经费,大力支持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孙中山还为上海大学《孤星》旬刊亲题了刊名。1925年4月24日,上海大学师生发起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发起人中的大部分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和党员。研究会的宗旨是通过研究孙中山的革命经验和理论以探求实现中国乃至世界和平的途径,1925年12月20日出版了《中山主义》周刊。

4. 孙中山与华东政法大学。1903年,圣约翰大学用庚子赔款基金兴建“思颜堂”,以纪念中国籍牧师颜永京,这一建筑现以楼群序号被称为“40号楼”。1913年2月1日,孙中山应邀至上海圣约翰大学思颜堂为毕业典礼致辞。在演讲中,他论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告诫青年学生:“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

(三)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精选

上海市档案馆作为主办方之一为这次展览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复制了多件重要

文物文献。

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逝世后为缅怀孙中山而出版的《向导》周报《孙中山特刊》是重要文献之一。1925年3月21日,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出版《孙中山特刊》,首页刊登《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指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不会随着孙中山先生的逝世而停止,号召民众在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等中坚力量的领导下,秉承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遗志,继续推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1926年在孙中山逝世一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发表《为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各界书》,号召各界民众齐聚在孙中山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为实现孙中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而奋斗。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法租界公董局档案记录了上海各界在孙中山纪念日举办的各种纪念活动。如192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3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相关的纪念仪式。同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62周年纪念日,上海各界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

在抗日战争中,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乐观主义革命态度激励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1940年3月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法租界散发传单,号召上海民众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坚定抗战信心,将侵略者赶出国门。抗战时期国民党原上海市党部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散发传单(上海市档案馆藏原件)并呼吁上海民众将日寇赶出国门,记录了这一重要事件。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另有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纪念孙中山诞辰、逝世等相关重要文件。其中较为珍贵的是宋庆龄在孙中山诞辰、逝世纪念日写给中国福利会工作人员的书信。1958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92周年之际,宋庆龄致函中国福利会,希望中福会同仁继承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为建设伟大祖国和美好幸福生活而奋斗。

(四) 上海图书馆馆藏精选

上海图书馆有着十分丰富的近现代史料馆藏,与孙中山相关的既十分丰富也非常珍贵,以书信、民国报刊资料为主。其中,孙中山在1891年6月发表的《教友少年会纪事》一文,刊登在上海广学会刊物《中西教会报》上,这是目前可知孙中山最早发表在报

刊上的文章。

上海图书馆还提供了其所珍藏的郑观应写给盛宣怀的推荐信。1894年,孙中山撰写了《上李鸿章书》,提议通过改革来实现中国富强。之后孙中山专程赶到上海,在这里他先后见到了盛宣怀、郑观应、王韬等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推荐信。

1896年10月11日,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人员诱捕,后经老师康德黎的全力营救而获释。孙中山将蒙难经过写成《伦敦被难记》,并于1899年在英国出版。同年,上海一些西文书店开始畅销此书,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声誉传扬于世界。上海图书馆提供了1912年出版的《伦敦被难记》。

孙中山逝世后,上海民众开展了多种纪念活动,如上海图书馆提供的1925年出版的《图画时报》上,刊载了1925年4月12日上海市民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追悼孙中山的盛况。上海市民约10万人参加,上午10时,宋庆龄偕母亲倪珪贞及孙科等出席,何香凝在会上报告了孙中山的历史及勋绩,同时号召民众跟随孙夫人宋庆龄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遗愿而共同奋斗。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陷入危急,国民党政府迫于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呼吁共同抗日的压力,终于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宋庆龄得知后立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国共合作之感言》,她指出只有施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紧密合作,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的独立解放。1937年出版的上海《抗日画报》刊登了宋庆龄撰写的《国共合作之感言》。

三、传承精神,深化研究

本次展览对于深入探讨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及地位,尤其是深化研究中山精神在上海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着重以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孙中山撰述的《实业计划》、中山精神在上海的传承发展、孙中山在沪著述等视角进行深化研究,进而突出中山精神对后世的重要影响及所产生的时代意义。

(一) 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熊月之对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1)上海是孙中山投身政治活动的

起步地。上书李鸿章一事是孙中山投身政治活动并产生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2)上海是最早宣传孙中山领袖地位的城市。1903年,章士钊在上海译编出版《孙逸仙》一书。(3)上海不仅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城市,还是支持新生革命政权的重要城市。1912年元旦,他从上海北站出发,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拥有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的上海,为孙中山革命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比较理想的环境。上海是孙中山心灵安顿之所,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二) 孙中山撰述的《实业计划》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戴鞍钢认为,孙中山在上海撰写问世的《实业计划》彪炳史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近代中国内容最宏富的实业发展整体方案,主要由六大计划组成,强调以大力发展交通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他认为孙中山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设想,对当下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极富教益和启示,亦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历史篇章。

(三) 中山精神在沪传承与发展研究。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廖大伟从上海对孙中山的纪念、对中山精神的传承与发展方面进行了研究。上海人民对孙中山感情深厚,每年孙中山诞辰日、逝世日,上海人民都会追忆、纪念。在1922年成立的上海大学,孙中山给予了关注与支持。上大师生对孙中山感情很深,其逝世后,有学生发表《孙先生不死》一文。上海中山医院原名上海国立医学院,1930年颜福庆“以继总理救民之间遗志”之名筹备中山医院,于1936年底建成。孙中山关注上海、喜欢上海,给上海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为浦东、洋山港构建的发展蓝图是上海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如今,“东方大港”已经实现,浦东开发成就斐然,孙中山梦想的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已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四) 孙中山在沪著述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涛认为,孙中山寓沪期间,是其一生最主要之平静时光,也是他思想臻于成熟,广布于世的关键时期。短短两三年间,他接连完成《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两本皇皇巨著,加上先前撰就的《会议通则》(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共同汇集成了《建国方略》一书,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著述不仅完成于上海,还是上海出版,发行于全国,最终流传于世界。可以说,没有上海的孙中山,就没有中国的孙中山、世界的孙中山。

结语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每逢孙中山先生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尤其是逢十的诞辰纪念日,国家均以高规格对其予以纪念。1956年,毛泽东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而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把三民主义纲领、统一战线政策、艰苦奋斗精神并称为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是“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2016年,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在他生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事业。在他身后,中国共产党人忠实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英勇奋斗、继续前进,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近百年来,孙中山在上海的革命历程和上海对中山精神的传承与发扬永远留存在上海城市记忆中。思想开放、拼搏进取、与时俱进、敢为天下先的中山精神,与开放、创新、包容的上海城市品格交相辉映,熠熠生辉。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建设东方大港和开发浦东的卓越见解和强烈期盼,正是今天浦东发展最令人瞩目的部分。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提出在上海修建东方大港,其计划港位于乍浦港和澈浦港岬之间的杭州湾乍浦正南之地。他认为“此港正门为最深之部分,由此正门出至公海,平均低潮水深三十六尺至四十二尺,故最大之航洋船,可以随时进出口”。如今,上海洋山深水港正位于杭州湾口附近,港岸线长达30公里,年吞吐量可达2000多万标准箱,拥有全球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成为闻名世界的东方大港。孙中山还主张改造黄浦江,开发浦东,“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左岸建一新黄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之新地之价值”。如今,浦东改革开放30年,浦东新区作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核心承载区,聚焦高端产业引领,以中国芯、创新药、蓝天梦、未来车、智能造、数据港为代表的“六大硬核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孙中山这

一宏伟计划已然实现。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在历史上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 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下,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建设的独立、民主、富强的国家正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孙中山与上海城市品格

熊月之

孙中山是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上海是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城市。一个人与一座城市内涵的一致性,使得这座城市对这个人容易发生影响力,也使得这个人对于这座城市容易产生适应性。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使得上海对孙中山革命事业、学术生涯、个人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关键的、决定性影响。虎啸生风,风助虎威,用风、虎关系形容上海对于孙中山的意义,庶几近之。

上海是孙中山投身政治活动的起步地。1894年,他在上海,辗转联系、得识陆皓东、王韬、郑观应、盛宙怀、宋耀如等,并通过盛宙怀联系上盛宣怀,由此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尽管没有见到李鸿章,但上书一事,却是孙投身政治活动与思想演变的重要一环,《上李傅相书》因此得以在报上发表。至于结识宋耀如对于孙中山革命事业、个人生活的意义,早已为世人所共知。其时上海人文荟萃,上述陆(香山人)、王(苏州人)、郑(香山人)、盛(常州人)、宋(文昌人)等,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孙中山能在一个城市,联系、结识那么多时彦名流,这便是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品格的魅力所在。

上海是最早宣传孙中山领袖地位的城市。1903年,章士钊据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中有关孙中山事迹的内容,译编出版《孙逸仙》一书。当时还在狱中的章太炎,为此书题词:“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嗑;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称颂孙是揭竿而起的刘邦式英雄(赤帝),反清功劳胜过郑成功、洪秀全,是四亿人

民共同拥戴的领袖(民辟)。那时,中国同盟会还没有成立,孙中山还没有在组织上成为革命领袖,上海革命党人已如此宣传,这对于孙中山日后领袖地位的确立,无疑有着率先树旗的意义。就在这本《孙逸仙》中,章士钊误将“孙文”(中文姓名)和“中山樵”(日文名)嫁接在一起,译为“孙中山”。由此,“孙中山”的名字第一次被创造出来,第一次出现在中文读物中。所以,上海是“孙中山”名字的诞生地。

孙中山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上海反清革命高潮的激发者。《苏报》原是比较温和的报纸,经章士钊接办以后,革命态度一下子激昂起来。苏报馆主陈范非常紧张,担心由此惹祸,决意辞退章士钊。就在这时,一个自称孙中山的人(后来查明,真实姓名叫钱宝仁,是个江湖骗子),悄悄地向陈范表示,坚决支持《苏报》宣传革命。陈范一向崇敬孙中山,信以为真,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变化,放手让章士钊去宣传革命。于是,章太炎鼓吹革命的文字,为邹容《革命军》所写的序言,陆续发布出来,愈演愈烈,导致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的发生。

还是那个假孙中山,到张园演说,满口“革命!革命!”引得听众如醉如痴。孙中山虽然名满天下,但张园里那些听众没有人见过孙中山,不知道孙中山是何模样。所以,都以为确是孙中山来沪演说!当年听众之一黄炎培,便一直以为是孙中山,有诗咏道:“味蕤园里吼狮声,最早词坛识伟人。听取批评清政治,大群革命种深根。”其实,孙中山在1911年以前,是清政府通缉的对象,根本没到张园演说过。上海发生的这些与他有关的事,孙中山本人也压根儿不知不觉。

演说的孙中山是假的,但孙中山的影响是真的;“苏报案”是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也是真的。这段历史,比电视剧生动有趣!

上海是孙中山在晚清从事革命活动提供经费极多的城市。晚清孙中山活动的经费来源,除了海外华侨,在国内支援最多的是两个人,即宋耀如与张静江,两人经费基地都在上海。

上海是辛亥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城市,也是支持新生革命政权的重要城市。武昌起义爆发以后,遭到清军残酷镇压,民军一度岌岌可危。是上海的起义成功,以及由上海带动苏州、杭州的独立,南京的克复,才使得全国性反清起义获得最终胜利。上海在反清革命斗争中,起着扭转乾坤的作用。新生的革命政权成立以后,其经费也主要靠上

海革命党筹集。

民国时期,孙中山事实上是以上海为革命基地。1912年元旦,他是从上海北站出发,到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行前,上海各界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是在上海举起了反袁的“二次革命”旗帜。日后,他在广东、西南一带活动不顺时,或者困顿了,便退居上海。他的重要著作《建国方略》是在上海完成的。他与宋庆龄结婚,在上海度过他一生最为温馨安定的家庭生活。上海不光是孙中山家庭生活的处所,也是他安顿心灵的处所,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体现开放、创新、包容品格的上海城市,为孙中山革命活动创造了必须的、比较理想的环境,孙中山的活动,又从多方面丰富了上海城市品格的内涵。这便是一座名城与一代伟人之间的关系。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上海文史馆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与上海同辉映

戴鞍钢

伟大的爱国者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与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息息相关。他为民族独立和富强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曾在上海留下诸多精彩华章。其中,在上海撰写问世的《实业计划》熠熠生辉彪炳史册。

1894年,28岁的孙中山就曾风尘仆仆,从广东到上海找人润色文字,又赶赴天津向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提出了一份在中国努力发展近代工商业和改革教育制度及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以求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实现民富国强。但他的美好愿望,却遭冷遇。严酷的现实,促使孙中山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决意从推翻专制统治、创立民主共和政体着手,去谋求国内各区域经济联动发展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夙愿。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继而武装反抗袁世凯倒行逆施的“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陷入低谷。

此后,他为重建民主共和与北洋军阀继续开展英勇斗争,同时进一步周密思考、精心架构、全面推进中国经济领域各方面建设的宏伟方案。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完成了著名的《实业计划》。同年,他挥笔为上海中华实业协会主办的《实业旬报》创刊号题词:“振兴实业以裕民生,实今日救国之急务也。”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近代中国内容最宏富的实业发展整体方案。它由六大计划组成,强调以大力发展交通业为先导,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提出在10—20年的时间内,在中国的华北、华东和华南分别修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3个大型海港,

4个二等海港,9个三等海港,15个渔港。与此同时,修筑总长10万英里的铁路,组成中央、西北、东北、东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一个连结全国的铁路运输网络。另外,还要在全国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和治理、疏浚江河湖泊,使海运、铁路、公路和内河航运相联结,结成一全国性的水陆交通运输网。在此基础上,大力开发各地的矿藏资源,发展各类轻重工业和推动农业的近代化。这一内容丰富、气魄宏伟的建设方案,把近代中国的实业思想和主张推向了新的高峰,是谋求民族复兴的系统设想和宏伟规划。

其中,孙中山特别重视发展铁路事业,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实业的关键之处,强调无论为了国内各区域经济联动以求富民强国,还是为了保障国家的主权和统一,修筑铁路都是当时的急务。他首先注重联结沿海与内陆及边远地区之间的铁路事业,同时又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形,要求同时也应重视公路建设,努力使之与铁路建设相辅相成,以节约建设资金,并充分发挥铁路运输网的经济效益,大力推进各地的经济建设。孙中山区域经济带发展设想的重点,是以上海为龙头的沿海及长江流域为主干,多方面带动和促进内陆及更广大地区的经济振兴。

他曾多次指出,以上海为龙头的沿海及长江流域人口众多,经济发展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技术和管理人才比较集中,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又有一定的基础,以它作为全国经济发展的基点和后援,是合理也是可行的。细读《实业计划》,孙中山的方针清晰可见,即以前者为骨干,通过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纵横交错的运河系统和便捷短途的公路运输线,向四面八方辐射,将全国各大地区联成一体,大力推动内陆及边远省区的经济建设,缩小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使中国的经济实力在总体上有一个较大的进步。孙中山曾以美国西部开发和加拿大一些落后地区经济拓展等实例,说明上述设想是可行的,并从各种角度,具体阐述了他的这些方案。

虽然孙中山壮志未酬,他对谋求国内各区域经济联动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殚精竭虑和不懈努力,永远彪炳史册,并对当今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长江经济带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奋斗的人们极富教益和启示,亦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熠熠生辉的历史篇章。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上海对孙中山的纪念与缅怀

廖大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上海人民无限悲痛。《申报》连续多日报道民众到莫利爱路寓所(今上海孙中山故居)凭吊的新闻,并从1925年3月14日开始推出“孙中山逝世之哀悼”新闻专题,进行了连续7天的报道。国民党在北京治丧告一段落后,葬事筹备处在上海成立。从陵墓图案征集、评选到中山陵建造和宣传,葬事筹备处工作积极推进,不断落实,上海各团体和各媒体也积极参与,由此孙中山逝世后又进一步受到关注,在上海民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纪念孙中山成了上海民众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年的孙中山诞辰日、逝世日成了纪念日,此外还有总理纪念周、植树节等等的纪念活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崇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这也体现在当时新成立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所作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1928年中山路开始拓建,不出几年便建成了中山环路,成为当时上海最长的道路。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指出,上海“苟长此不变,则无以适合于将来为世界商港之需用与要求”,希望上海能够变得更好,发挥更大的作用。据此,上海特别市政府着手制订和实施“大上海计划”,将租界北面东近黄浦江的江湾一带划为市中心区域,在一片农田间建设一座上海新城。在道路命名上既凸显“中华民国上海市政府”这九个字,又按照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世界大同思想分别命名了三民路(今三门路)、五权路(今民星路)、世界路、大同路(未建)。

上海最早建成的孙中山“总理纪念碑”也位于江湾地区,碑高3丈余,正面镌有谭延

闾所题“独有千秋”、蔡元培所题“侯圣大惑”。1929年10月10日,江湾当地民众提灯参加了“总理纪念碑”揭幕落成大典,为此上海特别市政府还将原体育会路改名为纪念路。另外“总理铜像”原来计划建在上海北站,后讨论决定建在上海特别市市政府大楼旁边。1933年11月12日,上海举行孙中山诞辰及“总理铜像”揭幕纪念大会,“参加观礼者六万余人,典礼隆重,全市悬旗庆祝,颇极一时之盛”。如今上海的中山医院原名国立上海医学院,创办于1927年。1930年颜福庆“继总理救民之遗志”,凭借“总理”名义发起筹备中山医院,以孔祥熙为主任,聘请国内各界领袖,广募经费,终于1936年底在枫林桥一带建成了中山医院。中山医院的创设,几乎全部借助社会力量而成,其中“总理”的名义吸引了大家,是事半功倍的关键。

1922年上海大学成立,孙中山正值留驻上海,筹划改组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因此对上大甚为关注。他希望上大办成“以贯彻吾党之主张,而尽言论之职责”的革命学校。当时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人应邀执教,该校面貌一新,声誉鹊起。该校进步学生社团为了促进交流,针砭时弊,创办了《孤星》杂志,孙中山欣然为该杂志题写“孤星”刊名,以示对年青学子的扶持和寄望。孙中山逝世后,上大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有学生还在《觉悟》上发表《孙先生不死》一文,赞扬“孙先生之一切行为与思想,皆是建筑在被压迫民族之解放与利益上了”,号召全国被压迫的同胞团结起来,为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事业而努力奋斗。五卅运动中上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执着精神,其中也表现了对孙中山的纪念。

“一·二八”淞沪抗战表现英勇的第十九路军,来自1923年奉陆海空军大元帅孙中山之命而组建的粤军第一师。由陈铭枢任旅长的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最终独立出来并成为拥有3万多人的第十九路军。这支部队从来不忘他们是孙中山亲手缔造的部队,爱国御敌是他们的本分,所以“要以伟大牺牲精神来战胜一切”。他们以简陋的装备坚持抵抗日军长达34天,其英勇抗敌的事迹受到中国社会各界甚至西方媒体的一致称赞。

孙中山不仅受到全世界华人的爱戴,受到上海人的爱戴,也受到在沪外国人的尊敬。1942年2月5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马杰里签发命令,宣布孙中山逝世、诞辰纪念日为上海法租界的假日。

孙中山关注上海,喜欢上海,也给上海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实业计划》与上海息息相关,他为浦东、洋山港构建的发展蓝图是上海一笔弥足珍贵的遗产。如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方大港”已经实现,浦东开发成就斐然,而中华民族也在朝着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断迈进。

(作者为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中山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

孙中山寓沪生活二三事

徐 涛

自 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回国,至 1925 年 3 月 12 日与世长辞的近 14 年岁月里,孙中山多住在广州、上海两地,时光相近,广州生活 4 年又 8 个月,上海更长,计有 5 年零 19 天。然而相较于在广州,孙中山组织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突遇陈炯明之袭击、担任海陆军大元帅等等,事事来得扣人心弦、跌宕起伏、吸引眼球,孙中山的寓沪生活显得异常平静,甚至而言“逊色”许多,往往不被史家关注。

其实上海才是孙中山生命中最重要城市,即便广州也不能匹敌。

孙中山的思想,并非顿悟偶得的。据其自述:“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之固有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这与孙中山读书、读好书、会读书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孙中山不止一次说过:“我一生除革命外,惟一的嗜好就是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在 1916 年讨袁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孙中山终于在上海可以有固定之住所,不再流亡,购书经费也不再像之前那般拮据,所买书籍不必送人,随之藏书也丰富起来。

据孙中山的贴身护卫马湘的回忆,孙中山在上海平时用度甚节俭,但涉及买书,则经常处于“忘我”的境界:

林焕庭某次来见先生(孙中山),报告华侨汇款来的事情。先生说:“好!款存在你处吧!”有一天,先生、夫人(宋庆龄)和我到林焕庭处取了百多元,缓

步走到棋盘街,走进一间旧书店里,选购了一大堆线装书。我将带来的大包袱把书包好,但是太重了,不容易拿回去。我便对先生说:“可否雇一部马车搬回去呢?”先生说:“好,这样重的书籍背着是不好走的。”说着把手向衣袋一摸,又说:“钱已经买书用完了。”夫人也说身上没有钱。先生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说有四角钱,遂雇了一部马车回去。先生随即命林焕庭购置书橱,并和夫人把书籍分门别类地放在橱内。先生有一次还带着我雇了马车到北四川路购了一大批外文书籍和制图仪器等物。

可见,孙中山实在是爱书之人,进入纸张的世界,居然花得一分不剩,也不自知。

在莫利爱路 29 号(今香山路 7 号)的孙中山上海寓所,楼上有他的读书室和藏书室,曾在这里见过他的一位苏联人马特维耶夫·博德雷回忆:“一张大写字台和上面摆着的东西,说明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具有怎样的思想办法。在几乎顶到天花板的玻璃书橱里,摆着许多书。书背上的字使主人知道全部书籍的名字。大概,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找到这里的任何一本书。”

上海孙中山故居迄今还保存着大部分孙中山一生所购买的图书,书目的总数 1 932 种,总册数是 5 230 册。这些书籍,绝大部分都是孙中山在寓沪期间购买、阅读的书籍。

革命实务千头万绪,与静心著述常常无法并行不悖。没有思想的政客,一旦政治失势,往往无所适从,但孙中山与他们大不相同,政治失意的他,可以隐居上海,过着读书、著述、出版的学者式生活,继续影响中国时局。

1918 年 6 月,孙中山避居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之中,其撰述计划是先写“精神上之建设”,后著“实际上之建设”。

“精神上之建设”是指《孙文学说》一书。孙中山自 1894 年《上李傅相书》就提出“知、行”问题,以后亦数次提及,这本是人类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孙中山读书破万卷,对此哲学议题有所思考,也不为怪。

“实际上之建设”专指《实业计划》,它是孙中山用英文,一个计划、一个计划写完,后经朱执信、廖仲恺等人翻译成中文,合并出版的著述。

《实业计划》可以说是孙中山厚积薄发之产物。而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

际局势,正式给了孙中山书写这本《实业计划》的最后推动力。

短短两三年间,他一口气写完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两本皇皇巨著,加上先前偷闲撰就的《会议通则》(后改名为《民权初步》),共同汇集成了《建国方略》一书,成为孙中山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著述不仅完成于上海,还是在上海出版,发行于全国,最终流转于世界。

孙中山虽终其一生都未曾单独以上海为题,谈论过自己与上海的关系,但这并不表明孙中山与上海的关系疏离。孙中山寓沪期间,是其一生最主要之平静时光,也是他思想臻于成熟,广布于世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上海的孙中山,就没有中国的孙中山,世界的孙中山。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回望 1949:为新中国奋斗”专辑*

伟大抉择 中共中央来电

(1949 年 1 月)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 周恩来

子皓

这是中共中央 1949 年 1 月 19 日致宋庆龄电全文。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署名,热诚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这封电报附在中共中央发给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刘骁的指示电之后。

两份电报均由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

中共中央指示电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

*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在“上海宋研会”微信公众号上推出“回望 1949:为新中国奋斗”特辑,逐月回顾宋庆龄在 1949 年当月的重大事迹,讲述 70 年前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的点点滴滴,缅怀宋庆龄的历史功勋和伟大精神,展现缔造新中国宏伟气象。执笔者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秘书处朱玖琳、王悠然。

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联络人可否约倪斐君至港面谈,并托其设法助孙夫人至港,但必须严守秘密。如你们认为危险,则可放弃此秘密办法。”最后,周恩来还特地加上:“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北上,源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但此时,大多数民主人士还在南方,上海和香港都居住着众多著名的民主人士。于是在周恩来的部署下,潘汉年、方方、连贯、夏衍等人,避开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的眼线,成功地护送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一路向北,到达解放区。

此时的宋庆龄刚刚在上海发表声明,批驳将在国民政府中就职的谣传,宣布她正贡献其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救济工作。

1月10日,宋庆龄邀请在上海的头牌电影明星80余人,在兰心大舞台上演“电影大会串”,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筹募儿童福利基金。

“大会串”开演之前,下午3点,宋庆龄在华懋公寓招待影剧界人士。借招待会各路媒体云集的机会,她宣布,任何有关她本人将在政府中担任或负责职务之报道,纯系毫无根据。宋庆龄更郑重声明:她正贡献其全部时间与精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之救济工作,与上海儿童福利工作,她为该会之创办者兼主席。

次日,上海各大中西文报刊纷纷报道了宋庆龄的辟谣声明,把向来是媒体宠儿的电影明星们抛在了一边。

1949年新年伊始,宋庆龄便成为各大媒体追逐的焦点。

元旦,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暗示自己将下野,并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和谈之最低条件。

同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玩弄新的“和平”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更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坚决消灭反动派,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政局变动,和战彷徨的时候,关于宋庆龄即将出山在南京政府担任要职的各种传

说,在新闻报道和人们的口头上流传着。

1月21日,蒋介石下野。22日,李宗仁在南京宣布就任代总统职。李宗仁随即迫不及待地谋划和谈,就任当日便分别书写了致宋庆龄等人的函件。

当夜,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即乘夜车由宁来沪。他出师不利,京沪路车严重误点,至23日午后4时方抵沪。甘氏即日便马不停蹄地带着李宗仁的亲笔信,开始分访宋庆龄、陈铭枢、张澜、张君勱、罗隆基、黄炎培、章士钊等人。

1949年1月,宋庆龄居住在香山路寓所。甘介侯来访时,她正卧病在床,因为连续两周血压过高,她谢绝宾客,但是甘氏一天来好几次,逼得她不得不起床,于24日破例接见甘氏,作一小时半的长谈。

虽然甘介侯对媒体说“孙夫人对和平提供意见多项”,“对于本代总统及其他人士之和平努力,深表同情”。但是私底下,宋庆龄在给德国友人王安娜的书信中表达了她对甘介侯的极度反感:

甘一天好几次到我这里来。最后,为了把他打发走,我不得不起来见他。他简直就是废话连篇,总是吹嘘自己为民主运动做了哪些事,以及他对李的影响,等等。很自然,我与我们的人民一样,渴望和平。我们希望很快找到解决这一僵局的办法,因为它使我们的生活难以忍受,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更不用说我们大家都遇到的各种物质困难。我们中一些有远见的人曾经想努力避开这种结果(我两年前的声明可以作证)。但是历史正在选择一条破坏极大的、痛苦的道路。

继甘氏之后,李宗仁又派和谈代表邵力子、张治中来沪斡旋,因为甘氏来访长谈导致病情加剧的宋庆龄不得已又再度从病榻上起身,于25日下午接见了邵力子。邵“微询孙夫人对和平之意见,并督促晋京(指南京政府),共商国是,斡旋和平”。

面对媒体的追踪和国民党政府的“敦促”,宋庆龄甚为反感,在致王安娜函中她还说道:

虽然上星期发布的消息对那些追踪新闻的人来说应该是足够了,但讨厌的是他们还紧跟在我的脚后。如果他们想知道我的看法的话,请让他们看一下我在两年前发表的声明。这项声明现在仍然有效。那个时候他们全都嘲笑我,称我是个红色傀儡。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之后,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怎么想的……如果你没有这份声明,也不记得所有的要点,我可以叫人打一份给你。

宋庆龄信中所说的两年前发表的声明,是指1946年7月22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此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广泛的震动与响应,它旗帜鲜明地反对内战,呼吁立即组成联合政府,要求美国停止一切军火供应,只允许把援助给予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

在中国正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宋庆龄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公开批驳将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的谣传,拒绝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但是,面对中共中央的邀请,她又将作何反应呢?

1949年1月25日,一位署名“晓冈”的记者在《孙夫人:民主、和平的象征》一文中写道:

为了国家,为了她所挚爱着的人民大众,她终究是要出来的,如果要知道在什么时候的话,那末记者可以说:“当中国在行动时,她将震动世界。”

立场坚定 支持解放事业

(1949年2月)

1949年2月1日,上海各大报刊头条均刊登了李宗仁昨日来沪拜访宋庆龄的消息。春节刚过,李宗仁便于年初三(1月31日)一早偕随员程思远等人搭乘专机赴沪。

妄图划江而治的李代总统此行目的有三:一是会晤居住上海的社会贤达和各界名流,包括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各位无党派人士,推请他们北上与中共接触;二是挽留孙科内阁,希望孙院长勿将行政院迁往广州;第三便是亲自邀约宋庆龄“赴京(指南京)为和平努力”。

记者对前两项事务均有具体报道,但苦于对李宗仁与宋庆龄的会谈不知详情。

《申报》报道:

总统府人士对李代总统在沪访晤孙夫人之情形,拒绝透露,记者询以李代总统曾否邀请孙夫人前来南京,该人士答称:孙夫人健康仍欠佳,且连日此间气候恶劣,恐短期间甚少晋京可能。

总统府之所以不向媒体作具体透露,是因为宋庆龄当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李宗仁的邀请。

1月31日下午3时半,与孙科、吴铁城等举行的重要会议尚未结束,李宗仁便中途早退,驱车分访宋庆龄和何应钦。

对于那次在宋庆龄寓所的谈话,李宗仁随员程思远多年之后有具体回忆:

1949年2月2日(误,应为1月31日),李宗仁专机去上海挽留孙科内阁仍返南京,下午偕我去拜访宋庆龄,希望她以个人身份到北京(时名北平)一行,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李谋求和平的诚意。宋仍一本初衷,拒其所请。她说:“德邻先生,我曾经明白表示过,在国民党未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以前,我绝不参与这个党的任何工作。不久前,上海有些报纸造谣:说蒋介石下野,宋庆龄要出山了,我立即发表辟谣声明。20多年来,我的立场和态度始终一贯,不容有所变更。”

1月31日,发生了一件比李宗仁来沪要重大得多的事情,上海媒体却没敢大肆宣扬。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在望。

在这样的形势下,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以私人身份)4人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4日抵达北平,22日飞抵石家庄,当日下午抵达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2月24日,代表团带着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飞返北平。27日上午,离开北平南归。

就在代表团南归带回毛泽东致李宗仁信的同时,宋庆龄给中共中央的复函正由中共地下党员华克之带回复命。

1949年春节期间,柳亚子女儿柳无垢收到金仲华自香港来函,说将有一位王先生来找她,要她帮助他。2月的一天早上,柳无垢正准备出门上班,那位“王先生”来了。“王先生”交给柳无垢一封信,要她当面交给孙夫人。

中共中央1月19日指示电中提到的“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并非柳无垢,而是中共地下党员、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工作组组长顾锦心。柳无垢不是中共党员,但是她曾经在香港参加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是宋庆龄的得力助手,深受宋庆龄的信任和关爱。

香港沦陷后不久,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柳无垢陪伴父亲离开了香港,后应金仲

华之邀进入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她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翻译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战时情报局改名为美国新闻处,总部迁到上海。在上海,柳无垢等金仲华手下工作人员同他一起被调往上海美国总领事馆工作。1947年,发现自己被盯上后,出于安全考虑,金仲华离开上海赴香港。

柳无垢虽然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但她并不常去宋庆龄寓所见宋庆龄,尤其宋庆龄那一阵正因卧病在床而谢绝一切宾客。柳无垢写信求见,告诉宋庆龄有要信面交,但是依旧被宋庆龄拒绝了。

宋庆龄回信说,因为正在打针,医生不准见客,所以不能见柳无垢。

不得已,“王先生”要柳无垢写信明白告诉宋庆龄,信是毛泽东、周恩来写给她的,希望她早日见柳无垢。

柳无垢一直都不知道,“王先生”其实是中共秘密战线的优秀地下工作者,真名华克之,曾经屡建功勋。

华克之在香港受命时,潘汉年明确告诉他,派他去上海执行任务是华南局的一致决定,并指示他,到上海后不能直接去找宋庆龄,而是去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柳亚子家找柳无垢。

华克之在得到潘汉年允许后,将信件拆开改装。他买了一盒精美的英制巧克力糖果,拆开上盖,倒出糖果,将信件平铺在盒底,然后装上糖果,重新将上盖合上,仔细地贴好封签,天衣无缝和原装并无二致。

这盒巧克力糖果随华克之一路坐船从香港来到了上海,并安全地被递交到柳无垢手中。

为完成任务,柳无垢费尽心机,经过一个星期和宋庆龄的书信往返,最后,柳无垢得以来到宋庆龄家中,将信面交宋庆龄,又从宋庆龄处取得回信交给华克之。

宋庆龄信写于2月20日,是用英文书写的,根据原件翻译的中译文全文如下: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地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高血压,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谨致
敬礼!

宋庆龄

华克之多年以后凭借记忆在自己的《卅年实录》中记录该信道:

接到某月某日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安全的关垂,至为感激。经长时间的考虑,仍以一动不如一静,热烈地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迅速地在上海握手。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求勿念。

两相比较,字面上出入较多,但是在精髓上,华克之的回忆还是与原件完全符合的:一是感谢中共中央的邀请;二是暂不北上;三是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不久将大获全胜。

栉风沐雨 力助中国福利呼吁会

(1949年3月)

1949年3月,宋庆龄向海外雪片般地发出了数十封信,主题只有一个:因为长期合作的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不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华北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等项目,即将成立的纽约中国福利呼吁会(China Welfare Appeal)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

美国援华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保卫中国同盟和后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为什么要中断与他们的长期合作关系转而宣布与一个尚未成立的组织建立合作?这与美国援华会本身的改变有关。

美国援华会是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Service to China)的团体会员。美国援华联合会原名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抗战以来给予中国诸多救助,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更名,更名后逐步背离了其成立时“救济对象纯为中国人民,绝无党派和宗教之分”的宗旨。美国援华联合会用种种理由削减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拨款,从1948年起,实际上停止了援助,甚至还公开声称“没被美国政府承认的项目,无论在什么地区,美国援华联合会都不支持”,并正式通知中国福利基金会。该会还专门出版小册子,进行反共宣传。

面对上述形势,中国福利基金会曾建议美国援华会退出美国援华联合会,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继续开展援华活动。但美国援华会认为有困难,以至于过了1948年11月的最后期限,美国援华联合会停拨了他们的办公经费,终止了他们的一切活动。至此,美国援华会董事会只得决定停止活动,宣布解散。

这时,美国援华会的一些成员如耿丽淑、爱泼斯坦等人决定另组新的机构,架设新的桥梁,继续支援中国人民。他们的决定得到了宋庆龄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支持。

1949年1月17日,宋庆龄复函耿丽淑,对她表示由衷感谢和坚决支持:

你和其他一些朋友即将为成立我们救济工作的一个新组织挺身而出,肩负重担,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都感到极大欣慰。我们一定要祝愿你们一切顺利,你们可以指望我们的充分合作。

宋庆龄立即决定将正在筹建中的纽约中国福利呼吁会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在美唯一代表。而这时,美国援华会又推翻了原先的想法,1月28日,他们召开董事会,决定维持原状继续留在美国援华联合会内。但美国援华联合会并不允许援助国际和平医院,受其领导的美国援华会是不可能同中国福利基金会保持原有合作关系的。因此,爱泼斯坦等部分人员在董事会上表达了辞职的意愿。

美国援华会决定恢复工作,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国福利呼吁会。美国的捐赠者会疑惑,究竟谁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真正代表。宋庆龄认为:美国援华会这么做是直接试图妨害正在筹建中的美国新组织所进行的努力。

中国福利呼吁会4月份即将宣布成立,必须尽快明确究竟谁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真正代表。于是,3月12日至15日,宋庆龄分别致函美国各界名人,告诉他们,只有中国福利呼吁会才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请他们支持这一新的援华组织。

宋庆龄在致美国各界名人的信中说:

对于中国福利基金会所支持的国际和平医院及其他各种项目,现在美国已没有任何一个组织下大力气在美国人民中间募集资金来赞助它们了。原先代表这些项目的“援华会”现在已把它的主要精力转而为满足其他的要求服务了。

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继续欢迎来自各方的援助的同时,高兴地从在美国的

朋友们那里听到了这样的信息:在美国,有一个新的组织正在成立,它将直接地、独立自主地为我们的工作服务。这个组织叫“中国福利呼吁会”,它将是我们的项目的惟一代表。

在这个时候成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在中国、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让世人了解我们勤劳的人民在恢复和建设我们的国家和城市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需要,以便让那些能够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知道要怎样做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我们还要为接受这种援助开放廉洁而有效率的渠道,并使之畅通无阻;还要在报章杂志上充分记录和报道中国自身的努力。

这个正在美国建立的新组织将会使这些目的得到实现。当前正在进行的基础工作需要得到你的支持,而且请求你在承担这个任务方面同我们携手合作。我们知道,你对全世界的平民百姓是一直抱有同情的,并一直在为他们的利益作出努力。不仅如此,我们还相信,你会承认这样一个组织为维持和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它始终是一支维护和平的力量——是必需的。

为了向外界说明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性质和意义,除了向美国各界名人致函外,宋庆龄特在1949年的3月15日撰写题为《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性质及其任务》一文,说明该会是非政治性组织,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

1949年4月19日,历经数月筹备的中国福利呼吁会终于在纽约成立,耿丽淑担任主席,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开始正式运转起来。新组织在中美人民间重新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福利基金会摆脱了困境,及时向华北的国际和平医院和儿童文化福利项目捐赠了资金和大批的医药物资、文化用品和书籍。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军事和经济封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福利呼吁会的活动受到限制。耿丽淑等中国福利呼吁会成员不得不相继离开美国。

春晖之心 救济申城“三毛”

(1949年4月)

1949年4月4日,上海大新公司4楼书画部人头攒动,书画部正在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人们争相观赏悬挂在大厅四周的一幅幅书画作品。而大厅的一侧,情绪激昂的人们正在踊跃购买书画作品。

引起上海人民如此高昂兴致的,是展览会上展出的著名漫画家张乐平的“三毛”原作,以及与此同时推出的“三毛乐园会”活动,而此活动的主办方正是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

1946年10月,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始在沪西、沪东、虹口的贫民区建立儿童福利站,融教育、保健、救济工作于一体,内设识字班、图书室、保健室和营养站,不到三年,受惠儿童就达数万人次。但随着局势急剧变化,中国福利基金会原有的海外经济援助大部分被阻断,社会上贫困儿童却越来越多。1948年长江下游突发罕见水灾,上海街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流浪儿童,宋庆龄深深为这些儿童的命运担心。

当时,漫画家张乐平自1947年6月开始在上海《大公报》登载的连环漫画《三毛流浪记》极受欢迎,流浪儿“三毛”的形象家喻户晓,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更引起了人们对流浪儿的广泛同情。以致常有读者写信、汇款、寄衣物到编辑部,希望通过报馆去救济贫困儿童,甚至还呼吁成立“三毛幸福基金会”。

宋庆龄也是这众多读者中的一员。她非常喜欢“三毛”,曾特地购买《三毛流浪记》画册赠送给外国小朋友。1949年的春节,她在用英文写给秘书王安娜的信中提道:“我喜欢三毛的漫画。办公室派人给我送来时,我没有时间看,于是当时就还回去了。因为

我不想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自己占着。希望你能恳请埃迪(即中国福利基金会财务汪海清)为我买6本,我想寄给国外的小朋友。”

为较稳定地解决救助贫困儿童的经费来源,宋庆龄设想运用“三毛”的影响力开展“三毛乐园运动”,创办“三毛乐园会”和举办“三毛”原作展览会,来推动社会各界关注贫困儿童。1949年1月下旬,宋庆龄诚邀张乐平一起举办“三毛”原作展览会,为筹备“三毛乐园会”开展宣传、筹措资金。张乐平闻讯马上应承,仅几天时间就拿出了构思方案。宋庆龄看后十分满意,立即答复了正在嘉兴疗养的张乐平。张乐平迅速来到上海,在一个月内赶画了30幅“三毛”水彩画供展览会期间义卖,并特地为“三毛乐园会”设计了一枚纪念徽章。除此之外,张乐平还将所创作的《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等300多幅画的原稿全部拿出来展览。

宋庆龄还通过报刊公布了创办“三毛乐园会”的宗旨及章程。当时定出的方案是:凡是愿意救助“三毛”的人士,不论国籍、年龄、性别及职业均可成为会员或“三毛之友”。会费以三毛为单位,按照当时物价,一个孩子每月的基本生活费用大概要三块银圆。每月救济一个“三毛”以上的,就能成为“三毛乐园会”的普通会员;每月救济五个“三毛”以上的,就能成为“三毛乐园会”的荣誉会员;不定期捐助不定额衣物、食品、玩具的,便是“三毛之友”。“三毛乐园会”的开办费,来自“三毛生活展览会”的收入。

1949年3月28日下午,宋庆龄在林森中路(今淮海中路)988号A中国福利基金会住所内举办“三毛生活展览会”预展,招待本市文化界、新闻界人士。中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美国著名舞蹈家莎菲·黛尔莎、陈光甫、罗隆基及各报记者多人参加了招待会。30幅义卖作品定价自30至50美金不等,预展时就有人订购数幅。张乐平后来追忆这唯一一次与宋庆龄的会面说:“那天,宋庆龄坐在我的旁边,她当时已年近60,看上去却不过40岁的样子,衣着朴素,仪态大方,举止端庄。同外国朋友谈话,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我讲话,却是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她很亲切地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庭情况如何,怎么画起‘三毛’来的,等等,完全是亲切的家常式的谈话。外国朋友同我谈话,宋庆龄亲自翻译。开始我还有点拘束,看到她这样和蔼可亲,就很快自然起来。她一再向我表示感谢,说:‘这次你为流浪儿童做了件大好事,真太辛苦你了。’听了这些话,我非常感动。”预展即将结束时,宋庆龄再次致谢,张乐平感动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1949年4月4日至9日,“三毛生活展览会”在大新公司4楼书画部正式举行。除了展览张乐平“三毛”漫画原作、举行“三毛”水彩画义卖之外,还展览了介绍中国福利基金会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以及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的活动的照片图表。“三毛乐园会”活动也在4月4日这一天正式推出。由于宋庆龄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展览会吸引了上海各界人士踊跃参观。展览会为期6天,因开幕日正值当时的儿童节(4月4日),第一天参观者就接近2万人,短短6天内,有4万多人参观了展览。无锡一学校特由教师率领二十余名学生前来参观,崇德女校学生参观后现场捐赠毛笔、铅笔及书本供中国福利基金会识字班的贫苦儿童所用,另有人前往“三毛乐园会”会址(即林森中路988号A中国福利基金会住所)送去一批书本和衣服。

活动举办得非常成功,短短6天内,有4万多人参观了展览,张乐平为义卖会赶画的30幅“三毛”水彩画很快被抢购一空,还有人又订购数幅。除此之外还卖掉了100本张乐平亲笔签名的《三毛流浪记》画册和许多他精心设计的“三毛乐园”徽章。有40余人表示愿意加入“三毛乐园会”为会员或会友,出资救济“三毛”,6天内共募得银圆3206元,还收到一批书籍、文具、衣服、药物。活动所得全部交予中国福利基金会下三个福利站、儿童剧团和育才学校作经费之用。宋庆龄在活动结束后,特意致函张乐平,祝贺他的作品展览获得成功。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宋庆龄以一颗慈母般的心,温暖关怀着每一个少年儿童,也赢得了成千上万儿童对她的爱戴。

战胜黑暗 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

1949年5月27日清晨,当上海市民打开家门的时候,发现下着雨的路面上睡满了解放军战士。上海市民对胜利之师全副武装露宿街头的情景闻所未闻,整个城市轰动了。

这天清晨,宋庆龄派了一辆大卡车来到了位于横浜桥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本部,把儿童剧团的表演队接到了位于安福路的上海影剧界集合点。在地下党文委的领导下,儿童剧团的表演队走上街头,34名少男少女边游行,边扭秧歌、打莲湘,欢庆上海解放。人们拍手欢迎说:“孙夫人的秧歌队来了。”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也组织了宣传队,高唱着《我们的队伍来了》奔向街头,欢迎人民解放军。市民们挤满街头,驻足观看,为儿童剧团表演队的表演鼓掌喝彩。

上海临近解放的那些日子里,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国民党的行刑队在街上出没,抓到“共匪嫌疑分子”就地处决。很多人突然失踪。黄炎培之子黄竞武到宋庆龄住所去过后被捕,宋庆龄因而警告经常来看望她的杨杏佛之子杨小佛,暂时不要同她来往,以保障他的安全。黄竞武在监狱中被活埋,遗骸直到上海解放后才被发现。

在这国民党最残暴的时候,中国福利基金会必须缩小活动。宋庆龄及时采取措施悉心保存力量,将3所儿童福利站的“小先生”们的活动,由原来教识字班的孩子们唱解放区歌曲、学习扭秧歌等,改为白天向周围贫苦儿童和难民发放救济物资,晚上聚集到福利站里,秘密制作欢迎解放军的标语、彩带、红花等。当她获悉儿童剧团在暨南大学礼堂演出《兄妹开荒》等晚会节目,遭国民党特务的捣乱和破坏时,迅即指示儿童剧

团要立即隐蔽,并在虹口武进路找了两间空房,让孩子们住进去。白天孩子们轻声练唱,排演节目,晚上拉上窗帘,缝制秧歌舞的服装,绘制标语、彩旗,进行迎接上海解放的准备工作。对于存放在仓库待运去解放区的300吨救济物资,也加强了守卫,解放后拨交给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其中仅医药和医疗器材,就可供100张床位的医院用一年。

同时,宋庆龄率领中国福利基金会积极地组织和领导在上海的人民应付意外。为了迎接上海解放,救助战灾难民,维护社会秩序,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的社会公益人士和救济福利宗教团体于1949年4月25日成立了上海市临时联合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联救会”),颜惠庆任主任委员,赵朴初任干事,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是联救会的主要成员之一。宋庆龄首先表示把基金会所存物资交出来供联救会使用。根据宋庆龄的指示,基金会不仅在物力上,如在救济物资、医药、医疗设备等方面给联救会以大力支援,还投入大量人力,积极支持和参加这项工作。基金会和3个儿童福利站的多数人员一度成了联救会的主力军,在救助战灾难民、医疗救护、物资储运,及其后大批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儿童福利站也作了联救会收容儿童的场所,儿童收容站第二站则设在西摩路宋家老宅(今陕西北路369号上海宋庆龄基金会住所)。为帮助贫困儿童,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联救会一起,在贫困儿童聚居的棚户区,又开设了14所儿童福利站,发放大米31.69万余斤、奶粉2.23万磅、鱼肝油200磅。此项救灾工作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期,将难民送返原籍而告结束。

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首先解放了苏州河南岸。上海解放前的最后一晚,四周特别寂静,既无炮声,也没有火光,人们对这突然的安静有点纳闷,有人已经推断出可能当晚便是解放上海的时候。这一晚,很多人没有入睡,住在林森中路1803号(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的宋庆龄也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

凌晨3点,宋庆龄看见了解放军的装甲车。她幽默地说:“但愿我能像装甲车一样被允许外出。那样我的胃病也许会治好。”

26日,苏州河北岸也获得解放。宋庆龄在当日致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宋庆龄刚刚从香山路7号(今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移居林森中路1803号。由于是敏感时期搬的家,关于宋庆龄的谣言又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谣言说宋庆龄离开了自己的家,躲到朋友家中去了。但是林森中路1803号原本就是国民政府拨给的,宋庆龄也没有偷偷摸摸搬家,她还在新家邀请朋友们前来做客。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后,19日,妹妹美龄和二弟子良联名从美国来信。他们说:“最近,我们都经常想起你,考虑到目前的局势,我们知道你的生活一定很艰苦,希望你能平安、顺利。”宋庆龄独自坚守上海与黑暗抗争,等待黎明到来。

上海全境解放次日,5月28日,宋庆龄在林森中路寓所便迎来了第一批前来向她祝贺上海解放的客人。史良和赵朴初先后前来表示祝贺和慰问。宋庆龄一见到史良,就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在这胜利时刻相见,史良与宋庆龄相抱而泣,共享胜利欢欣。赵朴初来时,宋庆龄微笑着把一朵红玫瑰花插在他的西装衣领,用以表示赞美他在解放战争中间同中国福利基金会共同战斗的友谊。

不久,宋庆龄还特意捧着一束红玫瑰来到林森中路988号A中国福利基金会办公地,微笑着给每一位工作人员送了一朵小红花。大家赶紧把小红花戴在胸前,宋庆龄向大家点头致意,大家也以注目和笑意回应她的慰问和祝贺。

5月29日,毛泽东为新华社修改的社论《祝上海解放》发表。同日,他亲自指示,委托陈毅和邓小平前往宋庆龄寓所表示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在同史良商量后,邓小平、陈毅于5月31日偕史良和长期坚持上海地下斗争的优秀干部吴克坚等一同拜望宋庆龄。

6月初,上海市委收到中央的指示:

要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

宋庆龄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中,她长期与中国共产党

合作,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了特殊而杰出的贡献。在极其艰辛危急的非常时期,她坚守着自己的阵地,积极准备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应付意外,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出了特殊贡献,践行了“永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

欢迎中央特使 响应北上邀请

(1949年6月)

1949年6月25日晚,在上海林森中路1803号宋庆龄寓所(今淮海中路1843号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邓颖超向宋庆龄面呈了分别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笔书写的两封信。

毛泽东信写于1949年6月19日,寥寥百余字,既清晰道明了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新中国建设大计之意,又以最高规格表达了对她的尊敬与仰望。函谓: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毛泽东因公务繁忙,书信经常有勾勾划划的地方,但这封信连一个错字、一个墨点都没有,可见是极其用心地书写而成的。

隔日,周恩来为邀请宋庆龄北上也书写了一封表达同样切盼之情的亲笔信。函谓: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崑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宋庆龄看到的这封周恩来亲笔信上，有一个字是经过改动的。那个字是毛泽东改的。他把周恩来信上“略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中的“略陈”改为了“谨陈”。此处修改，尽显中共中央对宋庆龄的尊敬。

毛泽东、周恩来6月份的这两封亲笔信是继1月份之后，中共中央第二次飞鸿来沪力邀宋庆龄北上。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宋庆龄，热诚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上海解放后，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张东荪、周新民等民主人士曾陆续致电宋庆龄，恳请其北上，但均被宋庆龄以“病躯急需疗养”为由婉拒了。然而，对于北上之事，她的确认真考虑过。就在史良6月15日启程北上赴平之前，宋庆龄跟史良讨论过参加政协事，她告诉史良过去香港曾送来毛、周致电，邀请她北上参加新政协，史良听后力主宋庆龄应该参加新政协，即使因病体不能天天到会，也应该到北平参加开幕式。宋庆龄闻之动容，请史良由平回沪后与她商决。

中共中央的第一次邀请发生在“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把邀请电报安全送达宋庆龄处。而这一次是在“全国革命胜利在即”之时，中共中央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才能让宋庆龄接受邀请。之所以特派邓颖超来沪，是因为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她同周恩来一起和宋庆龄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且作为周恩来夫人，她能代表周恩来迎接宋庆龄。

6月25日,邓颖超偕廖梦醒抵达上海。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女儿,曾长期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深得宋庆龄信任。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去和宋庆龄打个招呼,然后她再去拜见。是日,当廖梦醒身穿灰布制服,头戴灰布军帽出现在宋庆龄面前时,宋庆龄还以为来了一个女兵。廖梦醒叫了一声“Aunty”,她才发现是廖梦醒,于是笑了起来。

廖梦醒对宋庆龄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接你,大家都盼望你能去参加新政协。”因为孙中山是在北平不幸病逝的,所以宋庆龄为难地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的伤心之地,我怕去那里。待我考虑考虑,想好再通知你吧。”

得知邓颖超来沪,宋庆龄25日当晚便约谈邓颖超。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宋庆龄的情绪很兴奋,但她还是向邓颖超表示因病体不克长途旅行,拟暂缓。因为紧张焦虑,宋庆龄自1949年1月开始就不断地被剧烈的头痛、高血压和严重的荨麻疹交替折磨。目睹宋庆龄的确体质虚弱,邓颖超对宋庆龄能不能坐火车赴平有点担心。

27日,廖梦醒再度先期只身赴宋宅劝说。当晚,宋庆龄设宴招待邓颖超,邓颖超得以再赴宋宅。言谈间,宋庆龄“颇感盛情难却”,再次表示“考虑考虑”。邓颖超感觉宋庆龄北上“或有可能”,但“依其性格,尚须下工夫”。

当日,邓颖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抵沪后的第一份电报。电报是发给毛泽东的,她向毛泽东汇报了上述情况,并请求答复“如孙夫人坚持此次暂不来平,则在我返平前,是否将请其参加政协及政府事,征其同意”。对此,周恩来于7月1日以中央的名义回复:要求邓颖超应向宋庆龄“直说请其参加新政协”,但是参加新政府的事得等她到平后再说。

经过几次交谈,邓颖超终于说服了宋庆龄。6月30日,宋庆龄高兴地向邓颖超明确表示同意北上。

随后,中共中央为安排宋庆龄平安舒适地北上,在答应北上参加新政协之后进一步答应参加新政府又继续进行了周密安排。其中一个令宋庆龄非常高兴的贴心之举便是将邓颖超留在上海,陪伴宋庆龄于8月份一起北上。周恩来要求邓颖超,在沪逗留期

间,“应多往孙夫人处谈话,为之讲解各种情况和我党政策”。

中共中央为邀请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协和新政府,做了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宋庆龄本人之所以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尊敬,宋庆龄北上之所以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不仅因为她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而且因为她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缔造者之一,她艰苦地追求真理的一生印证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历史真理。

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1949年7月)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他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
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这是我们祖国建设和前进的动力。我们的旗帜是“生产”,更多的生产。
向人民的力量致敬!

这是大地上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温暖和光辉留传照耀到每一个
为反动势力所笼罩的黑暗的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这是胜利的高潮,荡漾到每一个口岸。各国的人民运动风起云涌,把我们
的力量和他们的合在一起,加强这勇敢的战斗。向全世界民主斗争中的同志
们致敬!

这一次胜利的战士们力量增长了,他们的英勇,无匹。他们的纪律无
双,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欢迎我们的领袖——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
征艰难困苦的路程上百炼成钢,在乡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袖。向中国共产党
致敬!

是的,这是一个最伟大的时期——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里程碑。我
们解除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政策的束缚,我们铲除了封建主义,人民正走向新
的,更光辉的高峰。敬礼!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万岁!

这份名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祝词是1949年6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逸园大饭店举行的“七一”纪念晚会上发表的祝词。

当晚6点,1000多个来自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齐聚一堂,欢庆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当宋庆龄在邓颖超和廖梦醒的陪同下进入会场时,四周围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始终坚定站在人民立场的孙中山夫人。

这次纪念晚会是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联合举办的。陈毅市长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将仍然和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他演讲过后,第一个被邀请讲话的就是宋庆龄。因她是带病来参加,在长久不断的掌声中,邓颖超登台了,她说她是代表孙夫人演讲的,她用清晰而充满感情的音调,朗诵了宋庆龄的这篇祝词。

与会人员后来回忆道:

邓颖超女士宣读时,全堂的人屏息而听着,就会觉得邓女士的抑扬顿挫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最强烈的情感;所以,九次热烈的全堂鼓掌不只是表示了赞同的意义而也自然地呈献了感动的效果的。事实上,这一篇祝词,真的是一首美丽的歌,一首精彩的诗。

这篇祝词最初是用英文撰写而成的自由诗。早在“七一”的前两天,宋庆龄便派人将此英文手稿交给擅长文学的柳亚子之女柳无垢,请她立即翻译成中文。柳无垢送来中文翻译稿后,宋庆龄亲笔誊写了一份,还在中文稿上再作修改。

7月1日,上海《文汇报》在详细报道“七一”纪念晚会的同时,将这首诗以“孙夫人祝词 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向中国共产党致敬”为标题全文发表。

次日,《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均予以全文刊登。

读者们纷纷表示,这篇祝词:“如此地洋溢着热情,如此地充满着诚意,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百个字,却已提纲挈要地说明了全中国的人民对于这一个伟大的时期所共有的向心力。”“自从上海解放以后,以各种形式发表的歌颂的文字虽然很多很多,但孙夫人的这一篇却无疑是最热情最能感动(人心)的。”

欣然北上 两条革命洪流汇合

(1949年8月)

为了参加即将在9月举行的新政协会议,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邓颖超、廖梦醒、柳无垢,以及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管易文等人陪同,乘坐专列启程。

沿途,宋庆龄受到了各地热烈的欢迎。专车在南京、济南和天津短暂停留时,当地党政领导和妇联代表等均亲往迎送。

在旅程中,宋庆龄对新老解放区的儿童福利、医疗卫生、各项设施及工作都很关心。沿途所见景象激励人心,令她一路上都精神振奋,非常愉快。回到上海后,11月7日,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之邀,宋庆龄发表广播演讲,生动地描绘了她对北上途中所见所闻的感受和体会: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那些新种植的田地,那些最近收割的田地,当它们在我的眼前滑过,消失在遥远的天边,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和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到标明出地形的无数大小的河流,有些是涓涓的细流,有些是急浪翻腾的大河,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当我看到这些景色时,我觉得生产和发展可能性,似已近在眼前了。没有一个计划,没有一个梦想是虚无缥缈的。这儿一大堆工厂,那儿一队队耕种机在垦着土地,路上的景色触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

两天的愉快旅程一晃而过,8月28日下午4时15分,宋庆龄专列抵达北平火车站。

这天中午,毛泽东一吃过午饭,就换上了他那套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才穿的浅色中山装,准备迎接宋庆龄。3时45分,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北平火车站。此时,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等党中央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代表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陈叔通、马叙伦、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彭泽民、胡愈之、陈其瑗,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全国妇联蔡畅、李德全、康克清、沈兹九、许广平、区梦觉,全国青联廖承志,全国文联郭沫若、茅盾,全国学联李秀贞,北平市妇联张筱梅,全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伍云甫、熊瑾玎、苏井观,还有宋庆龄点名希望访问并致敬的留北平的国民党政府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等等,共计80余人早已等候在了月台之上。月台上还有一支特殊的娃娃欢迎队,他们来自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资助的洛杉矶托儿所。

宋庆龄专列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亲自欢迎宋庆龄下车。他握着宋庆龄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您,欢迎您!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随后,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穿黑色拷绸旗袍,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

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此时,蔡畅迎上来,向宋庆龄献花。洛杉矶托儿所儿童也随后向前献花。接着,宋庆龄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随后,宋庆龄由何香凝和周恩来、邓颖超陪同,驱车到周恩来亲自为她安排的方巾巷寓所休息。

宋庆龄北上抵平和中国共产党一起领导新中国建设,其意义正如爱泼斯坦先生在《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一书中所总结的:

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人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

参加新政协 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9月)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议正式召开之前,9月上旬,600多名会议代表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报到。代表报到的签名纸是白色宣纸,代表签名一律用毛笔。因为宋庆龄不擅长用毛笔,负责宋庆龄报到的两位姑娘孙小礼和荆惕华特意为她精心挑选了一支钢笔。9月19日上午,天气晴朗宜人,宋庆龄由管易文陪同来怀仁堂签到,她用钢笔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两位姑娘目送她走进一辆小汽车,随即驶离怀仁堂。

9月20日上午9时,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委会在北京饭店举行茶会,招待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女代表,宋庆龄、何香凝等54位女代表出席了茶会。

9月21日晚7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开幕式的各党派、团体代表635人,来宾300人。宋庆龄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

大会主席台的布置简洁庄重,正面悬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画像,中间和两侧挂着中国人民政协的会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

会议正式开幕前,周恩来首先代表筹备会报告了出席会议的各类代表名额和总人数,提出主席团名单和秘书长人选的建议,得到了全场的一致通过。

当被通过的主席团登上主席台后,毛泽东以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他以沉稳而缓慢的语调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

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在长时间掌声中结束以后,全场起立为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静默3分钟志哀。

随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等各界代表共12人,在会上相继发表演讲。

在全场庄严和谐气氛中,宋庆龄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宋庆龄演讲时曾突然停电数分钟,虽然这种现象在解放初期是难免的,工作人员早就准备好了备用电源,但在停电的数分钟内,他们还是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不过全场仍然保持安静,宋庆龄也从容地继续讲话,最后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她含笑走下讲台。她的从容淡定使紧张的工作人员感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9月22日至29日会议期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3个为新中国奠基的历史性文件,并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首都、纪年等决议。

9月30日是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在下午3点钟开始,第一项和第二项议程是两项选举——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当投票完毕,检票人进行检票时,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全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的碑文。

代表们随即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大约在晚6时,奠基典礼正式开始。首先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接着全体代表静默致哀。默哀毕,毛

泽东宣读纪念碑文。最后,在毛泽东主持下,各位首席代表排着队,每人用铁锹铲土奠基。

纪念碑奠基礼完毕后,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选举结果: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陈毅、贺龙等 56 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毛主席和 6 位副主席在持久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毛泽东宣布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式开始,朱德致简短闭幕词后,大会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国歌声中庄严闭幕。

正如宋庆龄所言,“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这是一次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从此,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参加开国大典 走向人民的时代

(1949 年 10 月)

1949 年 10 月 1 日是中国历史开天辟地的一天,中华民族历经了百年沧桑,在这一天迎来了巨变。这一天,北京 30 万军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群、旗帜、鲜花、灯饰汇成了锦绣的海洋。这一天,宋庆龄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开国大典。

当天下午 2 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召开。宋庆龄出席了此次会议,并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他副主席和委员一起就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会上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宣布本政府为代表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下午 2 时 50 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分别上车。车队由勤政殿门口开出,绕中南海东门,5 分钟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宋庆龄紧随毛泽东、朱德之后,沿着长长的 100 个台阶,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北京 30 万群众早早就齐集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一隆重的庆祝典礼。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 8 盏大红宫灯,靠着城楼左右两边的石栏上,8 面红旗迎风招展。天安门广场上汇集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群众队伍,人们有的擎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到了正午,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像海上的波浪。下午 3 时整,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副主席及各位中央委员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上与群众见面。30 万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主席台,天安门广场上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掌声。

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后,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群情激昂。摆在前门城墙根的 54 门礼炮齐鸣 28 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 28 年的光辉历程,震撼人心。这时,林伯渠大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只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前高高矗立的旗杆上,那面巨大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中徐徐升起。

随后朱德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并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迅速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欢呼声似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宋庆龄透过这欢乐的海洋,遥望广场中央矗立着的孙中山巨幅画像,心中更是激动万分。宋庆龄后来追忆道: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后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盛大的阅兵式后,欢乐的游行开始。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和市民,高举红旗花束,载歌载舞地前进着。直到晚上 10 时庆典结束,宋庆龄才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开国元勋们一起,离开天安门城楼。

在新生的北京,宋庆龄又相继出席了各项重要会议及活动。10 月 3 日,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担任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执行主席。10 月 5 日,宋庆龄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并致开幕词,会上她被选为该会总会第一副

会长,刘少奇任会长。

虽然日程紧张、工作繁忙,但宋庆龄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之中,她对北京的感觉也完全不同于她在 1925 年所经历的。10 月 10 日,宋庆龄离开北京回到了上海。她带着为新中国献出一切力量的决心,以无比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

1950 年 10 月 1 日,宋庆龄在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而作的《新中国的第一年》一文中写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一个快乐的日子。它标志着解放了的人民、新生了的中国的开始。从那一天,我们跨过了一个新的世纪的门槛,走向未来,走向人民的时代。

加强中苏友好 开启新中国外交活动

(1949年11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年11月,新中国第一次迎来苏联十月革命节。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对外友好协会便是中苏友好协会。

宋庆龄1949年10月5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曾指出:

当苏联的十月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这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遭受到一切帝国主义的造谣诬蔑的时候,孙中山首先指出:“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是的,从三十年前产生的这个大希望,今天终于在我们的祖国有了光辉灿烂的发展了。

诚如孙中山临终时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所说:“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现在,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们终于亲自看到这个日子了。

在举国同庆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宋庆龄也积极投入其中。

11月5日,宋庆龄和中苏友好协会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体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琴尼索夫教授,祝贺苏联十月革命32周年。这一天,新中国领袖以个人名义致电斯大林表示祝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便是宋庆龄。

宋庆龄的个人电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发出的。她电贺斯大林道：

在这个十月革命纪念日,我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一致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孙中山一样,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希望底诞生。孙中山和毛主席了解,只有苏联是真正渴望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我们现在的胜利,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所梦寐以求的中苏两大民族底紧密合作,现在成为事实了。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的来到中国,是这种合作的表现。我们感谢代表团给我们很多的益处,帮助我们怎样在建设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中,坚决地追随苏联所首创的榜样。中苏人民友好、团结、合作万岁!

宋庆龄在电文中提到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是苏联政府向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代表团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于10月1日上午11时抵达北京火车站。当日上午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委会主任宋庆龄、副主任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副主任兼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筹委会主任郭沫若,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委会总干事钱俊瑞等。各界人士进站欢迎的,共达两百多人。列车进站时,车上车下一片欢呼声。随后在车站举行了欢迎会。在奏了苏联与中国国歌后,周恩来和郭沫若先后致辞。头发灰白、高个子的法捷耶夫激动地高呼“中苏伟大人民的永久的友谊万岁!”“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万岁!”“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人类的领袖和朋友,我们的导师斯大林万岁!”下午,这支苏联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随后代表团一路南下,去往南京、上海、济南等地,在中国刮起了一阵又一阵“苏联旋风”,所到之处欢迎场面热烈隆重。10月15日凌晨2时,代表团一行抵达上海。当天下午,上海各界举行隆重的欢迎集会。10月18日晚,刚刚从北京回到上海仅1天的宋庆龄,就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在上海寓所举行鸡尾酒会,热情招待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团长法捷耶夫已先行回国,来参加酒会的有西

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瓦尔拉莫夫、杜伯洛维娜、马尔柯夫、费诺格诺夫、阿格拉则、司托烈托夫、德奥米多夫、伏兹尼等 10 人,苏留沪外交人员符拉其米洛夫也出席。出席的中国宾客有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和副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等。在挂有孙中山像的会客室内,宾主双方畅谈甚欢。酒会中,宋庆龄向客人们示范如何把筷子当刀叉,格拉西莫夫等也模仿起来。次日代表团离沪赴京时,宋庆龄亲往火车站送行。

在宋庆龄从上海发出致斯大林电报后的第二天,11 月 6 日,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筹委会在兰心大戏院举办庆祝苏联十月革命 32 周年纪念联欢晚会。到各界代表共 800 余人,苏留沪外侨人员符拉基米洛夫及苏侨协会会长齐布诺夫斯基等 70 余人也应邀参加。会上通过宋庆龄、陈叔通、饶漱石、陈毅、颜惠庆、潘汉年等 17 人组成主席团。

11 月 7 日上午 11 时至下午 1 时,苏联驻沪总领事馆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招待来宾。主人佛拉基米洛夫、奥布曹夫、梭波列夫、米德维捷夫、雷特金洛谢夫等殷勤招待出席的 600 多位宾客。中国宾客出席者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上海市长陈毅、市委书记饶漱石、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刘长胜、张耀祥、郭化若、童蕴、李昌、舒同、冯定、夏衍、陈望道、盛丕华等人。宋庆龄、陈毅、饶漱石一再和苏联友人干杯,并互祝斯大林大元帅和毛主席健康。

11 月 7 日下午 5 时 40 分起,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推出了一系列特别节目。晚 8 点放送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宋庆龄的演讲——《华北之行所得到的印象》。其中,她讲到:“我深信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在劳动工作中,决不会比我们伟大友邦苏联的斯塔哈诺夫英雄落后一步。”

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和中苏友协副会长,宋庆龄以加强中苏友好为起点,开启了她从事新中国外交活动的生涯。作为新中国和平使者,宋庆龄为积极推进中外友好作出了独特贡献。

团结全世界妇女 为世界和平而奋斗

(1949 年 12 月)

1949 年 12 月 10 日至 16 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报告和讨论亚洲妇女为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与世界和平而斗争问题,保护妇女权利问题和保护儿童权利问题。参与大会的有来自中国、苏联、蒙古、朝鲜、印度、越南、缅甸、暹罗(今泰国)、叙利亚、以色列、印尼、菲律宾、马来亚、伊朗、黎巴嫩等 15 个国家的代表及捷、英、美、法、荷等 10 个国家的来宾约近千人。

12 月 10 日下午 4 时 30 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瓦扬-古久里夫人(Marie-Claud Vaillant-Couturier)在开幕式上作了《国际民主妇联为民族独立与和平的斗争》的报告。在报告伊始,她就国际民主妇联为召开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十八个月内苦心经营而未实现的事”终于在新中国实现而表示衷心感谢。

古久里夫人是法国人,她的丈夫保罗·瓦扬-古久里(Paul Vaillant-Couturier)是法共领导人、著名作家,1933 年曾作为法国代表来华参加远东反战大会。1933 年 8 月 8 日上午,远东反战大会筹委会主席宋庆龄蔑视当局禁令,亲临码头迎接包括古久里在内的 5 位国际代表。9 月 30 日,远东反战大会在上海成功地秘密举行。

在古久里和他当时的妻子谭丽德(Ida Treat)的动议下,宋庆龄和鲁迅收集到的新兴木刻版画得以在 1934 年在巴黎的比利埃-皮埃尔·沃尔姆画廊(Galerie Billiet-Pierre Vorms)展出,展览名称为《革命的中国之新艺术》。古久里于 1937 年在西班牙内战中牺牲。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结束后,为追寻亡夫的足迹,古久里夫人在上海参观

时,曾在夏衍陪同下去虹口寻找远东反战大会的会址,可惜当时没有找到。

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宋庆龄已回到上海。1949年9月2日,她在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期间,被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举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

宋庆龄十分关注此次国际性妇女会议,为了写好给大会的文章,正在病中的她连续数天忙得足不出户。在11月26日给友人王安娜的信中,她写道:“我受托要为妇女大会写篇文章,为此需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更不用说需要找人谈话了,目的是为我的‘文章’收集必要的资料。几天来忙得我足不出户。我虽然已经开始输液,但是紧张的活动起了反作用,又是发烧又是头痛。这一切都是由于我承担了新的责任所造成的。”虽然病体不支,但是在得知妇女代表们将来沪参观时,她还是表示了欢迎。12月8日,她在致王安娜函中说:“我希望妇女代表团来的时候我还能坚持得住,因为那是我最感兴趣的代表团。”在写就致亚洲妇女代表大会贺词后,她又请翻译译好,并托当时主持上海妇女工作的章蕴带到北京。

12月11日,史良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宣读了这篇长长的贺词。

宋庆龄在贺词中倡导亚洲妇女应该团结起来,为争取下列权利而奋斗:

- 一、妇女婚姻应有平等权利。
- 二、妇女在家庭中与财产继承上,一切权利与男子完全平等。
- 三、母亲对儿女的权利。
- 四、增加托儿所、保育院、幼稚园、卫生设备与个人卫生教育来保养儿童。
- 五、立法规定同工同酬,分娩假期照付全部工资,禁用童工。
- 六、所有儿童必须受强迫免费教育,并展开“小先生”运动以扫除文盲。
- 七、设置妇女及儿童高等教育基金。

她建议此次北京会议发出两封战斗性的通电。第一封通电是给亚洲妇女的;第二封通电是给美英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妇女的。她号召各国妇女:为解放自己而斗争,为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12月16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闭幕。闭幕会通过了《致亚洲各国妇女姊妹书》《告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妇女书》《关于争取妇女权利的决议》《关于亚洲各国儿童情况的决议》等宣言和决议。闭幕会上还宣读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致宋庆龄的感谢电。

会议结束后,以古久里夫人为首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参观团74人从北京赴上海参观。12月22日晨0时10分,当火车徐徐进入月台后,宋庆龄和上海市党政领导一起驱前迎接。欢迎会旋即是在广场上举行,迅雷似的掌声划破车站的夜空。宋庆龄热情地致欢迎词说:

你们是为着世界的和平与民主而斗争的代表。你们莅临了已在转变中的上海,这个都市本来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堡垒。现在你们可以看出她已经完整地属于我们人民所有了。……我们都将看出人民的力量是万分巨大的,任何势力不能阻挠我们从事和平建设。

是日晚,宋庆龄与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一起,举行公宴欢迎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代表。次日晚,她又应邀出席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酒会,欢迎各国妇女代表们。宴会上充满着欢笑和诚挚友好的气氛。

代表团离沪时,古久里夫人依依不舍地对中国同志说:“我们回去了,但半个心还留在中国。”

1955年,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欧仁妮·戈登夫人一行4人应邀来华。5月5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会见了戈登夫人一行。是年11月30日,她致电戈登夫人,祝贺国际民主妇联成立10周年。“祝贺它在保卫世界和平和妇女儿童权益的事业中所获得的显著成就。”

宋庆龄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始终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是人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参加国际妇女运动,号召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争取妇女解放,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

宋庆龄是新中国重要领导人,也是新中国杰出的妇女领袖!

“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专辑^{*}

创立保卫中国同盟的重要功臣

——詹姆斯·贝特兰

朱玖琳

新西兰友人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 1910年8月11日出生于新西兰奥克兰市,在奥克兰大学本科毕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6年1月抵达中国,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中文和研究时局。在燕京大学,贝特兰和黄华同住一个寝室。贝特兰有着强烈的反法西斯思想,与进步学生十分投缘。他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海伦结为好友,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接受刚从延安归来的斯诺的建议,去西安,作为斯诺的特约通讯员,为英国《每日先驱报》发稿,报道西安事变情况。在西安,他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与时任杨虎城秘书的王炳南成为好友。他和史沫特莱、王炳南夫人安娜一起,每天晚上用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从XGOB电台向外界播报西安事变进展。回到北平后,发现《每日先驱报》不爱刊登斯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系列报道后,他同斯诺和英国青年约翰·利宁(John Leaning,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任中央委员)一起,创办了新刊物《民主》。

正是那次西安之行,使贝特兰有机会接触到另一种全然不同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他看到红军之间平等和谐的同志情谊,久久不能忘怀。于是他决定去探索中国

^{*} 为展现宋庆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团结引领广大国际友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同心奋斗的革命经历、独特作用和重大贡献,2020年,“上海宋研会”微信公众号推出“宋庆龄与国际友人”专题系列,聚焦保卫中国同盟时期,在宋庆龄的号召下,为支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而工作的国际友人,介绍他们的光辉事迹,弘扬他们的大爱情怀和献身精神,让国际主义精神在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继续发挥时代光芒。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天地——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日军侵占北平后,贝特兰和斯诺一起护送周恩来夫人邓颖超等3名中共党员一同撤离北平,到天津后,为他们订船票并一起继续撤离的是年轻的新闻记者爱泼斯坦。

9月,在西安,贝特兰收到毛泽东的一封电报,邀请他作为第一个英国客人访问延安。于是,贝特兰就此开始了他将近5个月的华北前线之行。

9月底,贝特兰来到延安。他在延安逗留将近一个月,对毛泽东进行了采访,还目睹了黄克功事件公审大会。他被延安的蓬勃朝气和充满希望的感觉深深吸引。

1937年11月初,贝特兰离开延安,去晋南八路军总部和贺龙的120师采访,并随军遍访华北前线。在随后引起轰动的《华北前线》(1939年在英国、美国出版英文版,在上海、香港出版中文版)一书中,他向世界宣布:“以我个人在晋北所观察的现象来说,我觉得即使是日本的那些善辩的人也很难长久维持他们那‘和平’的谎言的。”

华北前线严重缺医少药,周恩来想到向宋庆龄求助,于是刚从华北前线下下来,并且同情、支持中共抗日的贝特兰自然成为最合适的带信人。结识宋庆龄后,贝特兰从此成为宋庆龄维系一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

一、转达周恩来请求

贝特兰在结束华北前线战地采访后,于1938年1月来到武汉。他多次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周恩来特别同他讨论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问题。以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他们商定了一项计划——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5个分院,并继续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周恩来请贝特兰把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带交给香港的宋庆龄。

在武汉,贝特兰遇到了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以后重点援助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创办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1938年1月8日,白求恩大夫率领美国—加拿大医疗队启程来华,在贝特兰抵达不久来到了汉口。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们。在离开武汉前,贝特兰把他的一套旅行用的衣物全部送给了白求恩大夫,后来从白求恩在延安和华北各地拍的一些照片上,他还看得出白求恩仍穿着其中的某些衣物。在武汉,贝特

兰为白求恩拍摄了后来为人们所广泛熟悉的白求恩酷似列宁的那张照片。贝特兰说：“在我看来，这是白求恩在中国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

1938年3月，贝特兰在香港第一次见到宋庆龄。他与很多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人一样，被她外在的美丽、端庄和优雅所吸引，更被她对理想的坚贞不屈所打动。宋庆龄曾对他说：“我们已经懂得，不要对英国、美国或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抱太大的希望。中国可能得孤军奋战了。对于这一点我们并不害怕；但是，我们要求你们的政府为我们做一件事，那就是不要帮助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力量，我们就会变得强大起来。中国现在已经团结起来，终于成为了一个统一的民族。这正是我丈夫的夙愿，他把毕生献给了这个事业。”“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我们自己将战胜艰难困苦而取得胜利……”

4月初，贝特兰受邀参加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廖于1月来到香港）在香港银行家邓文钊家中举行的秘密会议。廖承志邀请了一些外国友人，席间谈到急需在西北地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和继续组织募捐。直到很晚时，他才向大家宣布，他是代表孙夫人举行这次会议的；她随时可以出任可能成立的任何援华委员会主席；她的兄弟宋子文将担任会长。当时提出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个名称并获得通过。贝特兰随后将他的两位朋友——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Hilda Selwyn-Clarke）和香港大学历史学高级讲师诺曼·法朗士（N.H.France）介绍给宋庆龄。他们成为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分别担任了名誉秘书和名誉司库。

保盟随即启动工作，努力实施周恩来在汉口与贝特兰等人商定的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计划。保盟6月14日在宋庆龄寓所正式宣布成立时，贝特兰已经离开香港，经大连、朝鲜、日本，去美国和英国，路费是贝特兰自己挣的，但此行的原因是宋庆龄对于他“前往美国和英国进一步推动”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这一计划作了安排。

1938年5月25日，宋庆龄致函贝特兰，表示希望看到贝特兰所写关于日本情况的观察报告，并感谢贝特兰对保盟创建的贡献。她说：“由于你的高度热情和助人不倦的精神，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终于发挥作用了。我们常常在念叨你那充沛的精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我们也感谢你赛尔温-克拉克夫人介绍给我们，因为这位女士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助手，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

二、护送大型救护车

由于通讯联系的困难和白求恩大夫日夜忙于医疗工作,有关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详尽的报道难以为外部世界所得知,1939年4月,贝特兰应保盟要求离开英国启程来香港,准备去五台山敌后游击区,“组织在保盟支援下的西北所有机构发送定期报告”。他向保盟提出,他愿意去五台山为组建国际和平医院义务工作一年。

6月,贝特兰从香港出发,同行的还有汉斯·米勒(Hans Müller)、江涛声夫妇等。

有一半犹太血统的德国人米勒在瑞士巴塞尔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时,深受中国进步同学江涛声影响。米勒毕业后,已经无法返回德国,江涛声建议他前往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工作。江涛声告诉米勒,自己要处理一些事情,随后也将前往香港。

江涛声1931年在德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所要处理的事情就是和德国妻子希尔达·派赫尔(Hilda Prerauer)一起,带领第一位“西班牙医生”——捷克共产党员弗里德里克·基希(Frederick Kisch)和奥地利共产党员保罗·杜汉(Paul Duhan)医生来华。在香港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杜汉的中国妻子江兆菊医生,她在抗战爆发后率领中国红十字会第29医疗队赴延安等地开展医疗救护工作,1949年应宋庆龄邀请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首任院长。江涛声一行在香港受到宋庆龄的热情接见,她亲切地对他们说:“欢迎你们远道而来支援中国抗日!”

基希留在香港等待另外两位第一批来华的“西班牙医生”——德国共产党员罗尔夫·贝克尔(Rolf Becker,中文名白乐夫)和澳大利亚共产党员弗里茨·严森(Fritz Jensen,中文名严斐德)。他们后来在贵阳图云关与贝特兰一行汇合。

宋庆龄将护送大型救护车去延安的任务交给了正要去西北的贝特兰和江涛声夫妇,贝特兰是总负责人,保盟要求他“全面检查运输情况”。临行前,宋庆龄向大家赠送了礼物。

大型救护车由英国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Sir John Thornycroft)捐赠。将要护送去延安的,除了这辆庞然大物一般的大型救护车外,还有23辆卡车,均装满了医药器材和汽油。贝特兰说这是八路军迄今为止获得的“最多最珍贵的捐赠”。

贝特兰一行一路艰辛地经海防、昆明、贵阳、成都到西安。在贵阳图云关他还得了一场疟疾,幸得林可胜大夫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救治。在赴西安途中,贝特兰

得知英法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于是他准备回国参加战斗。把大型车队护送到西安后,他向中途遇到的斯诺,以及米勒和江涛声夫妇告别。9月底,他回到香港,给保盟撰写了一篇非常有用的详细报告,报告车队一路的运输情况。随后返回祖国新西兰。

贝特兰未能行使保盟交托他的西北任务,但他记挂在心。10月,斯诺来到香港,他向保盟中央委员会报告说,他在延安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他讨论的结果是以贝特兰先生授予他的权力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作出建议”。从那时起,保盟由马海德处定期得到了大量的报告和照片。

三、临危受命

1940年6月,贝特兰在新西兰接到宋庆龄发来的电报,问他愿不愿意回香港继续为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电报说旅居海外的中国人面临新的危机,委员会需要贝特兰来帮助恢复它。随后,在贝特兰登上来华的远洋轮时,宋庆龄又发来第二封电报:“请在马尼拉稍事停留,设法在那里建立一个保卫中国同盟的分会。”

宋庆龄电报中说的“旅居海外的中国人面临新危机”指的是保盟面临日军封锁香港的危机。1940年6月22日,日军封锁香港,随后于6月24日要求英国政府关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不仅要禁运武器弹药,连汽油、卡车也在禁运之列。6月28日,香港总督下令英侨一律离港,香港一度人心浮动。保盟为此曾作非正式讨论,决定暂时不动,将不去内地,向外发展。保盟一度准备迁移至菲律宾。而此时正在内地休假的爱泼斯坦一时又回不来,于是宋庆龄再次想到了请老朋友贝特兰暂时代替爱泼斯坦。

贝特兰到了马尼拉后,发现宋庆龄在这里的华侨当中声望很高,他以宋庆龄代表的身份,拜会当地的主要华人领袖,非常顺利地得到了数额可观的捐款和华人领袖的支持诺言。在菲律宾,贝特兰去看望了正在为工合运动工作的斯诺夫妇,还遇到了来菲律宾为工合筹款的路易·艾黎和正准备去中国内地考察工合运动情况的卡尔逊上校。他随后同艾黎和卡尔逊上校一起乘船来到香港。

7月17日,英国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封锁滇缅公路运输的协定》。香港危机暂

时解除,保盟决定继续留在香港。

1940年9月6日,贝特兰抵达香港,随即接手《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的编辑工作。宋庆龄向贝特兰指出:“重要的是我们的宣传。我们必须告诉海外的朋友,中国真正在发生什么事。”

那时,国共关系渐趋紧张,统一战线正在破裂,保盟从陆路运送物资去西北,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有好几次整车的宝贵物资在路上被宪兵夺走。“摩擦”不断升级,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终于发生。贝特兰编辑《保盟通讯》时,“摩擦”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他在1940年12月1日发行的第24期通讯上刊登文章,披露了“最近在中国发生的摩擦”;随即又在1941年1月15日发行的第25期通讯上重点介绍了新四军。在1941年2月15日发行的第26期通讯上,他刊登《坚持统一战线》一文,分析了整个错综复杂的形势,说明了统一战线和世界形势的关系,详细描述了事变经过,报道了周恩来提出的12个条件,最后指出:“皖南事变向中国所有的爱国人士敲起了警钟,向国内外的一切民主力量发出了呼吁:必须继续施加压力,因为这样,国内和国际的反侵略统一战线才能继续坚持下去。”

不久,英国驻重庆大使邀请贝特兰去重庆英国大使馆当新闻参赞,宋庆龄得知后,笑着说:“当然,我们不愿失去你。但是,你在重庆会非常有用,尤其是在我那尊敬的妹夫采取最近这次背信弃义的行动之后。我们必须保持住统一战线。周恩来在重庆,但是他的办事处受到蓝衣社的严密监视。照你说的那个办法,你可以和他接触,并且使英国政府了解情况。”

在重庆期间,贝特兰果然不辜负宋庆龄,他曾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加入保盟,并希望他声明美国不能帮中国压迫共产党。他对詹森游说道:美国对华援助应该以蒋介石制止内战爆发为条件,美国不应干涉中国内政,以落入日本人圈套。

四、香港遇险

1941年春,贝特兰被宋庆龄召回香港,编辑保卫中国同盟的《1940—1941年度报告》。这时,金仲华、邹韬奋的加入也使保盟队伍得以壮大,他们负责编辑《保盟通讯》的中文版。此时却发生了宋子文宣布退出保盟的事情。迫于蒋介石压力,宋子文于1941

年5月30日给保盟名誉秘书司徒永觉夫人发来电报,宣布退出保盟。针对宋子文辞职,宋庆龄决断地说:“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我们需要在理事会中增加信任。”之后,保盟争取到了一批新的国际和国内赞助人,其中有孙科、冯玉祥、尼赫鲁、保罗·罗伯逊、托马斯·曼、赛珍珠和克莱尔·布思·卢斯等人。香港理事会也增加了新成员,其中有香港大学许乃波教授。

1941年12月,贝特兰终于完成了“像书一样”的年报编辑工作,随时准备付印。然而,这份报告却永远发表不出来了,因为形势这时骤然变得极其严峻。

在12月第一周,宋庆龄收到宋子文从华盛顿发来的急电,劝她马上离开香港。保盟开会时,宋庆龄询问大家的意见,贝特兰认为宋子文在华盛顿最了解内情,他对宋庆龄说:“如果他说应当走,我认为您应该接受他的劝告。”宋庆龄表示同意,但是她要等到出现真正的危机再走。

那边宋子文心急如焚地不断给宋美龄发电报叫她想办法救二姐,但是这里谁也没有把宋子文的警告真正放在心上。散会后,刚刚交了保盟年报校对稿的贝特兰一身轻松地诺曼·法朗士离开香港本岛度周末去了。12月8日,贝特兰回到香港的第二天早晨,正准备吃早饭时,突然听到枪炮声,随后得知日军此时此刻正在轰炸九龙启德机场。贝特兰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宋庆龄,为方便去机场,宋庆龄九龙公寓就设在机场附近。贝特兰打她公寓电话打不通,于是他赶紧把早饭塞进嘴里奔到西摩道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他接到了宋庆龄打来的电话。宋庆龄语气镇定地告诉他自己还在九龙,她向贝特兰口述了目睹香港轰炸的声明。在声明最后,她呼吁:“让我们共同战斗到底,直到把日本强盗赶过海洋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

12月8日傍晚,宋庆龄和姐姐宋蔼龄一起,持特别军事通行证,趁军火管制期间来到港岛。贝特兰陪伴她们在告罗士打酒店订了两间单人房间。第二天上午,他们在西摩道21号举行了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在香港的最后一次会议。

多年后,贝特兰深情细腻地描绘了这最后一次:

起初,孙夫人说要留在香港,同大家一起共度受围困的日子。但是,她留下来的确是再无事可做,让她来冒落入日本人手中的风险,是不可想象的。她

坐在窗边朴素的木制书桌旁,我们望着她,在窗外的山下,空袭警报声在居民住宅区尖叫。她是一个敏锐、勇敢的妇女,像这样的危机,她过去遇到过多次;她在过去三年中同这几个朋友亲密地在一起奋斗,她不愿意离开他们。

“那么,说来说去,我一定得去重庆啦,”她微微地做了个怪脸说。“上回,他们对我到那儿去不太高兴!不过,找个什么地方——中国,缅甸,甚至印度——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委员会再组织起来。”她把文件收拾好,朝着墙上她丈夫的照片看了最后一眼。“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继续下去!”

12月9日,宋庆龄和姐姐宋蔼龄及其长女孔令仪一起,在九龙启德机场从中午12点一直等到12月10日凌晨5点,才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当时四周正在猛烈交火,6个小时后机场落入日本人手中。

贝特兰随后和诺曼·法朗士一起投入保卫香港的战斗。这是他在来香港之前就做好的决定。来香港之前,他给宋庆龄秘书柳无垢发来电报,希望确认一旦战争爆发他不是被应募入伍,而是自愿加入志愿者队伍,因为战争的性质变了,保卫香港就是保卫民主阵线,因为那是他做的“最好的事情”。

法朗士牺牲了,贝特兰在香港沦陷后被关进集中营,以后又被转到日本,在战俘营里备受折磨,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

五、上海重逢

1945年12月,贝特兰作为远东顾问委员会特别顾问随新西兰代表团到日本访问。离开日本后,他来到上海。那是1949年1月到达上海的第一天,贝特兰应邀来到位于苏州河边的颐中大楼,当他敲门走进挂着“中国福利基金会”小牌子的201室时,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香港西摩道21号。屋里坐了很多,中国福利基金会正要开会,他看到了很多熟人,有廖梦醒、柳无垢、魏璐诗、王安娜,以及他在武汉时看到过的博西克医生(B.Borcic)。随后,贝特兰翘首以盼的宋庆龄到了。贝特兰看到她比以前瘦了,两颊塌下,但是双眼还是和以前一样平静而忧伤。

当天傍晚,他应邀来到宋庆龄位于靖江路45号(今桃江路45号)的住宅做客。宋

庆龄给他看了一些孙中山遗物,这些遗物刚刚从南京取回来,它们在战时被日本人从莫利爱路寓所掠走,交给汪精卫手下的汉奸保管。宋庆龄给贝特兰看了孙中山手书《建国大纲》、孙中山大元帅指挥刀等。她告诉他,准备把莫利爱路寓所交给国家作为孙中山纪念馆。

宋庆龄请贝特兰喝咖啡,吃“世界上最好的”哈密瓜,听他讲日本的情况。那种十分熟悉的明亮、热情、平静、温和的精神,又让贝特兰感受到了内心的安宁。最后她说:“现在你要回到你的国家去,但是我知道你会回到中国,因为战斗是在这里进行。这次战争不取决于日本战败。在中国这里,还有印度,要为未来进行多少工作。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要多少时间,人民将会胜利。”

六、重返中国

宋庆龄和贝特兰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并请他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聘请新西兰医护人员的工作。而他们再次相见已经是10年之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了。1956年4月底,贝特兰率领新西兰文化界人士访华团来华访问,在接受了周恩来总理接见,并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观礼之后,来到了上海。

5月15日,星期二,上午,这时已经是上海市副市长的老朋友金仲华来电提醒贝特兰与宋庆龄的午餐约定。贝特兰怎么可能忘记呢,思绪又把他带回到香港岁月。在香港,每次宋庆龄约他去家中吃饭,都会派宋子文司机开着宋子文那硕大的防弹车来接他。当贝特兰坐着锦江饭店派给他的车到达淮海中路宋庆龄寓所时,在门口站岗的卫兵向他敬礼,两名卫兵微笑着为他打开了大铁门。贝特兰手捧鲜花往里走时,宋庆龄迎面而来说:“你终于来了。”

“无论是春天的俏还是夏天的美,都没有秋天的这份优雅。”这是贝特兰在看到10年未见的宋庆龄时在心里默念的诗句。

宋庆龄带贝特兰参观自己的家。贝特兰看见客厅里挂着孙中山肖像,还有一副现代印度木画;餐厅里,宋庆龄向他介绍一幅中国妇女肖像画说:“我母亲。一位巴黎艺术家为我画的。”

金仲华已经先于贝特兰到了,不久耿丽淑和谭宁邦也一起到来。

餐桌上,宋庆龄举起酒杯说:“我们必须干杯,这是一种格鲁吉亚葡萄酒,它是有历史的。毛主席去莫斯科时,斯大林同志想给他一份来自他家乡的特别礼物,于是,他把这种酒给了他。毛主席给了我一些。很高兴我还剩下这一瓶酒,为我们的下一次重逢干杯。干杯!”

午餐后,宋庆龄邀请大家去花园喝咖啡。贝特兰忽然想起自己跨洋过海带来的礼物还放在门厅处,他赶紧去取来,交给宋庆龄。“啊,我最喜欢的利口酒!”宋庆龄看到自己最爱喝的甜酒高兴不已。

室外聊天随后因雨改为室内。贝特兰看了宋庆龄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亚洲三国的纪录片,宋庆龄对他说:“我上次出国访问是很辛苦的工作——有那么多安排,剩下的休息时间太少了!当然,任何有助于睦邻友好的事情都必须做。我认为这些访问确实有帮助。但当我从巴基斯坦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

“宋庆龄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责任。”带着对宋庆龄的无比崇敬,贝特兰在依依不舍地告别时说:“一定要照顾好您的健康,您对中国很重要。”宋庆龄回答他:“重要的是人民!”

贝特兰与宋庆龄约定的下一次聚会一直没有到来。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因病在北京逝世。贝特兰来到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吊唁,沉痛哀悼宋庆龄逝世。1982年,纪念宋庆龄国家名誉主席基金会在北京成立,由邓小平任名誉主席,廖承志任顾问,康克清任主席,贝特兰是理事之一。1993年8月24日,这位宋庆龄终生挚友、一直致力于新西兰与新中国友好事业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病在新西兰去世。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副研究馆员,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秘书长)

保卫中国同盟在汉口的代表

——王安娜

朱玖琳

1950年2月,德国友人王安娜得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出的“第壹号”聘书。这是补发证书,聘任时间是保卫中国同盟时期的1938年11月1日,聘任职务是“运输组主任”。

事实上,保卫中国同盟当年还没有运输组,常伴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寥寥数人,但是,正是王安娜为保盟物资运输打通了关卡,并长期从事保盟及其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物资运输和对外联络工作。物资运输和对外联络是保盟的核心工作,能够承担这一重任,与王安娜特殊的经历和她特殊的身份有关。

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施瓦茨(Anneliese Schwarz),1907年9月20日出生在普鲁士王国西普鲁士省(1939年并入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但泽市附近一个农村家庭。父亲在“一战”中阵亡,母亲靠政府抚恤金维持一家人生活。童年的经历使安娜利泽养成了勤奋独立的性格。中学毕业后,她先后就读于柯尼斯堡(Königsberg)大学(现属俄罗斯)、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柏林大学及奥地利的格拉兹(Graz)大学,并在格拉兹大学取得历史哲学博士学位。

在柏林求学期间,安娜利泽与在柏林读书的王炳南相识。王炳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为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书记,1932至1933年在季米特洛夫领导下,担任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国际反帝大同盟的东方部主任。安娜利泽

与王炳南在思想上有很多共同点。她也是一个反法西斯主义者,因为参加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活动,曾经两次被捕,于1933年3月离开了她在柏林供职的普鲁士国家档案馆档案资料出版部。1935年,两人在英国伦敦结婚,安娜利泽取中文名字王安娜,加入中国国籍,领了中国护照。

1936年2月,王炳南收到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知,要求他回国做杨虎城工作,于是带有特殊使命的王炳南偕安娜由柏林经莫斯科回西安老家。安娜自此开始了她“嫁给革命的中国”的生涯,直至1955年回国。

1937年3月,王安娜在上海结识了对她的一生有决定性影响的宋庆龄。从1938年开始,直到1955年,王安娜和宋庆龄一直保持合作,和宋庆龄的亲密交往对她来说“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漫长的岁月里,她对宋庆龄的尊敬和仰慕“与时俱增”。

一、结识宋庆龄

1936年9月,杨虎城赴沪治牙病,随即召王炳南来沪,王炳南不忍留即将临盆的妻子一人在西安,于是偕王安娜一起来到上海。在上海他们曾租住在法租界莫利爱路,不远处就是宋庆龄寓所。安娜也确实曾上门求见,但那时她对宋庆龄而言是一个陌生人,宋庆龄并没有准见。

10月上旬,勤奋的安娜不顾即将临盆,去看望了病入膏肓的鲁迅,告诉他正开始把他的《祝福》等作品译成德文。鲁迅给她看了珂勒惠支的版画,还邀她再来一次,介绍她认识一些青年作家。可是,这个意愿未能实现。杨虎城离沪后,王炳南陪伴妻子在上海迎来了他们的小宝宝王黎明,这一天是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日子。

11月,王炳南被杨虎城急电召回西安。西安事变爆发后,安娜不愿意袖手旁观,她决定突破难关到西安去。12月31日,冻僵了的安娜带着2个月的宝宝抵达了西安。当天晚上,她与史沫特莱初次见面。安娜说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史沫特莱用温暖和热情来款待她的夜晚。史沫特莱用戏剧化的语言、连讲带比划地向安娜描绘了西安发生的一切,她把自己的毯子和厚衣服送给安娜,还为安娜的宝宝换尿布,她就像对待一个老朋友那样欢迎安娜的到来。

在西安,安娜继史沫特莱、贝特兰之后,通过XGOB广播电台向世界播报西安的真

实消息。她还由史沫特莱带着,一起去西安郊外拜访红军。那是安娜初会红军,她看到红军战士非常疲惫,明显营养不良,但是他们的脸上却看不到空虚和绝望的表情。红军战士对她说:“参加红军,就是走上幸福生活之途。”

史沫特莱去延安后,给安娜来信邀请她也去。1937年3月,安娜来到延安,跟史沫特莱同住一个窑洞。在延安,她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结识了彭德怀、贺龙、林彪,见识了居住条件最好的李德窑洞,还见到了3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康克清、邓颖超……在他们口中,安娜了解到红军长征许多详细的情况。她认识到,“红军幸存的主力部队,经受了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的考验,在激烈的战火中锤炼成了钢铁战士”。

不久,王炳南来电,要安娜尽早返回西安同往上海。在即将离开延安时,廖承志来访,他说请求安娜替他带一封信给住在上海的母亲何香凝报平安,他已经多年没有和她通音讯。他说:“母亲和孙逸仙夫人是好朋友,她现在也住在上海,我想您一定会见到她的。”

1937年3月,安娜偕子随王炳南移居上海后,将廖承志的家信送到了何香凝手中。何香凝含泪感谢安娜给她带来爱子的信息,而安娜对她则不能不表示更深的谢意。因为她使安娜认识了影响安娜一生的宋庆龄。

在何香凝的引荐下,安娜终于见到了宋庆龄。初次站在宋庆龄面前,她和所有人一样惊叹宋庆龄的美。不久,她也成为《中国呼声》的大力支持者。这份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力发声的英文出版物,是在宋庆龄的支持和协助下创办的,安娜给予了杂志“一切可能的帮助”。

二、香港重聚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王安娜迅速投入上海人民的抗敌活动,她参加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委员会,参与发行外文宣传资料,定期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的活动,并和王炳南一起用德语对外播音演讲,向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和向外国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宣传活动。

在上海,安娜结识了7月份刚刚从新西兰回到上海的路易·艾黎,两人走遍了淞沪

抗战后的大街小巷。他们穿过日占区充满死亡和恐怖的街道,也走进了阴暗简陋的杨树浦贫民窟。艾黎告诉了她什么是包身工,女工们的生活有多么悲惨。

通过艾黎,安娜在上海又见到了老相识斯诺。1936年6月,斯诺手持一位德国著名汉学家为他写的介绍信找到王安娜,请安娜为他去延安采访提供帮助。和斯诺一起去延安的马海德,还为重病的王炳南治了病。

在上海,朋友们聚在一起谈论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大家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组织工业合作社。

年底王炳南去临时首都汉口为周恩来工作,他给安娜来信说:“我与周恩来曾谈起你,他说,你在上海的工作很能起作用,现在还是留在上海的岗位为好。”

1938年6月,安娜终于获准可以去汉口。经过香港时,她来到嘉林边道宋庆龄寓所与宋庆龄重聚。正是在宋庆龄寓所,是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刚刚正式宣布成立。于是,诚如王安娜所言:“我从保卫中国同盟创建起时便是它的成员。”保盟后来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王安娜也曾参与该刊的编辑工作。

三、保卫中国同盟汉口代表

作为保卫中国同盟的一员,王安娜与宋庆龄就到汉口接受任务的问题商谈过多次。因为保卫中国同盟支援中国红十字会位于长沙的救护训练所,安娜在汉口的任务是把红十字会的活动情况报告给保盟。任务确定后,安娜才启程去汉口。

1938年7月,王安娜乘坐的飞机在空袭警报声中降落在武昌机场。一家人在汉口团聚。

因为安娜和宋庆龄约定,要尽快把红十字会的工作情况以及伤病员和难民问题的有关报告送给保盟,所以,她决定参加前线访问团去现场考察,为她的报告收集真实的资料。

前线访问团由史沫特莱、史迪威、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协助艾黎工合工作的英国青年乔治·霍克以及王安娜本人共5人组成。一行人在8月上旬启程。他们坐火车来到长沙,访问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倾听总队长林可胜和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处长卢致德谈他们的工作和困难。林可胜告诉他们,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训练所“最初培养的

几批医疗小队,在前线都表现得很出色。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有的已经牺牲,有的负了伤”,损失不小。一行人随后经南昌来到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伤员收容所。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地狱图景。

在归途中,在他们的再三坚持下,他们的司机终于允许5名疲惫不堪的伤兵搭车同行。史迪威说:“比起汉口那些高谈阔论的家伙来,还是这些农民的子弟能勇敢地保卫祖国!总有一天,他们的权利会恢复,他们会受到平等的待遇。”

9月,日军开始逼近武汉,安娜忍痛接受丈夫的意见,送别奶妈和孩子回丈夫老家。武汉陷落日益逼近,国民政府已移往重庆。10月23日,夫妇俩坐上八路军办事处租用的“新升隆号”轮船撤离,同行的还有正准备回国途经武汉的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他们在李克农和边章五的带领下出发了,但是在出发第二天便遭遇到生死之劫。24日,王安娜等人跟着李克农上岸进村休息,跟他们上岸的还有随身保管藏有机密文件和所有人路费的小皮箱的赵世炎烈士夫人夏之栩。一行人出村回船时,日机出现,“新升隆号”被炸毁,日机随即疯狂扫射落入水中和在岸上四散奔逃的人群。王安娜一行人因为有李克农沉着冷静的指挥,在日机扫射下逃过一劫。

全船三分之一的幸存者在李克农带领下,历经艰苦终于来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先行抵达的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李克农带领大队人马继续南下,三天后抵达衡阳。一到衡阳,他们就听说长沙已被有组织地夷为平地。11月16日,当周恩来等人冲出长沙大火,撤退到衡阳时,李克农已经奉命在衡阳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12月3日,周恩来先行坐飞机撤退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他邀请王安娜和琼·尤恩同行,但是二人坚持不离开大部队。

不久,王安娜一行人也来到桂林。在他们抵达桂林次日,周恩来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安娜。他对安娜说:“现在,关于你的去向,我的意见稍为有些变更。前几天,运往西北去的大量医药用品、野战医院的设备和X光透视机,已经抵达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这些物资现在全部要经印度支那(即中南半岛,时为法国殖民地)才能运去。装船的话太慢了。上海也有保卫中国同盟的组织,但我们和他们未能取得紧密联系。因此,我想请你到香港和上海去,多少帮帮孙夫人的忙。如果你能接受这个任务,那我们太高兴了。”

四、打通物资运输线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乘飞机前往重庆之前,将广西龙州区民团总指挥官李新俊介绍给王安娜。安娜同李将军一起乘车出发,三天后抵达位于广西南部的龙州,并在李将军帮助下得到了进入中印半岛的入境许可。发现海防海关法国政府官员对中国人百般刁难后,对完成任务忐忑不安的安娜在海防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

在香港,安娜住在西摩道21号保盟办事处,她对宋庆龄说她想尽快去上海。宋庆龄亲切地对她说:“上海也有许多工作等着你做,到了那边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了。等你再回到香港时,我们一起到海边去作几次愉快的远足。”

1939年1月,安娜来到上海,她在上海停留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保盟上海分会成员的商谈上。他们谈到了组织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保盟上海分会急于知道沦陷区最需要的救援物资是什么,在上海已收集到的物资如何运往内地。为了提高上海分会的工作效率,安娜被邀请给几个志愿做这方面工作的小组谈谈自己在前线的体验和有关红十字会的工作。

回到香港后,安娜经常和大家商洽她到中南半岛的工作。3月11日,满载5辆卡车的援助物资由两名来自英国的医生哈利·泰博特(Harry Talbot)和保罗·杜汉(Paul Duhan)负责用船从香港运往海防。

在海防,两位英国医生去海关交涉,但毫无效果,甚至他们乘坐的开往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总部的救护车,海关也不放行。打通海防海关的任务十分艰巨。安娜在香港爱国名媛、为支援抗日志愿工作的年轻姑娘李安西(笔者注:李安西时去贵阳任林可胜秘书,贝特兰1939年夏在贵阳见过她,她后任端纳秘书,协助端纳整理回忆录)陪同下启程去海防,同行的还有20名新加坡华侨,他们向保盟提出志愿担任滞留在海防的卡车的驾驶员。李安西为安娜做翻译。

分手时,宋庆龄对安娜说:“能得到你的帮助,实在令人高兴。你能说法语,又是妇女,办起来可能会顺利些。”

宋庆龄的推理被证明是正确的。让在海防海关空等两周都没有结果的泰博特医生很不服气的是,安娜一出面就解决了难题。在海防海关,看到来的是一位“柔弱”的漂亮女性,又听到这位女性说的是德语,那些来自德法边境地区会说德语的法国官员态度就

越发亲切起来。安娜借着自己的性别和语言优势,立马就办好了所有通关手续。次日,安娜便带着车队取道河内、东丹,以最高速度驶向中国国境。一到龙州,安娜就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电报,要她立即回海防去,新的待运物资又到了。此后数周内,安娜频繁往返,这使她在广西南部一带成了知名的“王太太”,各方都来求她帮忙通关,但光是给保盟和八路军办运输就够她干的了。

1939年4月,安娜直接从昆明乘飞机去了重庆。

五、保卫中国同盟重庆代表

在香港时期,安娜同宋庆龄谈论过她到重庆以后的工作。宋庆龄反复向她说明得到国际和平医院等保卫中国同盟支持的许多项目的情况报告是如何的必要,她答应宋庆龄会尽早去华北前线,“这是因为来自华北前线的给保卫中国同盟的报告太少了”。

1939年5月,周恩来回到重庆,他给安娜布置了新的任务——往贵阳接收红十字会指定给八路军野战医院的医药品和补助物资,同时还要与红十字会会长林可胜商谈今后的合作。借此机会,安娜准备跟林可胜谈谈保卫中国同盟的新计划,向他说明她已任保盟驻重庆的代表。

为此,周恩来特地给了安娜一张以“八路军少校”为头衔的军用通行证,这使得安娜成为了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少校。周恩来说:“这张军用通行证对你往华北前线去会有帮助。”

在贵阳,安娜的主要工作是担任“西班牙医生”的联络人,给他们送书报,把他们的报告交给保盟或交给为支援他们而献金献物的外国组织。

1939年6月,安娜在重庆收到宋庆龄来信,再次叮嘱她依约行事。周恩来也劝安娜尽快去华北,因为进入八路军地区的困难与日俱增。已经有人听说,往延安去的学生们遇到了国民党的封锁及其他的障碍。保盟的工作需要真实的、生动的材料,周恩来因而想尽办法给安娜收集了许多资料,用以说明共产党支配地区的社会设施和文化设施。安娜把这些资料译成英文寄给宋庆龄,但是这些材料仍然不足,而且有些单调。

为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安娜经历了很多危险。在包围圈中,她白天休息,夜间行军。在黑夜中,她穿过深山峡谷,在悬崖峭壁上夜行军,身上长了虱子。在战士掩护下,

穿过日军占领下的铁路线后,安娜终于来到八路军师部。她用法语采访了聂荣臻,了解了边区“豆选”制度、减租减息制度,以及工农组织和妇女组织。

访问白求恩大夫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是安娜此行的目的。即将开拔前线的白求恩大夫带她参观模范医院——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她讲述缺医少药之苦。安娜向白大夫保证保盟一定会把必需的医药物资调配给他。

安娜把八路军卫生队的广泛活动,以及它所发挥的卓越的能力等详细情况综合起来,与急需的医药品清单一并送交保盟和宋庆龄处,但这些药品未能运到,白求恩大夫白等了一场。

1940年4月,宋氏三姐妹联袂乘飞机由香港来到重庆。宋庆龄坦率地对安娜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在这里,当展品。”

回到香港后,宋庆龄给安娜来信说:“实际上是政府阻止这些医药用品的输送。家丑不可外扬,难道我们能够对外国朋友说明这个情况吗?我本来还没有下决心把实际情况告诉他们,不过,连英国救援机构的成员都被政府阻挡不让通过封锁线,我怎么还能瞒得住呢?”5月30日,宋子文辞职。6月15日,保盟中央委员会在《救济工作与政治——答宋子文先生》一文中彻底揭露道:“在外国红十字会和救济基金会目前送到中国的大批物资中,没有一点到达他们访问过的那些重要作战地区的前线。”

此后数年间,保盟事实上停止了设法把药品送到医院去的努力,外国为医院募集的捐款,只交给驻重庆的八路军代表部门。

六、与宋庆龄的密切合作

1941年12月10日,宋庆龄在香港沦陷前,乘坐最后一班飞机来到重庆。自此,安娜与宋庆龄开始了密切的合作,一直到1955年。

宋庆龄初到重庆时,安娜是她时时见面的唯一的旧相识。在保盟前委员会驻重庆代表王安娜的帮助下,宋庆龄开始在重庆重建保盟组织。她们设法和国外接上关系,并采取措施确保保盟在各地的援助项目能继续获得援助。这些机构有纽约美国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加拿大维尔农中国战灾救济委员会、荷属西印度

阿鲁巴爱国华侨协会和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

1942年8月3日,廖梦醒应周恩来要求,来到重庆帮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8月6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告知她准备改组保卫中国同盟委员会。到8月中旬,保盟在重庆已经集合了足够数目的委员,可以正式重组一个中央委员会了。8月14日,宋庆龄致函王安娜说:“在写信时,爱泼斯坦应以改组后的保卫中国同盟执行书记的名义署名。你作为司库,梦醒作为办公室中文秘书。这是我的建议,我希望你们都会同意担任这些职务。”

保盟正式恢复了工作,而固定在保盟办事处——宋庆龄重庆两路口新村3号寓所工作的,总共也只有宋庆龄、廖梦醒和王安娜3人。

对于这段日子,安娜回忆道:“这时,我与孙夫人虽然经常见面,但几乎每天我们总是习惯交换长函短柬。她还常常让用人给我送点儿使我欢心的小东西,比如在重庆弄不到的一点儿美食,这是她出席豪华宴会时,悄悄地为我藏起来的,或者给我的儿子一件玩具,等等。”“我们常常在重庆南面的群山之中散步。”在被人认出来后,安娜就在宋庆龄身后保护住她,“怕她被发狂般聚集而来的群众挤坏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了,曾经共生死的王炳南、王安娜夫妇二人却因为各种原因决定暂时分手,分开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恢复夫妇关系。

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到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王炳南将他们从机场接到曾家岩桂园,他是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时期的秘书。9月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桂园举行招待在重庆的各国援华救济团体负责人的茶会,安娜陪伴宋庆龄出席。

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返回上海,因为原莫利爱路(时为香山路)寓所已无法居住,遂直接入住靖江路45号。安娜随即也追随她来到上海。

宋庆龄在上海开始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后,王安娜和廖梦醒、魏璐诗一起,成为宋庆龄身边最重要的工作人员。儿子黎明也与乔冠华、龚澎一起从重庆乘马歇尔专机来到了上海。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迅速扩展,队伍也逐渐扩大,王安娜又忙得快飞起来了。1946年,王炳南在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工作时,有几次来上海与宋庆龄商讨一些事情,与王安娜曾在宋庆龄香山路寓所相见。1948年夏,宋庆龄搬回香山路寓所居住,她写信

邀请安娜来做客时说：“希望你能过来团聚一次，正如你和炳南曾在这栋房子再见面时，你们称作的那种团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宋庆龄在给王安娜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由于工作转型，中福会不再需要外籍人士专门从事海外募捐和物资运输管理，王安娜暂时被借调到北京工作。为了表彰王安娜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成员所做的大量工作，当他们首次从上海到京时，周恩来专门为他们举行了庆祝会，董必武、聂荣臻、杨尚昆等领导也前去祝贺。

1955年，离家20年的王安娜回德国定居。安娜回国后，与宋庆龄一直保持书信往来。宋庆龄也关心着王安娜留在中国的儿子王黎明，并时时在书信中告知。王黎明后于1978年赴德国与母亲团聚。王安娜曾于1959年和1979年来华，与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老朋友相见。

1981年6月3日，正当宋庆龄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时候，治丧委员会成员、时任德中友好协会名誉主席的王安娜在德国家中收到了宋庆龄临终前寄来的最后一个邮件——刚刚出版的《中国建设》杂志。王安娜百感交集地凝视着宋庆龄病中颤抖的笔迹，向前来采访她的记者指出：宋庆龄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伟大政治女性。

（作者为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业务处（研究室）副处长、副研究馆员，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秘书长）

保卫中国同盟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伊思雷尔·爱泼斯坦

沈海平

2019年9月25日,在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前夕,“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共有278名个人和22个集体获此殊荣。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2005)名列其中。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昵称艾培(Eppie),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俄属波兰一个革命的犹太人家庭,父母因为参加反对沙皇的革命斗争遭到追捕和流放。他2岁时随父母流亡到中国,后在天津定居求学。家庭浓郁的革命气氛,父母的进步立场和社会主义观点给他打下深深的烙印。他在不满15岁时即入职天津一家俄文日报《晨报》,开始了记者生涯,负责将路透社及其他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稿译成俄文。不久,又受《京津泰晤士报》主编的聘请,进入该报社工作。

1933年与埃德加·斯诺的相遇,改变了艾培的人生轨迹。在斯诺的引荐下,他阅读了毛泽东、宋庆龄和鲁迅的文章,认识了史沫特莱等进步人士,与爱国学生运动有了联系,为进步刊物撰文……艾培从此投身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开始了与中国革命的缘分。结识宋庆龄后,艾培长期在宋庆龄领导的机构中工作,他们的友谊保持了一辈子。

一、在斯诺引导下投身中国革命

艾培认为对他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指引他从同情、支持中国革命到走上同中国人

民共同奋斗道路的第一个引路人是斯诺。

1933年,艾培看到了斯诺写的第一本书《远东战线》。书中鲜明的观点和流畅的文笔打动了,于是他发表了一篇书评,同时,主动登门拜访了斯诺。

当时,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住在天津的艾培,利用周末专程从天津到北平去拜访。在北平一个小四合院里的斯诺家,艾培认识了斯诺夫妇。他们一见如故,成为好友。尽管艾培比斯诺小整整10岁,但是他们志同道合。在斯诺家,艾培结识了不少燕京大学的教授,还有不常与西方记者接触的苏联《真理报》记者加特曼,以及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学生。

以后,北平的学生每逢到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推行的不抵抗政策,中途在天津等候换车时,常会带着斯诺的信找到艾培,在他的住处作短暂休息。

斯诺访问延安后,艾培最先从斯诺那里听他讲述延安见闻,并看到了斯诺拍摄的很多照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出版前,艾培就有幸在斯诺家看到了最初的手稿。斯诺生动地讲述在延安的情况,让艾培大开眼界,也感到震撼。他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也萌生了要到延安采访的强烈愿望。

不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在斯诺家,艾培读到了目睹这一事件的史沫特莱和詹姆斯·贝特兰给斯诺的信件,这对他也是很大的触动。艾培亲眼见到斯诺夫妇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一方面忙于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和其他文章,一方面积极筹备在北平创办英文杂志《民主》。斯诺邀请艾培为该刊撰稿,并作为编辑部成员出席会议。与此同时,艾培还开始为宋庆龄在上海支持主办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撰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北平被日军占领。《民主》杂志的出版工作被迫停止,斯诺全力以赴投入到帮助爱国者和革命者离开沦陷区的工作。同时,也毫不客气地请艾培协助他的工作,包括帮助并护送邓颖超离开北平,前往解放区。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几天,因患肺病正在北平西山疗养的邓颖超(化名李知凡太太)急需离开疗养所去延安,斯诺便利用外国人的有利条件,带领邓颖超、张晓梅和王世英乘火车到了天津,找到爱泼斯坦,让其负责为邓颖超一行购买去上海的船票,并一路护送。

当时,艾培并不知道被护送者的具体身份,只知道是“爱国者”,也就是抗日的,所以

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艾培安排邓颖超一行住进小白楼地区犹太人常住的泰来饭店,然后去买上海船票。那时船票很紧张,即使外国人去购买都很困难。购票时对乘船者的盘查也很严。于是,艾培通过自己父亲一个生意上的关系人,设法买到了英国轮船公司的船票,并亲自护送邓颖超一行顺利通过了盘查,登船上路。开船后的第二天,收音机里传来了日军攻打上海的消息,船长宣布不去上海,经烟台后直驶香港,于是艾培便与邓颖超一行在烟台道别。

二、加入保卫中国同盟

艾培第一次见到宋庆龄,是在1938年8月的广州。当时,艾培担任美国合众社的通讯记者。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京沦陷,武汉与广州都受到了严重威胁,艾培正在广州作报道。他目睹日军每天都对这个城市狂轰滥炸,但是人民没有屈服,始终英勇抵抗。

8月20日,宋庆龄由香港乘轮船抵达广州。抵粤当日,她便不顾空袭警报尚未解除的危险,外出视察。宋庆龄不仅在广州各地视察,还在广州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呼吁英美停止同日本进行贸易,援助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

9月14日,宋庆龄再赴广州。这一次,她邀请艾培一起参加了9月17日欢送印度国大党派来的医疗队上前线的活动。9月18日,她参加了广州为纪念“九一八”事变7周年而举行的超过20万人的火炬示威游行。艾培看到,冒着日军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的危险,成千上万的广州市民打着火把在夜晚的街道上游行示威,苗条端庄、容光焕发的宋庆龄神态镇定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这一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以至于他多年后一直把这一天误记为是他第一次同宋庆龄见面的日子。

之后,宋庆龄将艾培等一批中外人士召集到一起商量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宋庆龄告诉艾培,说她早已在《民主》与《中国呼声》杂志上看到过艾培的文章,通过艾培的文章了解了他的观点与文笔,对他有了初步的认识。在广州沦陷后,宋庆龄即邀请艾培到香港参加保盟中央委员会,任务是编辑机构的机关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那一年,爱泼斯坦23岁,是保盟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保盟的骨干成员都是尽义务工作的,包括宋庆龄全都不领取任何报酬。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艾培入职香港著名的英文报纸《孖刺报》报馆,靠在《孖刺报》当编辑维持日常

生活开销。

三、编辑《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

在中华民族遭受灾难的危急时刻,宋庆龄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这是一个有外国人士参加的专门从事向海外募集资金和医药物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国际性反法西斯救援机构。

为了与国际援华团体建立经常联系,保盟于1938年下半年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专门向海外友人和华侨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需要,通报保盟的工作和海外援助的情况。

《保盟通讯》是宋庆龄十分重视的刊物。早期是一份油印的英文简报,编印过6期,其中第五期是艾培写的关于广州沦陷前后的报道。从1939年4月1日起,《保盟通讯》改为铅印出版的双周刊,称为新刊,每期发行1000份。从新刊第7期起,每期增至2500份。为扩大在华侨中的影响,1941年初,《保盟通讯》从第26期起,还同时出版了中文版。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保盟通讯》被迫停刊。

新刊共出了36期。艾培亲自编辑了1—17期,参与了25—36期的工作。而18—24期的编辑工作,因为1940年春至1941年5月,艾培离开香港去重庆工作,宋庆龄便请詹姆斯·贝特兰接替了艾培。先后参加《保盟通讯》英文版编辑工作的还有约翰·列宁、柳无垢等人。中文版编辑为邹韬奋、金仲华等。艾培对这份刊物充满感情。50年之后,他将自己一直保存着的《保盟通讯》作为文物全部捐给了北京宋庆龄故居。

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报人,艾培的编辑思路十分清晰。1939年4月1日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新刊第1期的头条,是艾培写的《我们的两周刊〈通讯〉》。他开门见山阐明了机构出版发行这份刊物的目的、作用和意义。

从本期开始,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将定期出版《通讯》,报告本同盟倡导各项活动的进展、新的需求,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朋友的援助等情况。

我们打算在每一期的《通讯》上都登载一份战地报告,并尽可能附上照片。

《通讯》的其他篇幅,将简要报道两周以来发生的和对中国有着影响的事件、阐

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收到捐赠款物和使用情况。

收到本《通讯》的机构,请对如何改进本刊和扩大发行量,提出你们的建议。

艾培很明白读者希望了解什么,知道如何让读者身临其境,感受到战争的危险和前线的困难与需求。因此,他特别重视发布机构主席宋庆龄的观点与立场。《保盟通讯》的第6期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第9期刊登了《孙逸仙夫人致外国团体的信》,第18期刊登了宋庆龄的文章《中国·世界和你们》。

虽然,宋庆龄直接给《保盟通讯》写的文章不多,但是她为《保盟通讯》定下基调,就是真实报道,以及给最需要帮助的地区与人们以帮助。50年后,艾培自豪地说,《保盟通讯》完全符合宋庆龄的要求,特别是通过通讯“表述了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在这一斗争中克服种种危险和困难的精神;表述了许多国家的人民在反对他们共同敌人的斗争中的国际互助热情,尤其是对战斗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前线的中国人民的支持;它表述了宋庆龄在关键的时刻,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在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了桥梁。”

艾培认为《保盟通讯》至今读来依然令人感兴趣,依然具有史实价值,是因为没有空话、套话,内容真实、具体。每期一份的战地报告,坚持让在战地做实际工作的人撰写,是艾培很得意的一招。如让诺尔曼·白求恩写他在国际和平医院治疗伤员的情况,让路易·艾黎从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编者注:简称“工合”,下同)的基层单位寄来稿件,伊文思·卡尔逊在视察了新四军后写出报告,詹姆斯·贝特兰写了关于他如何运送医药物资从香港到延安的经历等等。这些撰稿人的报告来自现场,是他们目睹之后的切实感受与体验,加之撰稿人本身的才华与文采,增强了真实感、生动性、感染力。

艾培也亲自采写战地报告。1940年春他离开香港前往重庆,途中撰写战地报告《突破封锁进入中国》一文,发表在《保盟通讯》第18期上,真切讲述了自己历经10多天的艰难颠簸,从香港进入广东韶关的一路见闻与感受,从侧面反映了保盟收到的捐赠物资可以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与重重封锁之下,依然能够通过水路、山路与公路甚至铁路进入抗日的前线与根据地,将反击侵略者所需的物资运抵目的地。

在第26期的《中国的经济战线》一文中,艾培讲述了他在重庆考察工合项目的所见所感,以一组翔实的数据,说明经济抗战的意义与作用。艾培在报告中概括道:“(重庆的)76个合作社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启示。它们表明:中国工合这种组织形式,在对敌人实行工业抵抗、保全战时工人的技能和较好的生活、向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方面,能够同其他各地一样取得成功;这种形式适合于今日战时中国的各种地方经济条件。”

《保盟通讯》的出版发行,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战胜敌人,使全世界认清中国人民的处境和他们斗争的重要性。

《保盟通讯》的出版发行,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帮助外国援华团体、华侨和海外朋友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推动了海外的援华活动。

其中,艾培的努力功不可没。多年后,宋庆龄在给艾培的信中,对他当年的工作给予了极高评价。

在香港时,你编印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抗日根据地真相,揭露国民党制造的谣言。由于你这些强有力的宣传,我们开始收到各国捐赠给新四军的药品和现款。陈毅因此说,我们给他们的工作以莫大激励。

——宋庆龄 1977年4月25日致爱泼斯坦

除了你真诚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之外,你的那支能干的笔也为我们的工作和人民的事业赢得了外援和理解。

——宋庆龄 1978年5月25日致爱泼斯坦

四、翻译延安精选文件

当年在香港,艾培每天从黄昏一直忙到深夜,但丝毫不觉疲倦,还有时间做其他许多工作。他说,在宋庆龄的领导下,自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艾培除了为保盟做宣传工作外,还为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委员会编辑了一两本小册子。艾培的第一本著作《人民之战》也是在那时候问世的。他在这本书中

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头两年抗日战争的情况。此书出版时,1939年6月30日,宋庆龄特地为艾培撰写了推荐说明,称赞这本书“不同于其他国外介绍我们反侵略战争的书。因为它把对我们过去斗争具有分析性的第一手资料与我国革命的未来发展前景紧密联系起来”。并说:“中国的每一位朋友都值得一读。”

此外,艾培还在同为保盟中央委员的廖承志的主持下,从事中共文件的英文译本的编辑改稿工作。廖承志交给他翻译的文件是延安精选出来,准备在国际上发布的,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长篇论著《论持久战》。来自延安的这些文件和其他一些文件在香港翻译出版后,有时从本港,有时从马尼拉发往世界各地。当时与艾培一同参加翻译的还有同住的唐纳德·艾伦和叶君健。当年他们3人在香港的罗便臣道租住了一套房子,稿件译完后打在蜡纸上,油印出来,分发出去或送到国外去复印。

后来,他们还挤出时间编辑了延安推荐的《中国革命运动史》的英文译稿,并对几期《中国作家》的英文版作了文字加工。他们参加的这些政治文件的翻译工作都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他们为之工作的那些出版物可以称之为新中国第一批外语对外宣传书刊的开始。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艾培开始给《纽约时报》投稿,论述中国的新文学艺术。这些文章发表在该报的“图书评论”版。之后,他开始给《纽约时报》撰写关于中国解放区的第一手报道系列,这也是该报第一次刊登有关中国解放区的信息。

五、逃出拘留营

1941年12月9日,日军进攻香港的第二天,保盟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让宋庆龄立即离开香港赴重庆做重建机构的准备,其余人在香港做撤退准备,尤其不能让机密资料落入日军手里。

宋庆龄乘坐的是从香港九龙机场起飞的最后一个航班,飞机刚一飞离,九龙机场即被日军的炮火炸毁。九龙被占领后,位于香港本岛西摩道21号的保盟的办公室成了柳无垢及她的父亲柳亚子等一家人的避难所。柳无垢时任保盟办公室的秘书。每天艾培在报社工作完毕后,就冒着隔海射来的日军炮火赶到保盟办公室去帮助柳无垢销毁文件,晚上再返回报社居住。

艾培原定撤离香港的计划是,先悄悄乔装更名躲进医院,同时在报刊上发布一个记者艾培在一次日本飞机轰炸中遇难的假消息,之后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再设法去重庆。谁知,计划只执行到一半即失败,艾培遇难的假消息经报纸传播,令远在美国的艾培父母伤心不已。艾培本已经乔装更名顺利躲进一家医院,并瞒过了日本宪兵的盘查,就等接应者带他离开香港,但日军突然占领了医院,将医院里所有人关进了赤柱拘留营。

艾培是个极其乐观的人,他一进赤柱拘留营就联络狱友积极设法逃脱,好在拘留营内管束得并不太严,于是,艾培和邱茉莉与另几位同伴历经惊险,竟然划着用各种废弃物制作的小木船,冒死成功逃离了赤柱拘留营。他们先是到了澳门,几经辗转后终于来到了重庆。

六、重庆再聚

1942年,艾培与邱茉莉几经辗转到达重庆后,与宋庆龄会合,继续为保盟义务工作。

此时,经过生死考验的艾培与邱茉莉在重庆结为夫妇。虽然在战时的陪都比在香港工作难度大得多,但是他们这批重新聚集的保盟成员依然一起在宋庆龄领导下努力为赢得抗战的胜利而工作。

在重庆时,没有办公地点,只能在宋庆龄的起居室里工作。无法搞到印刷设备,只好托友人在旅行时把稿件带到国外,由国外支持者帮助印刷出版。1943年的保盟年报《在中国游击区》就是在纽约印刷出版的。但是重庆也有比较有利的条件,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有来自盟国的许多外交官、军事人员和救济机构的代表,以及各大媒体的记者,他们都想会见宋庆龄这位世界知名的人物,了解她的主张。中共代表周恩来也在重庆,即使国民党也无法阻止宋庆龄与周恩来见面。

宋庆龄领导保盟在重庆继续为支持抗日根据地开展各种义演、义卖和宣传活动,源源不断地募集医药物资,并千方百计运抵那里。而艾培与邱茉莉在重庆为保盟所做的主要工作,还是为赢得抗战的胜利而努力宣传与呼吁,传播真实和正义的信息。特别是1944年争取到加入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机会后,艾培得以亲临早已向往的革命圣

地,看到一个充满生机、朝气蓬勃,有理想、有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心脏”,看到了人心所向,采访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他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对这样的根据地进行物质与道义上的支持是正确的,也是值得的。

在延安时,艾培与毛泽东有一次单独的谈话。艾培向毛泽东转达了宋庆龄的问候,并代表宋庆龄就保盟如何向延安提供更有有效的帮助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交给艾培一张所需物品的清单,请他带回去交给宋庆龄。

在周恩来的窑洞里,周恩来告诉艾培,他利用往返重庆与延安的机会,把宋庆龄募集的药品和医疗设备以及无线电器材带到延安,一些虽小但十分珍贵的物件——牙科的钻头和外科手术用线等就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带到延安。

在延安,艾培撰写了大量报道,通过留在重庆的邱茉莉及时发向世界,让被严密封锁的共产党根据地的信息冲破封锁,公之于世。

访问延安的经历,深深触动了艾培。他急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所感写成书,但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这些设想根本无法实现。于是艾培与妻子邱茉莉一起到美国(他父母的移居地)生活了5年,撰写出版了《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札记》。其中《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的书名,取自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训。

七、参与创办《中国建设》

1945年至1951年初,为了写书,艾培与邱茉莉到了美国。对于他俩来说,这不过是战斗阵地的转移而已,在美国的5年是他们在逆境中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奋斗的5年。他们加入美国援华会,继续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在抗战胜利后由保盟更名)宣传、募款,帮助编辑出版《孙夫人的报告》;他们也和其他一些在中国曾经追随过宋庆龄的老朋友史沫特莱、斯诺夫妇、浦爱德、陆懋德、耿丽淑等人一样,加入了“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在美国援华会步入反动逆流后,他们做出坚决斗争,毅然退出,并和耿丽淑等一起另行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

直到1951年春,艾培与邱茉莉遵从宋庆龄的召唤,脱离敌对势力的监控,辗转回到

新中国,着手筹办新中国第一份对西方世界传递新中国真实信息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

艾培一到北京,立刻投入了筹备工作。他不仅改稿,还经常撰写文章。艾培写作经验丰富,最难得的是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以及背景有着极深刻的了解和积累,文字修养深,编辑技术高超,有些稿件,往往经他点睛之笔稍作润色,就成了一篇极好的文章。

他作为资深新闻人,对杂志的编排、印刷以及铅字字体的选择,照片的取舍、剪裁,美术品、工艺品的选择等,都体现出独到的见解。特别是他对刊物、对对外宣传工作的责任心和热爱,使他对杂志投入了全部精力和心血。

宋庆龄对艾培的工作很满意。1980年3月22日,宋庆龄来信道:

亲爱的艾培:

我刚读完我们的《中国建设》四月号,觉得它可读性很强,也很有教育意义。取得这样的成绩,是由于你和全社干部殚精竭虑去实现我们已故总理生前亲自表达的对我们的希望和指示。

杂志在各方面都编得很好。我想它可以成为国外学校里外国文学课程的教材。历史细节真实,文字流畅,而且艺术性又这样高!

向你和同志们祝贺!

SCL

字里行间,充满着自豪与欣慰。宋庆龄在高度赞扬艾培为《中国建设》杂志所作的努力之外,还表达了对他俩共同的朋友——周恩来的尊敬与怀念。

对《中国建设》这份刊物,艾培十分热爱。不仅因为他经历了创办阶段,与它一同成长,更因为它是宋庆龄的事业。从担任执行编辑,到总编、顾问,直至生命的终结,他勤恳为这份杂志工作了一辈子。他认为,这是宋庆龄创办的事业,也是他自己的事业,是值得为之努力奋斗一辈子的事业。

八、宋庆龄最信任的人

爱泼斯坦是宋庆龄最信任的人,是宋庆龄唯一指定为自己写传的人。宋庆龄在晚年曾写过3封信,请艾培为自己写传。用宋庆龄自己的话说是“信任”。

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

——宋庆龄 1975 年 5 月 28 日致爱泼斯坦

无论如何,我请求你在我死后为我写传记。因为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

——宋庆龄 1980 年 9 月 17 日致爱泼斯坦

我深深地被你的友情和对我的信任感动了,真是思绪千万,百感交集。尤其是我知道曾有多少人要替你作传。

首先,我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我会把我的能力和精力都无保留地投入其中。

——爱泼斯坦 1980 年 9 月 20 日致宋庆龄

我终于可以写信告诉你,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因为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同意为我写传记了。

——宋庆龄 1980 年 9 月 25 日致爱泼斯坦

的确,信任与了解,是宋庆龄选中艾培为她写传的最主要的原因。艾培珍藏了宋庆龄给他的 200 多封信件。200 多封信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宋庆龄与艾培的深厚情谊以及宋庆龄对艾培的高度信任。

艾培是在宋庆龄领导的机构里从创建起就参加,并且工作时间最久的人。从 1938 年至 1981 年,艾培与宋庆龄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共同经历过许多事,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如斯诺夫妇、格兰尼奇夫妇、有吉幸治、杨孟东、路易·艾黎、耿丽淑、马海德夫妇、米勒夫妇、斯特朗、史沫特莱、贝特兰、周恩来夫妇、廖梦醒和廖承志姐弟、邓文钊父子、陈乙明、陈翰笙、陈志昆一家等等。

1978 年,在筹备纪念保盟成立 40 周年之际,宋庆龄曾写信给艾培深情回忆道:“往

事如潮,涌上心头。我的心回到了我们在广州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你是合众社派出的记者,专门报道中国事务。我为你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深深感动。当你同意我的请求到香港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时,我是多么高兴。”“从那以后,许多外国朋友来来去去。为我们工作过,但是你,亲爱的艾培,是始终被充分信任的。”

在几十年的交往过程中,宋庆龄十分了解艾培的为人与行事风格,特别是对艾培的文字功夫与写作能力,不仅熟知而且欣赏。她知道,艾培的写作态度很严谨,长期的新闻与编辑工作经历,培养了他追求真实与准确的习惯。况且,从他写作并出版的书籍名称就可以知道他所热衷与关注的话题:《人民之战》《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等等,她完全清楚艾培绝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附庸低级趣味。传记到他手里,绝不会写歪。

宋庆龄与艾培对新闻、写作与阅读方面都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经常交流阅读心得以及国外最新出版的书刊和知名作家的信息。特别在对外宣传报道方面有着相同的观点,在努力坚持《中国建设》杂志独特的定位与风格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共同探讨与磋商。他们往往为了一篇重要的稿件,反复推敲和修改。宋庆龄也曾多次放手请艾培代拟文章、起草信函、修改润色。特别是他们在共同应对一些造谣诽谤的事件的过程中,曾无数次一起讨论与斟酌,宋庆龄对艾培的文笔、写作风格以及对事物的分析、描述和把握分寸的能力十分了解,完全放心。她也很明白,艾培完全熟悉和了解自己的想法以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路与把握的尺度。

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他们一直保持通信的习惯,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经常用信件沟通信息。艾培曾应邀在1980年《人物》第3期写了《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一文,事前征求过宋庆龄的意见,完稿后又交宋庆龄审阅,宋庆龄完全赞同,并补充了内容。所以宋庆龄对将自己的传记交给艾培写,心中完全有底,非常放心。

艾培没有辜负宋庆龄的嘱托,在宋庆龄逝世后,以10年的心血与努力,完成了宋庆龄传,写出了他心中的伟人。同时,他不仅始终关注着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对外刊物,还关心着宋庆龄创办的机构的发展与壮大。

从1988年后,他担任了中国福利会的副主席,参加一年一度的执行委员会会议,对每年的工作提出决策建议。对机构遇到的困难,出谋献策,协调解决。每逢参加中国福

利会执行委员会会议,他总是习惯地发问,如果宋庆龄主席在座,她会怎么说?她会怎样做?

艾培从不为自己个人的私事向领导开口,但是为了宋庆龄创办的事业发展,他给江泽民主席与朱镕基总理写信,给各相关部门的领导写信,还利用每年的政协会议以及总书记、总理每年节庆时前来探望慰问他时的宝贵机会,提出请求,要求对宋庆龄创办的机构与事业多多给予支持和帮助。

1990年,艾培获得了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他的确具有与宋庆龄一样的精神,也的确具有与樟树一样的品格。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之际,艾培荣获新中国“最美奋斗者”称号,实至名归。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

保卫中国同盟编外战友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徐 涛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出身卑微,1892年2月23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Osgood)附近的佃农家庭,9岁时随家人搬迁至科罗拉多的矿区,在此长大。她自幼开始做工补贴家用,当过侍女、烟厂工人、书报推销员,但始终没有放弃求学之路。

1918年,史沫特莱为女权主义先驱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节育运动撰写一些揭露丑闻的政治性报道,并因为帮助组织印度流亡者争取独立的斗争而被捕入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年代在魏玛德国、30年代在中国,她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作家。

宋庆龄何时何地与时沫特莱相遇目前尚难定论,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两人最迟在1929年9月之前就已相识。那一年5月,宋庆龄因为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关系,专程从德国回国,居住在上海家中,至9月21日再次赴欧。当时,业已抵达上海的史沫特莱送上了她那本刚刚面市的成名作《大地的女儿》,并在扉页上题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赠词:“送给宋庆龄同志,我无保留地尊重和热爱的一位忠贞不渝的革命家。——1929年9月17日于上海,艾格尼丝。”这本见证两位伟大女性友情之初的著作,现在仍旧珍藏在上海宋庆龄故居之中。

1936年以后,由于斗争环境和私人关系的变化,史沫特莱没能再像以前那样与宋

庆龄同处一地、并肩工作,但她们仍然为了同一个伟大的革命事业而保持着联系。在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上,宋庆龄和史沫特莱共同努力,为缺医少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的物资和药品。

一、共同营救牛兰夫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史沫特莱与路易·艾黎曾一道实地考察上海多处血汗工厂,到过黄浦江上的码头。在目睹底层民众的生活境遇后,路易·艾黎对史沫特莱说:“我觉得好像整个制度都需要改变。”史沫特莱一把抓住他的手腕说:“那就让我们来干点什么改变它吧!”史沫特莱迅速投身于中国的社会政治运动之中,其积极程度相较她之前参加印度革命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1 年 7 月,宋庆龄回国奔母丧。丧事完毕后,宋庆龄回到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家中,收到了史沫特莱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为救一个人(即牛兰, Hilaire Noulens)的生命,希望宋庆龄在百忙中给予 5 分钟谈话机会。

牛兰夫妇 1931 年 6 月在上海被捕,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即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而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组织科负责人,但在当时甚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被误认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

据陪伴宋庆龄回国的胡兰畦回忆,宋庆龄看过史沫特莱来信后说:“这封信的英文写得很好,这信的英文基础很高深,话没有多少句,语言和用字都很美的。”

宋庆龄回国后接受采访的第一名记者便是史沫特莱。1931 年 8 月 24 日,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对话刊登在当时影响力最大的上海英文日报《字林西报》上,通过史沫特莱的笔,宋庆龄公开表达了自己坚定的政治态度——不参与宁粤调停,不是第三党成员,政治见解仍然和 1927 年在武汉所陈述的相同(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要求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的电报雪片般地从海外飞来,《字林西报》当天同时选登了其中来自德国的数篇。此后,宋庆龄成了营救牛兰夫妇公开活动的中心人物,多次赴宁当面要求司法当局释放牛兰夫妇,甚至亲与蒋介石交涉。

以史沫特莱为中介,宋庆龄与营救牛兰夫妇的同道中人佐尔格(Richard Sorge)小

组正式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

1932年7月,上海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正式成立。宋庆龄任委员会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办事处设于四川路。该委员会随即发表英文宣言,要求将牛兰一案移沪审理,或无条件将其释放。

面对声势浩大的国际救援压力,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最终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宋庆龄一直关注着狱中的牛兰夫妇以及他们的孩子吉米。吉米后被接到宋庆龄家中住了几个月,直到苏联来人将他接回苏联。而牛兰夫妇则在1937年南京陷落之前,狱卒打开牢门放人后溜出监狱,来到上海。宋庆龄把他们安顿在一个空闲的公寓中,还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具。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下来,1939年顺利地返回苏联。

以营救牛兰夫妇为契机,1932年1月13日,在中共地下党支持和宋庆龄帮助下,史沫特莱等人创办了英文刊物《中国论坛》(*China Forum*),具体编辑交由美国记者伊罗生在上海法租界里负责。

宋庆龄在《中国论坛》上公开呼吁,“让我们团结起来,用我们最大的力量来保卫那已经由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剥削的羁绊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他们现在正受着国民党军队第五次而且是最大规模的进攻”。史沫特莱等人用化名在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宣传中国革命。

二、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2年夏秋之间,宋庆龄、史沫特莱等人开始酝酿筹备一个组织,以谴责国民党“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以及“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的现况,“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

12月30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今金门大酒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传同盟的宗旨及进行情况。

同盟章程规定,参加者可“不拘国籍、性别及政治信仰”。这一组织最大限度上团结了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进步力量,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

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 7 人。

史沫特莱虽然不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列,却是公认参与组织活动最为积极的国际友人之一,被视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骨干成员。在同盟于上海正式亮相之前,史沫特莱肩负任务,秘密前往北平活动,帮助促成北平分会,积极游说胡适、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夫妇等人入盟。

史沫特莱好友陈翰笙在致杨杏佛之子杨小佛的一封信中回忆道:“史沫特莱对‘同盟’非常热心,通过孙夫人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这段时间,史沫特莱与宋庆龄交往十分密切,是她得力的工作助手。邹韬奋回忆道,同盟会议“每次参加者有蔡先生、孙夫人、她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女士、鲁迅、林语堂、杨杏佛、胡愈之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

1933 年 2 月 17 日,作环游世界旅行的萧伯纳(George B. Shaw)偕夫人乘英轮“皇后号”抵达上海。宋庆龄在上海家中热情接待了这位英国著名作家,蔡元培、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出席作陪。

史沫特莱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上,但是事与愿违,“胡适事件”所带来的冲击波,对她精神打击不小,随后身体也发出警报,她时常感到筋疲力尽。1933 年 5 月,史沫特莱离开上海,去苏联疗养。

史沫特莱走后不久,6 月 18 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特务刺杀。社会各界对杨杏佛的吊唁庄严隆重,同时也成为了同盟本身的告别仪式。虽然宋庆龄郑重声明:“杨铨(即杨杏佛)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目的”,但大多数成员还是选择就此作罢。在轰轰烈烈地活动半年之后,同盟结束了它的使命。

三、发出中国呼声

史沫特莱于 1934 年 4 月离开苏联,转道美国,直到 10 月 22 日才重新回到上海。11 月,宋庆龄来到史沫特莱寓所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聚会。她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和在座的朋友畅谈。几个美国朋友唱了美国工人歌曲,最后还高唱《国际歌》,大家边谈边唱,非常高兴。

中国正值红军被迫长征、革命失败主义蔓延之际。不久,在宋庆龄的关心下,侨居上海的进步青年以学习小组的形式聚会在一起,在共同学习马列主义的同时,了解到中国真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以及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这个学习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史沫特莱寓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培恩公寓二楼举行的,参加者有路易·艾黎、耿丽淑(Talitha Gerlach)、马海德(George Hatem)、汉斯·希伯(Heinz Shippe)、卢秋迪(Trude Rosenberg)夫妇、魏璐诗(Ruth F. Weiss)、甘普霖(A.B.Camplin)、陆懋德(Maud Russell)、夏秀兰(Lily K.Haass)、邓裕志、艾琳·魏德迈(Irene Weitemeyer)、曹亮。据马海德回忆,史沫特莱当时就像是“火花一样激励着”这个学习小组。

此时,宋庆龄和史沫特莱肩负着一个共同使命——在上海另出一份新的刊物以取代已经停刊的《中国论坛》。她们一致认为必须有一份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报道政治局势的刊物;而这样一份刊物将不得不使用英语、由国民党当局奈何不得的外国人编辑,并在南京政府鞭长莫及的上海租界内出版。

在史沫特莱的再三请求下,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终于派来了他的秘书格蕾丝·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与其丈夫曼尼(Manny,马克斯·格兰尼奇的昵称)。

一份新的英文半月刊《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随后在上海创刊,自1936年3月15日起办,至1937年11月1日止,每份售价一角。《中国呼声》主要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格兰尼奇任总编辑,宋庆龄亲自为刊物收集材料,并约请一些知名的中外人士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一开始,史沫特莱化名“Rusty Knails”为《中国呼声》供稿。但她与宋庆龄看法不同,对这份新刊物的编辑情况越来越不满。史沫特莱与格兰尼奇夫妇的矛盾日趋尖锐,他们之间的对立最终也波及到了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关系。

四、告别鲁迅

1936年5月,宋庆龄因盲肠炎住医院治疗。她是在病床上听到来访探望的史沫特莱亲口所说,才知道鲁迅病重的消息。为了给鲁迅治病,宋庆龄设法邀请寓居上海的美

国治疗肺结核的专家“D(邓)医生”,委托史沫特莱陪同,前往为鲁迅诊治。

6月5日,自己病还未好,仍挂念着鲁迅病情的宋庆龄修书一封,希望他能听从医嘱,早日痊愈。信中宋庆龄饱含深情地写道:“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耽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宋庆龄信中担忧鲁迅,感到极度不安的朋友们中,当然包括鲁迅的密友史沫特莱。

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鲁迅逝世后,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两人同列为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委员。一年后,两人又共同组建鲁迅纪念事业筹备委员会,为继承鲁迅未竟的革命事业贡献着所有光热。

史沫特莱是在离开上海到达西安后惊悉鲁迅逝世的噩耗的。1935年末,她曾特地跑到鲁迅家中,去听来自陕北的冯雪峰讲述长征的故事。正是这次会晤使史沫特莱萌生了前往陕北根据地实地采访的念头。1936年秋,史沫特莱在刘鼎的帮助下,离开上海来到西安,准备从西安进入陕北根据地。此行使她成为了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西安事变之后,她最终到达延安,深入接触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导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国抗战。她写成的《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在反攻》、《中国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传记)等,向世界宣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成为了不朽之作。

五、与保卫中国同盟合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宋庆龄发表大量文章和演讲,阐明她坚持抗日的坚定立场和坚决主张。1938年4月,她着手筹建一个新的组织——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支持这场反法西斯战争。6月14日,在香港宋庆龄住宅的小客厅里,保盟宣告正式成立。宣言表示,这一组织的主要目标是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史沫特莱没有参加保盟,尽管在组织上没有关系,但一直保持着与保盟相互合作的关系。1938年9月,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宋庆龄亲往广州码头迎接。医疗队医生巴苏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我问宋庆龄对我去中共领导的军队工作有何意见,她听了很高兴,并说我们可以在长沙或汉口会见史沫特莱,她会安排我们会见周恩来,我们的

要求必须向周提出。”

1938年冬天,新四军军医代表沈其震在香港拜谒宋庆龄,其间牵线搭桥之人正是史沫特莱。

当时史沫特莱已经离开延安,在山西前线跟随八路军转战沙场3个月后抵达武汉,后又赴安徽云岭新四军根据地采访。她获悉,新四军中许多干部战士患有肺结核、胃病、慢性溃疡等,很多人生疟疾,长疥疮,得其他传染病、寄生虫病、地方病,但极度缺少药。于是,她向叶挺军长建议,希望新四军可以与保盟取得直接联系,争取援助。

沈其震将史沫特莱用打字机打在一方丝质白手绢上的信件缝在衣服里,按她的嘱咐到上海找到了保盟上海分会秘书耿丽淑,又经耿丽淑协助坐船赶赴香港。沈说:“到了香港,经过廖梦醒同志很快地会见了宋庆龄。我把史沫特莱打在手绢上的那封信亲自交给她。她说,艾格尼丝的报道我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已经读过了。你们缺少药的情况我是知道的。她接着说,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在香港成立,国际上主持正义的一些团体和个人都在响应保卫中国同盟的号召,已经有不少捐募得来的医药器材和其他救济物资运到了香港,上海也成立了组织,建立了仓库,除了从香港带回去一部分外,还可以从上海运回去一些。”在宋庆龄的大力帮助下,新四军得到了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大量药品,得以顺利渡过难关。

1943年初,福斯特(John B.Foster)在重庆经爱泼斯坦推荐认识了宋庆龄,后顺利加入保盟。一次,当宋庆龄获知福斯特曾是史沫特莱的追随者及战友后,温情地对他说:“艾格尼丝是性情之人,对反动派她嫉恶如仇,对人民则爱得极深。有人把她比作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你同意吗?”爱泼斯坦后来评价说:“在宋庆龄的心中,史沫特莱这个名字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她把史沫特莱1929年赠送予她的那本《大地的女儿》珍藏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直至生命的终结便是明证。”

史沫特莱也一直关注着宋庆龄,用实际行动为保盟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编外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保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迁到上海开展新工作。这一时期,宋庆龄呼吁援助贫病作家,当时身在纽约的史沫特莱为之筹集了2500美元。那时的她因为美国当局麦卡锡主义的打压,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生计艰难”。1950年3月22日,宋庆龄在致两人共同的朋友王安娜的信中,请王安娜不必为史沫特莱近

况太过担心,“艾格尼丝已经到达伦敦,很快就会到这儿来”,“她做事从不半途而废,我们定能很快见到她”。

无奈天不遂人愿,史沫特莱抵达伦敦后,不幸胃病发作,经医治无效,于5月6日病逝于牛津医院。宋庆龄听闻噩耗传来,又去函告诉王安娜:“听说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葬礼上放了一场电影,内容是关于陕西牧羊人的故事……”

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史沫特莱心里最惦念的仍然是她日思夜想的新中国。她在遗嘱中表示要将她的骨灰交给朱德将军,埋在中国。按照她的遗愿,史沫特莱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前竖立着一块大理石墓碑,上刻朱德亲笔题写的“中国人民之友 美国革命作家 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保卫中国同盟荣誉会员

——埃德加·斯诺

王成至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05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25年考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28年来到中国后,正式开启了记者生涯。1931年,他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在她的影响下走上了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艰难险途。1936年,经宋庆龄推荐,斯诺成为第一个访问革命根据地的外国记者,据此经历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首次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真实面貌。抗日战争中,斯诺协助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与宋庆龄一起推动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并积极争取美国政府支援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冷战时期,移居瑞士的斯诺,继续向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读者介绍新中国的成就。1970年,他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代表应邀访华,为1972年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转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宋庆龄与斯诺之间历经风雨的友谊,是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互相支持的光辉写照。

一、旧中国带给斯诺的震撼

自少年时代起,斯诺就向往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锤炼自己,去了解域外的众多民族。22岁那年,斯诺从股票交易中赚了800美元,决定利用这笔钱去东方旅行一年。1928年7月6日,斯诺抵达上海。按照斯诺在回忆录《复始之旅》中的说法,他原计划只在中国停留6周就走,可没想到一待就是13年。

在上海的时候,斯诺依靠新闻学院校友的关系,成为美国人在当地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兼职记者,终于学有所用。此后,他又成为美国新闻界的海外机构统一新闻协会驻远东的游历记者,为12家大报供稿。记者的职业使斯诺得以在中国及其邻国广泛游历,接触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在他眼里,中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笔下充满神秘色彩的东方世界,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代之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的骇人景象。

斯诺注意到,在上海的租界内,西方殖民者享受着跟本国富人几乎一样的生活条件,却拒绝让中国居民享有一些基本的权利,在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中国民众更是苟活在侵略者的同化政策之下。在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内蒙古,人民流离失所,疫病到处肆虐,生命贱如草芥。日本于1932年初进攻上海,斯诺目睹了空袭中上海居民的惨状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抗战。他在记录、报道这些惊心动魄的事件同时,朴素的正义感被一步步唤醒,对中国和远东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偏离于当时欧美国家的主流观点。

斯诺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向英语读者反映中国人民在外国侵略和本国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与挣扎,抨击包括美国在内的新老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对民众悲惨境遇的熟视无睹。虽然眼前的中国满目疮痍,但是凭借他在中国及相邻区域的所见所闻,斯诺逐渐认为:随着中国从封建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亚洲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最终且不可避免地会落在中国人身上,“今后20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事情将是世界性的大事”。当时对中国事态作出如此预见的西方人,即使不只斯诺一人,也应当是凤毛麟角。

对中国未来的展望,对参与到中国民族解放和复兴进程当中的渴望,成为把斯诺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

其实,斯诺形成这样的认识,离不开一位伟大的中国女性对他的启蒙和影响,斯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的同路人,与这位女性的引领也极有关系。她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

二、体验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

1931年9月,斯诺应纽约《先驱论坛报》之约,请求采访宋庆龄,通过史沫特莱的引

荐,宋庆龄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巧克力商店与斯诺会面,采访从中午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据斯诺后来回忆,在这次采访中,宋庆龄向他深入介绍了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及其领导的革命的性质,揭露了蒋介石在“反共”旗号下对“三民主义”的背弃,也解释了她所以会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是因为相信在当时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只有共产党真正为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谋福利,是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希望所在。

在斯诺眼里,宋庆龄不仅是言论上的巨人,更是行动上的巨人。她不惜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置身于革命这一边,还在淞沪抗战中不顾个人安危,亲赴前线慰问将士、陪护伤员。为了营救遭到监禁和迫害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她多次赴南京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交涉,保护了一批革命志士。在她的感召下,斯诺也参加了宋庆龄为营救共产国际在华情报人员牛兰夫妇发起的声援活动。

宋庆龄的言传身教,使年轻的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崭新的认识,按照斯诺自己的话说,“通过她,我体验到了中国的美好思想和感情”,“及时认识了宋庆龄,我领悟到了中国人民有能力从根本上改革他们的国家,并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国提高到凭其历史和众多人口在世界上应占有的地位”。

1936年,斯诺出版了他主持翻译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小说集《活的中国》,在扉页的献辞中,他这样写道:“献给宋庆龄,她的坚贞不屈、勇敢忠诚和崇高的精神,是‘活的中国’的卓越而光辉的象征。”

宋庆龄对斯诺也非常认可,在首次采访后,斯诺便成为了她府上的常客。1932年12月,斯诺与海伦·福斯特订婚,宋庆龄赠送了一只电咖啡壶作为贺礼,还特意为他们设广东菜便宴表示祝贺。海伦亦成为宋庆龄终身的友人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三、向苏区推荐斯诺去采访的人

1932年圣诞节在日本东京结婚后,斯诺夫妇前往北平定居。1934年春天,斯诺被燕京大学新闻系聘为讲师。虽然如此,斯诺并没有脱离新闻界,跟在上海的宋庆龄也继续保持着联系。1935年初,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宋庆龄公开声援,并捐款给学生,斯诺不仅参与了运动的酝酿,还广邀国外媒体报道宣传这一运动,并为学生们

提供庇护。斯诺在这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中表现出的进步立场和社会能量,增进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成为日后向苏区推荐他去采访的一个重要依据。

早在1929年,斯诺就开始关注井冈山的斗争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著的想法,在他的心里逐渐扎下了根。1932年,他甚至搞到了去中央苏区的通行证,可是由于帮他联络的地下党人对他访问苏区的动机产生怀疑,切断了跟他的联系,江西之行遂化为泡影。1934年,一家美国出版商约斯诺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书,并预付了稿费,斯诺再次萌生了访问苏区的想法,后因蒋介石发动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作罢。1935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会师,1936年初,斯诺又通过天津地下党领导人黄敬帮忙联系去苏区采访,然而迟迟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于是海伦鼓动他去上海找宋庆龄帮忙。

1935年底至1936年初,宋庆龄与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通过电台建立了直接联系。面对日趋严峻的抗日形势,她充当起了南京政府与陕北苏区就开展第二次国共合作进行接触的牵线人。宋庆龄了解到,中共中央希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能为外界广泛了解,拟邀请一位公道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实地考察。正好斯诺在1936年春到上海请她帮忙联系去苏区采访,于是宋庆龄就向中央推荐了斯诺以及美国医生马海德,中共华北局为斯诺赴苏区开了介绍信。

据路易·艾黎回忆,斯诺对陕北之行并非没有顾虑,因为一路上注定危险重重,甚至有生命之虞,他在拜会宋庆龄时也流露了这种顾虑。宋庆龄则为他鼓劲,告诉他旅程中会有周密的安排,并说他的报道将对“她所支持的、多少人为之牺牲的事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同年6月,斯诺通过宋庆龄搭建的秘密交通线,从北平出发,绕道郑州前往西安与马海德会合,最后平安抵达了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不仅坚定了斯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救亡事业的信心,也使他有机会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袖人物倾心相交,为日后充当中美人民友谊的使者打下了基础。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斯诺随即赠书宋庆龄,他在扉页上亲笔题写道:“送给勇敢的革命家庆龄同志,你是中国第一位鼓励我写作此书的人,而且是此书的第一位读者。书中有不妥之处请见谅。”1938年2月该书中文版以《西行漫记》

为书名在中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英美等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借此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人在远东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作用,国统区的青年学生和海外华侨更是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希望和民族复兴的前景,纷纷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年仅32岁的斯诺凭此书一举成为了世界闻名的作家和记者,他的成功,离不开宋庆龄的独具慧眼,他的成功,也是宋庆龄推动的中国革命事业的一次成功。

四、携手推动工合运动

1937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后,斯诺作为战地记者,横穿中国国土,向世界报道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情况。当时,美国政府虽然担心本国利益因日本独霸中国而受损,却没有决心放弃名为“中立”实为“绥靖”的对日政策,军火商为了牟利,继续向日本出售武器,对中国人民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充耳不闻。宋庆龄通过撰写文章和电台广播等形式告诉美国朝野:听任日本吞并中国,必然会祸及美国自身。对远东局势极具洞见的斯诺,极为认同这个观点。对短视的美国政客不抱期待的斯诺,此时更愿意以“世界公民”的身份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他声称:“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我并且把这份感情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这一民间组织,旨在动员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抗战,特别是支援处境最为险恶的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上海,斯诺夫妇和艾黎,看到沦陷区大部分工业经济落入了侵略者之手,便考虑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建立由民众自己管理的工业合作社,为长期抗战奠定经济基础。1938年6月前后,正是保盟初创时期,斯诺带着这个想法到香港去征求宋庆龄的支持,宋庆龄认为工业合作社可以补充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最易被忽略的“民生主义”,因此予以“百分之百地支持”,并将其作为保盟的优先事项来推动。在国际友人的推动下,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在武汉成立。当年秋天,斯诺夫妇赴马尼拉筹组菲律宾工合委员会,在募集资金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

1939年初,斯诺从菲律宾回到香港,在宋庆龄的指点和协助下进行工作,争取香港总督支持,使香港成为工合国际协会的所在地,并争取其他有影响的人士支持这一工

作。1939年1月,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斯诺是委员之一。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凭借宋庆龄在海内外的声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都成立了援助中国工合运动的促进社。

宋庆龄和斯诺也积极将工合理念向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广。1939年9月,斯诺以工合国际协会代表的身份再赴陕北,惊喜地看到合作社在根据地也办得如火如荼。毛泽东旗帜鲜明地对他说:“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支持这个进步的运动。”10月,斯诺来到香港,他向保盟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他说他曾和边区领导人讨论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他讨论的结果是以詹姆斯·贝特兰先生授予他的权力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

在斯诺等人的努力下,到1940年,工业合作社已经扩展到全国16个省,拥有了3万工人,产值占全国工业的百分之一。工合运动稳定了受战火冲击的中国经济,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宋庆龄1972年在《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中说:斯诺在创办保盟的事情上给予了她和一些左翼人士很大的帮助。斯诺也因此当选为保盟的荣誉会员。

五、争取美国政府援助敌后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加强对中共抗日武装“清剿”的同时,转而对蒋介石政权采取政治诱降,而蒋介石方面也乘日本军事压力减弱之际,对江南的新四军痛下杀手,于1941年初制造了“皖南事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宋庆龄与其他进步人士一方面联名致电蒋介石,严正要求其坚持联共抗日的政策,一方面向外界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利用国际舆论对蒋施压。

当保盟领导人之一廖承志向斯诺通报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斯诺立即通过香港向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报社发出多则电讯,率先把事变的真相捅了出去,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感受到日本威胁日益迫近的罗斯福政府,担心国共合作破裂将大大助长日本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安全处境,因此以终止援助向蒋施压,令其不得放弃抗日。迫于外部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在反共问题上收敛形迹,但是斯

诺在中国采访的资格却被吊销,不得不离开他为之奋斗的这片土地。

在返回美国前,斯诺赴香港与宋庆龄话别,宋庆龄对他说:“你会回来的。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我们算你是弟弟,你是属于中国的。”同年3月6日,宋庆龄致函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女士,将斯诺作为保盟的创始人介绍给她,希望她为斯诺在美国提供宣传保盟的机会,信中说:“如果在援华会主持下他有某些讲演的机会,我们将很感激,他能向美国公众说明同盟的目标和活动。”

1941年12月,日本突袭珍珠港,美国政府被迫放弃“中立”,加入到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之相应的是,对中国的抗日援助也大幅提升。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控制了外援的分配,在蒋介石的“溶共”“限共”“防共”思想主导下,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很少能够得到外援。宋庆龄从香港撤到重庆后,重组了保盟,继续致力于为抗日根据地争取外援,在她亲自斡旋下,盟军东南亚战区副统帅史迪威将军批准用美国军机向陕北运送医疗物资。

回到美国后的斯诺荣任《星期六晚邮报》首席记者,实际上作为战地记者,奔波于中国、印度、苏联、欧洲等地,但是一有机会,他就会积极配合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1942年2月,他在第一次接受罗斯福总统就中国政策的垂询时,就盛赞中共抗日武装,介绍了工合运动,建议总统要求蒋介石在美国对华2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工合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罗斯福表示他不宜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会设法让蒋了解美方的想法,并要求他随时通报这方面的进展。1944年5月,在第二次与斯诺会面的时候,罗斯福主动告诉他,已经给蒋介石去信谈工合的事,斯诺则告诉他获悉工合已从蒋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罗斯福还向斯诺透露了将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的计划。1945年3月,斯诺在第三次接受罗斯福垂询时,告诫总统要当心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被蒋介石用作打内战的资本,罗斯福表示会考虑直接向八路军和中共游击队提供军援。罗斯福和斯诺都认为战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符合美国的利益,期望国共两党能够成立联合政府。

六、为中美人民友好架起精神之桥

日本战败投降后,斯诺寄以厚望的联合政府并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蒋介石迫不

及待地对中共解放区发动了进攻,然而时移势易,仅3年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出了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宋庆龄当选为新政府的副主席,此后一直投身于新中国的外交、外宣、文教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

在世界滑向冷战的大背景之下,美国被“麦卡锡主义”的阴霾笼罩,一大批了解中国、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知识分子和官员,受到了所谓的“忠诚调查”。斯诺也一度失去了自由,著作成为了禁书,文章也刊发不了,宋庆龄对斯诺回国后的命运的预判,居然变成了现实。斯诺的同行曾劝他不要再碰与中共有关的话题,转而去写其他不甚敏感的问题,但是斯诺厌恶这种苟且的人生,于是在1959年携第二任妻子路易斯·惠勒·斯诺及他们的孩子移居瑞士,仍然保留美国国籍。

宋庆龄对斯诺的处境十分了解,她在1960年11月给斯诺的一封信中,鼓励他一如既往向西方和美国公众介绍中国的进步,至于因此带来的压力与困难,她写道:“当你感到对你的压力的时候,想起像鲁迅这样的人们,他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接受考验的,纵然多方设法想毁灭他,然而他的事迹还是流传在人们之中。纵然美国人民过去和现在一直受到各种谎言的灌输,甚至歪曲了他们自己的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形象,然而我仍旧相信,以毅力和决心来坚持真理的话,真理是能够流传到他们那里的。”

斯诺于1960年、1964年、1970年三次访问新中国,撰写著作和文章向西方读者介绍共和国的建设成就和外交政策主张。在197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21个国庆节之际,他受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他与毛泽东主席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的醒目位置,昭示着中美关系将迎来重大的变化。

斯诺每次来中国,都不忘去拜访宋庆龄。除了1960年宋庆龄因病未能相见外,他们每次见面都相谈甚欢。1970年,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为斯诺夫妇接风,由于飞机晚点,一直等到深夜才等来他们。这次会晤,竟成了宋庆龄与斯诺的诀别。

1972年2月15日,就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前一周,斯诺在瑞士日内瓦病逝,享年67岁。宋庆龄获悉了这一噩耗后,为起草唁电一夜未曾合眼。事后,她告诉秘书张珏:“由于拟电稿,勾起了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很难下笔。”

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葬在了故乡的哈德逊河畔,另一半则葬在了他执教

过的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在斯诺骨灰安葬那天,宋庆龄派秘书张珏代表她前去,并嘱咐张珏:“请代向路易斯·惠勒表示慰问,我精神上与她同在。”

1972年6月,宋庆龄撰写了《纪念埃德加·斯诺》一文,她把斯诺称为“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正像宋庆龄在致斯诺夫人路易斯·惠勒的信电中所说的那样,她与斯诺40年的坚强友谊,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骨干

——耿丽淑

徐锋华

1987年6月13日,在中国福利会少年宫礼堂举行的中国福利会成立49周年的庆典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福利会顾问、美籍专家耿丽淑接过了上海市公安局颁发给她的“永久居留证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向外国人颁发的第一份永久居留证书,这份特殊荣誉,耿丽淑当之无愧。

1896年3月6日,耿丽淑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附近的一个德裔农村家庭,本名塔丽莎·格拉克(Talitha Gerlach),父亲是一位牧师。1926年9月,她由美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委派到中国工作。耿丽淑追求民主,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到中国不久便涉足中国革命事业。

1938年,耿丽淑成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骨干力量,担任秘书工作,组织援助新四军,并为保盟和宋庆龄传递重要信件,在上海分会中坚持战斗到只剩她一个人。抗战胜利后保盟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耿丽淑担任执行委员,其间代理过近一年总干事。被迫返回美国后,她参加了美国援华会的工作。美国援华会转入反动立场后,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人退出美国援华会,于1949年4月在纽约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并担任理事会主席。1952年,由于耿丽淑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宋庆龄帮助她秘密来到中国,并安排在中国福利会工作,直到1995年去世。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耿丽淑为宋庆龄领导的事业服务长达近60年,

是宋庆龄最为信赖并保持终生友谊的外国友人之一。

一、初涉中国革命

耿丽淑 1926 年来到中国后,经上海北上去北京学习汉语。1927 年,北方军阀张作霖在处决共产党嫌疑犯,要杀鲍罗廷夫人以儆效尤,耿丽淑和女青年会的一个同事遂掩护鲍罗廷夫人逃跑,直到她取道天津离境。1928 年,耿丽淑被调往山东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济南工作。

1929 年 5 月 28 日,宋庆龄从德国取道苏联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国葬,从北平的西山迎灵柩到南京中山陵。耿丽淑专程从济南赶到南京,在人潮拥挤的长江南岸中山码头一带,她隔着人山人海远远地看到端庄娴雅的宋庆龄站在“威胜号”军舰舰首,目睹了这位中国杰出女性的风采。

1930 年,耿丽淑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系学习。

1932 年耿丽淑被调往上海。1934 年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学生部主任干事,和邓裕志、夏秀兰(Lily K.Haass)一起在工人居住区小沙渡路三合里开办女工夜校。这年秋天,耿丽淑参加了路易·艾黎和汉斯·希伯组织的政治学习小组,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小组是由宋庆龄建议发起的。耿丽淑参加政治学习小组后,总是有一些进步团体和共产党员要求她提供帮助和掩护。

1935 年 11 月的一天晚上,宋庆龄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喜讯,于当晚带着香槟和白兰地,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家,同艾黎及其他几位国际友人一起,举杯相庆,为人民的胜利干杯。这些国际友人都是参加政治学习小组的朋友们,不巧耿丽淑回美国探亲错过了。路易·艾黎事后告诉耿丽淑,宋庆龄曾特意问起耿丽淑,并说她做的事情正是宋庆龄所希望于她的,直到这时耿丽淑才知道政治学习小组从成立伊始都是由宋庆龄亲自指导的。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耿丽淑与金仲华、邓裕志等创办了难民收容所、伤兵救护站,组织教会大学学生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开展义卖活动。

二、投身中国抗日运动

1938 年 6 月 14 日,宋庆龄在香港创办保卫中国同盟,随后派吴大琨赴上海与耿丽

淑联系。1938年冬天,吴大琨带着宋庆龄的亲笔信从香港秘密赴沪找到耿丽淑。宋庆龄在信中称呼她为“我的朋友”,并问她有没有得到朋友们的消息,还叮嘱她租界有“狼”,要小心,最后说来人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委托他作为代表来面议要事的。吴大琨介绍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性质,然后转达了宋庆龄的设想——在上海建立保盟分会,接应国外救援物资,并将物资转运新四军皖南军部,请耿丽淑参加筹备。

几天后,由吴大琨、耿丽淑、沈体兰、吴耀宗、张似旭5人组成的保盟上海分会核心,在耿丽淑的住所举行了首次会议,宣布分会的成立。会议使用英语交流,耿丽淑是唯一的外国人。耿丽淑被选为上海分会秘书,负责接应国外的捐助,以及与其他革命组织的联络。保盟上海分会主要是接受香港保盟的指示,由保盟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由上海分会支援新四军。

上海分会成立后就开始募捐,并与中共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刘少文取得联系,得到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及中共江苏省委有力的支持。

同年12月,新四军代表、军医处长沈其震和材料科长吴之理到上海向耿丽淑紧急求援。保盟上海分会募捐到现金10万多元,为新四军购买了5万套军装所需的布匹和一批药品,在上海党组织安排下,由顾执中、王纪华率领第一批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通过日军封锁线和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地,送达新四军军部。

1939年初,皖南新四军又得到一批手术器械、药品、被服、食品、文化用品,特别是获得了名叫“白浪多息亦”的消炎药(磺胺的前身),是当时世界上刚生产出的最新产品。同年夏天,宋庆龄得知新四军地区蚊子猖獗、疟疾流行的消息,随即安排上海分会向新四军提供一批紧急援助,并以上海地方协会名义,派出第二批慰问团,携带所需紧急物资前往新四军根据地,其中有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400听炼乳、几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2000个消毒包等。慰问团中约有20多名青年留下来,参加了新四军。此外,新四军军部医院就是依靠保盟上海分会建立起来的,许多新四军的伤病员在这座医院得到医治、疗养,康复后重返前线,保盟每月还向新四军医院提供1500元的日常开支费用。

“孤岛”上海在客观上成为新四军取得人力、物力、财力支援的主要根据地。从上海运输物资去新四军驻地很不容易,大都通过邮局里的内线关系设法转运出去,而邮局里

也只有两三个进步人士可以委托。一般做法是将包扎好的、已经检查过的邮包在下班后打开,把药品、器械、食品等急需物资放进去,请邮局同志以邮包形式护送出上海。分会两批赴新四军慰问团带去手术器械、药品、食品、被服等,同耿丽淑、王纪华、吴大琨等竭尽全力分不开,也同国际友人与上海人民的捐助息息相关。保盟上海分会是热心抗日的中外人士的共同体,耿丽淑回忆说:“有很多同志和外国朋友在工作,这是由于在许多场合以我们外籍人员面目出现更为合适,可以起到中国人自己起不了的作用。”上海分会还曾请教会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帮助,将药品从上海带到九江,再转运去新四军驻地。

后来上海分会的其他4位核心成员被捕、牺牲或因故离开,只剩下耿丽淑一人。耿丽淑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但她毫不惧怕海关码头的日本特务,经常秘密地给香港的宋庆龄传递秘密信件。每当香港来上海的美国“总统号”轮船到达时,她机灵地扮作接客者混入人群登轮投递,并及时取得邮船带来的宋庆龄最新指示。通过这种方式耿丽淑为宋庆龄进行“信件走私”,报告募捐救济情况,基本上是每周一次。她还冒着风险储存国外寄来的捐款和物资,以待时机转运。虽然她因外国人的身份得以幸免于难,但保盟分会已名存实亡了,耿丽淑也于1940年秋回国。

回美国之前,1940年秋,耿丽淑终于在香港西摩道21号保盟总部与宋庆龄会面,这是她们第一次相见。宋庆龄亲自出门迎接耿丽淑,把她领进房间。由于已有的工作联系,她们一见如故,谈了许多许多。从言谈中,她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彼此增进了友情。回到美国后,耿丽淑依旧经常保持与保盟的联系。她通过讲演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情况,为中国人民募捐。还担任美国社会服务工作者工会主席。1941年秋,耿丽淑本已订好回中国的船票,但由于日本对中国形成包围圈,随后偷袭珍珠港,并向香港发动进攻,她回中国的路被卡断了。

三、协助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

1945年11月,耿丽淑同爱泼斯坦、陆懋德、斯诺、史沫特莱等人一起,参加了美国进步民间组织“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干涉中国内政。

1946年7月,耿丽淑如愿来到上海,继续在女青年会工作。这时,保盟已于1945

年11月迁至上海并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宋庆龄马上邀请她加入,担任执行委员。1947年初,中国福利基金会总干事谭宁邦请假回国,耿丽淑被推上了代理总干事的职位,处理福利基金会的日常工作。

1947年1月10日,加拿大夏理逊大夫为了将中国福利基金会等救济机构募集的30吨医药器械、20吨纺织品运往邯郸国际和平医院,而在国民党的重重阻挠下饱受寒冷、饥饿和疲劳之苦,以致献出生命。在2月7日举行的夏理逊大夫纪念会上,耿丽淑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发出呼吁:活着的人应该继续夏理逊大夫的工作,把物资输送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们。12月,耿丽淑被纽约女青年会召回美国。宋庆龄和金仲华、沈体兰等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亲赴机场送别,表示随时等待她回中国工作。

1948年,由于长期合作的美国援华会不支持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华北援助国际和平医院等项目,耿丽淑和爱泼斯坦等人决定退出美国援华会,另组新的机构,宋庆龄十分支持他们,打算在美国重建一个新团体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12月8日,宋庆龄致函耿丽淑,邀请她在这个新团体的初创阶段,担任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个人代表。1949年4月19日,耿丽淑与爱泼斯坦等在美国正式成立中国福利呼吁会,耿丽淑担任理事会主席。该会是中国福利基金会在美国的唯一代表,呼吁美国人民在医疗物资、儿童保育工作等方面对中国人民给予帮助。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9月22日,由于耿丽淑6月后的5封来信很晚才送达,宋庆龄回了一封很长的信,祝贺耿丽淑当选为中国福利呼吁会理事会主席,告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将来打算和其改组问题。10月21日,宋庆龄致函在美国的耿丽淑,认为“就政府的组织、运转的标准化和整体的协调而论,我们的国家仍处于组建的过程”,所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问题暂时被搁置着。有一件事是明确的,那就是要“继续开展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暂时按现在的情况进行,那就是我们将在上海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以及医疗卫生这些方面开展工作,并且充当解总(解放区救济总会)和国外为中国人民工作的组织之间的联络渠道。我们将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在国内和国际上进行促进工作。这意味着你们的促进工作将继续采用过去中国福利基金会所采用的规划”。

1949年12月19日,宋庆龄给耿丽淑回信,答复了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情况,最后表示“真心希望你很快回到中国来。这里有工作要做,你能

帮助我们。……另外,今年春天(编者注:原文笔误,应为“明年春天”)很可能有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发生,将更便于你离开美国到中国来。我们将继续朝着使你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的目标努力,以便你能帮助我们人民为建设一个新社会而奋斗。”

四、宋庆龄积极筹措耿丽淑来华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耿丽淑也是受害者之一。她因为大谈中国革命,而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当耿丽淑陷入危险时,在地球的这一边,宋庆龄时刻担心着她的安危。1950年5月,宋庆龄致函周恩来,推荐耿丽淑为国际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她说:“在美国最近的危机中,当美国援华会不再起作用而真正的进步人士都在坚决为中国和为美国维护正义的时候,耿丽淑小姐总是站在他们的前列。”1951年2月15日,宋庆龄致函顾锦心说,周恩来已允许耿丽淑来华参加中国福利会工作,因为“耿丽淑的身份在那儿是完全暴露的,完全有理由另找一个人接替她在那儿的工作。”当月,宋庆龄给耿丽淑发出电报,邀请她立即回中国工作。但迟迟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宋庆龄十分担心。4月25日,宋庆龄致函吴耀宗,表示“非常关心耿丽淑的情况。两个月以前,我通过香港向她发去过一个电报,要求她立刻动身去印度,并且在抵达印度以后马上与中国福利会联系。中国福利会办公室最近也发过几封信给她,向她发出了更加明确的指示。现在看来电报和信件都没有送到她手上,因此直到今天耿小姐尚不知道我们想要她马上动身。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紧迫。要是你和科拉·邓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定出一个通知耿小姐的最好方式,以使他尽可能早地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我将不胜感激。如果你能让我知道你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我将更加高兴。”5月12日,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朋友格雷斯时提醒说如果要同耿丽淑联系,“请不要提起我,因为这没有好处”。

1951年9月,耿丽淑被“麦卡锡主义”分子宣布为“支持红色中国共产党的颠覆活动”,即将退休的她遭到纽约女青年会全国委员会解雇。被长期服务的机构抛弃,耿丽淑愤怒不已,她决定立即投向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新中国。

宋庆龄为耿丽淑回到中国作了充分安排,先是让她避开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视线取道欧洲抵达香港,又亲派时已出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专程在香港迎候并陪她北上

来沪。在上海,宋庆龄的一位朋友交给她一张表格请她填写,在填到“职务”一栏时她顿住了。正当她感到为难时,那位朋友接过笔在该栏目下郑重填上了“顾问”一词。耿丽淑顿时热泪盈眶,她激动地说:“感谢你们,感谢宋庆龄,我将很好地履行我的义务。”

从此,耿丽淑一直居住在中国,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会的事业中。

五、在中福会为新中国工作

宋庆龄亲自安排耿丽淑入住陕西北路 369 号宋氏老宅。耿丽淑的卧室就是当年宋美龄的闺房,而宋母倪太夫人的卧室作为耿丽淑的会客室和书房。一直到 1963 年,因房屋修缮,耿丽淑才迁居他处。

初期,耿丽淑担负起中福会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具体担任《中国建设》的审稿人和负责对外联络,她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开辟国外发行的渠道上,因她曾从事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工作,朋友几乎遍及世界,她写信向朋友们介绍杂志,并亲自邮寄每期刊物,想方设法为杂志的海外发行打开门路。因为中美关系十分紧张,美国不准中国的刊物直接邮寄,她就通过香港的朋友改换包装寄往美国。

1956 年,中国福利会的妇幼保健工作进入一个新的与科学研究联系起来的发展阶段。当时,国内还没有一个组织专门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宋庆龄表示,“让中国福利会在较高的技术水平上承担起这项工作,一直是我多年来的梦想。这就是我所设想的如何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我们组织的名称‘研究会’一致起来”。但制定如此一个计划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中福会和对中国来说它都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而且还比较复杂。宋庆龄认为,“要使这项计划走上正轨,耿丽淑肯定是一个重要的人选。希望她尽快回上海”。耿丽淑当时在北京做国际宣传,回沪后,宋庆龄委托她担任幼儿园、托儿所的顾问,加强幼儿教学工作的实验性、示范性、科研性。在耿丽淑的指导下,中福会幼儿园被评为全国儿童工作先进集体,并出席了 1960 年的全国群英会。

耿丽淑是宋庆龄基金会的理事,1985 年兼任上海宋庆龄基金会顾问。1986 年 3 月 6 日在她 90 岁生日时,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向她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她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1987年6月13日,耿丽淑获得上海市公安局对外国人颁发的第一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证书,同时荣获中国福利会颁发的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荣誉奖。这一年,她还获得了上海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颁发的上海工作纪念章。

1989年9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颁发荣誉证书,赞扬她“几十年来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促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了“宝贵贡献”。

1991年3月6日是耿丽淑95岁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称号和奖章。

1995年2月12日,这位将大半生精力贡献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百岁老人逝世。她被安葬在宋庆龄陵园,与老朋友长相厮守。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创始人

——路易·艾黎

王建明

2017年4月21日正值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来华90周年纪念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贺信中指出:“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在华工作生活60年,为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他和宋庆龄、斯诺等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①

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1927年来华,1933年与宋庆龄相识,两人自此结下跨越五十载的革命友谊。20世纪30年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协助参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革命活动,收留庇护地下党员,创办《中国呼声》杂志以唤醒国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携手发起中国工业合作运动,通过宋庆龄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进行抗战宣传、开展生产自救、援助抗日根据地建设以支援抗战,巩固经济国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共同倡导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致力于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促进中国与各国人民友好事业。宋庆龄评价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

^① 《习近平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北京培黎职业学院回信强调 发扬传承“努力干一起干”的工合精神 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人民日报》2017年4月22日。

一、为中国革命吸引来华

1897年12月2日,路易·艾黎出生于新西兰南岛坎特伯雷地区的一户教师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翌年(1916年),艾黎高中毕业,他自愿报名应征入伍,作为新西兰远征军步兵团的一员被派往法国前线参战。战后,伤愈出院的艾黎于1919年退伍回到新西兰经营农场。1925年,艾黎偶然读到报刊上有关中国大革命的报道,便决意前往中国,去探寻一条新的生活道路。

1926年12月,艾黎结束了在新西兰莫瓦蒂亚的农场生活,几经辗转,终于在1927年4月21日平安抵沪。抵达上海的第二天,经友人推荐,艾黎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录用,担任工部局虹口救火会的小队长。10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督察,负责检查公共租界里工厂企业的防火措施。

来沪初期,艾黎在写给家人的信里提到:“这里必定有一些坐拥巨资的人,许多古典式的豪宅就坐落于花园和林荫道中”,“但最底层的工人阶级辛勤劳作,比我们役使的马儿都不如”。通过实地走访,上海的贫富悬殊也让艾黎感到震惊。随着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了解,艾黎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年半后,他打消了离开的念头,从此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艾黎来华之初,正值中国大革命失败之时。艾黎从英文报刊上读到了宋庆龄的报道。当时身在汉口的宋庆龄拒绝出席汪精卫7月14日召开的“分共会议”,并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同年8月,宋庆龄乘船转赴苏联,继续探寻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9年5月宋庆龄从德国转道苏联回国,6月1日参加孙中山灵柩移葬南京中山陵的奉安仪式。站在观礼人群中的艾黎,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宋庆龄,目睹了她进入享堂。在艾黎看来,宋庆龄是当时奉安大典“那一场面的中心人物”。在此前后,艾黎还通过阅读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和文森特·希恩的《个人历史》,对书中叙述的宋庆龄在武汉和苏联的个人经历有了初步印象。

二、上海的地下斗争

1933年,艾黎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引荐下,在莫利爱路宋庆

龄寓所,真正结识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女性。初次见面,宋庆龄向艾黎讲述了1922年她从陈炯明兵变中从广州脱险的往事。在艾黎的印象中,宋庆龄“表面上是一位退隐的夫人,住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公馆。事实上,她一直很活跃,感到自己有责任秉承孙中山的遗志,尽一切办法继续为革命工作”。

1934年,在宋庆龄的关心和支持下,艾黎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宋庆龄为使政治学习小组的成员们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状况,要求他们进行社会调查。1935年5月起,宋庆龄请艾黎利用工部局工厂督查这一职业便利协助马海德对上海各工厂中的电镀铬中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项调查,是中国关于工业公害对青年工人(包括童工)影响的第一项研究,对工厂铬中毒问题提出大量的改进意见,同时也让艾黎和马海德对上海这一工业城市的劳动状况有了深刻了解。事后,宋庆龄对他们的调研工作十分满意。

在宋庆龄的鼓励和支持下,艾黎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艾黎居住的愚园路寓所顶楼小房间里,设了一处秘密电台,与进行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消息传来,艾黎和宋庆龄都无比喜悦。11月7日,宋庆龄用“苏西”的化名复函艾黎,赞扬红军“真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其后的一天凌晨,宋庆龄悄然前往艾黎寓所,和艾黎、甘普霖等几位国际友人一同庆贺这一胜利。

宋庆龄曾为红军运送过一箱手枪和子弹,她亲自去沪东取出来后,一路通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所有卡哨,最后将之转移到艾黎家暂存。直到1938年艾黎离开上海时才将枪弹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另一处地点。

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国际友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

艾黎在上海愚园路的家和宋庆龄的寓所,还常被用作中共地下党员、革命人士的庇护所。在艾黎家住过的有:左尔格情报小组成员陈翰笙博士,红军将领刘鼎、许光达、李克农,以及日本友人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等。而刘鼎(原名阚思俊)在艾黎家和宋庆龄寓所暂住的经历,间接促成了中共与张学良东北军的联系。

对于宋庆龄交办的革命任务,艾黎总是尽心妥善地执行完成。艾黎的挚友马海德

曾问他：“你就不害怕被敌人抓住吗？”艾黎坦然地说：“不！不怕！要干革命就应当置生死于度外，只要下了这样的决心，就什么也不怕了。”

上海的岁月中，艾黎还积极参与宋庆龄支持筹办的《中国呼声》(*The Voice of China*)杂志。在编辑格兰尼奇夫妇同宋庆龄、艾黎、史沫特莱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呼声》首期于1936年3月15日出版。

自创刊起，宋庆龄就不断给予《中国呼声》以指导和支持。她不仅为杂志提供稿件，还“亲自为这个刊物搜集材料，介绍一些人对局势的看法，协助他们做好编辑工作”，有些文章就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她转给杂志编辑的。艾黎则是《中国呼声》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用凯特·道森、理查德、霍华德、乔大琦、韩素梅、明甫等不同的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有：《岳飞——中国的爱国者》《法西斯战争的后果》《日本的致命弱点》《台湾——我们失去的领土》《绥远——要塞》《爱和平的我们必须争斗》等十余篇文章。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中共中央建议宋庆龄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2月23日清晨，宋庆龄在艾黎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外滩南京路码头。晚年的艾黎清晰记得“她挎着我的胳膊走过所有那些面目狰狞、虎视眈眈的家伙，愉快地交谈着，神态自若”，无人敢上前盘问他们。12月26日，宋庆龄安全抵达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

三、发起工合运动与保盟并肩战斗

1937年底，日军完全占领上海的华界地区，开始对这座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进行疯狂的战略物资掠夺和破坏。艾黎目睹了遍布黄浦江两岸的工业废墟，日本人不断装载掠夺来的机械和废铁，用货船运往本国。在艾黎看来，“随着战火蔓延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地区，失业工人日常发生骚乱和从战场上撤下来的残废士兵的问题使人担心”。仅上海一地就约有60万工人失业、衣食无着，在街头坐以待毙。

受美国友人海伦·斯诺的启发，艾黎开始思考如何以他“在工厂督察工作中取得的实际经验来为抗战力量服务”，将失业难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抗战工业。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多次商讨后，提出了“可以把迅速的建设和生产、难民的救济、劳工的训练与军事动员，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保卫游击区的反抗封锁，与反抗日货经济侵略”等目标合在一起的工业合作设想。随后，他们制订出一份在非沦陷区开展中国工业合作

运动(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运动”)的计划草案,并在由中外进步人士参加的“星一聚餐会”上进行讨论研究。与会者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工业合作运动,应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务上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同时必须保持这一组织的群众性,才能调动广大难民、工人的积极性,并得到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的支持。

在酝酿工合运动过程中,艾黎随时将情况告诉在香港的宋庆龄,得到其“百分之百地支持”。1938年7月,艾黎辞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工厂督查职务,乘船赴香港向宋庆龄汇报工合运动的实施计划。宋庆龄对实施计划十分赞同,并积极联系她的弟弟宋子文,为工合筹划了急需的启动资金。

1938年8月,艾黎从香港飞抵武汉,向宋美龄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游说他拟定的工合计划。由于该计划已得到宋庆龄的支持,外加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柯尔爵士的积极斡旋,宋美龄亦十分赞同。1938年8月5日,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长,艾黎被聘为技术顾问,同时代理总干事一职。

在武汉期间,艾黎还向中共长江局领导周恩来和博古(秦邦宪)汇报开展工合运动的计划。周恩来对艾黎的工作鼓励有加,勉励他继续推进下去。博古则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希望使工合成为一项支持统一战线的群众运动,并来延安开展工作。他建议艾黎游说政府尽可能将更多的工业设施从武汉转移至西北地区,因为西北很可能成为抗日的根据地。他还请艾黎尽力支援中共新四军根据地的后方经济。艾黎接受了这些建议,并在后续开展工合运动中予以落实。

在艾黎等人的努力下,工合在全国非沦陷区共组织了近6000个合作社,并投入生产。1939年末,艾黎亲赴陕北边区访问,筹建延安工合事务所。至1942年9月底,延安地区已成立有41个合作社。艾黎担任主任的工合东南区办事处,共组织了600个合作社,并在新四军根据地所在的茂名建立一所仓库,在绥安建立了一所专门为新四军维修、生产军需品的机械厂,在都、瑞金、长汀、宁都和兴国,也都建立了工合事务所。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立之前,宋庆龄于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立保卫中国同盟,并亲任主席。因共同的支援中国人民抗日的方针,中国工合运动始终得到了宋庆龄及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持。

保盟对工合运动的支持和推动首先体现在宣传工作上。宋庆龄以保盟主席的身份,通过演讲、撰文,以及与国际援华机构、个人通信等方式宣传工合的性质和作用,呼吁援助新生的中国工合事业。1938年8月15日,宋庆龄向正在美国举行的世界青年大会广播演讲,呼吁世界各地进步青年和人士,尽他们的最大力量,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一新生的进步的工合运动。

1939年12月,宋庆龄又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又称“中国工业合作社香港促进社”)名誉主席的身份,在香港电台作了题为《中国工业合作社之意义》的广播演讲,指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重要性,不单只是重建社会,它更可以促成经济的改善。”1940年4月,宋庆龄和宋蔼龄、宋美龄三姐妹联袂从香港飞赴四川,一同视察了重庆、成都等地的多个工业合作社。宋庆龄在视察工合成都事务所的工人欢迎会上讲话指出:“工业合作社事业,正是总理民生主义之实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实国家经济力量,希望各位对民生主义加以研究,俾总理遗旨能普遍实行。”

保盟的英文宣传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和《保卫中国同盟年报》,经常刊载有关工合运动的报道和工作报告。在1938—1939年度的《保卫中国同盟年报》中,开篇卷首刊载了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们——孙中山夫人的呼吁》一文,呼吁全世界热爱和平和民主的人士支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因为“这种工业合作运动不仅重建着被破坏得支离破碎的中国工业,使千万个沦为难民的工人有了工作和恢复了自尊心,并为中国经济民主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作为图文并茂的新闻月刊,对工合运动和艾黎的报道则更为丰富得多,陆续报道了《请援助西北》《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与教育》《工合的“孤军”》《支援中国工合的一碗饭运动》,以及艾黎于1941年4月在香港所作的《中国为抗战而生产》讲话。艾黎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我在香港很高兴地看到,以中央银行的钟秉锋先生为首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以香港主教为主席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都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后者致力于把海外友人努力的联合起来,以帮助工合运动。对于全中国的工合成员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鼓舞。”

艾黎提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香港促进社(简称“工合香港促进社”),由宋庆龄和艾黎、斯诺等人团结国内外知名人士于1939年1月在香港发起成立。之所以选定香

港,是因为宋庆龄和艾黎为了进一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工合的援助,并将援助资金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不受国民党官员的控制和中饱私囊。艾黎曾说:“外国朋友看到宋庆龄的名字就认为可靠。”因此,宋庆龄始终担任工合香港促进社名誉主席,首任执行主席为美国友人浦爱德(Ida Pruitt,中文名又作“普爱德”“普艾达”),艾黎、斯诺等20余人作为委员。同年5月,宋庆龄前往香港码头迎接从莫斯科来港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陈翰笙、顾淑型夫妇,并对陈翰笙说:“这次请你回国,主要是协助我搞工业合作运动。”不久,陈翰笙即出任工合香港促进社代理主席,顾淑型也在协助艾黎开展工合事务。

1939年7月21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协会(又称“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国际协会”或“工合国际”)在香港成立,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主教任主席,陈翰笙任秘书,艾黎任实地秘书。组织工合国际协会的目的在于代表中国工合协会接受各界对工合运动的援助,使援助资金不受重庆官方领导的中国工合协会的控制和支配。宋庆龄非常支持工合国际的工作,但没有担任过工合国际的名誉主席。在艾黎记忆中,宋庆龄介绍过许多人才到工合国际协会工作。

在宋庆龄的组织领导下,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举办多场活动筹募资金,用于援助中国工合事业,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41年7、8月间举行的“一碗饭运动”和同年11月举办的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一碗饭运动”以每券港币2元售价发售餐券2万张,认购者持券到提供赞助的餐馆、茶室吃炒饭一碗,收入全部捐作中国工业合作社救济华北灾民的经费。宋庆龄亲自参与筹备,主持开幕及闭幕典礼,并发表演讲,阐明举办“一碗饭运动”的意义。两个月期间,“一碗饭运动”出售的餐券和捐款的净收入为22 144.95元港币和615元法币,英国援华会香港分会允诺补赠2 000多元港币,使之凑足25 000元港币。这些钱款全部捐赠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协助其在中国西北地区设立工厂基金,用于发展工合事业。

为配合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募款活动,艾黎也两度专程从内地前往香港,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顾问的身份协助开展工作。在1941年7月1日“一碗饭运动”开幕式上,特别放映了一部艾黎跋涉千里拍摄的工合影片,艾黎亲自向观众解说片中各镜头的意义,使大家对正在开展的工合事业印象深刻。

1941年11月11日,保卫中国同盟又与工合国际在香港南华体育场旁的海军操场,共同举办集休闲娱乐、商品展销于一体大型嘉年华会暨工合展览会,轰动全港。宋庆龄出席开幕式并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对支持工合运动的英、美等国友好人士表示感谢。开幕式结束后,宋庆龄和艾黎等人还参观了工合产品展览。百余种展品包括来自中国内地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毛毯、丝织品、化工、机电等产品,其中许多是艾黎冒着极大的危险和困难,从内地运到香港的。据统计,为期三周的嘉年华会,累计吸引观众达100多万人次参与,共筹得港币2万元。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保盟为支援工合举办的又一次声势浩大、引人注目的活动。

四、创办培黎学校获宋庆龄援助

皖南事变以后随着国共合作关系走向破裂,1942年底,艾黎因为长期支援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工合事业,被国民党官方控制的工业合作协会以“通共”为由解雇。后来,艾黎以工合国际实地秘书的身份继续开展工作,将全部精力用于创办培黎工艺学校。

早在工合运动兴起之初,艾黎就意识到,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对工人进行管理和技术培训,故1941年起,艾黎就在江西赣州、陕西宝鸡和双石铺、四川成都等地试办培黎学校培训技术工人,同时免费招收贫苦学生就读。随着学校的发展和抗战局势的变化,后来又集中西迁至甘肃兰州和山丹县,继续扩大办学规模。

宋庆龄始终关心着艾黎的教育事业。1945年5月,宋庆龄在致爱泼斯坦夫妇函中提道:“我们(指她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将举行两场舞会,希望能筹集到两百万元,用于培黎学校和由贺耀祖夫人主管的难童收容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于11月从重庆回到上海。12月,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开展战后重建工作。宋庆龄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简介》中指出:“中国的战后重建时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新的任务,要解决这些问题和完成这些任务,可以利用社会团体的力量,中国福利基金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组织。”为战灾儿童提供帮助是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之一,艾黎的山丹培黎学校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

1948年,宋庆龄曾派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旅

外代表陈永淦去甘肃山丹县视察培黎学校。据陈永淦回忆：“1948年10月，宋庆龄主席派我去甘肃省山丹县，视察山丹培黎学校，它是中国福利基金会重点援助的单位之一。行前，宋庆龄主席要我带一封信和一瓶白兰地酒，交给培黎学校校长、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我完成了这一任务，艾黎和我在培黎学校校门前，还拍照留念。”

艾黎在给宋庆龄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机构同中国福利会的关系一直很好。你主持的领养工作（指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帮助我们渡过了许多困难时期。”

五、老而弥笃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路易·艾黎决定留在中国，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尽心尽力。当山丹培黎学校移交给石油管理部门之后，艾黎定居北京，致力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他和宋庆龄一起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声援受麦肯锡主义迫害的美国友人鲍威尔夫妇。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艾黎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代表经常出国参加国际和平会议，通过发表演讲、起草会议决议、写诗著文，为宣传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做了许多工作。

1953年起，艾黎主要从事写作，他翻译出版中国的诗歌，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对友人的怀念之情；他走遍中国各地，写下了对人民中国的切身感受；他长期在《中国建设》《东方地平线》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在新西兰家乡出版著作，利用各种渠道向世界传播新中国的声音。据统计，路易·艾黎先后出版了30余部著作，包括纪实采访、诗歌和翻译作品等。

1963年，宋庆龄读过艾黎翻译的蔡文姬《胡笳十八拍》英文版后十分欣赏，特意推荐给身边的英文秘书。上海宋庆龄故居至今保存着宋庆龄收藏的20余本艾黎的赠书。

在诗集《病树前头万木春》中，附有一张艾黎写于1963年2月16日的便笺，称呼宋庆龄为“阿姨”，落款署名戏称“你的瘦侄子比尔”，因宋庆龄曾建议艾黎减肥，这张便笺也是他们数十年深厚友情的见证。

宋庆龄与艾黎之间的友谊在他们的晚年更趋深厚。“文革”中，许多在华的外国友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人身限制，艾黎也未能幸免。宋庆龄为保护艾黎，1968

年8月31日,亲笔为艾黎写了封证明书,她写道:“我觉得艾黎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这封亲笔证明书也使艾黎免遭怀疑和迫害。事后,宋庆龄对送证明书的秘书张珏说:“我保护艾黎,他为中国做了不少事。”

在每年春节、元旦宋庆龄收到的贺卡里,艾黎的一份是最醒目的,这是用他拍摄的儿童照片特别印制的相册贺卡。宋庆龄有时也用艾黎定制的贺卡,写上祝福语赠送友人。

为艾黎庆祝生日是宋庆龄晚年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有时甚至提前数月就开始准备艾黎喜欢的食品、邀请宴会宾客。她还事先告诉寓所工作人员,艾黎有过敏性皮肤病,要选择他能吃的菜,排座位要挨着她便于谈话,并留下了许多为艾黎庆祝生日的合影。

1980年12月2日宋庆龄在北京寓所为艾黎庆祝生日的照片上,艾黎正在切蛋糕,宋庆龄高兴地在旁拍手称庆,气氛十分温馨,宋戏称他为“Rewi boy”。这是宋庆龄为艾黎庆祝的最后一个生日。

1981年春,宋庆龄被医生诊断患上了慢性淋巴性白血病。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次日凌晨3点,得到宋庆龄病危紧急通知的艾黎,立即起身前往探视。艾黎来到宋宅后,宋庆龄已不能说话,但能听得见,神志也还清楚。在宋庆龄的病床前,艾黎说了声“路易在这里”,双眼已经看不见任何东西的宋庆龄似乎听见了他的呼唤,隐约点了点头,这便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当晚,艾黎前往宋庆龄寓所瞻仰遗容,同时参加治丧委员会为她守灵。

1981年6月4日,宋庆龄骨灰安葬典礼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举行。艾黎作为列名第一的宋庆龄外国友人来沪出席安葬典礼,将一朵宋庆龄生前喜爱的黄色香石竹花放在她的墓前。

六、永不消逝的记忆

斯人已去,空余思念。在宋庆龄逝世后举国悲痛的日子里,艾黎思及往事,心潮难平,在两天内写下了五首悼诗和两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宋庆龄,以寄托他的哀思。1981年5月29日当晚,艾黎就写下了《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回忆宋庆龄二三事》,刊发于次日的《工人日报》。他在文中写道:“她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她好像一朵永不凋谢的花,

永远使人鼓舞,永远使人感到她的存在。”

是年9月,艾黎又在宋庆龄亲自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中发表了《回忆宋庆龄》长篇文章,饱含深情地回忆他们风雨同舟五十载的革命情谊。在艾黎1986年出版的《自传》中,他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巨星陨落”的文章纪念宋庆龄。

1986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五周年时,艾黎抱病来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在宋庆龄陵园举行的纪念碑落成典礼,他发言讲道:“我很感激收到这一邀请,使我能再一次向我们时代这位最伟大的女性致敬。宋庆龄的一生是进步妇女的优秀代表。”

1987年12月27日,艾黎在北京病逝,走完了他90年的传奇人生,而这其中有60年都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什么促使一个新西兰人来到中国,并在此度过他的一生?艾黎曾自言:“伟大的革命带来了好处,它激荡着那个时代的一切,正像它如今仍然激荡着我们;同我一道走过来的人们,至今把我当做同行者的人们……多种因素把我同中国联系在一起……我始终感到欣慰,由于曾经在这条或那条道路分担它伟人的抱负。”宋庆龄正是使他踏上中国革命的引路人,并不断给予他激励和力量。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研究室文博馆员)

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

——马海德

王婉如

2020年9月26日是宋庆龄的国际友人马海德诞辰110周年纪念日。193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美国青年马海德来到上海。在来华工作的55年中,他将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1936年,在宋庆龄的安排下,马海德前往陕甘革命根据地。1937年2月,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第一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协助国际和平医院建设,为抗日根据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争取国际医疗援助。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履行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代表的使命,为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任卫生部顾问,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与研究,获得举世瞩目的成果。

马海德原名沙菲克·乔治·海德姆(Shafick George Hatem),1910年9月26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的一个黎巴嫩籍工人家庭。作为家中长子,贫苦的家庭环境让马海德养成了勇于拼搏、自强不息的品格。在高中时,他曾半工半读完成学业。由于幼年时全家患病,曾受到一位老医生的无偿帮助,马海德因此立志成为一位正直、善良的医生。

1927年秋,马海德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卡罗来纳大学攻读医学预科。两年后,他怀揣成为医生的梦想,转入黎巴嫩贝鲁特美国大学医学院攻读临床诊断。1931年,他

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深造,于1933年7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马海德与他的两位同窗好友克士、雷文森决定一起前往中国。他计划在中国进行医学实习,考察东方热带病,同时了解中国社会情况。1933年9月5日,他们抵达上海。尽管一开始他并不打算在中国逗留太久,但在接下来的55年里,中国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一、结识革命导师宋庆龄

初至上海,马海德与克士、雷文森在仁济医院、同仁医院等几家医疗机构内工作。1934年1月,他们在九江路10号大陆银行大厦内开设了诊所。通过工作,他看到了中国更真实的一面——“战乱、饥饿、瘟疫,人们饥寒交迫”。复杂的社会现状让他逐渐意识到仅仅医治人们身体上的疼痛是远远不够的,他开始思考社会方面的问题。

不久,马海德认识了在上海的一些外国进步人士。与汉斯·希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路易·艾黎等人的交往和谈话使他明白,有人正在努力地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且只有社会得以改善,医生才能真正发挥长处。1934年11月,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多位国际友人在史沫特莱家中聚会。正是在这场聚会上,马海德结识了他敬仰已久的孙夫人——宋庆龄。

在宋庆龄的关怀下,艾黎和希伯等人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马海德也是其中一员。在学习小组中,他第一次阅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书籍,初步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社会。宋庆龄鼓励马海德进行社会调查,了解上海工人阶级的生活情况。在艾黎的帮助下,马海德以科学研究为名,先后到二三十个工厂调查职业病和营养不良的情况,并发表学术报告《上海镀铬业工人之卫生研究》(英文)。在目睹中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后,马海德的思想和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认识到:“工人的出路是反抗,社会的出路是革命,在这场斗争中我应该和中国工人站在一起。”

马海德的进步加深了宋庆龄对他的信任。她将马海德的诊所安排给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作为联络开会的地方,还派他作为医生去南京的监狱探望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部驻上海工作人员牛兰夫妇。1935年夏天,宋庆龄嘱咐马海德开车将两位客人送到码头,登上一艘开往苏联的轮船。后来,他才知道这两位客人是前往苏联,试图与共产国

际取得联系的陈云和陈潭秋。马海德还为宋庆龄支持创办的进步刊物《中国呼声》撰稿,呼吁民众团结抗日。通过协助革命工作,马海德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日益深厚,参加中国革命的决心更加坚定,正如他日后所说:“我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能够救中国”。

二、扎根陕北的马大夫

马海德多次向宋庆龄提出前往革命根据地工作的请求,但一直未能成行。1936年春,宋庆龄获得中共中央拟“邀请一位公道的记者和一名医生到陕北”的消息。6月,经宋庆龄介绍,马海德终于如愿以偿,奔赴陕北。与他同行的是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据马海德回忆,他与斯诺各自出发,在郑州会合,前往西安。在西安短暂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与装扮成古董商的“王牧师”董健吾接头,随后穿越层层封锁,抵达陕北。

7月9日,马海德与斯诺到达安塞白家坪,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还为他们拟定了陕北考察的线路和项目。7月13日,他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社会和历史,中国共产党的长征和革命战略等。这让马海德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将这几次与毛泽东的谈话称为“至关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毛泽东对马海德提出了一项特别委托,请他在考察途中关注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单位,对根据地医疗条件的改善提出具体的意见。于是,马海德带着任务,在燕京大学学生黄华的陪同下,与斯诺一起进行考察。9月,斯诺结束采访准备返回保安,马海德决定留下来。分别之时,马海德嘱咐斯诺不要将他写进著作中,因为一旦他在陕北的事情被报道出来,在上海的朋友可能因此受到伤害。

与斯诺分别后,马海德和黄华跟随红一方面军南下西兰公路,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当时,马海德还没有中文名字,为了便于结识群众,他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姓——“马”,这是当地回族同胞中常见的姓氏。“海德”二字则来源于他的美国姓。于是,“马海德”这个名字逐渐在根据地中为人所熟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马大夫”或“老马”。

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马海德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在走访和行军过程中,他考察了红军前线和后方的医疗

卫生单位,用英文撰写《视察红军卫生工作的意见书》,并提出了改进根据地医疗事业的建议。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亲自任命马海德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

马海德被根据地朝气蓬勃的革命氛围深深吸引,他看到一支纪律严明、意志如钢、深受人民爱戴的革命队伍,感受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他决定参加革命。1936年底,他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37年初,马海德随部队从保安进驻延安,于2月1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初到延安时,当地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而且军队里受过正规医科训练的医生屈指可数。作为卫生顾问,马海德夜以继日地奔波在卫生工作的前线。他不仅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和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还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当地群众治疗疾病,成了延安最受欢迎和信赖的人。

马海德很快学会了中文,融入了延安的工作和生活。在谈及延安时,马海德说:“对于这地方,有一桩事情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儿绝对没有职业上的妒忌。我们所有人一起工作,就像一个大家庭……这使得医学恢复了本来的任务,医学原就是为人类服务的一种科学。”

在延安,他践行着医生的初心和使命,还收获了一份珍贵的爱情。1940年3月,马海德与鲁迅艺术学院的周苏菲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登记结婚,安家延安。尽管延安物资匮乏,生活条件艰苦,但他们始终怀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苦中作乐,日子过得十分幸福。

三、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的代表

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动员和争取国际力量援助中国的抗战。

1938年1月,宋庆龄策划协助诺尔曼·白求恩大夫来华支援中国抗战。3月,白求恩大夫携医疗队抵达延安时,马海德等候在延安城门外迎接,并向他们介绍八路军医疗工作情况和敌后游击战中的卫生、医疗特点,带领他们参观了设在窑洞内的医院和安置在农家的伤病员室。此后,他还接待了由保盟协助前往延安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和德国医生汉斯·米勒等,为他们在边区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帮助,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

马海德正式担任保盟驻延安代表是在1939年9月。是月,保盟荣誉会员斯诺来到延安,他在延安和边区领导人讨论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并指派马海德大夫作为保盟在延安的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疗救济工作的情况,并就保盟送往该地区的物资的接收和分配向中央委员会做出建议。

20世纪40年代初,为方便马海德在边区进行工作,宋庆龄赠送给他一台照相机。这台德国制造的120型“蔡司”牌相机,是宋庆龄经保盟募捐而来。在延安,马海德用这台照相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他将照片寄给保盟,供他们进行宣传。

马海德担任保盟驻延安代表后,始终与宋庆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定期向她汇报边区的医疗工作、医院和制药厂的情况,使宋庆龄和保盟能够及时将边区军民英勇抗日以及医药匮乏的情况告诉海外人士,将募集来的大量款项、药品、医疗器械、通讯设备、罐头食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往延安。

抗战时期,马海德在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据统计,他在门诊部接治病入达5万人以上。《解放日报》曾对他的事迹作了专题报道,号召所有卫生工作者向他学习。在忙于医治病患的同时,他还协助延安各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和制药厂的建设。在此期间,宋庆龄领导保盟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使延安国际和平医院和边区其他医院得以迅速发展。1939年至1940年2月,保盟向国际和平医院捐赠46 878.46元港币和6 800元国币。1942年至1943年,保盟为医院提供的经费达到280万元国币,这笔捐款不仅用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的建设,还分发延安3家国际和平医院分院使用。至1944年,延安地区的医疗体系已达到一定规模,抗日战士和老百姓们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

虽然马海德和医务人员们克服了许多障碍和困难,但设备和药物的缺乏仍然困扰着他们。1944年7月26日,马海德致函宋庆龄,在信中建议:“如果可能的话,为每一个在敌后作战的战士提供一个急救包,里面放有一包磺胺粉和药片……我们的战士不惧怕日本人,如果我们能够消除他们对于受伤的恐惧,他们的勇气将不可战胜。”1944年下半年,宋庆龄曾通过美军观察组为延安输送了大量医疗物资。7月,美军观察组成员抵达延安时,随机带去了宋庆龄支援延安的医疗药品和设备,其中包括马海德在信中

提到的磺胺药品。

8月,马海德收到一张宋庆龄赠送给他的肖像照。照片上,宋庆龄站在一幅宣传抗日的海报前,眼神坚定地凝视着远方。照片背后是宋庆龄的亲笔题词,她写道:向你对我们国际和平医院所作的贡献致以真挚的感谢。这张照片是宋庆龄对马海德多年来在边区辛勤工作的鼓励与肯定。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与马海德虽未曾谋面,但他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工作中共同面临的困难、秉承的宗旨和付出的努力,令他们的友谊更加深厚。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合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1日,宋庆龄致函马海德,告诉他保盟将改名,并希望他及时报告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战后救济和医疗方面的情况及需要的药品清单。年底,保卫中国同盟在上海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后改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仍将援助解放区医疗卫生事业作为主要任务。马海德继续履行驻延安代表的使命。1946年1月16日,宋庆龄再次致函马海德,强调“需要精确和最新的报告”以及“了解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使中国福利基金会能够为国际和平医院争取更多的药品和医疗设备。是年,马海德与中国福利基金会谭宁邦、王安娜等人联系密切,频繁的往来书信记录下他们共同为解放区所作的艰苦努力。

1946年底,马海德来到上海,与宋庆龄见面。在12月10日宋庆龄主持召开的中国福利基金会行政会议上,马海德报告了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再次提出当前最急需的医药和医疗设备。在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支持下,国际和平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到1948年,国际和平医院已从抗日战争时期的4所发展为8所中心医院,分布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苏皖、山东等地区,还建立了42所国际和平医院分院。

这一时期,马海德还担任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解总)的顾问,他时常向宋庆龄反映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官员中饱私囊,导致本该运往解放区的物资流入黑市,解放区人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济物资。为争取公平合理的物资分配,中国福利基金会积极协助解总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联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行总)进行交涉。经多方努力,不少医药救济物资被送往陕北、华北、山东、苏北等解放区。

为争取联总对解放区的支持,解总与中国福利基金会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3、4月间,马海德陪同联总驻华办事处的外科医学专员艾乐思等人参观位于张家口和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向他们介绍解放区的医疗卫生工作。艾乐思在看到解放区物资极度匮乏的现状后,计划把全部联总救济物资的20%至35%送往解放区,并始终支持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

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驻延安的代表和解总的顾问,马海德始终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这一时期,解总和中国福利基金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共同努力令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为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在延安的十载春秋中,马海德不仅致力于建立和开展边区医疗事业,还积极参与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1937年11月,马海德从五台山回到延安,准备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此时,廖承志邀请他参与新华社英文部的工作,担任英文翻译,并采写一些揭发日本侵略者法西斯行径的英文消息,向国外读者播发。1941年起,马海德经常为中共中央出版的对外宣传刊物《中国通讯》(*Report from China*)撰文。这份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对于加强抗战对外宣传和开拓中共对外宣传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海德是延安的义务接待员,时常与前来边区访问的国际友人打交道。他接待过白求恩、柯棣华、米勒等支援根据地抗战的外国医生,招待过多位前来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1944年,国民党的封锁被打破,一批批外国记者、外交官、军人访问延安。马海德担任中央军委外事组顾问,陪同来访者考察、参观,耐心而有说服力地同他们交谈,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中国人民不可阻挡的前进潮流。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进行采访,马海德陪同爱泼斯坦等人前往延安国际和平医院进行考察。马海德的言谈举止给外国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哈里森·福尔曼在《北行漫记》中写道:“马海德全身心地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卫生服务工作,是一个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人。”在采访过程中,外国记者们被延安的

革命氛围所感染,他们相继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实报道。

1944年7月,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派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了解中共军队的实际情况。马海德作为中方工作人员陪同观察组成员参观,他和美国士兵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时光,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根据地军民艰苦抗战的情况,争取他们的了解和支持。马海德说:“延安的国际友人们带着同情而来。在看到我们当时的工作和战斗之后,他们成了我们的朋友。”

1946年1月,马海德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其间,他向美国代表团成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多年来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向北平的外国朋友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真相,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正义立场。

六、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在此之前,马海德已随叶剑英部队来到北平西郊颐和园内,准备进城接管医院和安置医务人员。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13年艰苦战争洗礼的马海德,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来了这伟大的日子。不久,经周恩来批准,马海德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马海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在担任卫生部顾问期间,他坚持每周都到协和医院出门诊或参加会诊。1953年,马海德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建立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的建议,并参与筹建工作。1954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马海德和同事们在共同研究后,首先制定了在全国范围内消灭性病的计划。此后,他每年都带领医疗小组走访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广西等边远地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在马海德与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至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范围内已基本消灭了性病。同时,边远地区的卫生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

在巡诊过程中,马海德带领医疗队有意识地开展对麻风病的调查和防治工作。他们深入麻风村、麻风院,为了扭转社会上对麻风病人的偏见,马海德主动和麻风病人握手。他不断引进和推广国外治疗麻风病的新技术,建立广泛国际联系,为加速消灭麻风病的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麻风病已得到有效控制,患者人

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50 万人减少到 20 万人左右,这些成绩凝聚着马海德和医务人员的心血和奉献。

1986 年,为表彰马海德在根除中国的性病和防治麻风病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为改善中国人民的卫生福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他被美国艾伯特·玛丽·拉斯克基金会授予艾伯特·拉斯克医学研究奖。这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生物医学奖项之一,在国际上亦享有盛誉。他在颁奖仪式上表示,荣获该奖项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而且也表明中国人的工作得到了世界的承认。1987 年,马海德荣获世界麻风病防治最高奖——国际甘地奖。1988 年 9 月 23 日,卫生部为表彰马海德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荣誉称号。

七、绵延半个世纪的友谊

马海德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图书——《中国福利会二十年》,这是 1958 年宋庆龄赠予他的。宋庆龄在扉页上亲笔题词:“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记得你治愈了我受伤的手指。”这件事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当时宋庆龄的手指患化脓性甲沟炎,马海德用冷冻麻醉为她动了一个小手术。20 多年过去了,宋庆龄仍记着马海德对她的帮助和照顾。

马海德对宋庆龄也满怀感激,在他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仍关心马海德的革命道路。20 世纪 50 年代起,马海德经常带医疗队到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回京后向宋庆龄汇报工作情况。他一直记着宋庆龄的叮嘱:“我一直关心着你,看你在革命道路上走得好不好。如果走得不好,我是要批评你的。”

马海德的夫人苏菲女士说:“宋庆龄与马海德保持了长久的、真挚的友谊,她关爱我们家里所有的人。”1976 年,唐山大地震导致马海德家的房子被震裂,宋庆龄闻讯后十分担忧。在获悉北京的好朋友们都安然无恙后,她才放心。8 月 9 日,马海德致函宋庆龄,向她表示感谢,并关心她的健康情况。他在信中写道:“当你的信使来北京把你的关怀和慰问带给我们时,我们是多么欢欣鼓舞……你必须保重身体,要做的事情很多……你需要有一个好的体魄。”

马海德的住所和宋庆龄北京寓所距离很近,均位于什刹海边。宋庆龄寓居北京期间,不仅常常托人给马海德一家送来食物,还多次邀请他们一家参加友人聚会。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刚到《中国建设》任摄影记者时,宋庆龄鼓励他为国家、为人民勤恳地工作。马海德的孙子马骏在儿时经常收到宋庆龄寄来的《儿童时代》,杂志的套封有宋庆龄的亲笔手迹。

1981年5月29日晚,宋庆龄与世长辞。在她最后的日子,马海德作为朋友、医生一直守护在她的身旁。宋庆龄去世后,马海德参与守灵、追悼大会和骨灰落葬仪式,撰写多篇纪念文章寄托哀思。在《我的革命引路人——宋庆龄》一文中,他深情地写道:“你是我的导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世上还有什么比我此刻的心更痛楚,世上还有什么比你的友情更值得记忆。”

八、人民的大夫,无悔的人生

马海德晚年身患癌症,前后经历过8次较大的手术,但他仍坚持定期坐诊,为老百姓医治疾病。他还多次带领医疗考察组出国访问、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医疗技术服务于中国人民。在担任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期间,他提交了多条具有建设性的提案。除繁重的医务工作外,他还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了许多努力,经常向一些来访的外国人士介绍中国的现状,说明中国对世界所具有的影响。

1983年11月22日,首都各界人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马海德来华工作五十周年招待会。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会见了,对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邓小平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五十年,不容易。”

马海德在招待会上致答谢词,他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半个世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却是漫长的道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员的我,能够置身于中国人民斗争的行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尽一份力量;在建设的年代里,我又能把自已的劳动同中国人民的劳动融为一体,为此我感到幸福和欣慰……”

由于长期处于繁忙的工作状态,马海德的健康每况愈下。1988年10月3日,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一生的马海德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8岁。家人们按照

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分别安置在三个地方。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部分被送回故乡美国纽约州布法罗市安葬,余下的一部分撒入了延安的延河中。

对于投身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马海德无怨无悔。他曾说:“如果让我重新开始生活,我还是要选择这条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巧合的是,宋庆龄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她在信中写道:“如果我必须重新再生活一次,我会同现在完全一样生活。”马海德对宋庆龄充满着无限感激,在他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更是他终身学习的榜样。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研究室业务研究员)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加拿大医生

——诺尔曼·白求恩

郑培燕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这是一个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末,这位加拿大共产党员、北美著名胸外科专家,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资助,来华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最终以身殉职。毛泽东主席曾经亲著《纪念白求恩》一文,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予以高度评价。

白求恩的来华,与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以及她创立和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今中国福利会前身)有着密切联系。她曾在回顾中国福利会历史时深情地说:“保卫中国同盟曾介绍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前往解放区服务;白求恩大夫竟至在建设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时呈献了他的生命。”白求恩来华之初,保盟尽力提供支持,并积极为之募集医疗物资。在保盟的努力下,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五台山建立的模范医院,成为第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保盟通过多方渠道,为该院募集资金和医疗物资;白求恩以身殉职后,宋庆龄和她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业,弘扬白求恩的精神。

一、优秀的加拿大共产党员

1890年3月,白求恩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一个基督教牧师家

庭。祖父老亨利·诺尔曼·白求恩是安大略省多伦多市著名的外科医生。自幼年时期,白求恩便立志成为像祖父那样的名医。

青年时代的白求恩当过工人,卖过报纸,做过教师,和劳动人民有过广泛的接触。1916年,白求恩从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学士学位。1935年,白求恩因医术精湛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

成名后的白求恩,始终惦记着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们,他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批评医疗制度的弊端,不仅呼吁“医生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医疗工作者团体,到贫民区去,到最迫切需要的地方去”,而且身体力行,主动为贫困患者开展诊疗服务。

1935年8月,白求恩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参观访问期间,他会见了巴甫洛夫,参观了医院、疗养院,研究了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措施,印象极深。自苏联返加后,白求恩渐渐与加拿大共产党接近,开始参加魁北克省共产党组织的报告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活动。是年秋,白求恩发起成立蒙特利尔保卫人民健康促进会并任会长。该会的主要宗旨是改善人民医疗卫生条件,有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百余人参加。此后,他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倡导社会化医疗制度。11月,白求恩加入加拿大共产党,这一人生中的重要抉择使得他有了核心信仰。

1936年冬,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战,白求恩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担任加拿大援助西班牙医疗队队长。在赴西班牙的前几天,白求恩写下了他的墓志铭:生为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白求恩在西班牙建立流动输血服务站,成为战地救护的重要手段,挽救了不计其数的生命。

1937年夏,白求恩在加拿大和美国巡回演讲,为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募捐,足迹遍及魁北克、温尼伯、芝加哥等地。在温尼伯演讲时,白求恩公开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他告诉听众:“我很荣幸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7月,中国爆发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对此,白求恩在加拿大演讲时指出:“章鱼状的垄断资本主义已四处伸出触手,日本侵略中国即是一例。”他决心到中国去,实现他“为人类福祉做些事情”的诺言。

二、医疗援华的先行者

1937年,毛泽东与在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派

遣医疗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同年8月,史沫特莱以两人的名义,分别给美共、加共、共产国际、美国红十字会等发出信件,呼吁援助。

几乎在同一时期,白求恩与加拿大共产党总书记蒂姆·巴克取得联系,建议派遣医疗队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党的八路军。10月前后,加拿大共产党决定派遣医疗队援助中国。因资金匮乏,蒂姆·巴克与美国共产党书记白劳德取得联系,决定两国组成联合委员会,白求恩受邀成为其中一员。为了表达自己的一片赤诚,白求恩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白求恩前往美国纽约与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商谈并筹备援华问题。他与刚从延安返回美国的援华会负责人菲利普·贾菲进行了深入交谈,了解到深陷困境的八路军急需有经验的医务人员,他为中国人民特别是八路军提供医疗援助的决心日益坚定了。

1938年1月,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由美国援华会赞助,白求恩与美国医生查尔斯·爱德华·帕森斯、护士琼·尤恩(加拿大共产党创始人汤姆·尤恩的女儿)组成加美援华医疗队,带着以美国援华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捐赠款项购买的医疗用品,从温哥华乘船启程,前往中国,开启了他为中国人民抗战无私奉献的艰辛历程。

关于前往中国的原因,白求恩在一封信中曾写道:“你要明白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读一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

白求恩信中所提及的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都是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相识并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与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一起,经宋庆龄联系,前往陕北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便是斯诺以陕北采访见闻为依据写成的。乔治·海德姆则留在陕北,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了卫生顾问,并取了中文名字马海德,后来成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史沫特莱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与宋庆龄相识,是最早向世界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新闻记者,之后到延安深入接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一步了解中国红军和中国抗战,也是白求恩与美国援华会之间的联络人,后来成为保卫中国同盟的编外战友。

三、支援白求恩去解放区

1938年1月底,白求恩一行到达香港。此时的香港,已成为中国与世界联系的重要渠道,既是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也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渠道和集散地。为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共地下党员廖承志在香港成立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中共人员往来香港,安排海内外人士赴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联络世界各国援华组织和海外侨胞支援抗战。一直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宋庆龄,也于1937年底接受中共建议抵达香港,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国际影响力和号召力。宋庆龄到达香港后,廖承志等多次与她商讨如何开展抗战救援工作的问题。

白求恩一行抵港后,准备取道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为旅途安全,必须由党的驻港办事处向党中央汇报并与汉口取得联系。同时,白求恩一行需要在港添购一些药品及医疗器材。宋庆龄在白求恩抵港后,便让廖承志通知地下交通员熊志华前往酒店与白求恩见面。第二天,廖承志又在熊志华的陪同下前往酒店与白求恩会见,代表党对白求恩一行的到来表示感谢与欢迎,并向白求恩介绍了边区对医护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的迫切需求,以及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极其艰苦的条件。白求恩表示希望早日动身,尽快到前方抢救伤员。廖承志还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姐姐廖梦醒以及表妹夫邓文钊组织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以进一步争取海外援助。在白求恩一行在港逗留的几日内,熊志华与几位同志陪同白求恩一行在香港采购了一些急需的医药用品,连同白求恩原先带来的医疗物资,总共装了20余箱。

2月初,白求恩一行抵达汉口。当时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亲切会见他们,并安排医疗队与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林可胜取得联络,白求恩和尤恩表示愿意尽快去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工作。周恩来还为白求恩去延安做了安排,他指定自己的秘书王炳南为白求恩一行办理去延安的手续并安排专人护送。

在汉口,白求恩还遇到了已结束华北前线战地采访的贝特兰。白求恩提及医疗物资缺乏的问题,贝特兰只能勉强募集到一些资金和供给品给他们。在武汉期间,贝特兰曾多次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周恩来,周恩来特别同他讨论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问题。他们以史沫特莱和贝特兰从华北前线带回来的关于伤员需要的第一手报告为依据,商

定了一项计划——在华北建立一个国际和平医院,下设5个分院,并继续提供医务人员和物资。周恩来请贝特兰把前线缺医少药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带交给香港的宋庆龄。在离开武汉前,贝特兰将自己的所有行头——御寒的衣裤、帽子和行囊统统送给了白求恩。后来从白求恩在延安和华北各地拍的一些照片上,他还看得出白求恩仍穿着其中的某些衣物。贝特兰还为白求恩拍摄了“在中国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即后来为人们所广泛熟悉的白求恩那张酷似列宁的照片。

1938年2月下旬,白求恩一行离开武汉去延安,途中多次遭遇敌机轰炸,历尽艰辛,于3月抵达西安。为了购买药品和医疗器械,他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住10天左右。其间,中共特别党员、西北军将领张克侠途经办事处时突发急性阑尾炎,白求恩为他进行了手术治疗。

1938年3月底,白求恩一行带着三汽车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到达延安。美国医生马海德前来迎接他们。在延安,白求恩及护士尤恩受到毛主席亲切会见。在延安期间,白求恩视察中央医院、诊治伤员,为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工学院、东北干部训练团学员作报告。不久,白求恩由延安出发,率领医疗队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其间白求恩持续致信史沫特莱和美国援华会催促对根据地进行援助。6月,八路军收到了美国援华会的捐助款项。

同一时期,贝特兰于3月抵达香港,向宋庆龄提交了前线缺医少药的报告,转达周恩来关于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抗日前线,特别是援助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意见。不久,老朋友廖承志请他参加了一个在邓文钊家召开的会议,讨论在支援白求恩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更大规模的组织,独立地向海外公众争取援助,并和海外援华救济团体建立联系,以打破国民党官办的“抗敌后援会”对外援的垄断和中饱私囊的弊端。廖承志提议请宋庆龄出任主席。之后,宋庆龄委托贝特兰到世界各地介绍筹建保卫中国同盟的情况,吁请海外救援机构援助中国抗战,争取知名人士支持保盟工作。1938年6月14日,保盟正式在香港成立。

保盟创立之时,白求恩一行已经到达岚县,受到军民热烈欢迎。6月17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冲过敌人封锁,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省五台县金岗库村。聂荣臻司令员聘请白求恩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

自1938年6月到1939年11月去世,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待了整整17个月,为晋察冀根据地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协力创建国际和平医院

1938年白求恩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期间,对刚建立不久的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所后方医院提出了在组织、清洁及其他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这些医院的技术和设备,他制定了一个“五周计划”,其重点是在松岩口村的一所大庙里创建“模范医院”。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他放弃休息,夜以继日地工作。9月15日,这个后来被称为国际和平医院的模范医院落成了。

在模范医院落成开幕典礼上,白求恩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作为医生、看护、救护员的责任,就是让你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要把病人当成兄弟亲人,他们还是我们的同志。”“虽然我们和他们可能无法活着看到这个新中国的成立,但我们正在通过今天的行动,使之成为可能。无论它是否能够实现,都需要依靠我们今后的行动。我们必须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来创造它。”

白求恩在五台山创立模范医院的同时,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在为争取国际援助做着积极的努力。为了将国际民间组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援助常规化,保盟开始筹备设立具体的根据地医疗援助项目。1938年7月,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世界代表大会。经过保盟努力,会议作出援华决议,决定帮助中国建立国际和平医院。英、美、加的援华团体为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纷纷捐款。国际和平运动委员会委派英国伦敦援华委员会何登夫人为代表赴广州与宋庆龄商谈建院事宜。1938年9月2日,宋庆龄和各界代表到码头欢迎何登夫人。经商议,决定将晋察冀边区五台山模范医院命名为国际和平医院,并请正在那里工作的白求恩大夫出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英国援华委员会捐助2450英镑,保卫中国同盟筹划950英镑,作为建院经费。

五、致力国际和平医院建设

国际和平医院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作为国际和平医院与海外援华团体联系的代表,不断地向美国援华会以及英、美、加等外国援华机构

反映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和需要,为他们争取更多的援助,从资金、医疗物资和医务人员等方面全力支持该项目的持续与发展。

由于通讯联系的困难和白求恩大夫日夜忙于医疗工作,有关该院工作的详尽的报道难以为外部世界所得知。保盟委托贝特兰前往山西北部,负责该医院的组织并将相关报告和照片发送出来,可惜贝特兰未能最终抵达。1939年9月,在延安接待过白求恩医疗队的马海德,被指派为保盟驻延安代表,报告国际和平医院和西北其他医药救济工作的情况,建议中央委员会关于保盟送往该区物资的分配。从那时起报告和照片才经常地由马大夫送来。

1939年夏天,保卫中国同盟驻重庆代表王安娜受宋庆龄的委托,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晋察冀边区了解华北前线的情况,还前往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向白求恩大夫了解医疗工作情况。她与白求恩进行了详细的交谈,实地考察了国际和平医院和卫生学校。白求恩告诉王安娜,这里非常需要援助。王安娜回到重庆以后,将所了解情况向保盟、宋庆龄作了汇报。

尽管保盟做了诸多努力和大量工作,然而,宋庆龄对八路军的专项援助却无法及时到达晋察冀。一方面,美国援华会从纽约募集来的资金,要经中国红十字会和保盟,转手两次才能交给八路军。另一方面,延安是运往晋察冀物资的第一站,物资辗转运到延安,再从延安运出,要通过骡车走几周的山路才能到达晋察冀。而且,到1939年年中,国民党无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切断了所有运往延安的物资通道。白求恩所在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并没有及时收到保盟募集来的援助物资。白求恩一直在为得不到援助而焦虑万分,甚至计划乔装去北平购药。他动员了随新西兰教会来华并经常为他提供帮助的修女护士凯瑟琳·霍尔跟他同去,但是因此行太过危险,二人被八路军总部拦了下来。不久,霍尔因支持八路军的活动被日本人驱逐出境到了香港,后受宋庆龄委派,从香港通过越南海防和滇缅公路辗转给白求恩运输医药器材。遗憾的是,这一批药品器材运到时,白求恩大夫已经与我们永别了。

1939年10月20日,这个原本是白求恩计划动身回国募集经费的日子,日寇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他毅然决定留下参与战地救护。他在河北涞源摩天岭战斗中抢救伤员时左手指被手术刀割破,又在后来的手术中感染。11月12日,因病情恶化抢救无

效,白求恩逝世于河北唐县黄石口村。

1940年1月,为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共中央决定将白求恩工作过的模范医院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为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在晋察冀的分院。

六、白求恩的工作在继续

白求恩的逝世,令宋庆龄十分痛惜。12月,宋庆龄在致尼赫鲁商讨印度医疗队援华工作的函中写道:“五台山这个地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而白求恩大夫却工作得非常出色,他在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用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负责300个病人的治疗任务。”印度国民大会发起的援华医疗队,于1939年2月到延安,在抗日前线跋山涉水,辗转各地,救死扶伤。白求恩去世以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接替白求恩,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

白求恩逝世后,宋庆龄一直将国际和平医院及八路军医疗体系的建设作为对白求恩事业的延续,国际和平医院一直是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援助重点。至1941年,许多援华委员会、红十字会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香港空前发展。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聚集和重新组合的时期,宋庆龄领导的保盟,与诸多援华机构都建立了联系,募集医药费及其他必需品,想方设法宣传和支援加拿大白求恩大夫和印度柯棣华大夫先后主持的国际和平医院。

1940年2月,保盟在香港皇家剧院义映墨西哥影片《裘莱士》,净收入3000余元,全部用以支援国际和平医院。保盟的宣传刊物上刊载了诸多与白求恩以及国际和平医院建设相关的工作报告、需求情况、捐赠情况等,向海内外呼吁以增加援助的行动来继续白求恩的事业。

在保盟的努力下,国际和平医院项目逐渐扩大,至1940年,已形成了包括五台山、延安、晋东南、皖南4个地区的医院和医疗工作的体系。除医院外,该体系还包括晋察冀军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延安的八路军制药厂、中国医科大学等,以及国际和平医院运输体系的维护系统。

宋庆龄本人也多次致信海外援华机构以及国际友人,呼吁对国际和平医院的援助。

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致函加拿大红十字会驻渝办事处,呼吁继续支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7年12月1日,宋庆龄发表《致国际友人》一文,谓:“中国人民在为争取进步和民主的艰苦斗争中一直深深怀念着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并一直被他的精神所激励。”“我知道,善意的美国人民是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维持下去并不断发展的。我相信,作为对白求恩大夫的纪念,我们可以共同再次向国际和平医院注入新的活力。”宋庆龄呼吁:“为了使白求恩大夫的事业得以继续下去,我请求你们伸出援助之手。”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1945—1946年的驻华卫生部总干事、驻华世界卫生会干事鲍谦熙医生曾说:“国际和平医院建立了健全的医疗实践,给整个远东作出一个公共医药卫生实践的模范。”

至1947年,在整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有了8所国际和平医院,和42所分院、16000张病床。

七、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白求恩的去世,是中国抗战救护事业的巨大损失。宋庆龄对白求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给国外中国人民之友留下他的生命和工作的榜样”。在领导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以及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中,宋庆龄始终注重弘扬白求恩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

为悼念白求恩大夫逝世,纪念白求恩的丰功伟绩,1939年12月15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1期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一个为中国而斗争的战士的牺牲》《在河北游击区4个月的工作》,并刊登了白求恩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一起的照片。1940年2月15日《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13期发表纪念白求恩的文章《白求恩大夫的工作在继续》和马海德的回忆文章《我认识的诺尔曼·白求恩》。

1949年11月12日,白求恩逝世十周年之际,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举行纪念会,向白求恩大夫致以最深的敬意与悼念!

1952年,加拿大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为白求恩大夫撰写的传记《手术刀就是剑》在美国出版。该书叙述了白求恩从一个普通医生成长为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国际主义战士的整个过程。宋庆龄在所作的序中,说出了她对白求恩的印象:“任何

时代的英雄都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以惊人的忠诚、决心、勇气和技能完成了那个时代放在人人面前的重要任务。”在她心中，“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宋庆龄在序中还说，“新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白求恩大夫”。“他的事业和他的英名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1979年11月12日“白求恩生平事迹展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开幕。宋庆龄为该展题词：“白求恩精神光耀千秋！”

1981年5月8日下午，宋庆龄抱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授赠典礼，并发表讲话，称白求恩是在各个革命与建设时期向中国提供帮助的加拿大人中“最杰出的代表，最崇高的象征”，是“在中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为反对一切企图奴役别人的人而团结战斗的国际性榜样”，是“中加两国的光荣”。讲话中，宋庆龄对中加两国友谊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呼吁“联合与加拿大一样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公众活动。

斯人已逝，而精神长存。宋庆龄、白求恩，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将毕生都献给了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事业，他们的光辉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研究室副研究馆员）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罗马尼亚医生

——柯列然

孙娴静

布库尔·柯列然(Bucur Clejan, 1904—1975),罗马尼亚共产党员,执业医生。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国际援华组织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的安排下,他秉持着共产主义信仰和国际主义情怀,来到中国支持抗战。从贵阳图云关到湘鄂粤前线,从西南边陲到中原大地,他把生命中最宝贵的岁月留在了中国这片见证了他的信仰和事业的土地上。在华工作9年间,他曾2次受到宋庆龄的亲切接见和热情鼓励。正是在宋庆龄精神和品格的感召鼓舞之下,柯列然为休戚与共的中罗两国友谊之路铺就了一块块基石。李克强总理2013年访问罗马尼亚时就曾指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贵国医生扬库和柯列然夫妇不远万里投身于中国反法西斯斗争,他们救死扶伤、舍生忘死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颂”。

一、西班牙“国际纵队”的战士

柯列然原名雅各布·克兰兹多尔夫(Jacob Laub Kranzdorf),1904年12月26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时,他报考了医大并远赴意大利留学,6年后成为一名合格的皮肤科医生。学成归国后,他在家乡开设私人诊所,并结识了不久后成为自己妻子的柯芝兰(Gisela Muntianu)。柯芝兰来自一个红色世家,在她和她家族的影响下,柯列然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逐步认识了共产党并参与党的

地下活动。1932年,柯列然加入了罗马尼亚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得知共产国际决定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的消息后,在妻子的支持下,柯列然响应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号召,变卖诊所的一切,离开家人和祖国,于1938年冬作为志愿医师加入了西班牙人民阵线,和白求恩大夫一样,成为了由50多个国家、数万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国际纵队的一员。1939年2月,在从事了短暂的战地医疗工作后,柯列然跟随队伍撤退至法国境内,随即被关押进了集中营。

此时,远在数万里以外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第二个年头。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敏锐地认识到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之间休戚与共的联系。毛泽东在致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们所努力的事业也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宋庆龄也曾向世界强烈呼吁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你们不要以为战争仅仅发生在世界上一个区域,昨天在西班牙,今天在中国,谁能保证明天这种死的恐怖不会降临到你们身上!我向你们急迫地呼吁!援助中国,援助西班牙,援助无量数的失却了父母的儿童,失掉了丈夫儿子和生活的女性,也就是帮助了你们自己!”“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侵略和黑暗统治的伟大斗争中,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公开的战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的人民正在英勇地和成功地同世界侵略集团成员之一的日本交战;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地拒绝投降。因此,连慕尼黑协定也没有能够使法西斯的浪潮淹没世界。”

集中营中的柯列然和战友们也关注着中国抗战的形势,为此特别编辑过一期声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特刊。由英国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运动委员会在得知集中营内有一批不能返回祖国的医务人员后,在伦敦成立了医药援华委员会,并与英国红十字会取得联系,计划招募和安排一些能去中国支援抗战的志愿者。柯列然得知后毅然报名申请,希望在中国继续他在西班牙未竟的事业。

不久,一支近20人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组建完毕,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国际纵队。当时,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已成为世界各地援华组织和中国抗战军民联系的重要桥梁,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就一直与保盟保持着联系与合作。此次援华队员到达中国后,即由保盟负责接待并帮助他们过境。

二、在香港与宋庆龄的第一次见面

1939年9月13日,柯列然等援华队员到达香港,受到了当地各界人士的欢迎。由于他们证件的国籍一栏上都填着“西班牙”,所以报纸媒体统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西班牙人。在码头迎接他们的是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名誉秘书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司徒永觉夫人)。她为队员们安排了在港逗留期间的食宿和一系列的参观和交流活动,并介绍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情况。

首次踏上东方土地的“西班牙医生”内心急切地盼望着早日奔赴抗日前线。在得知白求恩大夫是经延安去晋察冀边区工作后,他们也希望能够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军队提供医疗服务。由于受当时形势的影响,他们无法如愿,只能暂去国民党统治区支援抗战。

出行之前,所有“西班牙医生”都收到了一份特殊而光荣的请柬——出席宋庆龄在寓所为他们举办的饯行晚宴。那是个美丽的傍晚,柯列然一行人来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一座“朴素的、小而简陋的住宅”。在这里,柯列然第一次亲眼见到了这位心目中的伟大女性。席间,宋庆龄热情地款待各位“西班牙医生”,她那“无法模仿的庄重仪态”令所有人深深折服,使人感到一种“真正的、人类的伟大,不需要表面形式也一样伟大”。与柯列然一同赴宴的队友富华德的回忆或许能代表当时每一位援华队员的心声——“她的行动、她那忘我的工作精神就是对我们无声的号召,召唤我们去为中国工作。”

在每一位客人面前,都有一张宋庆龄精心准备的席位卡。柯列然手里的是一张用彩色通草纸剪成的提着花篮的小姑娘,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柯列然十分珍爱这张“上面有我名字的小女孩”的卡片,他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并终身珍藏着它。

晚宴快结束时,宋庆龄邀请全体队员用自己的母语共同演唱《国际歌》。不一会儿,狭小的屋子里回荡起多国语言的大合唱,这是柯列然在离开法国集中营后再次重唱的歌曲,一首为“争取人类最终解放而斗争的歌曲”。那一刻,所有人的情绪都无比高涨。

当晚,柯列然与大部分“西班牙医生”带着宋庆龄临别时赠送的花束一同出发。因受交通封锁,援华队员们在保盟的安排下,由海路至越南海防登岸,再乘卡车经广西入贵州,最终于10月间到达了他们此行的终点——贵阳东南郊的图云关。

三、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特别会员”

图云关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部的所在地,这里成为了柯列然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在救护总队报到后,援华队员们被分别编入不同的队伍,从学习中文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

尽管已到达贵阳,但队员们的心里还一直盼望着能去抗日根据地服务。他们曾设法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之后还专门派代表前往重庆拜访周恩来,表达内心的愿望。在听取周恩来分析当前的形势后,他们深深牢记了只要在抗日战线工作,无论在哪个地区,都是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忠告。

1939年12月,柯列然和战友们前往湘鄂赣前线,每人率领一支红十字救护队,到部队开设一个带有手术室的医院,直至次年6月才回到图云关。此时,恰逢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到图云关访问救护总队,她和援华队员们有过短暂的接触,并作了如下记录:“作为反法西斯战士,他们是团结一致的。他们在吃、穿、住上,全都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全都看清了中国在卫生条件和科学上的落后,但他们能从正确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状况,并且以尽可能肩负一份重担的行动来对它们。”

两个月后,“西班牙医生”们再次出征。柯列然先被派往第四战区的粤北前线,其间短暂奔赴过云南蒙自,之后又进驻云南建水的滇军第二十师师部工作。在这些地方,柯列然用带来的药物和医疗器械帮助装备部队的军医院,指导和组织卫生机构;他冒着战火,抢救和治疗负伤和染病的抗日将士和当地百姓,在医药用品紧缺的条件下,能代用的代用,能配制的配制,想方设法更多地救治伤病员。此外,柯列然还参与医务培训工作,为部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医务人员。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柯列然和战友们满腔的热情却一度遭遇过无情的猜疑。1941年,来华一起参与医疗队工作的妻子柯芝兰也在救助伤员的过程中不幸染病离世。但在这些挫折和打击过后,柯列然依然振作精神,积极投入战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结束后,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久宣布解散。10月,柯列然离开了救护总队。临别之际,中国红十字总会因为他“服务本部有年勋劳卓著”,而授予“特别会员”的荣衔。与部分“西班牙医生”选择回国不同,柯列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的指示下,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职员继

续留在中国服务。

四、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的共产党员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是一个先于联合国运作的临时性慈善救济组织,帮助“二战”中遭受战争灾难的国家和个人恢复生产和生活。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华设立了中国分署(以下简称联总),先后安排将近250余吨救济物资运往中国,同时派遣诸多专业人员参与中国的善后救济事务。从1945年底至1947年底,柯列然先是被任命为联总驻重庆办事处的卫生官员,之后又被调任至联总驻河南郑州办事处,负责河南地区一切有关医务卫生、赈灾救济等工作。

按照联总成立之初的大会决议,“任何时候,救济善后物资都不得被用作政治武器,同时,分配救济品时不得因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基于此,解放区一直关注着联总的政策,于1945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后于1946年8月更名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以下简称“解总”),协助解放区政府开展救济工作,同时与联总、行总(即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是国民政府为与联总对接而设立的机构)进行多方接触与交涉,力图为解放区争取更多救济物资。

1945年12月,宋庆龄将保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力于遭受战争创伤地区的恢复和建设,“在中国的需要者和全世界朋友中间起着联系作用”。她呼吁“把捐款、医疗物资和其他捐助物运送给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使朋友们和同情者的捐赠最有效的得到应用”。她带领中国福利基金会与解总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为解放区募集和运送了大量的医药物品,也为解总向联总与行总争取更多的救济物资提供诸多帮助。

然而,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趋紧张,内战一触即发。受国民党当局的阻挠,运往解放区的物资越来越少,总量不及联总运抵中国物资的2%。

作为联总职员,柯列然完全支持宋庆龄的主张,对解放区的救济物资分配给予高度关注。在每次参加完物资分配会议之后,他总对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感到愤怒,他常常与行总的代表争执,因为“他们分配给解放区的救济物资的比例太小”。尽管,持有相同意见的联总人员在分配会议上只占少数,但柯列然认为“若不尽力去争取的话,那分给解

放区的就更少了”。柯列然总想着“设法使解放区代表知道自己有什么物资已经来到和多少数量是该分配给他们的”，也正得益于在联总的工作机会，柯列然才有机会前往解放区运送物资。在与解放区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柯列然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气，也看到了解放区的军民是如何在简陋的生活条件下，用顽强的意志应对困境、用智慧解决困难，这些都再一次激起了他对前往解放区工作的向往。“工作人员的热诚、他们的毅力、坚信、朴实”，每当柯列然向身边人津津有味地讲述着这一切时，他的眼里总是显得闪闪有光。在郑州办事处工作的日子里，柯列然还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毕业于湖南湘雅医学院附属护校的赵婧璞。两人于1946年底结为夫妇，柯列然成了中国女婿。

1947年11月，联总宣布停止在华救济工作。年底，柯列然依照工作安排，携妻子前往联总驻华总办事处的所在地——上海。

五、在上海与宋庆龄重逢

到达上海没几天，柯列然就收到了一份请柬，受邀出席解总驻上海办事处代表林仲在新亚饭店举办的告别鸡尾酒会。

12月4日下午5时，柯列然偕赵婧璞依约准时赴宴。当柯列然在酒会上与故友们正交谈时，突然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宋庆龄。

这次的重逢令柯列然惊喜不已。据赵婧璞回忆，柯列然连忙走到宋庆龄身旁向她问候道：“您好哇？我真高兴在这里又有机会见了您。”在他的眼中，宋庆龄“精神饱满，一点儿也不像近六十岁的人”。柯列然激动地向宋庆龄述说着1939年第一次见面的场景，边说还边比划着当年保存的那张席位卡，称赞“那是一个很宝贵的纪念品”。宋庆龄听后微笑着给予回应，她告诉柯列然：“我们中国人民同样地也永不会忘记所有你们志愿来帮我们的同志们的，以后有机会时请你们再来访问中国。”

听完宋庆龄的话，柯列然心潮澎湃，他回复宋庆龄：“请您不要客气，我们做的都是应该的，可惜做得太少了。我已经把中国看作我的第二故乡，以后只要有机会一定再来中国，那时也会来拜访您的。”说完，他连忙掏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郑重地请宋庆龄在上面签名，并在宋庆龄的签名后写上了日期，满脸幸福地收入衣袋。

三个月后,柯列然结束了在联总的一切事务,带着妻子从上海登上“飞云号”远洋轮,返回已阔别十载的祖国——罗马尼亚。

六、中罗友谊的友好使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罗马尼亚成为了第三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柯列然回国后,先后担任国家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国家监察署署长等职。从1955年起,应本人的要求,柯列然在布加勒斯特市第十皮肤病医院担任副院长,继续从事他喜爱的医疗工作直至1970年退休。

宋庆龄以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架设了新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谊桥梁。同样,柯列然夫妇也为中罗友谊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中国驻罗使馆初创期间,他们二人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尽力给予帮助。赵婧璞一度还成为了使馆的职员,从事翻译资料、登记侨民、陪同来访的中国代表团等工作。1957年,罗马尼亚外文出版社增设《今日罗马尼亚》杂志中文版。在柯列然的支持下,赵婧璞与中国派来的排字技师一起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刊工作,并在之后的近20年里始终致力于架设中罗友谊桥梁的事业。

1972年10月,中国人民友好协会邀请柯列然夫妇访华。作为与中国有着“同志、朋友、亲属”三重关系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1975年,柯列然在罗马尼亚家中不幸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享年71岁。2008年12月26日,柯列然诞辰104周年之际,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柯列然纪念墓在宋庆龄陵园落成,柯列然的骨灰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的外籍人墓区。从那时起,他又回到了中国——他念念不忘的“第二故乡”,永远地留在了自己终身敬仰的宋庆龄身旁。他为中罗友谊作出的不朽业绩也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作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管理处研究室文博馆员)

保卫中国同盟协助援华的德国医生

——汉斯·米勒

沈海平

1939年4月,汉斯·米勒从瑞士巴塞尔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到香港,找到宋庆龄,通过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奔赴延安国际和平医院。从此,米勒的一生就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与宋庆龄的友谊也就此开始。

当米勒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上以及解放战争中,以精湛的医术奋力救死扶伤时,他与宋庆龄以及她领导的机构(保卫中国同盟,后更名中国福利基金会)虽相距遥远,通讯艰难,但始终保持着联系,即使在繁忙的工作中,米勒仍以撰写战地报告的形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争取医疗物资,米勒的名字也不时出现在保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档案中。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当米勒一家定居北京之后,米勒与宋庆龄的交往越来越密切,米勒一家成为宋庆龄家的常客,米勒的女儿米蜜也与宋庆龄结为忘年之交。

一、向往革命

汉斯·米勒(Hans Müller, 1915—1994),出生于德国文化名城、著名诗人海涅的故乡——杜塞尔多夫。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则是日耳曼贵族之后。米勒是家中独子,193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兴登堡中学后,全家人怀着美好的希望准备让米勒进入大

学深造。可是,此时的德国政局混乱,阿道夫·希特勒攫取了最高权力,要求所有中学毕业后的青年,必须接受一年的劳动服役和军事训练,才可以升入大学或者分配正式工作。

米勒来到劳动服务队后不久,党卫军就准备将其中的犹太青年关进集中营。米勒属于半个犹太血统,如果继续待下去,只有被关进集中营。米勒设法逃离了德国,去瑞士巴塞尔大学学医。可是他的父亲却没这么幸运,他被关进了集中营,受尽折磨,直到纳粹灭亡后,才走出集中营。

在巴塞尔大学,米勒比较亲密的同学都比较激进,其中有一位是来自中国的共产党员江涛声。通过与他们的交往,米勒对法西斯的侵略本质,以及对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他开始关心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通过江涛声的介绍,他也知道了东方伟大的中国人民,率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

1938年秋,江涛声等进步同学被捕,米勒也接到瑞士警察局的通知,限他在半年之内离境。米勒不得不日夜兼程,在6个月之内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授予的医学博士学位,结束了大学生活。

米勒大学毕业后,既不能继续留在瑞士,更不能返回德国。正当此时,江涛声被瑞士当局无罪释放,两人见面后交流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江涛声表示要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动员米勒也到中国,一起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米勒慨然允诺。江还要在瑞士处理一些事务,他让米勒先行。他们相约到香港,与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取得联系后,再转赴中国内地。

二、到香港找宋庆龄

1939年4月10日,年仅24岁的米勒毅然卖掉了心爱的照相机,购买船票,带着从瑞士红十字会申请获得的一套医疗器械(米勒以后用它拯救了无数八路军战士的生命,但在1943年的一次突围中痛失,仅留下了一副听诊器),登上了驶向香港的“杜梅号”海轮。

抵达香港后,米勒急着去找宋庆龄的机构接头。保盟是一个国际救援机构,此时在

西摩道 21 号办公。最先接待米勒的是保盟中央委员爱泼斯坦。他告诉米勒,“工合”与国际和平医院是保盟重点支援的两个项目工作。国际和平医院项目现在刚刚起步,正需要努力加紧开展工作,医疗设备、医药物资和医务人员都是当前最迫切需要也是最受欢迎的,很希望米勒这类专业人士前来参加援助中国抗战的斗争。米勒急切地报名,要求为中国的抗日斗争出力。他提出尽快安排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联系,早日奔赴抗日战场。

于是,爱泼斯坦把米勒介绍给了廖承志。廖承志既是保盟中央委员,同时也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告诉米勒,准备安排他去延安,同时,还准备将募集到的医疗物资等一同运去。于是,米勒被安排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住了下来。

在保盟办公室,米勒遇到了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也是保盟中央委员,曾经去过延安。他向米勒介绍了很多有关延安的情况,并说,此次将由他带队前往延安,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位志愿者,其中包括米勒的老朋友江涛声及其德国妻子,他们将分别去各个国际和平医院工作。贝特兰告诉米勒,他这次还将到白求恩工作的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考察,深入了解那里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需要。

在保盟办公室,米勒还见到了保盟的另一位中央委员——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她兴奋而神秘地告诉大家,很快还会有一辆大型救护车从英国运来,届时会与已经募集到的一批医疗物资一起运往延安。

三、护送救护车去延安

1939 年 6 月,在贝特兰带领下,米勒一行出发了。他们从香港启程前往海防。然后,再经由越南过广西、贵州、四川等地进入西北。他们此行带着保盟在香港募集到的一批抗日根据地急需的医疗物资,包括送给国际和平医院的 23 辆卡车、15 000 加仑的汽油、600 多箱急需的医疗物资。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廖梦醒说的那辆大型救护车,那是由英国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捐赠的。

这辆大型救护车有一节火车车厢长,外形十分醒目:车身喷成暗绿色,车顶上喷了大白圆圈,中间是大红十字。车里面能放 9 副担架,有 6 个轻伤员的座位,还配备了冷热水洗手盆,可以实施手术与抢救。驾驶员的座位就像英国公共汽车一样高居于

发动机之上,庞大的车体最后面是流线型的车尾和双扇门、折叠梯,高于路面大约6英寸。

这辆定制的大型救护车虽然漂亮,但是实在不适合在陡峭蜿蜒、泥泞颠簸的路上长途跋涉。从香港经过海防开往南宁后,流线型的救护车尾部终于受损了,只得半路上找了一个修车铺把大型救护车的尾部割掉。以后一路遭遇暴雨、路障、塌方、空袭,以及发动机故障与爆胎,终于经贵州群山到达图云关。

途经镇南关时,遇到白崇禧部队中一批新加坡华侨新兵得了疟疾,经贵阳八路军办事处安排,米勒被请去治病。日军飞机每天来轰炸,白天不能在村里住,米勒每天带着这批病人躲往山上的树林,晚上再带着他们返回驻地。直到一周后,这批病人全部痊愈。在这一过程中,同行的贝特兰等人也都感染了疟疾,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他们一行人再次上路。

他们经过贵阳、遵义和桐梓著名的具有72个急转弯的“蛇路”,到达了重庆。半路上还出过事故,吓得司机不敢继续开车。米勒就自告奋勇,跳上驾驶座,勇敢地代替司机开了一段路。

在重庆稍事停顿后,他们一行继续往西北行进。最终到达西安,将全部护送的车辆与医疗物资交付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随后米勒与八路军一支运送物资的车队会合,一同前往目的地——延安。

四、见到毛泽东

米勒的目的地是延安,可是西安的国民党当局故意刁难他,拒不给他通行证。情急之下,米勒掏出了随身携带的盖有国民政府驻瑞士使馆签证的德国护照,厉声呵斥:“看看这是什么?你们政府同意我访问中国的任何地方,如果不同意我访问延安,我马上打电报去重庆,一切后果你们负!”西安当局的办事员不知底细,反倒被镇住了,只好在米勒的护照上盖了允许通行的公章。

经过4个月的漫长而艰险的路途之后,米勒终于在1939年10月到达了延安。

10月29日,由在八路军卫生部工作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陪同,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来到杨家岭一间宽敞的窑洞,他注意到桌子上、木箱上零乱地堆放着许多

书籍、杂志和文件。毛泽东气度非凡,精神饱满,伸出手来亲切地同他握手。毛泽东和蔼的态度一下子打消了他的拘谨。毛泽东与米勒很随意地攀谈着,他们谈到了德国的社会状况、米勒家乡的风俗民情、米勒来中国的所见所闻、德国的文学,以及贝多芬的音乐。米勒发现,毛泽东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富有幽默感,并不是一个难以接近的刻板的人。

他们两人还就当时的国际形势交换了看法。米勒表示,他坚信希特勒发动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必然以失败告终,世界人民的正义斗争虽然艰苦曲折,但还是一定会胜利!毛泽东表示赞同米勒的看法,建议他在延安各处看看,不要急于工作,作为刚从欧洲来到中国陕北的医生,对中国的一切,特别是生活习惯,将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卫生部门的领导征求了米勒的意见后,决定安排他在延安拐岭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随着抗战的深入,华北战场战斗异常激烈,米勒坚决要求同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上前线工作。毛泽东在作了缜密安排后,同意了米勒的要求,派他到山西八路军总部去。

五、“当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大夫”

1939年12月12日,米勒一行在途中惊悉白求恩大夫已于上个月(1939年11月12日)去世。12月20日,米勒一行到达了八路军总部。次日,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总部会见米勒和印度援华医疗队成员。他问米勒,是否知道白求恩?米勒说:“知道。上个月12日,白求恩大夫在前线为伤员实行手术时,割破了手指,因为病菌感染而逝世的。”朱德怀着沉痛的心情讲述了白求恩大夫的事迹,特别提到了白求恩大夫深受八路军爱戴的情况。朱德深情地说,白求恩大夫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他在弥留之际,还不忘祝愿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我们要是不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不起白求恩和一切热情帮助我们的同志。朱德接着说,我们将在12月24日隆重举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你们是否参加?米勒说,当然参加!

于是米勒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三位大夫:爱德华、柯棣华和巴苏华一起参加了追悼大会。爱德华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讲了话,米勒也上台讲了话,他简单地表示:“白求恩从大洋彼岸的加拿大来到中国,他是为了反法西斯。他是我们医务工作者的榜样。我

从大西洋另一边的欧洲来到中国,也是为了反对法西斯。我将会像白求恩那样,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最后他用白求恩常用的西班牙式的举拳头敬礼作为结束,并向大家表示了决心:“一定要沿着白求恩的道路,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当一个白求恩式的好大夫。”

米勒在八路军总部的日子里,依靠自己精湛的医术和忘我奉献的精神,很快远近闻名。他在医院除了为伤病员治疗外,还为周围的老百姓治病,甚至远近的妇女生孩子,也请他接生。无论刮风下雨,或是三更半夜,米勒对群众有求必应,与百姓亲如家人。当地老百姓觉得叫德国大夫不顺口,还是习惯地用当地方言叫他外国菩萨“米拉”(山西武乡的农民把“勒”字读作“拉”音)。

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和作战需要,米勒组建了一支医疗技术较强的手术队,在太行山区各根据地巡回医疗。他率领手术队与敌人“玩捉迷藏”,穿梭奔波于日军扫荡部队之间,活跃在广阔的太行山区。在“百团大战”的战役中,在他和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曾一次将 200 多名伤病员全部胜利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米勒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一切为了伤病员,在救死扶伤的同时,尽量保全战士的肢体。当时,战事紧张,医药紧缺,一般对难治而没有生命危险的伤员往往采取截肢手术,这样伤口愈合快,操作也容易。可是米勒没有这样做。面对肢体里有弹片的伤员,他总是反复考虑治疗方案,尽量保全战士的肢体,做到既能取出肢体里的弹片和碎骨,又不加大关节的损伤。为了取出战士体内的弹片和碎骨,宁可自己耗时费力,甚至做整整一天的细致手术。米勒因为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身体状况很差,在做这类手术过程中,多次累到几乎休克。但是他咬牙坚持,目的就是在挽救伤员生命的同时,尽量保住他们的肢体,让他们重返战斗岗位。

六、写给宋庆龄的战地报告

米勒在繁忙的工作中,坚持撰写战地工作报告,再由保盟驻延安代表马海德寄往香港,向保盟报告保盟所支援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医疗事业的情况。下面就是米勒所写报告中的一份,刊登在保盟的对外宣传刊物《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 22 期(1940 年 11 月 1 日)上。

战地报告之一：山西的医疗情况

平民医院

总部附近有三个医院，一幢房子是供伤残者和病员住的。大部分病员都是老百姓，只有少数士兵。一个是有 100 张床位的内科医院，另一个是有 80 张床位的外科医院，附属卫生学校（有 170 名学员）的第三个医院是最近建在此地的。

第三个医院有三方面的目的：向学生提供教学示范病例；为前两个医院不能确诊的病人进行诊断；实施手术，处理较复杂的病例。我是第三个医院的院长。

我们作出上述安排，原因在于医生们甚至没有做小手术的足够的训练；另外，有时在诊断中会遇到困难。我在这个医院里除了治疗、诊断、动手术等工作外，还给学生讲课、做示范，访问其他两个医院，帮助那里的医务人员为教学医院挑选比较疑难的病例。

伤兵们

特别在治疗伤兵时，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通常在几个月后才能接收下这些伤兵，他们的骨头往往有极其严重的感染，只有进行彻底的手术才能治愈。即使是很成功的手术，常常也只是免于截肢，但是因运送期间肌肉萎缩、骨伤处硬化导致的畸形和肢体变短，却已无法矫正。正因为运输问题，使得我们不能较早地接收病人，我们也就不能使许多人免于成为生活中的残废者。

但是，在这个地区里战斗扩展得相当广，并进入一些与别处隔绝的地方。运送的困难非常大，数不胜数。在我们拥挤的医院里，既缺乏必要的设备，也没有经过培训的动手术的大夫。所以，目前的基本条件尚无改变的希望。

缺少设备

缺少设备和药品仍然是我们的主要难题之一。我曾用非常不合适的器械

进行一次妇科手术。我们没有眼、鼻、耳、喉外科的设备;没有任何特种外科设备、显微镜、X光机、实验化学药物。这里的本地居民中梅毒流行,由于缺少洒尔佛散,我们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由于经费不足,也不可能向病人提供合适的饮食。我们无法建立任何大的医院——这需要很多钱——因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疏散。

尽管在工作上和生活中有许多困难,我仍感到这是多年来最幸福的。知道能为帮助这些勇敢的士兵和人民进行有益、必需的工作,这是一种巨大的满足。我们的生活非常简朴,但我没有任何怨言。我不愿意调换到任何别的地方去。

当年带队与米勒同行的贝特兰是《保盟通讯》的编辑,他在编辑米勒这篇报告时,特意加了编者按:

这封信是一位年轻的外国志愿人员写的。他是山西第十八集团军总部(最近华北游击战役的总部)的医生。他是一位德国的反法西斯战士,于一年前来到中国,以战地医务人员的身份来帮助中国军队。

七、突破封锁回延安

1943年元月,米勒不幸患上重症痢疾,导致昏迷不醒,延安紧急发来电报要求尽快护送他回延安。同志们用担架抬着米勒上路,同行的还有美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

回延安必须经过日军封锁线,得等待机会。一直到3月,他们终于等来了突破封锁回延安的机会。行动前,在山西交城县八路军晋绥八分区,米勒不顾自己身体虚弱,骑马上山,为山上一位身负重伤、生命垂危的张营长做了手术。这是一次令米勒难以忘怀的手术,因为这是他最后一次使用他心爱的手术器械。在随后不久的突破封锁线行动中,米勒痛失从瑞士带来的这套手术器械。

回到延安后,经过短期休息,米勒体力迅速得以恢复。他重新回到已迁往刘万家沟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任医院内科主任,直到抗战胜利。

八、新中国乙肝疫苗之父

抗战胜利后,米勒又参加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以忘我的精神与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伤病员,被誉为来自德国的白求恩。同时,他与来自日本的“女八路”中村京子,在并肩救死扶伤的战场上,相知相爱,喜结良缘。

新中国成立后,米勒加入了中国国籍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为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及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特别是为中国乙肝病研究与乙肝疫苗的研制及应用立下了功勋。

1973年10月,米勒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出席东京国际肝病研讨会。在会上,米勒报告了中国利用新的乙肝检测方法所取得的成果,提供了纯化的表面抗原、抗体及敏感血球。经鉴定,试剂完全符合国际标准。米勒的报告得到与会者的重视和一致好评。

乙肝试剂研制成功后,米勒并不满足,因为肝炎的预防问题尚未解决。米勒又向科研组提出更高要求。一定要研制出中国的乙肝疫苗,一定要实现预防接种。

科研小组经过几百次反复试验,1975年7月1日,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之际,终于制成了我国首批乙肝疫苗。大家说,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成果。所以,也要给这个成果起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于是,大家为这个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这天诞生的中国人自己研制的乙肝疫苗起名“7571”,作为大家向伟大的党的生日奉献的一份最有意义的厚礼。

中国终于成功地制成了乙型肝炎疫苗,跨进了肝病研究的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第一个肝病研究所也成立了,米勒担任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为普及疫苗接种不懈呼吁。米勒因此而被称作新中国的“乙肝疫苗之父”。

1989年,是米勒来华工作的第50周年。中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与表彰会,授予他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称号,他被誉为“活着的白求恩”。

1992年,为了宣传和弘扬米勒长期支持和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事迹和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国家博物馆和河北博物馆分别为他举办了“杰出的国际主义白衣战士——汉斯·米勒展”。米勒亲身感受到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他这位来自莱茵河畔的白求恩的认可。

九、宋庆龄家的常客

1961年,米勒一家从东北调到北京定居,距宋庆龄的寓所不远。宋庆龄热情地邀请米勒夫妇到家中做客,并仔细询问了米勒的家庭情况,叮嘱今后要带着孩子一起来做客。从此,米勒一家便成了宋庆龄家的常客。每当宋庆龄家里周末放电影,她一定会邀请米勒全家去看。宋庆龄在家接待外国专家或者邀请来自国外的老朋友时,也一定会邀请米勒夫妇陪同。

宋庆龄见了米勒的女儿米蜜之后,很喜欢她,嘱咐米蜜有空来玩。几乎每到周六,米蜜与弟弟米德华一从学校回到家就赶紧洗澡换衣服,因为,宋庆龄早已写条子过来了,让他俩先去吃晚饭,然后看电影。他俩曾经在宋庆龄寓所的院子里照了不少相片。

1976年,米蜜结婚了,正在上海的宋庆龄立即赠送了一份礼物,还附上一封信,祝贺米蜜新婚。婚后,米蜜随瑞士丈夫到国外定居。米蜜以为她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系就此中断了。没想到她竟在瑞士意外地收到了宋庆龄的来信。从此,她们又开始了通信。《中国建设》是宋庆龄钟爱的对外刊物。米蜜到瑞士后,一直收到宋庆龄亲自寄出的《中国建设》杂志,每期不落。

1978年米蜜回国探亲,专程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很高兴,主动提出为米蜜举办一个派对,依照米蜜开出的名单邀请客人。在派对开始前,宋庆龄还与米蜜和她的丈夫一起合影。米蜜高兴极了,也感动极了,她一直把照片还有底片都当成宝贝珍藏着。之后,宋庆龄特意送了一件缎子面的儿童斗篷和2双刺绣的虎头小鞋给米蜜——尽管那时米蜜还没有孩子。

1981年4月7日,米蜜的女儿顺利降生。米蜜第一时间就向宋庆龄报喜,并给她寄去了女儿优利亚的出生通知卡。

可那时宋庆龄已经重病。得知宋庆龄逝世的消息时,米勒夫妇正在瑞士照顾米蜜,没能赶上出席国内的追悼活动,他们参加了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举行的悼念宋庆龄仪式。那一刻,他们都特别伤心,感觉失去了一位十分亲近的家人。

1994年12月4日,米勒在北京逝世。自从1939年通过宋庆龄的安排奔赴延安,投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开始,米勒始终与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对此,他说过,“为此

我感到幸福和欣慰”。正如邓颖超给予他的高度评价,米勒“不愧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一名国际主义战士,是一名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

(作者为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

口述纪实



保卫中国同盟与延安国际和平医院

金星

我的父亲金茂岳出生在一个回民家庭,是一个世袭的伊斯兰教徒。在济南齐鲁医学院学习期间获学士学位,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又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抗战爆发,为了不做亡国奴,他辞去齐鲁医院的工作参加了红十字会医疗队。1938年1月13日,他带着《圣经》跟随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来到延安。当天晚上,十八集团军卫生部在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大会,身着八路军军装的马海德站起来唱了一首陕北民歌“陕北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汤”,大家热烈拍手欢迎,并且告诉我父亲,“他是一个美国人,来延安参加抗战”。这让我父亲非常感动,他想:马海德是一个美国医生,都能来到中国参加抗战,而我是一个中国医生,更应该在这里好好地为伤员和群众服务。我父亲留在了延安。在边区医院工作时又邂逅白求恩大夫,得到受用一生的教诲。1942年3月28日,他改变信仰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6年底撤离延安时,我还是一个“马背摇篮”里的小娃娃,对延安没有太多的记忆。当我退休后,为了探寻父亲的内心世界,从2006年开始,我一次又一次回到延安,跟着父亲的足迹,走进一个个革命旧址。2020年7月,新冠病毒疫情得到控制后,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一行就到西安、延安进行“宋庆龄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主题的实地考察,让我非常感动。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关注的话题——保卫中国同盟与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

一、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保卫中国同盟

1937年1月13日,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从保安迁到延安,党中央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抗日战争由于缺少武器弹药而惨烈悲壮——生活物资的匮乏,各种疾病的困扰……全面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们纷纷自发捐款捐物,而在内地港口遭到日军封锁的情况下,香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枢纽。经过慎重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设立一个八路军办事处,既能顺利接收海外华侨捐赠的物资,又能借助香港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毛主席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1937年10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把廖承志请到了他居住的窑洞,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要求廖承志以独特的便利条件,到香港开设香港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

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国民党左派领袖;母亲何香凝是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也是国民党元老,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威望。1924年8月,仅有16岁的廖承志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早年他先去日本人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学习,后又到德国汉堡、莫斯科中山大学、荷兰鹿特丹学习和工作,通晓5国语言,学识渊博,且建立了诸多的社会关系。廖承志出身国民党元老之名门,却在革命低潮时投奔了中国共产党。他于192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反日大同盟上海分会工作,编辑“反日新闻”。1933年9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2月因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被关押并开除党籍,他是在被押解中参加长征的特殊人员。1936年冬,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他经周恩来同志解救获释,恢复党籍。历经磨难的廖承志无疑已经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毛泽东亲自找廖承志谈话,对他说: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我们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周恩来同志知人善任,选择了你,我也举手同意,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在国民党那边有不少朋友,你要充分团结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你到了南京,跟叶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时间,熟悉“行情”后再去香港开个分号。

廖承志深感责任重大,马上离开延安经西安乘坐火车到达南京,在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下的十八集团军工作,熟悉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1938年初廖承志到达香港,马

上与潘汉年、吴有恒、连贯、张唯一、李少石、廖梦醒等人召开秘密会议,商定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事宜。不久之后,在香港岛北岸闹市区,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和廖承志终于看中了位于皇后大道中18号的一处房子,临街、两层高、楼房有后门,楼下有商铺,决定在这里开一家茶叶商行作为掩护,而商号后楼就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周恩来特地在香港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因日军的大举侵华也极大地损害了英国在华的利益,在香港开设八路军办事处得到了当时港英政府的默许,不公开挂牌,请港督给予关照。经过努力,于1938年1月,成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的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

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确立的香港为“国际宣传及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伊始,就以香港为阵地,重点开展了对国民党民主人士、在港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的统战工作,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积极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保卫中国同盟联合抗日。在孙中山先生怀抱里长大的廖承志辅佐孙夫人应该是天经地义之事。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大力支持和协助下,由具有独特政治地位和享有崇高声望的宋庆龄发起筹建保卫中国同盟,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英勇作战,得到国内外富有正义感人士的赞扬,充分地赢得海外广大华侨的尊敬。爱国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力量,遍布全球各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地,华侨们纷纷捐赠物资钱款,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一批批汇至香港。仅在1938年4月份,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就收到了由香港同胞捐献的价值8000多元的药物。相比之下,当时,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的军费是每人每月1.3元,这笔钱相当于新四军建立初期由国民党当局拨给新四军全军的军费。为抗日救国,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挥了巨大作用。保盟的主要任务是“成为需要者和资金、物资捐赠者之间的桥梁”。保盟成立后,积极从事国际范围内筹募款项,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关注中国抗日根据地的医疗服务的工作、同西北边区的工业合作社合作难民救济工作、边区儿童保育工作以及

国际医疗服务队等。廖承志在香港的重要工作就是协助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积极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

保卫中国同盟架起了世界支援中国抗战的桥梁,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是保卫中国同盟的坚强后盾和忠实助手,保卫中国同盟在抗战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成功地参与了挽救中国革命的运动。

二、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

保卫中国同盟建立后,1938年9月,宋庆龄与国际反侵略大会特使、英国援华委员会代表何登夫人商议,决定在新开辟的八路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山西五台山建立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由加拿大外科医生白求恩出任院长。随后,保盟以支援建立国际和平医院的形式,全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医疗服务工作,延安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

(一) 八路军军医院冠名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设有军委后方卫生部,黄克诚任部长,姬鹏飞任副部长。1936年春,军委卫生部驻瓦窑堡(今陕西省子长市)南门外一村庄,姬鹏飞任部长,吕振球任政委,饶正锡任医务主任。1937年1月,军委卫生部随党中央进驻延安,在延安城东40里的拐峁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个干部休养连,归军委卫生部领导,改为拐峁直属卫生医疗所,由浦荣欣、徐根竹任正副所长,杜国兴任政治指导员。1939年中央军委成立总后勤部,下设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饶正锡任卫生部部长,马海德任顾问,戴正华任医务主任。1939年5月,中央军委卫生部决定拐峁直属卫生医疗所扩建成八路军军医院,成为军委卫生部领导的直属医院。1939年5月3日正式成立,举行了揭幕典礼。苏井观任院长,汪东兴任政委,靳来川、祁开仁任副院长。全院工作人员112人,医生9人,护士长1人,护士45人,全院可收容病人120人。中央对该院的要求是“成为八路军的模范医院,成为全解放区的模范军医院”。此后,不断有国际友人来院工作,如:印度援华医疗队,他们一行于1939年2月到达延安,毛主席亲切会见了他们。他们为了表达参加抗战的决心,分别在各自名字的后面加上一个“华”,分别是:爱德华(马登·莫汉拉尔·爱德)、卓克华(姆·尔·卓克)、柯棣华(德瓦卡纳特·桑塔拉

姆·柯棣尼斯)、巴苏华(比乔爱·库玛尔·巴苏)、木克华(德贝尔·木克)5位医生。朝鲜友人方禹镛,德国友人米勒先后来院协助工作,又有国内的医生如魏一斋、曲正、邵大达、刘允中先后来到医院工作。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把这所医院当成大后方医院,除了收治陕甘宁边区军委机关和各部队的伤病员外,也收治从山西、河北等前线部队送来的伤病员,一些领导同志到延安向军委汇报工作,也常常到医院检查身体、治疗疾病。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大夫为帮助中国抗战,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以身殉职。11月29日,《新中华报》刊登马海德《纪念诺尔曼·白求恩博士》一文,作为保卫中国同盟驻延安代表,他在文中写道:“……一天内替十个以至十五个(伤员)施行手术。一个月内他平均要替130个人施行手术。而在去年一年内经他手术的要超过一千人以上。他在四月到八月的四个月间的一个典型的工作记录:施行手术315人,走路1504里,建立了13个不同的医疗站和救护站,组织了两个手术站治疗队,为了医士和看护的深造主讲了两种课程。在这一期间,他个人还亲自领导一个手术治疗队在前方工作,离开火线从来不曾超过八里地。他的绝大部分的治疗工作是在这样靠近火线的地方执行的。他救治了许多内脏穿通了的伤员,有几个还是脑部受伤,在伤后三四个钟头之内施行手术的。有一次他在炮火之下施行手术,炮弹就直落在临时手术室的对面,在战斗结束后49个钟头之内,他一气割治了71个伤兵。……他写了三本关于战时救治的著作,他设计流动手术治疗队的组织,这样的治疗队要靠火线几里地之内,以腹部、胸部和脑部中伤能够在几个钟头之内施行手术,这样的设计,世界上他算是第一个人……”由于他的工作,晋察冀八路军的四等野战医院升格为一等野战医院。

1939年12月6日《新中华报》刊登新闻:《本市各界名人沉痛哀悼白求恩 吴玉章 王稼祥 陈云等同志 勸勉大家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报道了12月1日延安举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会情况,追悼大会主席台上悬挂毛泽东同志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

1939年12月13日《新中华报》刊登《八路军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为告慰此辈国际友人之伟大精神》一文,文中记道:特将本军军医院改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资纪念。八路军军医处 12月1日

经军委卫生部呈报中央军委,八路军军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成为了延

安第一所国际和平医院。1940年春,由于八路军发展壮大,军委卫生部决定医院迁往柳树店,重建新址,扩大医院,10月13日午后4时举行新址落成典礼。此时,鲁之俊任院长,汪东兴任政委,祁开仁、马荔任副院长。原拐岭医院旧址设为和平医院分院。1943年春,医院再次扩建,由柳树店迁往刘万家沟,使医院成为当时具有正规化设备的一流医院。已是军委卫生部副部长的鲁之俊仍兼任院长,马荔、黄树则任副院长,刘新权任政委。这里为总院,下设两个分院,第一分院在晋察冀边区,第二分院在晋东南。又设三个分部:第一部在城北李家圪(即中央医院),第二部在城南白家坪(即边区医院),在城东的柳树店旧址(即医大复员)改为和平医院第三部。

此时可谓国际和平医院全盛时期,保盟主席宋庆龄女士从香港通过周恩来直接向医院捐赠过几批延安奇缺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儿童用品。宋庆龄女士接到过“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字样的纪念章,还为鲁之俊院长赠送了有她亲自签名的照片。美国医生马海德也调至和平医院外科工作。



延安柳树店旧址(吴印咸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大量干部外调,又从延安其他医院选拔医护人员补充缺额,11月,中央医院的刘允中调和平医院任副院长。1946年2月,中央医院的内科、传染科并入和平医院,一部分医护人员随调入和平医院。1946年10月更名为陕甘宁晋



刘万家沟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大门



刘万家沟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全景

绥联防军卫生部第二后方医院,为适应随军转战,取消科室,改为4个医疗所。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名称转交给中央医院。1949年,医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卫生部第二野战医院,进入兰州市,1950年7月改编为西北军区第一陆军医院。

(二) 红十字医疗队在第二后方医院(二兵站医院)

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到达延安后,被派往第二后方医院。医疗队员们回忆在甘谷驿二兵站医院工作时说:医疗队赶往位于延安以东80里的甘谷驿第二后方医院(后称二兵站医院)。甘谷驿是个大镇,有近百户人家,一条大道将镇子一分为二。医院在路北,利用了外国人建的一座较大的天主教堂。所用的窑洞、院墙都用石灰粉刷,灰砖铺地,显得整齐清洁、光亮、通风都比较好。院内有一口砖砌的水井和一座礼堂。我们医疗队的手术室、办公室、药房、消毒室和宿舍、厨房、后来还有X光室都安排在这里。后面的山坡上有医院的仓库、药库以及院部直辖的病区。病房是借用居民的空窑洞。医院的警卫排、饲养班、炊事班和宿舍在路南。

当时医院的规模并不大,都是在黄土高原上挖出来的土窑洞,民工们都是抬着担架把伤病员送到医院来。但是,每个医院都有下属的所、站,地域辽阔。医院年轻的院长李资平、政委方国南和医务主任单克向医疗队员们介绍医院的基本情况。除院



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在甘谷驿二兵站医院,右一为金茂岳

部外,医院还管辖4个医疗所。一所在甘谷驿东边傍延水的杨家沟,距院部10余里;二所在延川县禹居镇,距院部上百里;三所在延长县交口镇一带,也有近百里路;四所在院部西北约二三十里处。医院之大、驻地之分散,是大家没有想到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山区农村人口稀少,而伤病员较多,若将伤员集中则住房和粮草均有困难。分散救治还可以尽量接近前线,就近收容伤员,一旦形势紧张,也便于农民分散掩护伤员。

1938年春,手术组刚到延长县不久,卫生部姜齐贤部长骑马匆匆赶来,请侯道之队长火速同他到黄河边的马渡关执行紧急任务。次日,他们带来一名伤员——受伤回到交口镇的115师师长林彪。护士朱朝成备好检查器械和药物,随同侯队长一起来到林师长的驻地。只见林彪中等身材,30岁左右,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他自述咯血、伤痛、睡不好觉。经检查,见他胸前、背后各有一个伤口,背部伤口在第七胸椎右旁,为子弹的进口。子弹穿过右胸肺部从右下腋下穿出,出口处伤口比背部大,而且边缘不整齐。两个伤口尚清洁,仅边缘红润并有少许渗血。侯队长探查伤口并叩听右肺部,未发现血胸、气胸的情况。侯队长经过无菌清创,并用钳子取出衣服碎片后,用消毒敷料遮盖伤口,并用橡胶布固定包扎,同时给予止血药及镇静药口服。因为处理及时,伤口没有明显感染,经过两三天换药和口服止血药,咯血停止了,伤口也渐渐好转。上级决定用担架将林彪送到卫生部医院休养,两周后,林彪的伤口就痊愈了。

医疗队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八路军各级指战员和山西新军伤病员,其中也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其中有的伤员曾经在延安经白求恩大夫手术过,因为白大夫去了五台山,这些未愈的伤员也转给了医疗队。

后方医院有一些伤病员是红军时期负伤的同志,体内有子弹、弹片等异物,伤口久治不愈,机能不能回复。为了尽早解决他们的痛苦,医疗队电告西安的第一大队部,要求支援一台X光机。1939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疗大队部即派技术员于保良携带军用X光机和小型发电机各一台来23医疗队工作,加强医疗工作,从此,边区有了第一台X光机。透视机每周开机三次,对外科伤员深部伤处的子弹、弹片进行透视,准确定位后手术减少伤员痛苦。手术600余次,取出子弹和弹片100多枚,治病400多人次。

1939年的夏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从马上摔下来,伤至右臂不能活动。卫生部急电第23医疗队,侯道之队长接电后全队顿感震惊、焦急,不知伤势如何。按照侯队长的吩咐,技术员于保良将X光机及配用发电机装箱上驮,兼程赶往延安。侯队长和爱德华大夫共同为周副主席作了X光透视检查,发现右肘关节的尺骨鹰嘴骨折。鉴于当时延安的条件,未做手术固定,采用了夹板包扎固定。随后向中央医院有关同志交代了医护注意事项。不久,周副主席乘飞机飞往莫斯科进行手术治疗。



周恩来赴莫斯科治疗前与刘少奇合影

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在第二后方医院800多天的手术治疗中,医好了40295人,检查伤员1590人,实施手术635人,其中有伤员做了二次手术,手术病人无死亡病例。经医疗队救治的伤病员,除少数留有残疾外,绝大多数痊愈康复重返前线。医疗队的工作得到医院和伤病员的普遍赞誉。在医疗队留下来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有一面锦旗,锦旗的题词是“中国红十字会二十三医疗队全体职员留念 仁术救国 朱德赠”。朱德总

司令亲笔手书的这面锦旗记录了中国红十字会第23医疗队在延安的感人的光荣岁月,是金茂岳和每一个医疗队员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

1940年4月26日《新中华报》的《边区新闻》专栏上特刊《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十三医疗队离延 军需处特设宴欢送 并于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的报道,周恩来同志亲致欢送词,高度赞扬第23医疗队在边区工作的成绩。“该队名医金茂岳和三名队友一直留在延安,参加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

(三) 白求恩大夫在边区医院

陕甘宁边区医院是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开办较早、规模较大的一所比较正规的医院,它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在延安历时13年之久。边区医院是比较早就接受外援帮助的医院,中国红十字会北方大队大队长万福恩曾在该院视察过。国际友人白求恩到延安后,参观医院后便要求工作,他不但查房,还为重伤员手术。

1936年在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组成中央政府机关卫生所,傅连璋担任所长,黄祖炎任政治指导员,由马海德、周毅胜、张天兰、陈真仁、李长壁、李素珍、史群英、周琪玉等人组成。1937年1月13日,卫生所跟随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卫生所驻在延安城小东门内,该所当时主要任务是担负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同时亦为后方机关及市民服务。后经边区政府同意,卫生所迁到大东门内,在城内浸信会基督教堂设立了门诊部和病房。门诊病人增加,要求住门诊部治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卫生所肩负着巨大的医疗任务。中共中央决定筹建苏维埃医院,并委派中央机关卫生所负责人傅连璋负责在宝塔山开辟新址建院。在宝塔山东南向阳的山坡上,先后共挖窑洞36孔,设病床约100张,为住院部。1937年7月初,边区医院正式落成,是延安当时设备较齐全,较正规的医院。为方便群众治病,在城内教堂里又设立了医院门诊部。边区医院开办后,一度直属边区政府主席团,后因医院的工作性质关系,改属边区民政厅主管。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0月,该院名称为“陕甘宁边区医院”,10月9日边区政府任命傅连璋任边区医院院长,黄祖炎、夏耘任副院长,王群任政治委员,薛峰任政治指导员。院内最高行政机关是院部,下分管理与医务两科。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一大批爱国志士仁人纷纷来到延安进入边区医院,如徐福静、金茂岳、蔓焰、朱仲丽、李志中、黄开

云、孙毅富、傅一诚等。



位于宝塔山上的边区医院

我父亲金茂岳随红十字会第 23 医疗队到达延安后,第二天分配工作,边区医院院长傅连璋说,边区医院要保证边区政府人员和党中央干部,以及边区 150 万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希望能把两个医疗队的专科技术人员留在边区医院工作。傅连璋同志又说:“听说 23 医疗队有个金大夫,是搞妇产科的,把他留下吧。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病还是很多的,希望他能留在我这个医院。”就这样,父亲留在了边区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同时留下的还有内科大夫谢景奎,护士长朱芹,第 33 医疗队的外科医生陈学礼和眼科的罗大夫,都暂借在边区医院协助工作。在边区医院工作的日子里,父亲金茂岳有幸见到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与他同台手术,受到享用一辈子的教诲。

1938 年 3 月 31 日,白求恩的医疗队到达延安。有一天,十八集团军卫生顾问马海德同志带着白求恩大夫到边区医院参观,白求恩大夫说:“这个地方好得很!比马德里好,这里的窑洞不怕敌机轰炸。”他对医院很满意。大家听了很高兴,按我们的习惯大家称呼他白大夫。

在边区医院,父亲邀请白大夫作了一例扁桃腺摘除手术后对白大夫说:“白大夫,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

他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

他又指着头和手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指头）去想一想，去解决问题嘛！有了这个（指手），还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

父亲说：“白求恩大夫说得那么轻松，但话里却给了我深刻的启示。一是遇事要用头脑去想一想，想解决问题，办法也就有了。二是要发挥手的作用，要用手去解决问题，这是很好的器械，而且还能掌握器械。我听了白求恩大夫的话，连说对对对。”但是我父亲又说：“我就不敢，我平时做手术光想着学校里手术室里有什么器械和设备，这个手术老师是怎么教我的。”

白大夫告诉我父亲：“就是这个框框把你框住了，要打掉它，要根据条件解决问题。”

白大夫说：“我当外科大夫，不是光会开刀，还是一个‘五匠’，会理发、会做木匠活、会缝纫，还是个泥瓦匠，这些都要会，才是一个好大夫。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你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白求恩同志的这些话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思想对我父亲也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我父亲感到，在当时困难的环境中，不能只依靠已有的条件，而应该开动脑筋，多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受了白求恩同志的启发，我父亲的工作大胆了，他按着白求恩的办法学会了做扁桃腺摘除术，不但给不少病人实施了手术，还设计了摘除扁桃腺的小勺，在新市场铁匠铺打制而成。

过了几天，白大夫又来到了边区医院。他见了我父亲就说：“金大夫，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父亲听了之后并没有理解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马海德同志带着白求恩同志刚刚参观了延安东边的一个八路军的军医院。他看到，战场在前方，战士们在战场上受了伤，要把他们从前方运到后方进行治疗。当时，运送伤员既没有飞机、火车，也没有汽车、马车等交通工具，全凭4个人用一副担架把伤员抬着，经过一个一个的兵站转运，要走那么远的崎岖山路，有时要历经一个月才能送回到后方医院，拖延了抢救伤员的时间，也延误了伤势的治疗，伤员们一路经受太多伤痛的折磨，有人失去生命，有人落下终身残疾无法返回战场。所以，白求恩同志的意思就是主张战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应该到战场上去，在最短的时间里救护和医治伤员，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不能坐等伤员来找医生。基于这种思想，后来白求恩大夫坚决要求上前线。卫生

部的领导给他做工作,希望他留在延安帮助我们培养人才。暴脾气的白大夫大怒,把椅子丢出窗外,坚持要到前方去救治伤病员。他说:“我不是为享受生活而来到这里,什么热咖啡、嫩牛肉、绵软的钢丝床,这些东西我早就有了,但为了理想,我都抛弃了。需要特别照顾的是伤员,而不是我。”他希望我父亲和他一起去前方,但组织对他说:金主任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他不是我们八路军的军事人员,他不能和你去前方,我们给你派别的人一起去。

白大夫在延安大约 40 天,临行前,他为边区医院傅连璋院长做了痔疮手术。

我父亲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白大夫。”

白求恩大夫病逝在中国,年仅 49 岁。我父亲把白求恩当成一生中最崇敬的朋友,白求恩大夫去世的消息传到延安,他非常痛心。和白求恩大夫短暂的接触,却留给他一生的念想、学习不完的精神。父亲晚年不止一次地说: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白求恩》最能表达我对白大夫的崇敬,我一生随时都能背诵《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

白求恩的精神影响了包括金茂岳大夫在内的那一代的医务人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位于安塞县黄瓜塌的陕甘宁边区医院旧址全景



安塞县黄瓜塌陕甘宁边区医院旧址

红十字会第29医疗队队长江兆菊大夫曾于1938年2月19日写过“延安后方医院报告”，刊登在《保卫中国同盟年报(1938—1939)》上，她所在的就是边区医院。1938年10月份，延安遭受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坐落在宝塔山上的边区医院迁往东二十里铺后转移至安塞黄瓜塌，4月28日在黄瓜塌重新建院，得到红十字会医疗队的帮助。队长江兆菊女士外科技术水平高，另有内科、妇产科、儿科8位大夫都有较高的技术。1938年11月，第29医疗队离开延安回西安，红十字会第35医疗队又来到边区医院工作，队长是薛培基，留在边区医院工作的金茂岳成为第35队的副队长。1939年夏，医院迁址安塞。先是金茂岳大夫奉调去新建的中央医院筹建妇产科。不久，第35队也调回西安。

1942年8月，边区医院随边区政府回到延安，驻白家坪，再次扩建后承担了巨大的医疗任务。1946年春，边区医院从白家坪迁到桥儿沟，成为西北医专的教学医院，是延安党政机关和老百姓治疗疾病的重要医疗单位。

194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边区医院改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七后方医院，由魏明中任院长。7月，第七后方医院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野战医院。

（四）延安中央医院在保盟捐助中发展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卫生工作均由中央军委卫生部统管。1938年党中央委派傅连璋同志筹备成立中央卫生处,负责中央机关保健卫生工作。傅连璋任处长,下设3个科:李志中任医政科长,鲍敬桓任保健科长,黄开云、李维桢先后任药材科长。中央卫生处下设中央直属门诊部,黄开云任主任。1945年10月,中央卫生处合并于中央军委总卫生处。

1939年5月,中央卫生处开始筹建中央医院,拨款5000元,委任肺科医学专家何穆,又从中央卫生处抽调共产党员郁彬护士一起觅址,在延安城北李家圪村的山坡上选定院址筹建医院,中央医院白手起家,没有前身。



延安中央医院旧址全景

1939年11月7日,中央医院举行开幕典礼。中央卫生处傅连璋处长兼任首任院长,石昌杰任副院长,魏一斋任医务主任。开始医院只有30—40张床,医务工作人员26人,设内科、外科、妇产科,药房、手术室和护士部。魏一斋兼任外科主任,金茂岳为妇产科主任,邵达为内科大夫,刘允中为外科大夫,马明忠为药房主任,郁彬为总护士长,龙静先为护士长。到年底,已经收治病人164人,接生婴儿59人。

中央医院不断扩建,两年多的时间建起 102 口窑洞,90 间平房,花费 30 万元。有病床 180 张,设有内科、肺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传染科,化验室、药房、手术室、婴儿室、流质房、X 光室一应俱全。1943 年又增加了干部疗养科、换药室、病历保管室,床位增加到 250 张,八九层高大的山楼错落有致,蔚为壮观。1944 年底,新建的综合手术室完工,使手术条件明显改善。毛主席亲书“治病救人”四个大字,镶刻在手术室的大门上。医院有了长足的发展,建院 3 周年时,毛主席又为中央医院题写“大有成绩”的条幅,张贴在礼堂外面的布告栏里,非常精辟地总结了中央医院的建设和发展,中央医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39 年 11 月 7 日中央医院正式成立,院名由毛主席亲笔题写

到 1945 年,中央医院已经有 210 张病床,医务工作人员达到 172 人。先后举办 8 期护士训练班(人数达 240 人)、两期医生训练班,和 3 期高级卫生干部进修班(接受来院进修、实习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医务骨干 115 人),为边区政府培养了百余名地方卫生干部,其中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卫生部长多人,对提高我军医疗水平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医院成为当时科学化、正规化的最高医疗机构。解放后,原中央医院的干部分散在全国各地担任医疗卫生工作战线的骨干,为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继续作出巨大贡献。

从1939年9月建立到1946年6月,中央医院一共收治病入13 876人次,共接生婴儿3 814人,小儿科收治病入1 704人次。治愈率达96%—99%。

在中央医院建院初期,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医疗器械和药品奇缺,没有便盆、没有秒表,一个科室也就只有一两支体温表,没有高压消毒锅,没有消炎药,没有输液的设备,甚至连住院病人用的便盆都没有,办院遇到极大困难。中央医院的同志们因地制宜,想办法克服困难,也曾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华中万国红十字会理事长马克斯维尔、汉口美国教会苏霭女士和希金先生、史沫特莱女士等机构和人士的帮助,捐赠了可供100名病人半年之用的药品及器械,现款20 600元。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后,自1938年至1945年间,设法建立了一些运输路线,采取有效的巧妙办法,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把筹集的药品、器械、麻醉药、抗生素、毛毯、奶粉等必需物资多次运到延安。宋庆龄在重庆会见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和美空军中尉陈平时,就请美国军用飞机往延安和解放区运送药品和救济物资。1944年10月,经宋庆龄斡旋,得到史迪威将军帮助,突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将1台200毫安X光机和配套的发电机于1944年末运抵延安,1945年初安装完毕开始使用,替换了中央医院的旧设备,大大提高了医院的诊断能力。



余秋成、张羽、刘承雷和200毫安X光机(西安儿童医院提供)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医院参观,对医院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深表赞许。7月22日,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8月,上校组长包瑞德、少校军医卡斯伯格等前来医院参观,受到刘瑞森副院长、刘允中主任的接待,他们说:这是一座很好的

医院。

中央医院一直得到各方援助。在宋庆龄的促成下,1946年12月,国际救济团体友谊服务会第19医疗队7名队员自郑州飞抵延安,随机携带由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向国内外友人募集而来的两飞机共3.5吨医药物资支援中国解放战争。外援不但带来药品和器械,更是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护理技术,使中央医院得到长足进步。

三、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是接受捐助的组织形式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丢失的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全国抗日模范根据地。中共中央在陕北的13年,也是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边区的医疗机构分为三个系统:中共中央系统属中央卫生处,有中央医院、中央门诊部、学生疗养院;中央军委系统属军委总卫生部,有原第一后方医院改编的二兵站医院,第三、四后方医院,八路军军医院,八路军门诊部,八路军制药厂,抗大卫生处及一、二两院,中国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延安药科学学校,八路军留守兵团卫生处及野战医院等;边区系统属边区政府卫生处(后改为卫生署),有边区医院、边区门诊部、结核病疗养院、边区医专、干部疗养所、卫生材料厂、荣军疗养院、保健药社、卫生合作社、国医研究会等。

大约在1943年,周恩来副主席指示,为了统一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国内外救济机关的联系,以便争取外援,应将解放区医院都改称“国际和平医院”。中央医院和边区医院相继对外改称“国际和平医院”,这是为了适应对外联络的需要。中央医院成立后,在山下的路口建造了一座石头门,右侧的立柱上刻着“中央医院”,左侧的立柱上刻着“延安学生疗养院”。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来访,左侧的立柱上挂上了“国际和平医院”的木牌。事隔不久,又在木头牌子下面接了一块木板,改成“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1944年《解放日报》报道中央医院的称谓也是“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1945年又把木牌下面的字“总院第一部”刮掉,改成为“国际和平医院总院”,1946年的报道也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有幸的是,中央医院大门的这几次变动都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虽然名字改为国际和平医院,但实际上彼此并无隶属关系。在1945年10月军委

卫生部和中央卫生处合并前,中央医院一直属党中央卫生处领导,而和平医院属军委卫生部领导,边区医院属政府系统。在军委卫生部和中央卫生处合并成立军委总卫生部后,中央医院与和平医院都受总卫生部领导,彼此仍无隶属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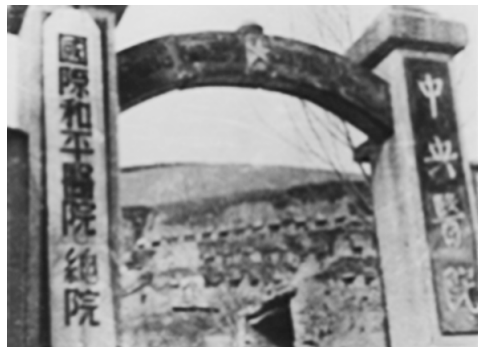
1946年8月,延安受到蒋介石反动派飞机轰炸,9月25日,边区政府发出统一边区各医院名称的通知,将原延安中央医院编为陕甘宁边区第一国际和平医院,又称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原延安和平医院编为陕甘宁边区和平医院第一分院,原边区医院编为第二分院,原柳树店医院编为第三分院,原陇东分区医院编为第四分院,原关中分区医院编为第五分院,原三边分区医院编为第六分院,原绥德分区医院编为第七分院,开始了新的征程。



中央医院原大门



1944年中央医院大门



1945年中央医院大门

在延安期间,“国际和平医院”只是一个统称,包括中央医院、边区医院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及分院。但是,我发现后人在撰写纪念文章时,经常把中央医院和八路军军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甚至边区医院的故事混淆。例如,美军观察组少校军医卡斯伯格访问国际和平医院后曾写过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收入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史中,可是从描述上分析,“山腰上的一层层窑洞排成四层,住有化验室、药房和六个分科病房(即外科、内科、传染科、妇产科、小儿科和门诊)。手术室是在病房下面的石头窑洞里”。这里说的应该是中央医院,因为只有中央医院建在山上,一排一排的窑洞错落有致。

尾声

1947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医院全部实行军事建制,调整卫生部机构,编制了7个医院,一个药厂。第一后方医院由原中央医院组成,李炳之任院长兼政委,袁开伦任副政委;第二后方医院由原和平医院组建,徐根竹任院长,刘允中任副院长,薛峰任政委;第三后方医院由西北医专组成,谢民心任院长,邬家馥任政委;第四后方医院由行知中学组成,卢勤良任院长,李义任政委;第五后方医院由原关中分区医院扩建而成,徐承俊任院长,刘芝禄任政委;第六后方医院由原三边分区医院扩建而成,姚铁岭任院长,权修身任政委;第七后方医院由边区医院组建,魏明中任院长,王子杨任政委。抗战时期的医药卫生工作具有鲜明的战争特点,关乎革命事业的胜败。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极为关注,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真正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人心,在延安聚集了许多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和国际友人;又得到保卫中国大同盟及世界和平人士的捐助;并且发扬了“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陕甘宁边区各个系统的医院的发展离不开保卫中国同盟的援助。

正如白求恩大夫所说:“在延安,就见到一个崭新的中国!”

(作者为北京世纪坛医院退休医生)

档案选编



耶鲁大学神学院藏范尼·波默罗伊·布朗档案中的宋庆龄书信(一)

宋时娟 译

【译者按】

耶鲁大学神学院中国档案项目各种人物档案中的案卷 8 第 30 盒,是范尼·波默罗伊·布朗档案(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 Record Group No.8, Brown, Fanny Pomeroy)。布朗档案共有 10 个文件夹,其中 7 个文件夹藏有宋庆龄的书信和少量照片。宋庆龄致布朗书信,自 1926 年至 1945 年,共 40 封,为手写或打印,部分有信封,其中 16 封书信(含少量便条)没有日期,推测多数写于 1931—1935 年间,时宋庆龄已从欧洲回到上海,布朗也在上海。照片有宋庆龄题赠布朗的她和孙中山的结婚照、合影,以及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自己的单人照。布朗档案中还有宋美龄给布朗书信两封和照片一张。

范尼·波默罗伊·布朗,美国人,曾在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在上海、北京待过,间或往返美国。从书信内容可知,布朗和宋庆龄及其家人在 1926 年就已经相识相交。布朗比宋庆龄年长,宋庆龄与之感情深厚,常亲昵地称她为“布朗尼”。在书信中,宋庆龄向她倾诉心声,告知自己的行踪和家人的一些信息,展示了她的内心世界、个人生活境遇和心路历程,无疑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宋庆龄致布朗书信时间跨度长达 20 年,在宋庆龄前半生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不多见。宋庆龄写信的地点正好是她 1926 年到 1945 年之间的活动之地:广州、武汉、上海、莫斯科、柏林、香港和重庆,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写于上海、莫斯科和柏林的几封书信,尤其珍贵。宋庆龄书信记载了她 1927 年 7 月 21 日从武汉回到上海、1928 年 4 月

30日从莫斯科到柏林的具体日期,以及她1939年12月从香港甘德道11号搬到九龙加林边道27号的具体情况,以前关于宋庆龄的这些重要时间节点都不够清晰。1928年3月24日写于莫斯科的信中,宋庆龄特别谈到美国报纸对她再婚的造谣,她表示自己有过非常美好的回忆,不会再去爱,更不用说结婚,她将生命献给了革命。而在柏林,宋庆龄为避免新闻媒体,对外使用过R.宋的名字,经由邓演达通信,还特意写信向布朗介绍将到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章克。

宋庆龄致布朗书信中,最早的一封写于1926年10月6日,使用了广州中央银行(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CANTON)的信笺,此前的9月23日宋庆龄在妹妹宋美龄的陪同下自沪抵粤。宋庆龄在信中谈到她们乘货船经过痛苦的四天四夜抵达广州,还谈到宋子文、宋蔼龄,并将三姐妹称为“野餐者”(Picnickers),在此后的书信中几次用“Nickpicker(s)”代指自己和她的姐妹。这样有趣的称呼,应是宋庆龄家人和布朗都懂的调侃昵称。宋庆龄致布朗书信中,最晚的一封写于1945年2月20日,写信地址是宋庆龄重庆住处新村3号,是回复布朗1月14日的来信。信中提到布朗1943年捐助的200美元,信中所附给布朗的收据显示,宋庆龄将捐款转给了伍智梅担任校董事长、姚卓英任校长的中华女子职业学校。

在香港和重庆两地的书信显示,抗战时期,远在美国的布朗为中国的抗战捐款或替宋庆龄购买物品。比如1941年3月28日书信中,宋庆龄寄给布朗为工合捐款10元的收据;1941年8月6日,宋庆龄写信感谢布朗为她购买物品;1943年4月8日的书信,也附带了捐款收据。

宋庆龄一生交往了许许多多的国际友人,如布朗这样完全是私人交往的亲密朋友为数不多。关于布朗本人的生平,还需要进一步了解和挖掘。宋庆龄书信的翻译出版,希望可以给学界和相关读者更多的关于宋庆龄与国际友人的交往史料。

一、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6年10月6日)

亲爱的布朗小姐:

我又在广州了!由于没有其他离沪的轮船,我们姐妹^①一起乘坐货船南

^① 此处指宋庆龄和她的妹妹宋美龄,报刊记载她们9月23日由沪抵粤。

下,因为我们必须要在特定一天出现在广州。

轮船承载了数百条白银和山羊。我们度过了可怜四个日夜,备受没清洗的山羊的味道的折磨,而且路上还有可能遇到海盗,因为船是白花花的,大量的白银和我们在一起。

广州很热,我们没有带来夏天的衣服,正在赶做几件凉爽的外套。至于May^①,她来时只带了两个箱子,所以她也在做衣服。

子文^②非常孤单,所以我们尽可能长时间的留在这里。

你认为你有可能回来吗? May找到了一些你会感兴趣的东西,她自己也在给你写信,所以让她用自己有趣诙谐的方式写给你吧。

孔夫人已经离粤赴沪,不过我们都期望她的孩子不久能来这里。

让我们知道你怎么样,何时我们再次见面。

爱你。

真诚的

R.孙

二、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7年3月13日)^③

中国汉口

1927年3月13日

亲爱的布朗小姐:

只是写几行字说我多么喜欢你的来信。母亲、May和孔夫人来看我已经有两三周了。多么希望你也在哪里。

我在参加各种会议。当会议结束后,我就给你寄一封长一点的书信告诉你所有发生的事情。盼望着你很快出现在中国。

爱你的

R.孙

① 指宋美龄,取自宋美龄英文名字 Soong May Ling 中的“May”。

② 即宋子文,宋庆龄大弟,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和广州中央银行行长。

③ 宋庆龄寄出此信的信封有“广州中央银行总行 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 head office Canton”字样及宋庆龄手写“Miss F Pomeroy Brown, Lane Ms Spalding, Riverside, Connecticut, U.S.A.”字样。

又及：看到任何有关我的简报都请寄给我。

三、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7年7月23日)^①

1927年7月23日

最亲爱的布朗小姐：

7月21日我从汉口回到离开了9个月的家，发现你的信在等我。它在热烈欢迎我回家！

经过繁重的救济伤兵工作后我极度紧张。我有许多很好的协和医院医生和护士南下帮我组建了协会。他们给我很多帮助。我们有1万多伤兵，设备之类的不足，以至于我简直忘记了自己，投入全部精力为我们的工作募集资金。

医生给我下了命令，要我立即离开去山上。但我反而偷偷回家了。有个委员会在负责，所以他们不会想我的。

我严重贫血，已经注射了18针砷^②，但体重下降、没有胃口，结果“野餐者”^③都认不出我来了！但我精神愉快，因我做了实实在在的事。我也许会死去，但我的良心是自由的。

美龄看起来很快乐很幸福。不过母亲身体不太好，子文的婚礼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我猜测孔夫人和孩子们都很好。斯坦和其他人我还没有见到。事实上，自从我回来后一直在床上，刚刚起来给你写几行字。

因为家人可能很快就来我，所以我最好立刻跳回床上去，因为我被命令要待在床上一个礼拜。

爱你的

R.孙

^① 宋庆龄寄出信的信封上有布朗的收信地址：美国纽约市纽约城 223 大街 2 号，F.P. 布朗小姐收 (Miss F P Brown, 223-2nd Avenue New York City New York U.S.A.)。

^② 少量的砷对身体有益，但其化合物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有剧毒。

^③ 此处代指宋庆龄的姐妹们。

四、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8年1月22日)

莫斯科

1928年1月22日

亲爱的布朗尼:

今天是中国的新年,我特别想念母亲和你,想念我们在1926年度过的所有快乐时光。自从上次我给你写信后发生了很多变化。我终于到俄国来了,这个我们常常谈起的国家。我非常高兴地告诉你,布朗尼,我比以前几年更开心了。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会更美好的世界的承诺。当然,对我们当中那些迄今仍过着寄居生活的人而言,会有许多困难和艰苦,但即便在那个时候,还是有很多东西来补偿舒适与享乐的匮乏。

这里的歌剧院在装饰上比纽约、伦敦的更华丽,音乐和戏剧更激发人,满足人们的精神饥渴。我现在沉浸于革命戏剧里。我见到了每个人,这里有非常多的剧院。但是白天我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和学习新秩序的东西。我在这里有好朋友,他们让我的生活尽可能地有趣。

印度朋友邀请我去印度,但英国拒绝给我护照签证(毫无疑问印度盼着中印革命者的护照到期),声称在我的“随行人员”中有共党。可我以前是单独来的。但是不要紧!他们这样做会失去更多。

你一定已经听说美龄嫁给蒋介石的事。这真让我吃惊!似乎宋家的成员都喜欢让别人吃惊!去年8月我在家里人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离开上海去海参崴,我离开前几个小时还在和孔夫人、美龄一起吃饭!我知道母亲决不会让我来红色莫斯科的,姐妹们也会阻止我做“有损”名誉的事,所以我必须保守秘密,尽管我是那么想跟她们分享我的兴奋之情。

一旦我筹到足够的资金,我就去访问欧洲国家。我会经美国回来,我不确定(谁知道呢!也许我会被当作共产党留在埃里斯岛^①)。

① 美国纽约市附近的小岛,1892至1943年间是美国的移民检查站。

可怜的普罗梅小姐,或者称雷娜·拉斐尔森^①,随同我们的代表团一起来,但去年11月她被神经疾病所压垮。数月遭受昏厥和头疼的打击。她曾经发烧过一次。但她是一位如此非凡而有趣的女性,所以她的去世对她的朋友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跟她一起共事过的人都很敬仰她。我非常想念她。她的丈夫因为她的去世来到莫斯科。他已经离开去欧洲了。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想同中国革命工作保持联系。可惜!现在那里只有抗拒了。

你的电话是多少?你会到欧洲来吗?请告诉我你自己的情况。

爱你。

你的

R.孙

我的地址经由莫斯科外交办公室列夫·加拉罕^②转。

五、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8年3月24日)

莫斯科

1928年3月24日

最亲爱的“布朗小姐”:

得知关于你和你工作的情况,我真是太高兴了!尽管这是一段苦日子,但当你回到(因为你必须!)中国来帮我们时,这段经历将会派上用场。

昨天我收到一位美国朋友的来信,说美国的黄色杂志正在制造愚蠢且恶毒的关于我跟某个傻瓜结婚的故事。乍一听就令人震惊!我有太多美好的记忆,所以很难再去爱,更不用说结婚了,我的生命正奉献给革命。尽你所能去揭露政治敌人针对我的这一肮脏的谎言。

^① 雷娜·普罗梅(Rayna Prohme),拉斐尔森是她前夫的名字。美国新闻记者、作家,1927年在武汉英文报纸《国民论坛报》担任主编,是宋庆龄的挚友,1927年8月陪同宋庆龄自上海赴莫斯科,11月21日在莫斯科因脑膜炎去世,11月24日宋庆龄出席了她的葬礼。

^② 全名即列夫·米哈依洛维奇·加拉罕(1889—1937),苏联外交家,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我已收到许多要我访美的邀请,但这一谣言让我如此愤怒,所以如果我来美国一定要驳斥这份美国黄色杂志。

要是我决定去美国旅行,我会拍电报给你,希望你陪同我横跨大洲的旅行,并同我一起返回中国。你愿意吗,亲爱的布朗尼?说,我愿意。

现在还在下雪,但暖和、舒服了很多,因为太阳藏了几个月后出来了。我不想离开莫斯科,这里如此有趣和令人鼓舞。“越飞”没有告诉你一些事情,但我会的。

立刻写信给我,说你会在旅途中担任我的“秘书”或者伴侣,我们会设法参观全美国许多大城市。

匆匆。

爱你的

R.孙

六、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8年5月7日)

柏林

1928年5月7日

亲爱的“布朗尼”:

我于30日途经波兰抵达这里。多么希望你和我在一起!柏林令人着迷,街道和公园都很好,人民是最民主的,不过还有许多奇怪的习俗依然存在。

在一个犹太人家里,我有了一个可爱的住处,我的房东一直在加房租,我加任何东西都是“额外的”,所以下月我要搬到不太贵的住处。目前,我单付房间费就要170马克。

在去巴黎以前,我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你有可能来这里旅行吗?你不用付房租因为我的公寓足够大到可以开家庭聚会。我正盼着一位艺术家朋友来此并陪伴我几个礼拜,然后她就去巴黎并工作。我想要旅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我也学习很多。

写信给我时,最好寄到如下地址,因为我“隐姓埋名”:

宋小姐,C.S.邓^①转,在苏斯曼,巴伐利亚大街 29 IV,柏林夏洛特。

下封信你会写得更详尽些吗?

非常爱你。

你的

R.孙

七、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8年5月14日)

柏林

1928年5月14日

亲爱的布朗:

我房东的儿子这几天要启程赴美国。我对他们了解很少,因为我到这里只有七天。为了履行我介绍几个美国人给他的诺言,我写一封介绍信给你。他是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希望在美国找到阿拉丁神灯,毫无疑问,他对美国幻想充满了想象。

我对柏林尚不熟悉,希望你能尽快来。我可能不会如我所期望的那么早到美国来。如果有可能,最早明年9月来美国。你能来和我待一段时间吗?我有两间大房间,生活很有趣。

如写信,请寄如下地址:

宋小姐

C.S.邓转

苏斯曼

巴伐利亚大街 29 IV

柏林夏洛特

你看我不知道会在这里住多久。请记得我是用 R.宋小姐的名字旅行的,所以不要在海宁·沃尔夫特这个男孩面前不停地说我。我已经成功避开了新

^① 即邓演达,字择生。他 1927 年至 1930 年访问欧洲时的护照上用中文名“石生登”。

闻报纸,因为别人只知道我是宋小姐。

爱你。

罗莎蒙德·S

八、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29年)^①

柏林

最亲爱的布朗尼:

此函介绍我的一位朋友章克^②先生给你。他一直在柏林学习,现将去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如果你能向他展示美国生活中有价值的事实,你就帮了一位好心的 Nickpicker 的忙。如果他遇到任何问题,请你尽最大努力帮助他,因为他是一位很好的年轻人,专心致力于我们在中国的事业。

爱你。

来自

R.S.孙

九、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2年9月19日)

亲爱的布朗小姐:

假期里我因疟疾而卧床,疟疾是我从广东带回来的纪念品,让我每年都要被套牢好几次。听说你打过电话来了又走了,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现在很好,只是双腿无力,因为躺了一个星期。希望尽快见到你,因为我有几件事想征求你的意见。

相信你正在享受舒服的秋天天气,这让我想起多年前那些难忘的日子,那

^① 此信没有日期,因宋庆龄1929年春从莫斯科返回柏林,5月6日离开柏林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大典,章克1929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推测这封信写于1929年春。

^② 章克(1904—1990),原名章胜荣,浙江杭州人。1924年从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奉宋庆龄之命,护送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返回莫斯科。1928年随宋庆龄之后到柏林,1929年秋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次年复应宋庆龄之召,回国协助邓演达,并在北京大学任教。

时我们会匆忙赶到你的静居所待上整整一个下午。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一位 Nickpicker

十、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2年11月24日)

亲爱的布朗小姐：

今晚7点你能来吃晚饭吗？如果不能，下午4点可否来喝茶？希望你能来吃晚饭，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爱你

宋庆龄

莫利爱路29号

1932年11月24日

十一、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3年2月6日)^①

亲爱的布朗尼：

非常遗憾我今天下午不能和罗斯福夫人^②见面，因为我倪舅舅^③昨天刚过世，我们需要去帮我舅母，最近几天要和她在一起。

我妹妹^④也病了，住在疗养院，所以我的假期很紧张，不能如我所愿和你待一段时间。

希望你很好。一旦得闲我就打电话给你。

爱你的

R.孙

① 此信没有日期，根据信中罗斯福夫人来沪的内容及倪锡纯去世的内容可推算是1933年2月6日。

② 1933年2月6日，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夫人由马尼拉乘船回国途经上海，登岸逗留，7日离沪。

③ 宋庆龄舅舅，是其母亲倪珪贞的胞弟倪锡纯，生于1880年，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1907年和宋庆龄同船赴美留学，回国后受聘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商务所所长，1933年2月5日病逝。

④ 即宋美龄。

十二、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3年)^①

秘密

亲爱的布朗尼:

昨天我一回家,下午4:20就打电话给你,但接电话的人说你已经离开。

你想着我真是太好了,但愿我今晚能过来,可我又收到恐吓信了,所以今晚不得不待在家里。特别是乔^②今天太忙,不能把他的汽车借给我。

为什么不来我这里待一个晚上呢?如果你能来,请在下午2点前打电话,并让我知道。爱你。

R.孙

又及:芒果是刚收到的,来自一位马尼拉的朋友。

我试穿内衣后,会第一时间告诉你是否合身。请为我付款。其他采购你成功了吗?不过,不用着急。R

十三、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3年)^③

亲爱的布朗小姐:

这是我跟你谈起过并希望你会觉得有趣的《青春誓言》^④。其他书,我没有读过,都是在店员的推荐下由黎小姐^⑤挑选的。我请她去给你买些杂志,她反而带回来这些书。她告诉我,这些书是“热辣书”,毫无疑问是店员的话。

哦,如果这些书看起来太过色情,就扔掉它们……或者给口味相当的什么

① 此信原无日期,根据宋庆龄收到恐吓信的内容可推算是1933年。

② 乔是宋庆龄小弟弟宋子安的英文名字,宋庆龄与之关系较亲近。

③ 此信没有日期,根据信中提到的1933年出版的《青春誓言》一书的信息,推测此信写于1933年。

④ 《青春誓言》(Testament of Youth)是英国女作家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出版于1933年的回忆录,回顾了她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生活经历,以及她走向反战主义的心路历程。

⑤ 指黎沛华,时任宋庆龄的秘书。

人……无论如何,我知道你会有个快乐的假期,精力充沛地回到你上海朋友身边,他们会想你的。

你真诚的

R.孙

向艾尔顿小姐和斯托普斯小姐致以我最好的祝愿。转告她们如果有时间再聚的话给我打电话。

十四、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5年3月)^①

亲爱的布朗尼:

很抱歉我今晚不能过来,因为凌博士和夫人^②刚刚从古巴回来,他们在古巴供职于外交界已经五年了,他们打算来拜访。凌夫人,我在美国时就熟识,最后一次见面并交谈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所以我们的拜访时间会很长。你有空就再打电话给我……最好尽快……希望你喜欢这块料子,我觉得你穿上会看起来很有魅力……只是我送你的小小纪念品,不要送出去。柠檬泡芙配冰淇淋很好吃。试试看!

致以良好的祝愿。

宋庆龄

又及:百隆女士今天下午要给我上课。目前她给我上课,如果你认识更好的,我就换掉她,因为她总是抱怨很累,说她好像80岁了,不能花一个小时给柔弱的人锻炼身体。匆匆请谅,不要透露给她我正考虑接受一位更有活力的老师。

^① 此信原无日期,根据宋庆龄书信内容,担任驻古巴公使5年的凌博士,当为凌冰,他于1929年11月至1935年4月任驻古巴公使。查阅相关资料获悉,凌冰1930年1月自沪启程赴古巴,1935年3月12日自古巴回到上海,3月18日再到南京外交部汇报述职。所以可以推定这封书信写于1935年3月,具体日期可能在12—18日之间。

^② 凌博士即为凌冰(1894—1993),字济东,河南省固始县人,民国时期教育家及外交官。早年毕业于南开学校,后赴美留学。回国后在南开大学任教,1929年11月被任命为驻古巴公使,1935年4月免职。凌冰夫人司徒如坤,少时跟随担任牧师的父亲赴美,后获得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们在美国读书时就相识,回国后都在南开大学任职,司徒如坤还是该校外语系第一位英文老师。宋庆龄1913年大学毕业后回国前曾在美国加州逗留了两周时间,其间和司徒如坤就有往来。

十五、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5年3月21日)

亲爱的布朗尼:

希望你收到上周六我让那个小伙计送给你的包裹。如有时间,请周六晚上来吃晚饭,届时我有空。

请为我找个伙计,因为年长的那个伙计本月底要去牯岭,他身体不太好,医生命令他到山上休息几个月。而且阿妈要去广东,所以在新佣人到来之前我会过得很辛苦。

爱你,希望周六见到你。

匆匆。

R.S.

1935年3月21日

十六、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5年9月27日)

莫利爱路29号

1935年9月27日

亲爱的布朗尼:

你现在的旅行该是多么有趣!看了你的来信,看到邮政贺卡来自加州,我几乎心碎了,因为不能和你在一起。你离开太糟糕了,更糟糕的是我没能跟你说再见。刚巧我必须主持一个会议,你知道那样的时刻几乎很难托辞缺席的……我告诉 Daodao^① 请你不要等我如果我下午5点不出现的话。他一直没回来,直到深夜才到家,我就紧张不安地想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后来他解释说 he 去了吴淞码头,安全地送你走,我几乎拥抱他了,因为他代我送你。所以,一切都好。

天气终于凉爽了。秋天让我渴望出门到乡村,因为树叶开始变黄变红,当

^① 时宋庆龄家里的工作人员,具体不详。

然,洋槐盛开,花香充满房间和空气中。多么希望你在这里。所以处理完你的事情,快快回来。

我的住处重新粉刷了,你来后可以和我一起住。至少你要和我住到你找到更喜欢的住处为止。Daodao的姐姐(妹妹)来住了一个礼拜,帮忙照看房子,当时有十几个工人在房子里忙活。她患沙眼很厉害,所以我最后送她回家,还给了她钱,让她在我给她推荐工作以前先把病治好。她可能在照看某人的小孩时把沙眼传给他。所以我只是想让她在治好以前不要找工作。

她离开时很难过,因为她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但不太喜欢和她兄(弟)在一起……因为他随便打她。我听到她的尖叫后就阻止了。我告诉他,如果他再这样殴打一个弱女子,我会把他关到警察局的。他很震惊,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妇女,是他姐姐(妹妹),他有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待她。噢,这种优越的态度立刻被纠正了……那当然。

你的猴子^①去南京了,我去送她的。事实上,她告诉 Daodao,她急于工作,因为她想休息。何还在这里。我把你的问候带给他们了,他们都说“谢谢,谢谢布朗小姐”^②。

你在旅行需要钱时,是什么让你寄给我如此漂亮的碗?哪天我要跟你算这笔账的……你知道,你的家具比你要的(价)更加值钱,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不要再把剩余的钱转给我了。下次再写信我会请你帮我寄几双鞋。现在我匆匆写几行,告诉你我很想念你,盼望着你的归来……越快越好。中国新年来临前后你要是不和我们在一起,那晚上会有炸弹落到你床上的,所以快下决心回来,因为我想你。

至爱你,感谢好意。

R.孙

① 从后文看,“猴子”是布朗在上海时的女佣。

② 原文为“Tank you, tank Miss Brown”,“tank”应是“thank”,佣人们发音不准。

十七、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5年11月左右)^①

最亲爱的布朗尼：

斯达小姐昨天寄来一套美丽的桌布和三双鞋子。有这些物品我太开心了，非常非常感谢你如此花费功夫。每双鞋都不同，可以在不同场合穿，这正是我需要的。桌布非常美丽、可爱且喜庆。我写信问斯达小姐是否她付了海关关税，费用多少，因为我不想让她从你那儿拿钱。到现在她还没有回复我。我收到她的男佣来信说她打算从虹桥路搬到外滩。

我打算通过孔夫人的女儿波利娜^②和珍妮特^③寄圣诞礼物给你，她们12月3日启程赴佛罗里达塔拉哈西^④去上学。你会比较晚收到礼物，但我想最好由她们通过邮局寄给你，在这繁忙的季节。

我很惊讶我姐姐会送她们到国外，因为她殷切希望她们首先要有中国文学的基础。我想她让她们去国外的主要原因，是她有一个亲密的校友兼同学正在中国访问，可以这样说，她是想要孩子们在她的照应下去美国。她们将紧接着入学，所以没有机会访问纽约及周边地区。波利娜会从佛罗里达写信给你。

你在哪儿，你在干什么？你会外出吗？我当然希望是这样，因为这里没有你的生活相当无聊。下次写信时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你记得那位来自广东、勇敢强悍的科恩^⑤吗？过去我们常常调侃他。他是和斯达小姐同船回来的，再和她同船去英国。但不要想象我要跟你讲述的与爱情有关，因为根本没有。一下船只有科恩来见我了，他告诉我乘柯立芝号来的。所以当斯达小姐的信笺来到时，我一点都不惊讶，并当着他的面打开包裹。当他看到那三双可爱的轻便帆布鞋时，他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毫无疑问

① 根据1935年12月1日宋庆龄致布朗书信的内容，可以推算此信写于1935年11月左右。

② 波利娜是宋蔼龄和孔祥熙的大女儿孔令仪(1915—2009)，又叫罗莎蒙德。

③ 珍妮特是宋蔼龄和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后改名孔令伟)。

④ 塔拉哈西(Tallahassee)，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府。

⑤ 即莫里斯·科恩(Morris Cohen, 1887—1970)，中文名马坤，加拿大籍英国犹太人。曾担任孙中山的贴身卫士，后在中国官至少将。1966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在英国去世后，宋庆龄为其墓碑题字。

他心里想,余生保持单身要比为某人支付鞋钱更明智。

我听说他正跟这里的某个人恋爱,此人对他赚钱的能力比对他本人更感兴趣。所以我想过要吓退他一点,只是为了帮帮他。那样做难道不邪恶、狡猾吗,布朗尼!????

拜托啦,亲爱的布朗尼,如果你有其他机会寄东西给我,请给我寄儿童的轻便鞋子,一双黑白混合的,因为我喜欢这两种颜色,很好搭配中国服装。再要几双纯巧克力的栗色或灰褐色的轻便鞋,肤色或不是绒面材质的都行,因为目前绒面的鞋子足够了。它们更适合春天穿。另外,请不要买晚上穿的鞋子,我只要白天和下午穿的。我的意思是不要任何装饰的鞋子,只是鞋面上有点缀的如搭扣或蝴蝶结,或某种轻巧有趣的结,或边上有条缝。我的脚穿凉鞋不好看。

如果钱用完了,请告诉我。不要急于出去为我买东西,毕竟你现在太忙。请你假期里去买。

无法言说我是多么感激你的好意,收到漂亮的東西和鞋子我是多么快乐。它们都很适合我,除了那双黑色的凉鞋,但夏天我脚变得大一点时可以穿。因为这双黑色凉鞋是 3.5 M,而不是 3.5 C。另外两双刚刚好,我很为它们骄傲。你的品味很不错。

顺便一提的是,你的猴子去南京了,我请 Daodao 去看过她,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工作。何与 Daodao 在此,希望你记得他们。我告诉他们每个人可以试着用英文写信祝你新年快乐,我会寄给你。Daodao 说“好的”,但是何腼腆地咧嘴笑了,无疑在纳闷老狗还能学出新把戏……因为他一个字都不会写,但能读一点。

请原谅这糟糕的打字,因为我赶着寄航空邮件。

同时,寄去我最好的爱和许许多多的感谢,亲爱的布朗妮。

来自
“孙妮”

十八、宋庆龄致范尼·波默罗伊·布朗(1935年12月1日)

亲爱的布朗尼:

只言片语告诉你,我要寄给你一块料子和一件白兔毛夹克,夹克给在纽约的你早上在床上吃早饭时保暖用。两面都可以穿。你不要为了帮助别人把它送掉。那块料子不算什么,只是我很喜欢它的设计就买下,或许你可以做内衬用。

孩子们明天即将启程去塔拉哈西。我请他们一到就给你写信,通过你在康州康涅狄格河畔的姐姐(妹妹)把包裹送给你。

顺便一提的是,斯伯丁夫人寄来这么好的一封信,不过这让我对出于好玩寄给她一个小枕套感到不好意思。她看得很重,费了足足十分钟给我写信。下次我会写信给她,现在我太忙了。

深深的爱你,希望你写信告诉我你假期的一切。我是多么嫉妒你能欣赏雪景……多么希望你和你在一起。

深爱你的

R.孙

莫利爱路29号

1935年12月1日

附录

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Oct. 6, 1926)

Oct 6, 1926

Dear Miss Brown,

Here I am in Canton again! We sisters come down together in a freight boat, as there was no other boat leaving, and we had to be here on a certain day.

The boat carried hundreds of bars of silver & goats. We spent 4 most miserable days & nights on it, tortured by the smell of unwashed goats 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meeting pirates on the way, since it was snow that there was a great deal of silver with us.

It is very hot here I did not bring my summer clothes so am having some cooler gowns made. As for May, she came down with just 2 bags, so she is also getting clothes made.

T.V. is very lonely so we shall try to remain here as long as possible.

Do you think it'd be impossible for you to come back? May has found something that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she is writing you herself, so let her do it in her own witty manner.

Mrs. Kung has left for Shanghai, however we expect her other kiddies here before long.

Do let us know how you are going & when we may see you again.

With love

Sincerely

R.Sun

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Mar. 13, 1927)

Hankow, China

March 13, 1927

Dear Miss Brown,

Just a few lines to say how much I enjoyed your letter. Mother, May & Mrs. Kung

are visiting me for two or three weeks. How we wish you were here!

I am in the midst of meetings. When they are over, I shall send you a long letter telling you of all that's happened. I am counting up seeing you look in China soon.

With much love

R.Sun

P.S. please send clippings whenever you see something about me.

I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July 23, 1927)

July 23, 1927

Dearest Miss Brown,

I returned home on the 21st from Hankow, after an absence of 9 months. I found your letter awaiting me. It was a lovely welcome!

I am terribly nervous after the strenuous relief work for wounded soldiers. I got lots nice doctor & nurses to come down from the PUMC to help me organize the assi. They helped me wonderfully. Over 10,000 wounded men were on our hands. Equipment etc. were so inadequate that I simply forgot myself & put all my energy in raising funds for our work.

I was ordered by the doctor to leave at once for the mts, but instead I stole back home! A committee is in charge, so they won't miss me!

I am suffering from anemia & already had 18 injections of arsenic, but I am losing weight & appetite that the Picnickers wouldn't recognize me! But my head is so happy, because I have done some real work. I may die but my conscience will be free.

Mayling is looking very gay & happy. Mother is not so well, however T.V.'s wedding sapped all her strength. I guess Mrs. Kung & Children are well. Stan & the rest I have not met. In fact, since I returned I have been in bed—just get up to scrawl you a few lines.

As the family may drop in any moment, I'd better jump in bed at once, for I've

been ordered to stay there for a week!

With much love.

Yours,

R. Sun

IV.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Jan. 22, 1928)

Moscow, USSR

Jan. 22, 1928

Dear Brownie,

Today is Chinese new year day & I am thinking particularly of Mother & you, & of the happy times we had in 1926. What a lot of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since I last wrote you! I am in Russia at last, the country which we talked a lot so often. And I am glad to tell you, Brownie, that I am happier than I have been for years. One sees here the promise of a better world for everybody. Of course there are difficulties and hardships for those of us who have led a parasitic existence hitherto, but even then there are many compensations to make up for the lack of comforts and luxuries.

The operas here are more gorgeous in settings than New York or London & the music & dramas stimulate and feed ones' mental hunger. I am just now steeped in revolutionary plays. I see every one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theatres here. But in the day time I spend many hours in reading and studying the new order of things. I have good friends here who make my life here as interesting as possible.

I was invited to India by the friends there, but the British refused to visa my passport (doubtless wishing to prevent Expiration of Chinese & Indian revolutionists) claiming that there are Communists in my "entourage". I was going alone however! But never mind! They will lose more by this!

As soon as I get hold of funds, I will visi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I may return via America, I can't tell (who knows but that I may be kept in Ellis Island as a Commu-

nist!)

You must have heard about May's marriage to Chiang Kai-shek. It was a surprising to me! It seems that the members of the Soong family delight in surprising one another! I left Shanghai for Vladivostok last August without letting the family know of my intentions, altho' a few hours before I left, I was dining with Mrs. Kung & Mayling! I know my mother would never allow me to come to Red Moscow, & my sisters would prevent me from "discrediting" my name, so I had to keep my plans to myself, altho'— I was bursting to share my excitement with them.

Poor Miss Prohme or Rayna Raphaelson came with our delegation but she succumbed from cerebral troubles last November. She had attacks of fainting violent & headaches for months. She had brain fever once. But she was such a brilliant and interesting woman & her death come as a great lost to her friends. She was much admired by those who worked with her. I miss her very much. Her husband came to Moscow for her ashes. He has left for Europe. He is a very fine man & wants to keep up with the revolutionary work in China. But alas! There is only reaction there now!

What are your phone and will you ever come to Europe? Please tell me all about yourself.

With much love.

Yours,

R.Sun

My address care Leon Karakhan Foreign Office Moscow

V.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Mar. 24, 1928)

Moscow

March 24, 1928

Dearest "Miss Brown",

How glad I am to hear about you & your work! Altho' it is a "dog's life", this

experience will come in handy when you return(for you must!) to China and help us.

Yesterday I received a letter from a friend in America who wrote me that the yellow journals in America are creating silly malicious stories about my marriage to some fool. It is amazing to say the least of it! I have too many beautiful memories to be able to fall in love again, not so say marriage, my life is now dedicated to the revolution. Do all you can to expose this dirty lie about me by political enemies.

I have rec'd many invitations to visit America, but this rumor makes me so angry that if I come I will certainly cuss the American yellow journal out!

If I decide to travel in America, I will wire you and hope you will accompany me on my continental trip, & return with me to China. Will you do it, dear Brownie? Say, yes!

It is snowing still, but quite warm & pleasant for the sun is out again, after hiding for months. I'd hate to leave Moscow, so interesting & stimulating—"Jeff" failed to tell you some things, but I won't!

Sent me a line immediately & say that you will be my "secretary" or companion on my trip, we will manage to see many big cities all over the U.S.

Hastily,

With much love

R.Sun

V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May 7, 1928)

Berlin

7 May, 1928

Dear "Brownie",

I arrived here on the 30th via Poland. How I wish you were with me! Berlin is enchanting, the streets & parks are lovely, the people most democratic, so many strange customs, however still exist.

I have a lovely apartment at the Jewish family, my landlord is increasing my rent all the time, my adding everything as “extra”, so I will move to less expensive quarters next month, at present, i have to pay 170 Marks for rooms alone.

I will spend some time here before going on to Paris. Could you possibly take a trip here?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rent as my apartment is big enough for a house party! I am expecting an artist friend to come & keep me company for a few weeks, then she will have to go to Paris & work. I want to travel, this is my only chance, I am learning a great deal too.

When you write me, better address mail as follows, as I am living “incog”:
Fräulein Soong care C.S. Dang, bei Sussmann, Bayerische Strasse 29 IV, Berlin Charlot.

Will write you in more details in next letter.

With much love.

Yours ever,

R.Sun

V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May 14, 1928)

Berlin

14 May 1928

Dear Brownie

My Landlady's son is leaving for America in a few days. I know them very little as I've been here only 7 day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my promise to introduce some Americans to him, I wrote for him an introductory letter to you. He is just a young Jewish boy, hoping to find Aladdin's lamp in America, doubtless filled with imagination of the America fantasy.

I am uncharted with Berlin & wish you came over soon. I may not come to America as early as I expected, if at all, next September of the earliest. Could you spend some time with me? I have 2 big rooms here & life is very interesting.

When you write, address mail in care as follows:

Fraülein Soong

Care C. S. Dang,

Bei Sussmann,

Bayerische Strasse 29 IV,

Berlin Charlot

You see I don't know how long I shall remain in this apartment. Please remember that I am traveling under name of Miss R. Soong, so don't' fire me away before this boy Heing Walft! I have succeeded in avoiding the newspapers post, simply because I am known as this Soong.

Much love from

Rosamonde,

S

VI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1929)

Berlin

Dearest Brownie,

This is to introduce my friend, Mr. Chang Ke, to you. He has been studying in Berlin & will now enter Columbia. If you will show him the worthwhile facts of American life, you will be rendering the service of a good Nickpicker. If he should meet with any problems please do your best for him, for he is a nice young man and is bent on devoting his services to our cause in China.

Much Love

From

R.S.Sun

IX.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Sept. 19, 1932)

19 IX 1932

Dear Miss Brown,

The holidays found me in bed with malarial fever is souvenir I brought back from Canton, and keeps me tied down several times a year ... I was so sorry to learn that you had called and gone ... I am allright now, but for my wobbly legs, due to a week's lying down. I hope to see you soon as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which I would like to have your opinions on ...

Trusting that you are enjoying the lovely autumn weather which reminds me of those unforgettable days, years ago, when we would bundle off for the entire afternoon for your Retreat ...

With best wishes from

A Nickpicker

X.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Nov. 24, 1932)

Dear Miss Brownie,

Could you come for supper at 7 p.m. today? If not, could you come to tea at 4 O'clock? I hope you could come for supper as we shall have more time. With love

SCL

29 Ave. Moliere

24 XI 1932.

X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Dec. 27, 1932)

Dear Brownie,

I'm so sorry I shouldn't be able to meet Mrs. Roosevelt this afternoon for my uncle Nie has just died(yesterday) and we have to help the aunt to stay with the these few days.

My sister is also sick in the Sanatorium, so I have had a hectic “vocation” & couldn’t come to spend some time with you as I wished so much.

Hope you are well. Will call you up, as soon as I am free.

Lovingly,

R.Sun

X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1933)

Confidential

Dear Brownie,

Yesterday upon my return home, I phoned you at 4:20pm, but the man said you had left already.

It is so kind of you to think of me & I only wish I could come this evening but I’ve rec’d threatening letters again and am obliged to remain home in the evening. Specially when Joe is too busy today to lend me his car.

Why don’t you come and spend the evening here? If you can, please phone before 2 pm, & let me know.

Much love.

R.Sun

PS The mangoes have just come from a friend in Manila.

As soon as I try on the underwear, I’ll let you know how they fit. Please pay for me. Have you succeeded in the other shopping? There is no hurry. Though—R-

XI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1933)

Dear Miss Brown:

There is the “Testament of Youth” which I told you about and which I hope you will find interesting. The other books, I have never read. They are chosen by Miss Li,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clerk! I asked her to get you some magazines, and she re-

turned with these books instead. She told me that they are the “book—sensations” ... doubtless quoting that clerk!

Well, throw them away if they look too erotic ... or give them to some one whose taste run parallel ... Anyway, I know you'll have a jolly vacation and return with energy to your Shanghai friends, who will miss you.

Sincerely yours,

R.Sun

My best wish to Miss Ayrton & Miss Stops. Tell them to phone me when they have time for a reunion.

XIV.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Mar. 1935)

Dear Brownie;

I am sorry that I shall not be able to come this evening for Dr. and Mrs. Ling who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Cuba where they were in the diplomatic service for five years, are going to make their visits. Mrs. Ling, I knew very well in America, and it has been ten years since we last saw and talked together ... So our visit will be rather long. Do call up again when you have time ... but preferably soon ... Hope you'll like the material which I think will look charming on you ... just a little souvenir from me, so don't give it away. The lemon puffs are quite good for ice-cream. Have a try.

Best wishes

SCL

PS This Blum lady is going to give me a lesson this afternoon. She'll do for the present, but if you know of a better one, I should like to change her ... for she is always complaining of being tired and talking as if she were 80 years old and unable to spend an hour doing exercizes of the gentle kind ... excuse hurry and don't let on to her that I am contemplating a more active teacher.

XV.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Mar. 21, 1935)

Dear Brownie:

I hope that you received the package I sent you by that boy last Saturday OK. If you have time, come over on Saturday evening to supper, for I shall be free.

Please try to look out for a boy for me as the big boy is leaving for Kuling the end of this month as his health is not good and the doctor orders him to rest in the mountains for some months. Also the ahmah is leaving for Canton, so I shall have quite a hard time, breaking in new servants.

Love, and hope to see you Saturday.

Hastily

R.S.

March 21 1935

XV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Sept. 27, 1935)

29 rue Moliere

27 Sept. 1935

Dearest Brownie:

What an interesting trip you are having! As I read your letters and look at the post card from California my heart nearly burst for not being able to be along It was frightful to have you leave and worse of all that I could not get say goodbye to you. It just happened that I had to preside over a meeting, and you know one could hardly give excuses for vacating the chair at such moments ... But told Daodao to ask you not to wait for me if I did not appear at 5PM. And when the boy did not return until late as night, I was so excited wondering what happened to you. Later he explained that he went to Woosung and say you safely off, I nearly hugged him for taking my place ... So all's well

We are having cool weather at last. The autumn days make me long to get out in the country for the leaves are beginning to turn yellow and red and of course the acacias are

in full bloom and their fragrance fill the rooms and the air. How I wish you were here! So have your business done and come back quickly.

My place has been repainted and you are coming to stay with me when you arrive. At least you must stay with me until you find some place you like better. Daodao's sister was here for a week to help look after the place when over a dozen workmen over run this household. She had trachoma so badly that I finally sent her away with money to stay home and get cured first before I could recommend her for work. She might take care of some one's child and give her for trachoma to some one so I simply would not get her a job until she is cured. She went away sadly for she liked staying with us, but not much with the brother. Though ... for he slapped her right and left. I stopped it though when I heard her screaming. I told him I would shut him in the police station for beating the weaker sex ... He was so amazed for he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she being only a woman and his sister he had right to do with her what he liked ... Oh, this superior attitude was immediately corrected You bet!

Your Monkey went away to Nanking when I sent off her, in fact she told Daodao that she wasn't anxious for a job, for she wanted a rest. Ho is still here. I gave them your regards and they all say "Tank you, tank Miss Brown".

What made you send me such a beautiful bowl when you need the money for the trip? I must get even with you one day ... You know your furniture was worth much more than what you asked for so for heaven's sake, please don't return the rest of the money to me. I will ask you to send me some shoes when I write again. Just now I want to dash off a few lines to tell you that I am thinking of you and will look forward to your return The sooner the better. And when China New Year comes around and you are not with us, then a bomb will land right on your bed, so make up your mind and return soon for I miss you.

With best love and thanks for thoughtfulness.

R.Sun

XV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Nov. 1935)

Dearest Brownie:

Miss Starr sent over the beautiful set of tablecloth and the 3 pairs of shoes yesterday. I am so delighted with them and wish to thank you very, very much for taking so much trouble. Each pair is different and for different occasions, just what I need! As for the tablecloth, it is so gay and lovely and festive-looking. I wrote to ask Miss Starr whether she paid duty on them and how much as I don't want her to get it from you. So far she has not answered. I heard from the boy that she is moving from Hungchiao Road to the Bund.

I am sending you a Christmas present through Pauline and Jeannette, Mrs. Kung's daughters, who are leaving on the 3rd December for Tallahassee, Florida to enter schools there. It will be late getting to you, but I think it is better to send by them then through the post during this busy season.

I was rather surprised that my sister would send them abroad, for she is anxious for them to have a ground in Chinese Literature first. The chief reason, I think that she lets them go abroad is, one of her intimate school friends and classmates is visiting in China and she wants them to go under her wings, so to speak. They will enter school immediately, so will have no chance to visit New York and vicinity. Pauline will write you from Florida.

Where are you and what are you doing? Are you coming out? I certainly hope so, for life here without you is pretty dull. When you write next please give me an idea when you could come back.

Do you remember that doughty Cohen from Canton whom we used to tease a great deal? He came back on the same boat as Miss Starr, and went to England with her on the same boat. But don't imagine that I am going to relate a romance to you, for there is none. Only Cohen saw me as soon as he arrived from the boat and told me that he came on the Coolidge. So when Miss Starr's note came I was not a bit surprised, and opened

the package right before him. When he beheld those 3 pairs of lovely pumps, his eyes grew bigger and bigger, doubtless making a mental note that it would be far wiser for him to remain a bachelor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than to pay for some one else's shoes!

I heard that he was having a romance with some one here who was interested more in his earning capacity than himself, so I thought I would frighten him off a bit, just for the sake of doing him a good turn. Isn't that devilish and subtle, Brownie!????

Please, dear Brownie, if you have another chance to sending something me, please send me kid pumps, a pair in black and white combination, for I like these two colors which match Chinese dresses well. Also some plain chocolate in marron or mouse colored pumps, either in skin or material but not in suede for I have enough of this at present. They are more for spring wear. Another thing, please don't get any evening shoes, just for daytime and afternoon. By this I mean, not any elaborate ones ... just some finishing touches on the vamp, with buckle or bow, or some slight fancy touches or slit on the side. My feet don't look good on sandles^①.

If money runs out, please let me know. Don't run out to get the things for me in a hurry, for you are too busy now. But during your vacation, please do it.

I cannot tell you how very much I appreciate your kindness, and how delighted I am with the beautiful things and shoes. They fit me well, excepting the black sandals, but I can wear it also by the summer when the feet get bigger. For it is $3\frac{1}{2}$ M, instead of $3\frac{1}{2}$ C. The other two are exactly right and I am so proud of them. You have lovely taste!

By the way, your Monkey went to Nanjing, when I asked Daodao to look her up, so I don't know where she is working now. Both Ho and Daodao are here and wish to be remembered to you. I told them that they might each try to write you a happy new year message in English, and I would send them to you. Daodao said "All right" but Ho

① 应为 sandals。

grinned sheepishly, doubtless wondering an old dog could learn new tricks ... for he cannot write a word, but reads a little!

Now, pardon this bad typing, for I am in a hurry to catch airmail.

Meantime, I send you my best love and many, many thanks, dear Brownie!

From

“Sunnie”

XVIII. Soong Ching Ling to Fanny Pomeroy Brown(Dec. 1, 1935)

Dear Brownie:

Just a line to tell you that I am sending you a piece of material and a white rabbit jacket to keep you warm in New York while you are taking your morning breakfast in bed. It can be worn both sides. Hope it will fit you and you won't discard it in favor of some one else. The material is nothing at all, only I liked the design so much that I got it perhaps you could use it for lining.

The children are leaving for Tallahassee tomorrow. I asked them to write you as soon as they arrive and forward the package to you via your sister in Riverside, Connecticut.

By the way, Mrs. Spalding sent such a nice letter although it made me ashamed of the tiny pillow case I sent in fun. She took it seriously and wasted a good ten minutes in writing me. Next time, I shall write her ... just now I am terribly busy.

Much love to you, and hope you will write me all about your holiday. How I envy you enjoying snow scenes ... wish so much I were along!

Affectionately,

R.Sun

29 rue Moliere

Dec. 1, 1935

亚利桑那州图书馆藏宋庆龄相关信函选译

郑培燕 译

【译者按】

本文译自亚利桑那州图书馆藏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信函及相关附件,分别于1944年9月6日、10月5日、12月6日及1945年5月15日收悉,编号为MSS_122_Vol.10_II_64,内容系1944年夏至1945年初宋庆龄就收集到的有关医药物资及款项的分配及收转情况、国际和平医院运作情况等材料向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米尔德里德·普赖斯作相关介绍,并附马海德、爱泼斯坦等致宋庆龄书信副本,以争取更多援助。

一、1944年9月6日收件

1.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4年7月25日)

1944年7月25日

亲爱的普赖斯小姐:

您5月29日的来信刚刚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特别高兴将收到《在中国游击区》^①和《新闻通讯》。《在中国游击区》一定印刷得非常漂亮,一旦我们有机会读到这本册子和通讯,我们会再写信给您。

^① 即《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43),由美国援华会资助在美国纽约出版印刷,封面标题为《在中国游击区》。

4 499 955 元法币的款项已经全部支付给我们,艾德敦^①先生说只要清算基金转到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②账户,就会提前支付 7 月份的款项。15 000 美元折合 750 000 元法币的收据(第 108 号)已给您寄去,同函附上余额收据一份。

另附一封给华侨衣馆联合会^③的中文信件,烦请转交。

另外还附上两份报告,一份是延安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④的工作报告,另一份是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三部^⑤的工作报告。由于寄送大宗邮件的困难,不知贵方能否制作副本并寄给加拿大的基普林小姐^⑥和英国中国运动委员会^⑦的克里普斯夫人^⑧。不知您是否已将这份报告的副本发给这些组织。

2.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4 年 8 月 1 日)

1944 年 8 月 1 日

亲爱的普赖斯小姐:

您 6 月 30 日的第 36 号来函已收到,非常感谢。希望此时您已经收到了遗失的其他附件,是随另外一封信寄去的。如果仍然没有收到,请告诉我。

您好意寄来的一本《报告》^⑨终于到了,我们都很高兴有机会看。这本报

① Dwight W. Edwards, 中文名艾德敦, 时任中华基督教全国青年会美籍干事兼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驻华总干事。

② United China Relief, 又译全美助华联合总会, 成立于 1941 年, 1946 年改组为美国援华联合会 (United Service to China, UCR)。

③ 1933 年 4 月 30 日, 在美洲华侨和中国工农革命大同盟的领导下,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 (简称“衣联会”) 成立。抗战爆发后, 徐永燠、唐明照指导以衣联会为代表的左翼侨团发起成立了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 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

④ Bethune International Hospital (Head Hospital),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总院), 前身是位于延安城东拐岭镇的八路军军医院, 1939 年 12 月更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以纪念为中国抗战捐躯的白求恩大夫。1940 年春, 医院迁至柳树店新址重新建设, 另设直属分院于拐岭镇, 与总院病员合计 400 名。总院下有两个分院, 第一分院在五台山, 第二分院在晋东南。1943 年, 总院迁至刘万家沟。至 1944 年,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在延安有 3 个分部, 第一部在城北李家坬 (中共中央卫生处于 1939 年筹建的中央医院), 第二部在城南白家坪 (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37 年筹建的边区医院), 第三部在柳树店旧址, 作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⑤ 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⑥ Ruth T. Kipling, 鲁思·基普林, 加拿大医药援华会 (Committee for Medical Aid for China) 官员。

⑦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 成立于 1937 年 9 月, 是英国友好人士为支援中国抗战而组建的, 总部设在伦敦。该会任务是向中国捐赠医药等救助物品, 并组织集会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呼吁抵制对日贸易等。该会原系通过中国国际红十字会向中国提供援助, 保盟成立后通过保盟提供物资。

⑧ Isabel Cripps, 伊莎贝尔·克里普斯夫人, 时任英国援华联合会会长。

⑨ 即《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43), 封面标题为《在中国游击区》。

告印刷得确实很漂亮,恐怕贵方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花了很多时间。我和委员会成员都认为它非常精美,也非常感谢贵方为我们做了这件事。我们唯一要发表意见的是这份常务委员名单并不十分准确,出于种种原因我们认为最好略去。当然现在《报告》已经在流通中了,这无关紧要了,但我希望如果《报告》再版的话,贵方能记得这一点。

我们也很高兴收到你们的《通讯》和剪报。您寄来的关于“柳拐子病”^①的材料已经到达该去的地方,我相信将会有引起巨大兴趣,并发挥巨大作用。

我们听说了旧金山的麻烦事,感到非常遗憾。不过我们会用中文写信给 Sam Young 先生,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写好并与这封信一起寄出。由于我们不知道 Young 先生的中文名字,所以收件人我们只能写华工互助会主席。

在昨天的会议上,我们决定从贵方给我们的款项中拿出百分之一用于我们这里的运作支出。随着汇率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可能不需要这笔款项的全额,但如果需要全额的话,我们也会在月底返还回去的。

爱德敷先生于6月底支付了750 000元(法币)作为5月和6月的拨款。这是预付款。3 749 955元余额是几天前才汇到的。非常感谢贵方考虑周全,将7月份的款项及早寄来。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

记者团^②有些人已经从延安回来了,我们又收到了一批报道和资料,希望能尽快发给您。其中有些材料已经是英文的了,有些还需要翻译。

非常感谢贵方给阿鲁巴委员会寄去《在中国游击区》。我们也会写信给他们,并重复贵方请他们直接汇款给我们的要求。

目前还找不到一个人来接替福斯特先生,不过我们香港时期的老会员廖梦醒正在代理他的工作。她还是我们的助理司库。

您得在如此炎热的情况下工作,我们感到同情,因为上个星期这里也热得让人难以忍受。过去几天室内温度都高达99(华氏)度。希望现在您已没有

① 大骨节病(osteoarthritis deformans endemica),又称“卡-贝二氏病”(Kaschin-beck disease),是一种以关节软骨和髌板软骨变性与坏死为基本病变的地方性骨关节炎,俗称“柳拐子病”,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东北的东北部、陕西、河南、山东和西北的山岳地带。

② 即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1944年6月初赴延安进行采访。成员共21人,有外国记者6人,如《时代》周刊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神父等,另有中国记者9人,及国民党官方指派的2个领队和4名随员。

那么难受了。

我谨代表我本人和委员会全体成员,向您和美国援华会其他成员致以问候,

诚挚的,

孙夫人

附:刚收到您好意托费奇先生寄来的鞋子。请不要再寄了,因为我的姐妹们给了我一些,她们已经动身去巴西了。上个星期,我第一次见到吉恩·莱昂斯。希望在这里逗留对她有好处。向您致意。

宋庆龄

3.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4年8月14日)

1944年8月14日

此信是向您汇报我们今天的双周例会的情况。在随函所附的其他几封信中,我们已提及了近几周收到的大量材料。这封信带给您两份材料清单:一份是延安生产的药品清单,另一份是一些报告和其他印刷品。延安生产的药品样品单独装在一个10磅的包裹里,由给您送这封信的可靠人员带给您。

我们随函附上1 797 762.87元法币的收据,是7月份拨款的预付款,按100:1的汇率计算。这里的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传来消息说,7月份的最终汇率可能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将收到差额。

我们能寄给您的照片数量,列在了上述的一份清单中,您会感兴趣的。另有一封马海德大夫来信副本,引用了一位美国军医对国际和平医院医疗工作之印象的评论。

因这里的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代表询问我们是否要对提交的1944年预算作修改,我们要求的总额为1 000 000美元(即贵方最初代我方要求的金额),而无论新汇率是多少。我们提交的预算必须以法币计算,在目前高汇率的情况下,这可能意味着我们收到的以美元计的实际拨款比以前要少。

您会很高兴知悉我们近期已经向国际和平医院发送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用品,一次是一批 200 磅,之后又发送了两批。随函附上清单。

我们正按照您的建议从金陵大学科学馆获取微缩胶卷,下次通信中我们会报告结果。

印度国大党派遣的援华医疗队成员巴苏大夫发来电报说,印度在拍一部印度斯坦语和英语的双语影片,以纪念该医疗队另一名成员、为了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而献身的柯棣华大夫。

送上委员会的问候。

诚挚的,

(签名)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

4. 马海德致宋庆龄函副本(1944 年 7 月 28 日)

国际和平医院

延安

1944 年 7 月 28 日

孙逸仙夫人

保卫中国同盟

重庆

亲爱的朋友:

这个地区的时代和时间观念似乎经历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我不知道在现代社会如何能将事情很快做好。回复一封一年前的信似乎有点丢脸,但这是第一次有机会这么快就把一封信写完。看来我得改变我的时间观念,加快工作节奏。

自外国记者们到访以来,现在又有新朋友从天而降访问我们,因此我们可

以寄来更多的材料,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过去似乎忽略的地方。迄今为止,他们对我们医疗工作的整体印象似乎很好。我刚刚和卡斯伯格少校^①参观了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②,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说:“这对于任何医院都是一个挑战。在看到这样一个机构在极少的物质援助下却运行如此良好和如此高效之后,这让我感到当我再次回到配备了所有现代化设备的医院工作时,我应该振奋起来,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以此向这里的工作人员致敬。”即便是非技术人员也对他们目前所看到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爱泼斯坦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给您寄去了一些我们帮助他收集的材料,所以这封信就不多说这方面了。我想告知您的是,记者们送来的物资已立即投入使用。就在今天早上,我们和卡斯伯格医生一起在儿科病房查房时,看到了一个康复期的肺炎病例,是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是记者团带来的磺胺噻唑救活了他。我们一岁以下这类病例死亡率极高。对于每一个人所遇到的麻烦和所付出的努力,单单是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母亲脸上那感激的表情,就已经是胜于无数次的感谢。我们并不是想要从那位母亲那里得到感谢,而是我们心怀感谢,因为这次(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病例(我来告诉你我们的常规做法)都有专门的护士,日夜守护在床边尽其所能,还有值班的医生随时准备在两分钟内赶到,缓解可能出现的呼吸困难或呼吸停止等情况。所有这些努力最终因孩子的死亡而付诸东流,又失去了一个本可以被救活的生命,如果……。这样的故事重复得太多而不再记录下来。

米勒大夫今天早晨刚带着整批塞佛散和奎宁动身离开(塞佛散和奎宁是飞机运来的,飞机上的味道还没有消散),前往我们的一支部队,那里正在流行回归热和疟疾。他认为,有了大量的预防性工作和药物,他很快就能很好地控制住疫情,但如果其他任何地方再暴发疫情,那将是又一场束手无策令人心碎

^① Melvin A. Casburg, 梅尔文·A·卡斯伯格少校, 1944年8月随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成员抵达延安。马海德作为中方工作人员陪同美军观察组参观。

^② 即中央医院。1939年9月中共中央卫生处筹建中央医院,选址于延安城北李家岔村的山坡上,11月7日举行开幕典礼。中央卫生处傅连璋处长兼任首任院长。1944年中外记者团来访时,该医院大门右侧立柱刻有“中央医院”,左侧立柱挂“国际和平医院总院第一部”木牌。

的战斗。简而言之,在我看来,这两个例子代表了病人和医务人员都是勉强生存,与死亡抗争。及时通过磺胺噻唑治疗伤病者的情况非常罕见,这也是我印象如此深刻的原因。

在我与使团的医生卡斯伯格少校的谈话中,我得知和上次战争相比,这次战争对伤员的医疗照顾更好,而且死亡率下降到了令人吃惊的低水平。他将此归结于三个因素:战地血浆输血、磺胺类药物内服和外用,以及航空运输。只有比我更有勇气的医生才能忍心去尝试将我们为伤员提供的医疗服务进行类似那样的比较,但同时令人心碎的是,当今世界上有方法和手段去拯救那些为抗击我们共同的法西斯敌人而战斗的人(他们积极投入,正如我们报告中所见),但他们却仍然得不到必要的医疗护理,更别说是更高级的药物了。我知道保卫中国同盟正在尽一切可能帮助第十八集团军和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疗服务工作。多年来,这一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因素。

将美国军队的伤病员医疗服务和我们的进行比较,再看看您和您的组织过去所完成的艰巨任务,我鼓起勇气提出一个肯定会很快得到当局认可的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尽量为在敌后奋战的每一位第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战士的急救包中配备一包磺胺粉和磺胺片。这一举措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如果能够实现,伤员的死亡率将大大降低,战斗的士气将会高涨,医疗服务将真正能够为伤员做些很好的事情。举个例子,一个民兵或者一个3到5人的小分队要袭击一个通讯点,他们无法带上医生和护士,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护。如果他们受伤,敷上磺胺粉包,服用几片药片,他们被运送时就能支撑48小时或更长时间,保持伤口不受感染,为手术提供可能性。这在我们目前的工作中通常是不可能的。米勒大夫、我本人以及数百名在第十八集团军工作的我们的中国同事都能够而且确实也讲述过这样的事例。使用磺胺粉这一简单技术不需要培训。每个战士都是自己的急救员。我们的战士是不怕日本人的,如果我们也能减轻他们对受伤的恐惧,他们的勇气将是不可战胜的。在我采取进一步措施之前,您能尽快告诉我您对这个建议的看法吗?

近期事件的种种迹象显示,至少就通讯而言,保持联系可能将更容易些

(我希望它的意义不仅于此),您要的材料和提出的要求,可以处理得比过去更快、更容易。爱泼斯坦先生在这里非常积极地开展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甚至不惜牺牲他的其他工作,而我应该以他为榜样,比过去做得更多。为您正在从事的工作提供帮助不是我来帮忙,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晚我要带卡斯伯格医生去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带他参观我们的机构,希望不久能有机会再给您写信。

我过得很好,也希望您身体健康,精神愉悦。我和我的家人一起祝您一切顺利。

敬礼!

(签名)马海德

5.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①致宋庆龄函(1944年6月5日)

陕北延安

1944年6月5日

亲爱的孙夫人:

科马克·夏南汉神甫正要和中国记者们以及政府官员返回重庆^②,借此机会,我让他给您带去目前我收集到的有关保卫中国同盟项目的所有印刷的和书面的资料,以及一些说明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样例表格、报告等。

我还有很多以采访等形式收集的材料,但是我们太忙了,没有机会写出来,所以我会把它们带回去。此外,医院工作人员目前正在准备以下三方面材料:(1)向援助组织提交的有完整数据的正式报告;(2)富于信息和兴趣、用于广泛传播和激发热情的一般介绍;(3)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科学论文以及对医学专业人员的动员。关于第三类,乍一看,在边区的原始条件下组建起来的医院似乎没有什么贡献。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科学工作持续展开,而普通治

^① 原档案未注明写信人,根据相关史实及信件内容推测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在延安采访期间曾在马海德陪同下采访国际和平医院。

^② 1944年7月12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全体中国记者和外国记者夏南汉神父返回重庆,其他外国记者留在延安继续采访。

疗手段的缺乏刺激了如广泛应用输血作为替代治疗、斯佩兰斯基法或脊柱穿刺法和颈椎阻滞等方面的研究。此外,在使用本地供给品制造简易仪器方面也进行了许多实验——医生们不仅制作了他们自己的听诊器和类似简单的设备,还制造了人工气胸仪、用于骨折的髓内钉(我认为他们在后方不管哪里都用不上这种技术)等各种各样的仪器,以及诸如康氏抗原的试剂——跟外界用的质量是一样的。现在,所有较大医院都有自己的血库——既有“活血库”(所有工作人员都要记录在册,以便能随时找到),也有“储存血库”——主要是分娩后保存的胎盘血。自今年年初以来,仅国际和平医院第一部的外科诊所就进行了数百次输血,200—400 毫升不等。一篇总结所有即时工作经验和替代疗法经验的文章正在准备中。

医学领域的持续研究、试验和即时创新,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边区的所有的生产和活动领域,都是这样的。注重目标性和责任感的教育方法,个人与组织之间系统的经验交流,对个人和群体克服困难的主动性的大力宣传,各领域的民主讨论和互帮互助,因为上述种种,发明和创新并不是由少数几个孤立的伟大头脑来完成的,而是每个人都热情参与公共事务——无论其目的是治愈疾病还是提高生铁产率。

今天我要发给您的材料是国际和平医院徽章、到处可见的《学习白求恩十项公约》、医院用表格、病例样本、验尸会议报告(其中有所有医务人员的治疗报告,还有相互批评以及未来如何改善治疗的讨论、一份护士报告样本、一份护士文凭样本、从墙报上撕下来的由那些来医院时还不识字的护士、厨师和护理员写的报告他们工作进步的文章,还有化验报告,以及位于柳树店的国际和平医院内部人员编制的原始预算等)。

还有一个文件是《解放日报》的“健康版”,反映对卫生预防、营养(现在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目标,因为这里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需求,食品的总体水平和种类都比重庆要高)和公共卫生教育的高度重视。这些报纸和其他附上的报纸剪报里包含了大量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材料,都应该翻译并加以利用。

现在来谈谈这里的国际和平医院组织结构。延安的医院现在有四个部,共有约500张床位。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在刘万家沟,主要治疗军队病例——前线伤员、旧伤康复、为现役和退役军人治病,也为平民治病(这里有很好的妇产科,本区的农妇都到这里来生孩子);国际和平医院第一部(中央医院)专门给老百姓看病,除非部队病人压力过大;第二部在城南门外;第三部隶属中国医科大学,有80张床位,病例是根据教学价值挑选的。这四个部都有门诊。

关于其他国际和平医院,我很高兴地告诉您,我们终于能够获取关于所有这些医院的全部报告,叙述全面,尽管不一定是统计详尽的。晋察冀边区司令聂荣臻将军和卫生部副部长等工作人员现在在这里,林迈可^①也带着大量材料来了。我已经能够找到最近来自晋东南的人(比米勒大夫更晚)以及来自新四军的人(从这些地方来的医生和护士被送到这里接受高级培训——因为中国医科大学现在能够提供完整的研究生课程了)。

关于洛杉矶托儿所的一份报告也在材料当中。

如果您能在这里看到国际和平医院和其他由保盟支持的项目,您会感到高兴和自豪的,因为(保盟)已经做了这么多工作,而且做得这么好,因为到处都洋溢着的精神,因为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我从未见过比他们更好的人——如此努力地克服技术和经济的困难(他们亲自在医院周围的贫瘠土地上耕作,直到这些机构能够做到蔬菜自给自足,而且在这方面不再需要依靠外国基金或边区政府,他们自己纺纱、织布、缝纫,制作了医院大部分的麻布和衣服)。这里的卫生程度和对病人的关注让我们所有的记者都觉得,尽管存在不足,但如果他们必须去医院的话,他们宁愿来这里,而不是去他们在中国看到的其他任何地方的医院。

我希望,到我们回来的时候,这封简略的信和所发送的材料可以用来向所有的朋友以及资助组织介绍这里正在开展的工作。关于中文资料,我希望有可能在重庆召集一些同情者承担翻译的工作。徽章是给保盟成员以及海外给

^① Michael Lindsay,中文名林迈可,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技术顾问,同时任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延安大学电讯技术教员。

予我们最多帮助的人的,棕色的徽章以及绿色徽章中的一枚是给您。

诚挚的,

附笔:哈里森·福尔曼已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了一篇关于国际和平医院的好文章(6月19日)。如果通过审查,一定已经见报了。请让埃尔希^①确认一下。她应该通过有权检查福尔曼电报的某人去问——也许还能给您弄一份副本。

6.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②致宋庆龄函(1944年7月8日)

延安,7月8日

亲爱的孙夫人:

这里的雨水阻碍了中国记者和夏南汉神父的动身行程——也让收集一些新材料成为可能(我说“一些”是因为它们只是现有材料的一小部分,但同时它们又比保盟任何一年收集的都要多)。

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所现已并入延安大学。关于此事稍后会有报告。抗日大学(抗大)现在完全忙于军事工作并且已经被分散,在不同的战线上有十多个分支机构。我建议用延安大学代替抗大作为我们为之呼吁(援助)的组织,因为这里的更有普遍的吸引力。

药厂的一大盒产品样品已经准备好了,我会把它们带回来。还有这里生产的仪器样品等。如果雨再下几天,还会准备一些照片让夏南汉神父一起带上。

外国记者们将于8月初奔赴前线。我希望越过同蒲铁路,进入晋察冀地区。我们都会在9月底返回。

所有的英文报告都要尽快打印、寄出,并呈送给援助机构。等我们回来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材料。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① Elsie,即 Elsie Fairfax Cholmeley,中文名邱茉莉,爱泼斯坦的妻子。

^② 原档案未注明写信人,根据相关史实及信件内容确定为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7. 宋庆龄致卡特夫人^①函(1944年6月8日)

新村3号,重庆

1944年6月8日

亲爱的卡特夫人:

此时,希望您已收到我感谢您1月25日来函的信了。我想借此机会再次告诉您,我们是多么重视您已经为保卫中国同盟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我将四幅竹卷与此信一起寄给您,竹卷是四川最著名的物件之一。恐怕这些都不足以表示我们的感激,但我希望它们能让您对中国有一点了解。

就在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个显微镜礼物。这当然是我们能告诉您的最好的消息之一,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想要一台。从我们收到的所有报告来看,和平医院的工作因为缺乏这一设施而大受影响,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也希望不久能有机会将它送往西北。

最近一位美国飞行员来到重庆。他在汉口附近降落下来,被农民们带到一个八路军队伍的司令部。他受了伤,但是他说他在非常棘手的情况下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他们不得不将他藏了许多天,并在夜间将他送到安全地带。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些游击队如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

希望您身体健康,夏季的时候能稍事休息。我们期待着再次收到您的来信,同时向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诚挚的,

(签名)宋庆龄

(孙夫人)

二、1944年10月5日收件

马海德致宋庆龄函副本(1944年8月13日)

^① Edward Carter,爱德华·卡特夫人,曾任美国援华会领导人之一、中国战灾孤儿和儿童福利美国委员会主席。

延安

1944年8月13日

中国重庆

保卫中国同盟

孙夫人

亲爱的孙夫人：

我们收到关于“柳拐子病”详细情况的咨询，设法获取了以下信息。我知道这些信息是很少的，但却是在我们能力所及范围内能够获得的所有资料了。唯一能另外获取的就是一组不完整的骨头，显示患者骨骼的变化。如果有用的话请告诉我，一有机会我就把它寄过来。

A. 发现该病的区域

该病例发现于陕北的合水、槐树庄等地区，以及南泥湾和甘泉地区。这一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森林和深谷覆盖。人口非常稀少，完全依赖谷内溪流流下来的水生活。水质有点黄，有锈色和泥沙。

B. 患病的年龄段

该疾病侵袭的是从青少年开始至20岁的人群。我们已经看到过早自7、8岁，晚如20岁的病例，但不常见。有时新来的人即使20岁也得上了这种病。该病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常见。

C. 病程与进展

该疾病通常以下肢的肿胀和压痛开始，随后出现一些肌肉萎缩现象。病人的膝盖、肘部和手指部位的关节慢慢变大，3至4年后肘关节的活动和曲度受限。肘关节最多能伸展至90度。曲度受限导致指尖够不到肩膀。许多病例显示脊柱后部弯曲，走路时膝盖永久性向前弯曲。我在调查一个陕北典型的18岁男性病例过程中记录了以下全部症状：偏瘦，营养不良，肘关节伸展和弯曲受限，双腿向内弯曲明显，胫骨内部骨节变大，腕关节近乎僵硬，手指关节变大（关节表面周围的骨头变大），扁平足，踝关节也有跟其他关节一样的问

题,脚趾显示出与手指一样的变化,牙齿状况不好,有龋齿。手指和脚趾又短又粗,胫骨也是。这些骨头明显在变短,但是其他长的骨骼表面上看长度是正常的。病人诉称膝盖和肘部关节疼痛,并且能感到类似外生的骨瘤。另一个病例是一位来自山东的24岁男性,童年时来到该地区。11岁时开始出现疼痛症状。另外一例也来自山东,疼痛自34岁开始。还有一例23岁,陕西人,除了没有扁平足以外,上述症状都有。他们走路都是摇摇晃晃,跛足和内八字。肌肉看似发育正常,反射也有。

这些病人有一些显著并发症:甲状腺肿大、心脏病以及风湿病。然而该疾病又与佝偻病、软骨病和变形性关节炎有所不同。

典型病例的饮食:每年12斤肉,每天1磅小米,每年6斤菜油,还有野菜、卷心菜、芜菁、腌菜、玉米。每年12斤盐,每月有一天吃小麦或小麦制品。唯一可以吃的一种水果是天然稀有长在山里的杏子。

环境和气候:大部分人群生活在山谷里和靠近森林的地方。树木主要是柳树、槐树和杨树。深谷中少有阳光,暴雨频繁,排水区被腐烂的植被、叶子和木头所覆盖。中午天气极端炎热,人们可以赤膊干活,傍晚和夜间就得穿上棉衣。农民们说一天过两个季节——夏季和冬季。

几点综述:当地人和青春期前后来到该地区的人都容易得这种病。20多岁以后该病似乎就停止发展了,但是畸形和骨骼发育迟缓现象依然存在。骨骼研究显示出骨头有变化,关节表面骨质有变形,包括组成肘部、膝盖以及脊柱关节的骨头。这些变形非常显著,就像是一团柔软的填塞物被挤在硬物中间,一部分溢出来了。

这是我们对该疾病的基本认识。还不可能对水质进行化学分析、拍X光片或验血。如果掌握更多的信息,我们将乐于帮助解决医疗方面的问题,为人民的福利和健康做贡献,不仅为抗日战争,也为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幸福的新中国。

希望您已收到我们的上一份材料。美国军医卡斯伯格刚参观了我们的卫生学校,对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并非常赞赏。他正在写一份很长的医疗报告,以呈交给他的上级。他答应给您一份副本。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致以最诚挚的敬礼!

马海德大夫

三、1944年12月6日收件

1.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4年9月25日)

新村3号

重庆

1944年9月25日

亲爱的普赖斯小姐:

希望您已经收到我8月1日信件以及一并寄给您的那些报告和第114号收据。我们还于8月30日给您寄了一些报告,于9月19日寄去了119号收据。

上次开会的那天,我们在重庆收到了0.75吨的医疗用品。这是昆明的美国红十字会拨给我们物资的一部分。几天后,一辆卡车驶往西北地区,这些物资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其中包括急需的X光机和手术器械。

我们重庆的协进会正为中国的文化界人士——贫病交加却无法得到医治的作家和艺术家们——组织一场舞会。我们希望两个晚上筹集至少50万元来救济这些人。我们订了重庆最大的大厅,能容纳300人,500元一张的入场券都已售罄。其余的资金将来自抽彩售物、拍卖和饮品销售。

谨致问候。

诚挚的,

(签名)宋庆龄

2.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4年10月4日)

1944年10月4日

亲爱的普赖斯小姐:

根据我们的新规定,我们这里每次会议后贵方都将收到一份报告,我们很

高兴地告知您,本地配给站借给我们的缩微胶卷正在本地拷贝,如此一来国际和平医院将能够无限期保有和使用它们。这些胶卷制作好后会送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能再将它们用小包裹转寄出去。我们相信国际和平医院收到后可立即加以很好利用。

我们延安的通讯员^①近日来信告诉我们,中国医科大学有两个班的学生即将毕业并被派往前线。我们被告知,他们需要听诊器,数量是200个。很遗憾,我们无法满足这样大的需求。马大夫还询问是否可以在这里弄到听诊器用的橡胶管,因为他们可以制作一种临时听诊器。我们正在尝试为他们募集听诊器,但不能期望达到指定的数量。

我们已经向您汇报了上周五和周六晚上在胜利大厦舞厅为帮助当地贫困艺术家和作家举行的舞会。募得的款项总额接近80万元法币。这笔经费将由抗日作家文化协会代表和我们委员会的一位代表组成的小型委员会进行管理。

最近,我们得以将本地所有的医疗用品,甚至一些笨重的物品,托运到国际和平医院。所幸交通情况已得到改善,而且每个人都乐于帮忙。

谨致问候。

诚挚的,

(签名)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

3.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4年10月27日)

1944年10月27日

亲爱的普赖斯小姐:

您7月24日和9月14日的两封信,已于近日在同一个邮件中到达。

我们非常高兴地得知美国战争信息(OWI)办公室正在为我们制作缩微

^① 即马海德。

胶卷,那些军事医学书籍也将很快送到我们这里。另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是,布鲁克林的托马斯·杰斐逊高中师生捐出 176.40 美元用于儿童工作。请将所附的感谢信转交给他们。

您在上述来信中已经告知收到了我们寄去的药品样品。我们非常有兴趣听取专家们对这些药品的看法。

麦康纳大夫并没有如您所述给我们带来《在中国游击区》,而是带给我们两块漂亮的手表给国际和平医院的护士用。您好意送我的新打字机,他也带给我了。这些礼物将极大地促进我们的工作。

我们运送给伦敦联合援华会 600 本《在中国游击区》供他们分发,我们可否建议您请伦敦联合援华会为此付款? 我们刚刚得知,该会已分配了 7 箱医疗用品给我们:5 箱药品、2 箱绷带及敷料。

我们之前已告知您,近日为援助贫困艺术家和作家举办的两次舞会,通过入场券、抽彩售物和拍卖,共筹集近 80 万元。这笔款项已移交给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委员会,我们自己的委员会也向该会派出了一位代表。

自上次给您写信以来,我们已收到医药援华委员会的 31 670 元法币用于国际和平医院,美国援华会为儿童工作提供的 1 338 950 元法币,也通过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收到了。

X 光设备已从美国红十字会收到,并已运往国际和平医院,这一情况已向您汇报。我们想提醒您注意的是,这里美国红十字会的尼科尔斯先生将这台 X 光设备分配给我们之后抱怨说他认为这种最新设备在国际和平医院地区无法使用,而且“穷人不需要这么好的设备”。我们想知道纽约的美国红十字会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尼科尔斯先生在做了分配之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不过,之后他又拨了一些医疗用品给我们。

诚挚的,

(签名)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

4.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4年11月1日)

1944年11月1日

亲爱的普赖斯小姐：

寥寥数语告知您，在史迪威将军的善意帮助下，我们已经成功地用飞机运送了大型X光机和许多箱捐赠物资。你可以想象他离开之时我是多么沮丧。自战争以来，他为中国人民所作的贡献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多。

爱泼斯坦夫妇下个月将乘船离开。他们将在纽约写一本书。你可以从伊西那里了解到很多关于过去5个月里外国记者访问过的解放区的情况。

除了救济工作以外，我还忙于很多我认为也是必要的其他工作，否则我就要离开重庆了，因为这里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瓦茨先生会告诉您这里的一些情况。

感激的，

(签名)宋庆龄

四、1945年5月15日收宋庆龄函副本

宋庆龄致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函(1945年3月14日)

两路口新村3号

重庆,1945年3月14日

米尔德里德·普赖斯小姐

美国援华会执行秘书

纽约州纽约市

百老汇1790号

亲爱的普赖斯小姐：

相信您此时已经收到了我们2月24日回复您诸多问题的长信。此后发

生的事件如下:我们非常高兴地向您报告,中英科学合作馆拨给我们一些用于国际和平医院的设备,包括显微镜、一台电动恒温箱和其他急需的设备。美国红十字会拨给我们 20 箱物资,其中包括一台汽油发电机。这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因为到目前为止,X 光机还得接在无线电台的发电机上。

请允许我代表本委员会表示衷心感谢,并确认收到下列两笔款项:

用于国际和平医院的 35 556.00 美元

用于儿童工作的 8 888.00 美元

按初步的 100:1 费率计算,折算款额分别为法币 3 555 600 元和 8 888 800 元。说是初步费率,因为联合清算委员会在每月的月底平整汇率,再另付款给接收人。随函附上我们这两笔款项的第 154 号和第 155 号收据。

在近日收到的信中,您提及贵方委员会急切地想知道延安是否已收到青霉菌培养组织,以及该实验的结果如何。我引用了近日马海德大夫一封来信中相关的一段:

“傅莱^①大夫正试着从您通过美国援华会送来的培养组织中培育出外用青霉素。操作说明应该在缩微胶卷里,但是缩微胶卷里没有适合这些化学元素(琼脂、碳酸钙、玉米浆、葡糖化酶)的操作工序,所以他想找找看是否另有其他关于这些物质的资料或者操作指南。如您对此能提供帮助我们将不胜感激。”

收到这封信后,我们的一位委员去拜访了中英科学合作馆的 A.G.桑德斯大夫,他是弗莱明^②大夫从青霉菌中提取青霉素实验的最早合作者之一。桑德斯大夫非常慷慨地给我们寄来一份生产青霉素的备忘录,还有一份专门讨论青霉素生产的医学杂志,以及一支装有另一种原霉菌培养组织的试管。这些材料已转往延安,我们希望桑德斯大夫知悉上文引用段落的内容并切实解

① Richard Frey,理查德·傅莱,原籍奥地利。1944 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以美国援华救济联合会(UCR)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会(CAC)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获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并积极投入青霉素的研制,于 1945 年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批粗制青霉素。

② Alexander Fleming,亚历山大·弗莱明(1881—1955),英国细菌学家,生物化学家,微生物学家。1928 年首先发现了青霉素。

答这一问题后,青霉素的进一步生产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

致以最亲切的个人问候。

诚挚的,

(签名)宋庆龄

(孙逸仙夫人)

附录

I. Letters Received on September 6, 1944

1.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July 25, 1944

Dear Miss Price:

Many thanks for your letter of May 29th which has just arrived. We were particularly delighted to have the copy of IN GUERRILLA CHINA and the Newsletters. IN GUERRILLA CHINA is certainly beautifully printed and as soon as we have had a chance to read this and the Newsletters we will write you further.

The amount of NC \$ 4,499,955 has now all been paid over to us and Mr. Edwards says that the July payment will be advanced as soon as the Clearing Fund has transferred money to the UCR account. The receipt for the \$ 750,000 has already been sent to you for \$ 15,000 U.S.(No. 108) and the receipt for the balance is enclosed herewith.

Also enclosed is a letter in Chinese addressed to the Chinese Hand Laundry Alliance, which please pass on.

Also enclosed are two reports, one of the work of the Bethun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at Yen-an, and the other of the work of the Bethune IPH Section No. 3. We wonder if owing to the difficulty we have in sending bulky mail whether you would get these copied and sent to Miss Kipling in Canada and Lady Cripps and the China Campaign Committee in England. I wonder if you have been able to send copies of the report to these organizations.

2.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August 1, 1944

Your letter No.36 dated June 30 has just arrived for which very many thanks. I

hope that by this time you will have received the missing enclosures which were sent with another letter. Please let me know if they are still missing.

One of the copies of the report that you so kindly sent has at last arrived and we were all very glad to have a chance to see it. It is certainly very beautifully printed and I am afraid that you must have ha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on it to get it into shape. Both the Committee Members and I think it is splendid and appreciate very much your having done it for us. The only comment we wish to make is about the list of Resident Members which is not quite accurate and which we had thought for several reasons had better be omitted. Of course now that the Report is in circulation it does not matter, but I hope that you will keep it in mind if the Report is reprinted.

We were also very glad to receive copies of your Newsletters and the newspaper clippings. The materials which you sent us on the "limping disease" have already arrived at their destination, and I am sure they will be of immense interest and use.

We were very sorry to hear of the trouble in San Francisco, but we will write the letter to Mr. Sam Young in Chinese, although I do not know if it will be ready to send with this letter or not. We shall have to address it to the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Workers Mutual Aid Association since we do not know Mr. Young's Chinese name.

At our meeting yesterday it was decided that we should take one percent of the funds you send to cover our operating expenses here. We do not expect with the improving exchange that we shall need the whole of this amount, but if this proves to be the case we shall of course pay it back into the funds for remittance at the end of every month or so.

Mr. Edwards paid us \$ 750,000(NC) at the end of June for the May and June appropriation. This was an advance payment. The balance of \$ 3,749,955 was only sent to us a few days ago.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your thoughtfulness in sending the July appropriation early, but up to the present time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payment on this.

Some of the Press Party from Yenan has already returned and we have received an-

other batch of reports and material which we hope to be able to send you shortly. Some of the material is already in English and some has to be translated.

Many thanks for sending the copies of "In Guerrilla China" to the Aruba Committee. We will also write to them and repeat your request that they remit to us direct.

It has been impossible to find anyone to take Mr. Foster's place yet, but Cynthia Lee, one of our old Hong Kong members, is acting for him. In a case she is our assistant treasurer.

We feel that we can sympathize with you in having to work in such heat, for the last week was intolerably hot here also. Ninety-nine degree indoors for the past few days. But we hope you are not suffering too much now.

With greetings from all the Committee and myself, to you and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China Aid Council,

Sincerely yours,

Mme. Sun Yat-sen

P.S. Have just received the shoes which you so kindly sent via Mr. Pitch. Please don't send any more because I've been given some by my sisters who have left for Brazil. Last week I met Jean Lyons for the first time. I hope the stay here will benefit her. Love to you.

SCL

3.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August 14, 1944

This is to report to you what transpired at our regular bi-weekly meeting today. In several other letters herewith enclosed, we have mentioned the great number of materials received in recent weeks. This letter brings you two lists of materials sent to

you; one a list of drugs manufactured in Yenan; the second of reports and other printed material. Samples of drugs manufactured in Yenan are being sent to you in a separate 10 lb parcel by the same safe hand who brings you this letter.

We are also enclosing herewith receipt for NC \$ 1, 797, 762.87, which is an advance on the July appropriation at an exchange rate of 100 : 1. Word from UCR here says that the final July rate may be even higher, in which case we will receive the difference.

The number of photographs, listed on one of the above-mentioned lists, which we are able to send you will interest you. Also copy of a letter received from Dr. Ma Haitteh quoting comments from an American Army doctor about impression of the medical work in the IPH.

Since we have been asked by the UCR representative here whether we want to make any changes in our submitted budget for 1944, we are asking for a total equivalent to US \$ 1,000,000(the amount you originally asked for in our behalf)at whatever the new rate of exchange may be. The budget we handed in had to be made out in NC \$ which may mean that, at the now higher rate, we get an actually lower appropriation in US \$ than before.

You will be glad to learn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send quite considerable quantities of medicines and medical supplies to the IPH recently, at one time 200 lbs. in one batch, and two more shipments have been sent since. Lists of supplies sent herewith.

We are following up your suggestion of securing microfilm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Science College here, and will report results in our next communication.

A telegram from Dr. Basu, member of the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medical unit to China, says that a film is being made in India in both Hindustani and English commemorat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Dr. Kotnis, another member of the unit who died working with the IPH.

With greetings from the Committee,

Sincerely yours,
/s/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4. Letter from Ma Hai-teh to Mme. Sun Yat-sen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Yen'an
July 28, 1944

Madame Sun Yat-sen
China Defence League
Chungking

Dear Friend:

Times and conception of time in this region seem to undergo such a change that I have no idea of how fast things can get done in a modern age. Writing in answer to a letter of a year ago seems a shame, but this is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get a letter through so quickly. It seems that I must change my conception of time to work at a much quicker pace.

Ever since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ame up, and now with the new friends dropping in on us from the sky, much more material can be sent and in a way try to make up for the seeming neglect in the past. So far, the whole impression that they have received of our medical work seems to be very good. I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 visit to the first section of the Yen-an(Bethune) IPH with Major Casberg, and he was very favorably impressed. He stated that "this is a challenge to any hospital. After seeing such an institution so well run and so efficient with the very little material aid at their disposal, it makes me feel that when I work again in an institution with all the modern equip-

ment I should got on my toes and work harder than I ever did, as a tribute to these boys here." Even the non-technical personnel has high praise for the work that they have seen so far.

Mr. E. has informed me that he has sent you quite a bit of material that we helped him collect so that this letter will not contain so much information along those lines. I would lik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supplies brought in by the correspondents were immediately put into use. Just this morning while making the rounds of the pediatrics ward with Dr. Casberg, we saw a case of convalescing pneumonia, an infant of 8 months who was saved by the sulfathiazole brought in by the press party. Our mortality rate for these cases under one year of age was extremely high. Just the thankful look on the mother's face that we saw this morning would have thanked anyone a thousand times over for any trouble or effort that would have been put out. It is not that we want the thanks from that mother but we are thankful that this time there were results to show. Usually, such cases(I will tell you of our routine) have a special nurse day and night, just guarding the bedside to do what she can, and a doctor on night duty ready to come within two minutes to relieve, if possible, any dyspnea or stopping of breathing. All the reward for such efforts usually ended up with a dead child, one person less that could have been saved if The story is too often repeated to put in print again.

Dr. Muller left just this morning with the whole batch of salvarsan and quinine for one of our troops(salvarsan and quinine had come in by air, and the smell of the airplane had not oven worn off) where an epidemic of relapsing fever and malaria is raging. He thinks that, with a lot of prophylactic work plus the medicines, he may get it fairly well under control quickly, but that if another outbreak occurs anywhere, it will be almost another heart-breaking fight with hands tied. These two examples, it seems to me, represent in a nutshell the hand-to-mouth existence that both the patients and medical personnel lead, a hit-and-rim with death. Coincidences with sulfathiazole dropping in time to cure wounded or sick have been all too rare, and this accounts for

my strong impressions.

In my talks with the doctor of the mission, Major Casberg, I have heard so much about the wonderful medical attention given to wounded in this war, as compared with the last, and that the mortality rate had gone down so low that it is amazing. He ascribed this to three factors: blood plasma for transfusion in the field, sulfa drugs both for external and internal use, and transport by air. It would take a doctor with more courage than I have to even try to compare our medical service for the wounded with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is heart-breaking that in the world today there exist the ways and means to save the lives of those who are fighting our common fascist enemies (and no loss energetically, an one can see from reports) and are still deprived of even medical necessities, to say nothing of more modern medicines. I know that the China Defence League is doing all that is humanly possible to help in the work here of the 18th Group Army and IPH medical services. This has boon a heartening factor through the years.

Comparing the U.S. Army medical service for wounded with ours and seeing the herculean tasks that you and your organization have done in the past, I take my courage in hand to broach a suggestion which will surely receive confirmation from authorities here soon. The idea is, if possible, to make an effort to get into first-aid kit one package of sulfa powder and tablets for every fighting soldier behind the enemy lines in the 18th Group Army and New Fourth Army. The immense importance of this can easily be soon that, if this is made available, the rate of deaths among the wounded would drop immensely. The fighting morale would be raised to new heights, and the medical services would really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excellent for the wounded. Take, for example, a people's guard (Min Bing) or a small squad, 3 to 5 men, raiding a communication point. They cannot take doctors or nurses, they will be far away from immediate medical aid, If they are wounded and amply the package of sulfa and take a few of the pills, they can be transported for 48 hours or sometimes longer, with the wound fresh and uninfected,

providing the possibility to operate on it, which is ordinarily impossible on the course of our work now. Dr. Muller, myself, and hundreds of our Chinese colleagues working in the 18th Group Army could and do tell the same story. The simple technique involved in using the sulfa powder requires no training. Each fighting man would be his own first-aid man. Our soldiers have no fear of the Japanese, and if we can also relieve their fears of being wounded, that total courage would be invincible. Can you let me know your ideas on this suggestion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before I take any further steps here?

The signs and symptoms of recent events may mean that it will be easier, at least as far as communications might be concerned (and I hope it means much more than that) to keep in touch and that materials and requests that you make can be handled quicker and more easily than in the past. Mr. E. has been very active in carrying out CDL work here even at the expense of his other work, while I should learn from his example and do much more than I have done in the past. It is not a favor on my part but my absolute duty to help in the work you are doing.

I am taking Dr. Casberg to the Yen-an IPH this evening with me to show him over our institution, and hope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write to you again soon.

I am getting on as well as I would like and hope that you are keeping in good health and spirits. My family joins me in wishing you all of the best.

Salute!

/s/ Ma Hai-teh

5. Letter from Israel Epstein to Mme. Sun Yat-sen

Yenan, North Shensi

June 5, 1944

Dear Madame Sun:

I am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return of Father Cormac Shanahan, who is traveling

to Chungking with the Chinese newspaperme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send you all the published and written materials I have so far collected on CDL projects, as well as sample forms, reports and so forth illustrating some of the work of the IPH.

I have a great deal more, collected in the form of interviews, etc. but we have been so busy that there has been no chance to write it out, so I shall bring it back with me. In addition, hospital workers are now preparing material along three main lines: (1) Formal reports with complete figures for organizations which have given support; (2) General stories of information and interest for wide dissemination and stimulation of enthusiasm; and (3) Scientific articles for publication in medical journals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Regarding the third category, it might appear at first sight as though hospitals organized under the primitive conditions of the Border Region would have very little to contribute. This, however, is entirely wrong. Scientific work is constantly carried on and the lack of ordinary means of treatment has stimulated research in such things as the widespread use of blood transfusion as substitute treatment, of the Speransky method or spinal “pumping” and cervical blocks, etc. Also there has been much experimentation in the manufacture of simplified apparatus, from local supplies—and doctors have made not only their own stethoscopes and such simple equipment but also pneumothorax apparatus, Steinman pins for fractures (I don’t think they use this technique anywhere in the rear) various instruments, and such reagents as Kahn antigen—equal in quality to anything outside. All larger hospitals now have their blood bank—both “living blood banks” (all the Staff is typed so as to be immediately available) and “canned blood”—mainly placental blood saved after deliveries. The surgical clinic of the 1st Branch IPH alone has given several hundred transfusions of 200 to 400 cc.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An article summarizing all experience in improvisation and substitute treatments is being prepared.

The constant study, experimentation and improvisation in the medical field are not an isolated phenomenon here. The same thing goes on throughout the Border Region in

every branch of activity and production. Because of the methods of indoctrination with a sense of aim and personnel responsibility, of systematic exchange of experience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of publicity for personal and group initiative in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and of democratic discussion and mutual help in every field,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 are not carried out by a few isolated great minds but are public business in which everyone participates enthusiastically—whether the aim is the cure of disease or the more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pig iron.

The materials I am sending you today include IPH badges, the ten rules of Dr. Bethune which one sees everywhere, collections of forms used in the hospital, specimens of case histories, reports of post-mortem meetings (in which all medical personnel report on treatment used, and there is mutual criticism and discussion of how treatment may be improved in future, a specimen book of nurses' reports, a specimen nurse's diploma, articles torn from wall newspapers written by nurses, cooks and orderlies who could not read when they came to the hospital, reporting on improvement in their work, laboratory reports, the original budget of the IPH at Liu Shu Tien which was built by the personnel themselves, etc.)

There is also a file of the "Health Page" of the Chichfang Jih Pao which shows the great emphasis placed on preventive sanitation, nutrition (this is now no longer an abstract aim 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ere has now exceeded the need and the general level, as well as variety, of food is higher than in Chungking) and public health education. These newspapers, as well as additional clippings also enclosed, contain a great deal of material on the IPH which should be translated and used.

Now a word about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IPH here. The hospital in Yen-an now has four branches with a total of about 500 beds. There is the main IPH at Liu Van Chia Kou, which treats mainly military cases—wounded from the fronts, repair work on old wounds, sickness among active and retired soldiers as well as among the people (there is a good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department to which peasant women come from all

over the area to have their babies), the First Branch IPH(Central Hospital) which treats civilian cases exclusively except when pressure of military ones is too great, the Second Branch outside the South Gate of the City, and the Third Branch attached to th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where there are about 80 beds and cases are picked for their value in teaching. Each of these four hospitals has an OPD.

Regarding the other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I am glad to tell you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be able to have full reports on all of them, full descriptively if not statistically. General Nieh Yung-chen, commander of the Hopei-Shansi-Chahar Border Region is now here with some staff members—including the vice-head of the Medical Department, and Michael Lindsay has also arrived with much material. I have been able to locate very recent arrivals from both Southeast Shansi (more recent than Dr. Mueller) and even the New Fourth Army (doctors and nurses from all these places are now being sent here for advanced training—since the Medical University is now in a position to offer a full graduate course).

A report on the Los Angeles Children's Home is also among the material.

If you were here to see the IPH and the other CDL-supported projects, you would be both happy and proud, because so much has been done and done so well, because of the spirit evident everywhere, because the staffs of these institutions—I have never seen finer people anywhere—have worked so hard to overcome not only technical but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y themselves have worked up the waste land around the hospitals until these institutions are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in vegetables and no longer a charge in this respect either on foreign funds or on the Border Region government, and they themselves spin, weave and sew most of the hospital linen and clothing). And the cleanliness and attention to patients are such that all our correspondents feel that if they had to go to hospital they would, in spite of shortages, rather do it here than in any other place they have seen in China.

I hope that, until we return, this sketchy letter and the materials sent can be used to

give all friends and contributing organizations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work being done here. With regard to the Chinese material, I hope that it will be possible to get together a group of sympathizers to undertake translation in Chungking. The badges are for members of the CDL and those people who have helped us most abroad, and the brown badge, as well as one of the green ones, is for you.

Sincerely,

P.S. Harrison Forman has written a good story on the IPH for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dated June 19) which must already have appeared there if through censor. Please ask Elsie to check if it did. She should ask through* who has authority to check on Forman's cables—and perhaps get a copy for you.

6. Letter from Israel Epstein to Mme. Sun Yat-sen

Yenan, July 8

Dear Madame Sun:

The rains here have held up the departure of the Chinese correspondents and Father Shanahan—and made possible the collection of some new material(I say “some” because they are a small part of what is available, but just the same they are more than the League has had for any single year.)

The Lu Hsun Art Academ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 Institute have now been reorganized as sections of Yenan University. There will be reports on these later. The Anti-Japanese University(Kang Ta) is now purely occupied with military work and has been decentralized, with more than ten branches on various fronts. I suggest that we substitute Yenan University for Kang Ta as the organization for which we appeal, as the appeal here is more general.

A big box of samples of the products of the medical factory has been prepared, and I shall bring it back with me. There will also be samples of instruments made here, etc.

If the rains last another couple of days, some photographs will also be ready to go

with Father Shanahan.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are going to the front at the beginning of August. I hope to get across the Tatung-Puchow railway and into the Chin-Cha-Chi area. We are all returning towards the end of September.

All the English reports should be typed and sent off, as well as shown to supporting organiz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By the time we come back, there will be more material.

With warmest regards,

7.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rs. Carter

3 HsinTsun, Chungking

June 8, 1944

Dear Mrs.Carter:

By this time I hope that you have already received my letter thanking you for yours of January 25th.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ell you again how much we value all you have done and are doing for the China Defence League. I am going to try and send with this four bamboo scrolls which are one of the things for which Szechuan Province is famous. I am afraid that these are in no way a measure of our gratitude, but I hope they will bring a little bit of China to you.

Just today we have received a gift of a microscope. This is certainly one of the best pieces of news we could give you, for we have been trying to get one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from all the reports we get it is very obvious how much the work of the Peace Hospitals is handicapped for the lack of such facilities. Moreover, we have hopes that it will not be very long before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send it off to the Northwest.

Recently an American flier came to Chungking who had come down near Hankow and had been taken by peasants to the Headquarters of an Eighth Route Army unit. He was injured but said that he was extremely well looked after in a very ticklish situation. They had to hide him for many days and move him forward toward safe zones by night.

He told many stories showing how much he was impressed by the organization of those guerrilla troops.

I hope that now you are in good health and will take a rest during the summer months.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gain and in the meantime send you our best greetings.

Sincerely yours,
/s/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II. Copy Received on Oct.5, 1944

Letter from Ma Hai-teh to Mme. Sun Yat-sen(copy)

Yenan
August 13, 1944

Madam Sun Yat-sen
China Defence League
Chungking, China

Dear Madam Sun:

We received an enquiry for further details available on the "Limping Sickness" and have managed to obtain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It is, I know, very little but that is all that can be obtained within our means. Only one other thing is available and that is a set, incomplete, of bones of such a case showing the bony changes. If this is useful let me know and I will send it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

A. Area in which disease is found.

In North Shensi it is found in the Ho Shui, Hwei Shu Chuang and Tsang Tsung-yi

districts and in Nanning Wan and Kanchuan districts. Most of this area is highly forested with deep valleys. The population is quite sparse and depends entirely on water from the valley streams draining the region. The water is slightly yellow and has a rusty color and sediment.

B. Age groups involved.

The disease affects those approximately from the age of puberty on to the age of 20. We have seen cases starting as early as 7 or 8 years of age and as late as 20 but this is not common. Sometimes newcomers acquire the disease even at the age of 20. It is more common among males than among females.

C. Course and progress of the disease.

The disease usually starts with swelling and tenderness of the lower extremity followed by some muscular atrophy. The knee, elbow, finger joints enlarge slowly and 3 to 4 years later the flex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elbow joint is limited. Maximum extension of the elbow would be about 90 degrees. Flexion limited so that the tips of the fingers of the hand cannot be made to reach the shoulder. A number of cases show an anterior posterior curving of the vertebral column and the knees are permanently bent forward on walking. In one typical case of a local North Shensi male, 18 years of age, the following symptoms were recorded by me in one of my investigations: slightly thin and undernourished, extension and flexion of elbow joint limited, apparent knock-knees, enlargement of internal condyles of tibia, wrist movements nearly ankylosed, finger joints enlarged (bony enlargement around joint surfaces), flat-footed, ankle joint involved as others, the toes showing some changes as the fingers, the condition of the teeth bad, some caries. The fingers of the hand and the toes were short and stubby as is the tibia. These bones showed a shortening, very obvious, but the other long bones on the surface appeared normal in length. The patient complained of pain in the knee and elbow joints. What seemed to be bony exostoses could be felt here. Another case was a 24-year-old male from Shantung, arrived in region in early childhood. Pains started at

age of 11. Another case at the age of 34, also from Shantung, and a 23-year-old one, a native of Shansi, showed exactly the same symptoms except that the flat-footed symptom was absent. They all presented a dragging, double limping, knock-kneed gait. Muscles now seem normally developed; reflexes were present.

Some complications noted in these patients: goiters, heart disease and rheumatism. The disease however does not resemble either rickets, osteomalacia and arthritis deformans.

Diet of one typical case: 12 catties of meat per year, 1 pound of millet daily, 6 catties of vegetable oil yearly, wild vegetables, cabbage, turnips, pickled vegetables, corn. Twelve catties of salt yearly and one day meal of wheat or wheat product per month. Only fruits eaten are few raw apricots growing in mountains.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Most of the population live in the valleys and near the forests. Most of the trees are willow, Hwei, and Yang trees. In the deep valleys there is very little sunshine, frequent cloudbursts, and the drained area is covered with rotting vegetation, leaves and wood. At noon the weather is extremely hot, people can work naked to the waist, while at night and in the evenings cotton-padded clothes must be worn. Farmers speak of living through two seasons in one day—summer and winter.

A few general remarks: Both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people who arrive in the region around the age of puberty are susceptible to the disease. After the age of 20 odd years the disease seems to stop but the deformities and stunted growth of bones remain. Bony change as divulged by skeletal studies show that there is lipping of the bony surface of joints, including the bones forming the elbow, the knee and the vertebral joints. The lipping is very pronounced as if a soft putty was squeezed between solid objects and part of putty oozed out.

This about sums up our knowledge of the disease.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make a chemical analysis of the water nor has it been possible to make X-ray plates or blood chemical analys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is needed which we possess we would

be very glad to contribute to help solve the medical problem and also to contribute to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making a healthier population both for the war against Japan and for building a free, new, independent, happy China.

I hope that you received our last material O.K. Dr. Casberg of the U.S. Army has just visited our medical school and has been very favorably impressed by what he saw. He is now writing a long medical report which he will send to his superiors. He promised to give a copy to you.

With my best wishes for your good health and success,

Sincerest Salute!

Dr. Ma Hai-teh

III. Letters Received on December 6, 1944

1.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3 Hsin Tsun

Chungking

September 25, 1944

Dear Miss Price;

I hope that you have received safely the reports and receipt no.114 that I sent with my letter of August 1st. On August 30th we also sent you some reports, and on September 19th receipt No.119.

On the day of our last meeting we received in Chungking three-quarters of a ton of medical supplies. These were a part of the allocation given to us by the American Red Cross in Kunming. A few days later a truck left for the Northwest and the supplies are now well on their way. They included an X-ray set and surgical instruments that have been so badly needed.

Our Chungking Promotion Committee is organizing a danc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ultural people of China—writers and artists—who are suffering very much from illness produced by semi-starvation and who have no means to get hospital attention. We hope to raise at least \$ 500,000 in the two evenings for the relief of these people. We have taken the largest hall in Chungking which holds about 300 people and tickets at \$ 500 are all sold out. The rest of the funds will come from a raffle, an auction, and the sale of drinks.

With kind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S/ Soong Ching Ling

2.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October 4, 1944

Dear Miss Price;

In accordance with our new ruling that you should receive a report after each of our meetings here, we are glad to report that the microfilms we were loaned by the local distribution center are being copied locally, so the IPH will be able to keep and use them indefinitely. Since these films are being sent to us as they are ready, we have been able to send them forward in small parcels. We are sure that they are being put to good use immediately after receipt at the IPH.

In a recent letter, our Yenan correspondent told us of two classes of th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graduating and being sent to the front. They need stethoscopes, we were told, and request was made for 200 of these. Unfortunately, we are not able to comply with such a large request. Dr. Ma inquired also whether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get the rubber tubing for the stethoscopes here, as they are able to make a makeshift kind of such instrument. We are trying to get stethoscopes for them, but cannot expect to reach the specified number.

We reported to you already about the local drive in aid of needy artists and writers, viz. a dance last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at the Victory House ballroom. The total

amount raised is just below the NC \$ 800,000 mark. This money will be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small committee formed from among representatives of the Writers' Anti-Japa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with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our Committee.

By a recent consignment, we were able to move forward to the IPH all medical supplies on hand locally, even some bulky and weighty stuff. Transportation is luckily improved, and everybody is being very helpful.

With kindest regards,

Yours sincerely,

/S/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3.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October 27, 1944

Dear Miss Price:

Your two letters dated July 24th and September 14th, respectively, came nearly in the same mail recently.

We are more than glad to hear that microfilms are being made on our behalf by the OWI, and that Army Medical books will be sent to us shortly. It was also gratifying news that teachers and pupils of the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in Brooklyn set aside the sum of US \$ 176.40 for our children's work. Please be good enough to forward to them the enclosed letter of thanks.

It will be very interesting to receive the opinion of experts on the samples of medicines we sent you and which you acknowledge in one of the above-mentioned letters.

Dr. McConaughy did not bring us a copy of "in Guerrilla China" as you had intimated, but he handed us two beautiful watches for nurses of the IPH. He also gave me the new typewriter which you so kindly sent out. Our work will be greatly enhanced by these gifts.

May we suggest that you ask the London United Aid to China Fund to pay for the 600 copies of "In Guerrilla China" which were shipped to them for distribution? We have just had word that this Fund has allocated 7 cases of medical supplies to us: 5 cases of drugs and 2 cases of bandages and dressings.

The recent two dances in aid of needy artists and writers, of which we informed you earlier, netted a total of NC \$ 800, 000—for tickets, raffle and auction. This amount was handed over to a Committee of writers and artists to which we are sending a representative of our own Committee.

Since we last wrote you, an amount of NC \$ 31,670 has been received for the IPH from the Committee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and an amount of NC \$ 1,338,950 for Children's work from the CAC through United China Relief.

We have already reported to you that the X-ray equipment was received from the American Red Cross and Shipped to the IPH. We would like to bring to your attention the fact that Mr. Nichols of the ARC here complained after he had allocated this X-ray equipment to us that such up-to-date apparatus, in his opinion, would not be usable in the IPH area and that "poor people did not need such good equipment". We are wondering whether the American Red Cross in New York is aware of this situation, Mr. Nichols raising question after a grant has been made. He has, however, since then allocated further medical supplies to us.

Sincerely yours,

/ S/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4.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November 1, 1944

Dear Miss Price:

Just a line to say we have succeeded in moving in the large X-ray machine and many

boxes of donated supplies by plane, through the kindness of Gen. Stilwell. You can imagine how depressed I am at this departure. He has done more for China and her people than any individual I know since the war.

The Epsteins will leave by boat next month. They will be working in New York on a book. From Izzy you'll be able to hear very very much about the liberated areas the foreign journalists visited during the past 5 months.

I am busy doing much work outside of relief, which I consider most necessary, otherwise I'd like to leave Chungking which has become insupportable. I hope Mr. Watts will relate to you some of the happenings here.

Yours gratefully,

/s/ SCL

IV. Copy Received on May 15, 1945

Letter from Mme. Sun Yat-sen to Mildred Price

3 Hsin Tsun, Liang Lu Kou

Chungking, March 14, 1945

Miss Mildred Price

Executive Secretary

China Aid Council

New York City, N.Y.

Dear Miss Price:

I trust that by now you have received our long letter replying to many of your questions, dated February 24th. Events since then are as follows: We are very glad to report that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has granted us apparatus for the

IPH including microscopes, an electric incubator, and other urgent needed equipment. The American Red Cross has allocated 20 cases of supplies, among which is a gasoline generator. This will be a great help with the X-ray set which, up till now, had to be hitched to the radio station generator.

Let me acknowledge with the best thanks of our Committee receipt of the following two amounts:

US \$ 35,556.00 for IPH

US \$ 8,888.00 for Children

These yielded, at the preliminary 100 : 1 rate, amounts of NC \$ 3,555,600 and NC \$ 8,888,800, respectively. The rate is preliminary because at the end of each month the United Clearing Board undertakes a leveling off of exchange rates, and makes further payments to recipients. Our receipts No.154 and 155 for these two amounts are enclosed herewith.

In the most recent letter we received you stated that your Committee is anxiously awaiting information as to whether the Penicillium culture was received at Yen-an, and what were results of experiments. I am quoting a pertinent paragraph from a recent letter of Dr. Ma Hai-teh's.

“Dr. Frey is trying to cultivate Penicillin for external use from the culture that you sent up here from the China Aid Council. The instructions were supposed to be in the microfilm, but the microfilm does not have the process suitable to the chemicals sent up here (Agar, Calcium Carbonate, Corn Steep, and Glucose), so he would like to find out if there is any other material or instructions for the use of such material only. We would greatly appreciate your help in this matter.”

After receipt of this letter, one of our Committee members here went to see Dr. A.G. Sanders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 who is one of the collaborators of Dr. Fleming in the original extraction of Penicillin from the Penicillium Notatum mould. Dr. Sanders very graciously sent us a memorandum on the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together with a medical journal dealing exclusively with the subject of Penicillin production, and a test-tube containing another culture of the original mould. These materials have been forwarded to Yen-an, and we hope that further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will proceed satisfactorily, especially since Dr. Sanders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above-quoted paragraph and thus was put into a position to answer the problem concretely.

With kindest personal regards, I am

Yours sincerely,

(signed)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Tat-sen)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宋庆龄与中华救济团档案选译

王婉如 译

【译者按】

美国国家档案馆藏主题为“经济合作总署对战后中国的救援工作,1946—1948 年”(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s Relief Mission in Post-War China, 1946—1948)档案,展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寻求机会,为促进中美关系作出努力。档案包括经济合作总署副主任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Donald S. Gilpatric)的记录、地区办事处的信函以及备忘录等。

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于1946年5月来华工作,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简称“联总”)联络员。1947年,吉尔帕特里克担任美国政府中华救济团(U.S. China Relief Mission,简称“中华救济团”)团长一职,负责联总撤离后美国在华的救济工作,曾以私人名义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二届儿童福利舞会捐赠200万法币。1948年5月,他兼任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副主任。6月30日,中华救济团正式宣告结束。7月1日,美国经济合作总署驻华代表团正式成立,继续办理中华救济团此前之例行工作。

该档案中,有一卷署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档案,共160页,内容涉及1947年至1948年,时任中华救济团团长吉尔帕特里克、副团长穆迪(James P. Moody)与宋庆龄、谭宁邦、王安娜的往来书信以及中国福利基金会相关报告等。

据 1947 年 5 月 16 日《字林西报》报道,美国参议院于 5 月 14 日通过“联总结束后美国对外救济议案”(Post-UNRRA Relief Bill),决定实行新的救济计划取代联总撤离后的工作,为中国和欧洲等国提供 3.5 亿美元援助基金。在得知该消息后,宋庆龄致函吉尔帕特里克,表示中国福利基金会愿意加入该计划。她积极地开展救济工作,为国际和平医院和中国儿童争取一切可能的援助。

一、宋庆龄致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函(1947 年 6 月 13 日)

1947 年 6 月 13 日

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先生

美国总领事署

建设大厦

上海

亲爱的吉尔帕特里克先生:

我们作为自 1938 年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福利和救济项目领域工作的一个组织,自然非常关注以救济为目的的资金。我们获悉,您将负责最近美国国会给中国的物资和经费的分配事宜。我们也进一步了解到,这将承担联总撤离后的美国对外救济计划。

诚邀您于 6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4 点半来我的寓所喝茶,我希望能够与您就中国福利基金会参与该计划的可能性进行讨论。如果您不方便的话,我希望可以安排其他时间。

随函附上一份我们最新报告的副本。它简略介绍了我们的项目,您可从了解到我们项目援助的范围。

您诚挚的,

宋庆龄

(孙中山夫人)

附件：

中国福利基金会第 45 号报告书(1947 年 6 月)^①

二、宋庆龄致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函(1947 年 8 月 7 日)

1947 年 8 月 7 日

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先生

美国总领事署

建设大厦

上海

亲爱的吉尔帕特里克先生：

我谨此向美国政府支持的对外救济计划呈交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第一份申请。

我想指出,这些只是我们初步的需求。随着你们计划的发展,在得到更多关于该计划潜在的信息后,我们将提交另外的援助申请。例如,在涉及解放区的援助请求时,您注意到我们选择了一个容易到达的地方^②,它符合您在先前讨论中提出的要求。正如您所知,这个急需外部支援的地区,仅仅是众多解放区中的一个。如有可能,我们将提请您关注其他地区的需求。

之所以这只是我们初步的需求,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应通过物资和财力来实现这些援助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不切实际的梦想。更确切地说,从冷冰冰的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需求远远超过了可供应总量上的任何一笔资助。因此,关于我们提交的上海工厂区 3 个营养站和 3 个保健室的预算,即便您将这个数字乘以 3 倍,仍然不能满足目前的需求。请您想想,整个上海仅有这三处受益,还有无数人未得到照顾,这真令人痛心。

我知道您已了解到尚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贵国政府的对外救济计划可

^① 报告标题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相关史实》。

^② 从中国福利基金会提交的具体援助项目可知,该处为山东国际和平医院。

以完成一部分。我真诚地向您保证,中国福利基金会将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帮助。

您诚挚的,

宋庆龄

(孙中山夫人)

附件:

山东地区的医疗服务

向美国对外救济计划申请的山东地区的总预算

三、中华救济团报告

1947年8月20日

关于民间机构提出的从美国对外救济计划得到财政和供应援助的临时申请 (如有可能)

7月8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署要求美国援华联合会驻华代表处向尽可能多的民间机构索取关于他们所需救济物资或当地货币支持的清单,并考虑这两种类型的援助是否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通过美国对外救济计划来提供。此后,从16家不同的机构或消息来源获得了报告,关于这些报告的概述请见附件表格和说明。

从民间机构的申请来看,他们关心的问题似乎已涵盖了目前中国所有的需求,比如医疗救助、儿童福利救济、工作救济和特殊项目需求等。关于各省,特别是饥荒地区(尤其是广东和湖南)的直接用于救济活动的需求并不完整。不过,我们已开始尝试学生救济,虽然这项工作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学校,但已投入了大量资金。

本阶段的总金额显示,所需的进口物资价值约195万美元,所需当地货币折合成美金为1365万美元(以2万法币兑换1美元为兑换汇率)。所有收到的申请都经过筛选和分析。要求提交这些初步的预算是为了编制一份供规划

民间机构名称	拟救济活动的类型	地区	所需物资	所需当地货币(2万 法币相当于1美元)	美国对外救济计划 支援全部或部分	备 注
1. 美国咨询委员会	(1) 紧急救灾——大规模供餐等	华南、华中、华北	尚未提供	550 000 美元	部分	见附注 1
	(2) 以工代赈——堤坝、道路、重新造林等	" ^①	"	400 000 美元	"	
	(3) 儿童福利——食品、医疗、服装	"	"	150 000 美元	"	
	(4) 供应服务等	"	"	200 000 美元	"	
2. 中国天主教福利委员会及医疗服务	(1) 通过已建立的药房和教会提供 医疗救济	全中国	见说明 A	30 000 美元	"	见附注 2
	(2) 现金救济、儿童福利等	"	无	1 570 000 美元	"	见附注 3
3. 国际救济委员会 医学部	(1) 非政府机构的医疗援助	"	1 000 000 美元 (见说明 B)	250 000 美元 615 000 美元	"	见附注 4
	(2) 医疗服务队	"	50 000 美元	100 000 美元	"	见附注 5
	(3) 院内康复	"	无 (见说明 C)	1 000 000 美元	"	见附注 6
4. 国际救济委员会	对学生、社工等特殊群体的援助和 医疗救助等	"	10 000 美元	100 000 美元	全部	
5. 中国营养促进会	促进健康饮食和利用本土资源	位于上海、南京、 成都、重庆、北平 和广州的中心	无	25 000 美元	部分	经美国援华联 合会批准,包括 一些工作救济
6. 公谊救护队(中国)	救济、医疗、福利、交通等专项工程	中国各地	100 000 美元 (见说明 D)	100 000 美元	部分	见附注 7

① 即“同上”意,下同。

续表

民间机构名称	拟救济活动的类型	地区	所需物资	所需当地货币(2万法币相当于1美元)	美国对外救济计划支援全部或部分	备 注
7.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	以工代赈	中国内地	50 000 美元	1 000 000 美元	"	见附注 8
8. 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	对贫困学生的医疗救助(大约 18 所大学,3 000 人)	全中国	50 000 美元	200 000 美元	全部	由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赞助
9.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服务中心的救济、医疗和福利活动	"	无	840 000 美元	部分	见附注 9
10. 门诺派中央委员会	洪灾地区的救济和重建	河南	50 000 美元	50 000 美元	"	见附注 10
11. 上海儿童福利促进会	通过各种机构为儿童提供救济和福利活动(约 35 000 人)	上海	无	400 000 美元	"	见附注 11
12. 学生喂养计划	私立大学里的 45 000 人	全中国	无	4 500 000 美元	全部	见附注 12
	基督教学校和大学内的 1 200 人	"	"	120 000 美元	"	
13. 蒙古救济计划	综合项目	察哈尔、绥远	500 000 美元(预估)	800 000 美元(预估)	"	见附注 13
14. 全国盲人福利协会	诊所和机构	全中国	100 000 美元(预估)	250 000 美元	部分	见附注 14
15. 中国福利基金会	儿童福利和医院	上海和山东	40 000 美元	150 000 美元	部分	见附注 15
16. 杂类项目			无	250 000 美元	部分	见附注 16
总 计			1 950 000 美元	13 660 000 美元		

之用的综合需求资源表,也能够使有关各方了解这些民间机构一直在做的或将来可能会做的工作。

由于所附表格的内容并不完整,而且当地货币需求的预算是以保守的汇率换算出的,所以建议考虑在实际操作阶段增加其他类型的需求。因此,出于规划目的,建议为受保护的民间机构的活动提供价值 300 万美元的进口物资津贴(包括食品、药品和其他经过批准的物品)和相当于 1 500 万美元的货款。最后一项预算的大约三分之一资金用于学生供餐,并可能会进行修订,以适应最终商定的关于这一重要项目的总体计划。

上述拟议的供应预算承担了民间机构自身以外币支付的大量开支。如果能够利用诸如剩余财产和联总仓库的库存等作为供应来源,将避免重复采购,这无疑能够节约资金。对该问题应进行深入研究,确保美国的捐款能够发挥最大价值。

补充说明:

说明 A:天主教福利委员会没有要求具体数量的医疗用品。他们表示,在 1946 年,

“天主教会开办的药房共治疗了 11 230 614 人。如果有足够的药物、设备和绷带等,就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照顾。我们确信,如果这些药物和医疗用品提供给相关药房,至少有 2 000 万人能够得到医疗照顾,否则所需品将严重缺乏”。(附一份没有具体说明数量的物品清单。有关详细情况已要求他们提供。)

说明 B:根据国际救济委员会的申请书指出:“经与中华民国卫生署(现卫生部)达成协议,国际救济委员会是公认的向非政府医疗机构捐赠医疗补助的机构”,这一职能或许不包括分配由其他民间机构处理或使用的物资,但他们确实可以向没有受到中国政府积极赞助的医院提供所需物资。因此,在允许规则例外的情况下,用于采购的 100 万美元基金能满足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要求。

说明 C:要求提供的各种用品是对联总捐赠物资的补充。在几乎所有实例中,它们都不符合“医疗救济”的条件。医院修建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并没有被

否认,督促外国捐赠机构向国际救济委员会提供物资,这有利于严格地进行医疗救助的采购,也符合美国捐资的条件。

说明 D:公谊救护队的要求包括一定的燃料和配件供应,以维持他们的运输小队。我们认为应该支持这一请求,以确保某些救济物资的运送,否则这些物资可能无法到达目的地。

附 注

附注 1 美国咨询委员会通过其地区的委员会,建议在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山西和东三省的所谓“灾区”开展紧急救援活动。同时建议在这些省份以及河南、陕西、甘肃和江西省实行以工代赈,它将包括灌溉、筑堤筑坝、植树造林、修路、修建避难所和当地纺织等行业。儿童福利活动通过喂养中心和诊所开展。他们还计划进行服装的分销。委员会估计至少要为这些项目组织 7 000 吨的物资。该委员会的主任是罗伯特·亨利先生。

附注 2 申请的当地货币只用于医疗用品的运输,希望能从对外救济计划中获得援助。人事及其他本地业务开支由天主教福利委员会承担。

附注 3 所要求的资金大部分用于为儿童和贫民购买食品的现金救济。它是根据以往经验的记录,旨在补充已经在预期分配的最大私人捐助范围内计划的活动。

附注 4 相当于 25 万美元的当地货币预算用于在中国境内购买疫苗、生物制品等医疗用品,其余相当于 61.5 万美元的当地货币预算用于支付运营费用。

附注 5 业务费大大超出了供应费,因为前者除了用于临床医疗用品外,还包括修理医疗设备的经费,例如由联总提供的 X 光机。这项工作的人事开支和零配件将由私人资金支出,因此没有足够的外汇捐款来支付国内旅费等。如果得不到足够的供应费,那么大量现代医疗设备将对中国失去价值。

附注 6 如说明 3 所示,将由民间的援助来源提供物资。由于计划进行许多与医院重建或修建有关的以工代赈项目,当地货币开支很大。国际救济委员会还向许多无法承诺物资分配的医院提供现金补助。

附注 7 公谊救护队目前的大部分救济活动都集中在河南省,帮助洪灾地区。他们还发起了一场消灭黑热病的运动。公谊救护队计划把活动扩展到河南以外的地方,因为它将得到更多的支持,并招募更多的人员。

与此同时,公谊救护队继续在河南和西部开展运输工作。这些项目对民间机构和救济活动至关重要,因为项目提供了训练有素的司机和技工。随着联总技术人员的撤离,这一需求将变得更加迫切。

附注 8 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直坚持该协会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机构,他们的努力引起了一些从他们工作中获利最多的中国政府部门的反感。由于对中国政府滥用救灾捐款的批评声日益增多,使得过去慷慨的私人捐助者对中国越来越缺乏同情,它的国外赞助(在美国通常是通过工合美国促进会和美国援华联合会寻求的,能够得到相关信息)今年下滑严重。就以工代赈来说,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项目似乎值得支持。不过,当地货币的分配将根据美国政府制定的工作救济标准来衡量。

附注 9 基督教青年会的服务中心主要为妇女和儿童提供服务。在 9 个城市里都有类似的项目,3 个农村服务中心在战争中被摧毁了。另外 5 个城市的服务中心正在投入使用。在北平、上海、香港、昆明、重庆、天津、广州、西安、成都也都设有中心。扩大后的业务范围将包括奉天、南京、杭州、厦门和济南。关于位于四川、江苏和湖南省的农村中心,美国对外救济计划不考虑对救济福利以外的项目提供支持。

附注 10 中国的门诺派救援工作以开封为中心,如果能够从美国对外救济计划获得支持,他们将扩大这些活动。

附注 11 该计划包括对上海 27 所孤儿院的部分资助,这些孤儿院没有其他援助来源。此外,多达 25 家托儿所将得到援助,还有许多大、小型诊所。如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料,所列预算将包括其他城市的需求。

附注 12 在中国,对学生的救助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和私人机构都提出了救助计划。与为政府机构提供赞助相比,在私立大学单独开展此类救济活动似乎是明智之举。在审查这类工作的所有需要,并协调政府和私人的目标

与责任之前,建议暂时设立并批准这一储备金。

附注 13 拟议中的蒙古救济计划将在一份单独的备忘录中详细说明。蒙古人实际上没有得到联总和行总的援助,他们目前急需帮助。

附注 14 这一救助盲人的请求是基于全国 37 个民间机构、2 个盲人兵营和 29 个脸内翻预防诊所的需求。这种救济在全国范围内是迫切而广泛的。然而,美国援华联合会要求对所有请求进行筛选。

附注 15 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上海开设了三家营养站和救济站,每天照顾儿童约 1 000 名。还有两个所谓的国际和平医院,开设在山东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内。中国福利基金会本次唯一提交要求批准的申请项目是紧急救济和医疗品供应。以当地货币申请的预算是初步的,目前仅作为规划之用。

附注 16 杂类的项目包括为盲人以外的残疾人提供工作救济和直接救济,对残疾退伍军人和难民儿童的某些职业救济培训项目,以及向某些医院提供特别拨款。毫无疑问,以后会提出其他有价值的杂项请求,以此为目的提议的储备金额不大。

四、宋庆龄致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函(1947 年 9 月 15 日)

1947 年 9 月 15 日

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先生

美国总领事署

建设大厦

上海

亲爱的吉尔帕特里克先生:

谭宁邦先生在最近与您面谈之后,提请我注意贵处的一份报告,题为“关于民间机构提出的从美国对外救济计划得到财政和供应援助的临时申请(如

有可能)”。我谨就其中所载信息作出以下评论和更正。

从表格中列出的所需供应品数量和所需当地货币来看,很难确定这笔资金分配给了我们的哪些项目。我们希望您能在这一点上进行说明。

我想纠正附注 15 中有关国际和平医院的措辞。这一段内容影射国际和平医院,尤其是山东省的国际和平医院是否真正存在。在我们的援助请求中,我们请求帮助的并不是两家国际和平医院,而是山东国际和平医院和华东医科大学,它们是我们申请加入美国对外救济计划时可以选择的众多机构中的两个。正如我在信中所指出的,我们希望这条渠道畅通,能够达成救济目标。目前有 8 所国际和平医院总院、42 所分院和无数流动医疗队,除了有些医院收取伙食费外,所有医院都免费向人们提供药品。而且,医院对病人一视同仁,在现有设备和供应品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得到了平等和有效的治疗。

您是否还记得,在我寓所的讨论后,我们给了您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报告,其中包括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情况。我希望再向您提交一份简报(随函所附),它将使您了解到人们在实地考察这些机构时感受到的价值。

我必须就上述事项提出要求。请您更正附注 15 的内容,并派发给已收到这份报告的机构,对此我将不胜感激。我由衷地认为,这是对那些在过去十年来为创造一个史无前例的医学纪录竭尽所能,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的一种认可。

我在此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我们需要仔细考虑和规划某种合作方式,使国际和平医院及其医学院能够得到帮助。我们知道这些机构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也知道人们非常需要他们的服务。当然,我们可以不考虑其他的问题,让那些急需得到帮助的人们直接获得援助。

我的办公室可以提交一份更详细的报告,说明山东国际和平医院和华东医科大学的需求。我们正准备为不同地区的医院和医科大学提出更多的请求。

您诚挚的,

宋庆龄

(孙中山夫人)

附件:

中国福利基金会第 48 号报告书:国际和平医院项目

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华东医科大学(1947 年 5 月)

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上海的儿童工作(1947 年 4 月)

中国福利基金会与中国赈灾委员会:湖南邵阳的合作社(1947 年 4 月)

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湖南的四个孤儿院(1947 年 1 月 27 日)

中国福利基金会报告:冀中的国际和平医院

五、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致宋庆龄函(1947 年 9 月 24 日)

美国总领事署

上海,1947 年 9 月 24 日

亲爱的孙夫人:

9 月 15 日来函收悉。您提到我处的一份“报告”是仓促编写的关于从民间机构或其代表那里收到的各种请求的摘要,目前在美中两国政府的谈判中,该报告被用作确定通过美国对外救济计划向民间机构提供援助的总目标的依据。这份文件目前尚未公开,而且报告并不代表已预先确定了可能得到援助的民间机构的完整名单。我们也无意以任何方式确认能够分配当地货币的特定项目。我以为我已经把这一点告诉谭宁邦先生了。无论如何,我们会在需要的情况下或是以后适当的时候就上述各点做出说明。

附注 15 中使用的有关国际和平医院的措辞并不是要对其医疗记录或诚信进行质疑。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份仓促口述的说明性摘要里有三个用了太多小写字母的词^①,引起贵组织如此大的关注。如果您提出要求,我愿意将您来信的副本分发给收到“报告”原件的人。就我个人而言,我建议不要这样做,因为敏感的因素一旦暴露出来,可能会阻碍而不是有利于救济工作。我希望

^① 在附注 15 中应该大写的“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用了小写。

美国这一新的计划能够和中国福利基金会联合起来提供援助。不过,我还是会按照您的意愿行事。

您忠诚的,

唐纳德·吉尔帕特里克

孙中山夫人

中国福利基金会

广东路 86 号 102 室

上海

附录

I. Letter to Donald Gilpatric from Soong Ching Ling(13 June 1947)

13 June 1947

Mr. Donald S. Gilpatric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Development Bldg.
Shanghai

Dear Mr. Gilpatric:

As an orga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originating and maintaining welfare and relief projects since 1938, we are naturally interested in the expenditure of funds for this purpose. We have learned that you are to be in charge of the distribution in China of supplies and money from the fund recently appropriated by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further understand this will take the position of post-UNRRA relief.

I would appreciate discussing with you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hina Welfare Fund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 I would be very pleased if you could come to my home for tea on Tuesday, June 17th at 4:30. If this is not convenient with you, I hope some other time can be arranged.

You will find enclosed a copy of one of our latest reports. It outlines our projects and will give you some idea of the latitude of our program.

Very sincer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Madame Sun Yat-sen)

Enclosure

China Welfare Fund Report No.45(June, 1947)

II. Letter to Donald Gilpatric from Soong Ching Ling(7 August 1947)

7 August 1947

Mr. Donald S. Gilpatric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Development Bldg.
Shanghai

Dear Mr. Gilpatric:

I am herewith submitting the first of the China Welfare Fund requests for aid from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sponsored post-UNRRA relief.

I wish to point out that these are our initial requests. As your program develops and we receive more information on your program potential, we will have additional ap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is aid. For example, in dealing with requests for help to be sent to the Liberated Areas, you will notice we have selected one location which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ccessibility as pointed out by you at a previous discussion. As you can well understand, the outside support needed in this one area is merely representative of what is needed in many of the other Liberated Areas. Additional needs will be brought to your attention when possible.

Another reason why these are merely our initial request is that the plans which we have invariably agreed our material and financial ability to fulfill them. This does not indicate grandiose dreams. Rather, in cold actualities, it means the needs in China are greater than any sum of money on tonnage of supplies made available. Consequently, when we submit a budget for three nutritional stations and three health stations in the factory districts of Shanghai, you would multiply this request by three times and still leave a terrible void to fill. When you consider this is only Shanghai which benefits from these three centers, it is grievous to think of the uncounted millions who still remain without care.

I know you understand the immensity of the job to be done and the part your government's post-UNRRA relief can accomplish. I sincerely pledge the facilities of the China Welfare Fund in aiding this accomplishment.

Very sincer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Madame Sun Yat-sen)

Enclosure

Medical Service in the Shantung Area

Overall Budget Post UNRRA Relief-Shantung Area

III. China Relief Mission's Report

August 20, 1947

TENTATIVE REQUESTS RECEIVED FROM VOLUNTARY AGENCIES FOR FINANCIAL AND SUPPLY ASSISTANCE, IF AVAILAB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IEF PROGRAM

On July 8, the Consulate General in Shanghai requested the Field Director of United Service to China to obtain from as many voluntary agencies as possible a statement of their need for support in terms of either relief supplies or local currency, having in mind that both these types of assistance would be available to at least a limited extent in the course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ief Program. Reports have since been received from 16 different agencies or sources, and these are summarized in the attached tables and notes.

Requests received appear to cover extensively the needs in China, as far as voluntary agencies are concerned, for medical relief, child welfare and relief, work relief, and special projects. Information does not appear to be complete as to the full extent of needs for direct relief activities in the provinces, and especially in the famine areas(notably Kwangtung and Hunan). Student relief, however, has been introduced

Voluntary Agency	Nature of Proposed Relief Activity	Region or Place to be Covered	Supplies Requested	Local Currency Needed (Converted at CN \$ 20,000; US \$ 1)	Partial or Complete USFRP Support	Comments
1. American Advisory Committee	a) Emergency calamity relief—mass feeding, etc.	South, Central and North China	None yet	US \$ 550,000	Partial	See Note 1
	b) Work relief—dykes, roads, reforestation, etc.	"	"	400,000	"	
	c) Child welfare—food, health, clothing	"	"	150,000	"	
	d) Supply servicing, etc.	"	"	200,000	"	
2. Catholic Welfare Committee of China and Chinese Catholic Medical Service	a) Medical relief through established dispensaries and Missions	All China	See Note A	30,000	"	See Note 2
	b) Cash relief, child welfare, etc.	"	None requested	1,570,000	"	See Note 3
3.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Medical Department	a) Medical relief through non-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	US \$ 1,000,000 (See Note B)	250,000 615,000	"	See Note 4
	b) Medical service units	"	50,000	100,000	"	See Note 5
	c)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	None (See Note C)	1,000,000	"	See Note 6
4.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Relief and medical aid to special groups such as students, social workers, etc.	"	10,000	100,000	"	U.S.C. approved, and includes some work relief
5. China Nutritional Aid Council	Promoting healthier diets and use of indigenous resources	Centers at Shanghai, Nanking, Chengtu, Chungking, Peiping, Canton	None	25,000	Partial	Supported by U.S.C.
6. Friends' Service Unit(China)	Special projects of relief, medical relief, welfare, transport, etc.	Throughout China	100,000 (See Note D)	100,000	Partial	See Note 7

续表

Voluntary Agency	Nature of Proposed Relief Activity	Region or Place to be Covered	Supplies Requested	Local Currency Needed (Converted at CN \$ 20,000; US \$ 1)	Partial or Complete USFRP Support	Comments
7. Chinese Industrial Cooperatives	Work relief	Interior of China	50,000	1,000,000	"	See Note 8
8. National Student Relief Committee	Medical aid and relief to needy students (app. 3,000 in 18 universities)	All China	50,000	200,000	Complete	Sponsored by Y.M.C.A., Y.W.C.A. and U.S.C.
9. Y.M.C.A. of China	Relief, health and welfare activities in service centers	"	None	840,000	Partial	See Note 9
10. 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Flooded-area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Honan	50,000	50,000	"	See Note 10
11. Shanghai Advisory Committee for Child Welfare	Relief and welfare activities through various agencies for children (app. 35,000)	Shanghai	None	400,000	"	See Note 11
12. Student Feeding	45,000 in private colleges	All China	None	4,500,000	Complete	See Note 12
	1,200 in Christian schools and colleges	"	"	120,000	"	
13. Mongolian Relief Program	Omibus project	Chahar, Suiyuan Ningshia	500,000 (est.)	800,000 (est.)	"	See Note 13
14. National Blind Welfare Association	Clinics and institutions	All China	100,000 (est.)	250,000	Partial	See Note 14
15. China Welfare Fund	Child welfare and hospitals	Shanghai and Shantung	40,000	150,000	Partial	See Note 15
16. Miscellaneous Projects			None	250,000	Partial	See Note 16
Total				1,950,000		
				13,660,000		

and involves a substantial cost without covering all of the institutions in China.

The total at this stage shows imported supplies requested in an approximate value of US \$ 1,950,000, and local currency in an amount of US \$ 13,650,000 (US dollars converted at an arbitrary rate of CN \$ 20,000 to US \$ 1). All of the requests received are subject to screening and analysis. The purpose in requesting these preliminary estimates was to formulate a table of consolidated requirements for planning purposes, and to permit all concerned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the type of work which the voluntary agencies have been doing or could do in the future.

Since the accompanying tabulations are obviously incomplete, and since the estimates of local currency requirements were made at a conservative rate of conver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allowances for increases in other type of requirement should be made in the operating stages. Therefore, for planning purpose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voluntary agency activities be protected by allowances of US \$ 3,000,000 for imported supplies (including food, medicines, and miscellaneous approved items) and the equivalent of US \$ 15,000,000 out of sales proceeds. Approximately one-third of the latter budget is for student feeding, and may be revised to fit in with any over-all plans which are finally agreed upon for this important project.

The supply budget proposed above assumes a substantial expenditure in foreign currency by the voluntary agencies themselves. Savings undoubtedly can be achieved if supply sources, such as surplus property and warehoused UNRRA stocks, can be drawn upon in favor of duplicating procurement. This matter should be carefully explored in order to insure maximum value from the U.S. contribution available.

SUPPLY NOTES

Note A. The Catholic Welfare Committee has requested no specific quantities of medical supplies. They state that during 1946 "the dispensaries conducted by Catholic Missions treated a total of 11,230,614 people. Many more could have been cared for if sufficient drugs, instruments, bandages, etc., had been available.

We feel sure that if these drugs and medical supplies were made available to the dispensaries in question, at least 20,000,000 people would receive medical care which otherwise would be entirely lacking.”(There then follows a list of items without quantities specified. Details on this have been requested.)

Note B. The I.R.C. application states “by agreement with the Nation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now the Ministry of Health), the I.R.C. is the recognized organization for donated medical aid to non-governmental medical institutions.” This function presumably excludes distribution of supplies which are handled or utilized by other voluntary agencies, but does include supplies needed for hospitals in China which do not have active government sponsorship. Therefore, while allowing for exceptions, it would appear that a \$ 1,000,000 fund for U.S. procurement would meet I.R.C.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to those it has already covered.

Note C. Various supplies are requested as a supplement to those which UNRRA has contributed. In almost all instances, they are items which would hardly qualify as “medical relief”. The urgency and importance of hospital rehabilitation work not being denied, foreign donor agencies are being urged to contribute this type of supply to I.R.C. in favor of the strictly medical relief purchases which would qualify under the U.S. contribution.

Note D. The Friends’ Service Unit request includes certain allowances for fuel and spare parts to maintain their transport units. It is felt support of this request is justified in order to insure delivery of certain relief supplies which otherwise may not reach their proper destination.

COMMENTS

Note 1. The American Advisory Committee, through its field committees, proposes emergency-relief activities in the so-called “calamity areas” in Kwangtung, Kwangsi, Hunan, Hupeh, North Anhwei, North Kiangsu, Shantung,

Shansi, and Manchuria. Work relief in these same provinces, and in Honan, Shensi, Kansu and Kiangsi, is proposed. It will consist of irrigation, dyke and dam-building, reforestation, road-building, shelter construction, and local industries such as weaving, etc. The child-welfare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n through feeding centers and health clinics. There is also distribution of clothing envisaged. The Committee estimates handling at least 7,000 measurement tons of supplies for these programs. Mr. Robert T. Henry is the director.

Note 2. The local currency requested is only to transport the medical supplies which it is hoped can be drawn from post-UNRRA funds. Personnel and other local operating expenses will be assumed by the Catholic Welfare Committee.

Note 3. The majority percentage of the funds requested is for cash relief in the form of locality purchased food for children and indigents. It is based on a record of previous experience, and is intended to supplement activities already planned within the maximum expected private contributions to be allocated.

Note 4. The \$ 250,000 in local currency is budgeted for the purchase of medical supplies within China such as vaccines, biologicals, etc. The balance of \$ 615,000 is to cover operating costs.

Note 5. The operating costs exceed the supply costs by a considerable margin because the former includes provision, in addition to handling clinical medical supplies, for servicing medical equipment, such as X-ray machines which have been supplied by UNRRA. The personnel expenditures and spare parts for this work will come from private funds, leaving insufficient foreign currency donations to meet internal travel costs, etc. If the latter are not made available, the value to China of a great deal of modern medical equipment will be lost.

Note 6. As indicated in Note C, supplies will be furnished from voluntary-aid sources. Local currency expenses are substantial because many work-relief projects for the rebuilding or repair of hospitals are envisaged. I.R.C. also makes cash grants

to many hospitals to which it cannot undertake to allocate supplies.

Note 7. The Friends' Service Unit is concentrating most of its current relief activities in Honan Provinc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flooded areas. It has inaugurated a campaign to wipe out kala-azar in Honan. F.S.U. will expand its activities beyond Honan as it receives additional support and recruits additional personnel. F.S.U. meanwhile continues its transport work in Honan and West China. These projects are vital to voluntary agencies and relief activities since trained drivers and mechanics are thereby made available. This need will become much more acute with the withdrawal of UNRRA technicians.

Note 8. The C.I.C. has always maintained itself as a strictly private agency, and the integrity of its efforts has antagonized som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ch stand to profit most from its work. Its foreign support (in the U.S. sought usually through INDUSCO and United Service to China, for which detailed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has fallen off seriously this year with the growing lack of sympathy for China among formerly generous private benefactors, and apparently caused by increasing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buse of relief contributions. As work relief, the C.I.C. projects seem worthy of support. Allocations of local currency will be measured against the criteria of work relief established by the U.S. Government, however.

Note 9. The Y.M.C.A. Service Centers are operated primarily for the benefit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re are such existing projects in nine cities and there are three rural centers in the areas devastated during the Japanese War. Five additional city centers are now being put into operation. The established centers are in Peiping, Shanghai, Hongkong, Kunming, Chungking, Tientsin, Canton, Sian, and Chengtu. The expanded operations will take care of Mukden, Nanking, Hangchow, Amoy, and Tsinan. The rural centers are in Szechwan, Kiangsu and Hunan Provinces. USFRP support for projects other than relief-welfare

are not contemplated.

Note 10. The Mennonite relief work in China is centered in Kaifeng, and will be able to expand these activities if USFRP support is obtained.

Note 11. The program includes partial support for 27 orphanages in Shanghai which have no other source of assistance. In addition, up to 25 nurseries will receive aid, along with many large and small clinics. If possible, the budget stated will be extended to include the needs of other cities if additional information becomes available.

Note 12. Relief for the students is highly important throughout China, and is being proposed for government as well as private institutions. It appears wise to have such relief activities in private colleges handled separately than those sponsored for the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Pending review of all the needs for this type of work,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objectives and responsibilities, it is recommended this reserve be tentatively created and approved.

Note 13. The proposed Mongolian relief program will be fully described in a separate memorandum. The Mongols received practically no UNRRA-CNRRA assistance, and are in desperate need.

Note 14. The request for aid to the blind is based upon the needs of 37 civilian institutions, two camps for blind soldiers, and 29 trichoma prevention clinics all over China. The need for relief of this kind is urgent and extensive throughout China. U.S.C. will be asked, however, to screen all requests.

Note 15. The China Welfare Fund operates three nutritional stations and feeding centers in Shanghai which take care of about 1,000 children each day, and two so-called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which operate in Shantung (the Communist-held area). Emergency relief and medical supplies are the only items in the C.W.F. request proposed for approval at this time. The budget requested

for local currency expenditures is preliminary, and is noted at this time for planning purposes only.

Note 16. The Miscellaneous Project include work relief and direct relief for handicapped people other than the blind, certain vocational relief training projects for disabled veterans and refugee children, and special allotments to certain hospitals. Other worthy miscellaneous requests will undoubtedly be received later, and the reserve proposed for these purposes is felt to be a modest one.

IV. Letter to Donald Gilpatric from Soong Ching Ling(15 September 1947)

15 September 1947

Mr. Donald S. Gilpatric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Development Building
Shanghai

Dear Mr. Gilpatric:

Mr. Tannebaum, succeeding his recent interview with you, has brought to my attention the report from your office entitled "Tentative Requests Received from Voluntary Agencies for Financial and Supply Assistance, If Availabl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ief Program". I would like to make the following comments and correction on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therein.

From the table designating the amount of supplies requested and local currency needed,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o which of our projects this money is allocated. We would appreciate clarific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correction I wish to make concerns the terminology used in Note 15 regarding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The inference contained in this paragraph is that there is doubt as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and particularly the ones

in Shantung Province. In our request for aid, help was asked not for two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but for the Shantung IPH and the East China Medical College. These two institutions are among many that we could have chosen in applying for participation in Post-UNRRA Relief. As indicated in my letter, we wished the avenue left open whereby this could be done. There are eight main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in existence and operating along with 42 branches and sections and innumerable mobile medical teams, all taking the medicine to the people at no charge, with the exception for some hospitals charging for food. In addition, these hospitals practice a completely nondiscriminatory policy toward their patients, everyone being treated equally and as effectively as the available equipment and supplies allow.

You will recall that after our discussion in my home, we gave you reports concerning the work of the China Welfare Fund, among which was information on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I wish to further submit the enclosed bulletin, which will give you some idea of the value of these institutions as observed by people actually on the scene.

I have to requests to mak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bove. I would appreciate if a correction were made to Note 15 and circulated in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your report was routed. I sincerely feel this is due in recognition of the men and women who have given all of their efforts and lives these past ten year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edical record unprecedented in China.

The second request I have to make is that serious consideration be given of planning some cooperative way in which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and their medical colleges can receive help. We know the job these institutions are doing. We know the great need of their services. Surely other considerations can be submerged and aid directed to these people who require it so sorely.

My office can submit a more detailed report on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in Shantung and the East China Medical College. We are also making prepara-

tions to submit additional requests for these institutions in different localities.

Very sincer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Madame Sun Yat-sen)

Enclosure

A report from the China Welfare Fund No.48: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Program

China Welfare Fund Report: East China Medical College(May, 1947)

China Welfare Fund Report: Children's work in Shanghai(April, 1947)

China Welfare Fund, China Famine Relief Committee: Cooperatives in Shaoyang
(April, 1947)

China Welfare Fund Report: Four Orphanages in Hunan(January 27, 1947)

China Welfare Fund Report: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in Central Hopei

V. Letter to Soong Ching Ling from Donald Gilpatric(24 September 1947)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September 24, 1947.

Dear Madame Sun;

This will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letter of September 15. The "report" from my office to which you refer was a hastily prepared summary of various requests received from voluntary agencies or representatives of same which is being used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s a basis for establishing a total target for assistance to be given through the facilities of the voluntary agenc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ief Program. This document has not been released for public circulation. It is not meant to predetermine the complete list of voluntary agencies whose requests for support will be sympathetically entertained. Nor is it intended in any way to confirm particular projects to which local currency may be allocated. I thought I had

made this point clear to Mr. Tannebaum. In any event, clarification on all the above points will be either sought or given at an appropriate time in the future.

The terminology used in Note 15 with regard to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was not meant to reflect on the medical record or the integrity of these institutions. I regret that a hurriedly dictated descriptive summary which contained three too many lower-case letters has caused so much concern in your organization, and if you so request it, I shall be glad to circulate copies of your letter to those who received the original "report". Personally, I would advise against this, since an element of sensitivity is revealed which might hinder rather than help the relief assistance which I hope the new United States program and the China Welfare Fund can combine to render. I shall act in accordance with your wishes, however.

Sincerely yours,
Donald S. Gilpatric

Madame Sun Yat-sen,
China Welfare Fund,
86 Kuangtung Lu, Room 102,
Shanghai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藏宋庆龄致迈克尔·哈里斯书信

霍媛欣 译

【译者按】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藏宋庆龄致公谊救护队成员信函2封,为宋庆龄致国际救济委员会暨公谊救护队成员迈克尔·哈里斯先生的信。为在中国更好地开展救护工作,国际救济委员会与美国红十字会、英国公谊救护队等其他救济团体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继续开展救济活动。1941年,国际救济委员会将运输事务委托公谊救护队代办。这两封信内容涉及1945年和1947年哈里斯在国际救济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及宋庆龄与哈里斯的友好交往等。

一、宋庆龄致迈克尔·哈里斯函(1945年6月1日)

3 Hsin Tsun

Liang Lu Kou

Chungking, June 1st, 1945

Mr. Michael Harris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84 Ma Ti Kai

Chungking

Dear Mr. Harris:

Let me herewith send you a word of appreciation for all your efforts in our behalf, especially your splendid “mastering” of ceremonies at the recent dances at Victory House, and now the 38 cases of medical supplies turned over to us for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s.

It is very heartening to know of friends willing to help in the difficult and needful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our work, and we are hopefully looking forward with your continuing cooperation.

With my best personal regards,

Sincerely yours,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

新村 3 号
两路口
重庆, 1945 年 6 月 1 日

迈克尔·哈里斯^①先生
国际救济委员会
马蹄街 84 号
重庆

亲爱的哈里斯先生:

我谨代表我们全体随信附上对您的感激之辞,向您为我们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尤其是最近在胜利大厦^②舞会上您精彩的主持。至此,已有 38 箱给国际和平医院的医疗物资转交给了我们。

① 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 Harris),英国人,曾在滇缅前线参加公谊救护队组织的医疗服务队,后担任英国援华联合会的秘书。1969 年,在国际救援机构——乐施会工作。

② 1945 年 5 月 18、19 日两晚,宋庆龄与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夫人在胜利大厦举行舞会,筹款半数拨交重庆市救济院,半数拨交工合培黎学校。

当我们的工作陷入窘境急需帮助时,得知朋友愿意鼎力相助,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期待着与您继续合作。

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您真诚的,

宋庆龄^①

(孙逸仙夫人)

二、宋庆龄致迈克尔·哈里斯函(1947年1月13日)

Dear Michael:

So this is the “snapshot” I have meant for you. I did not realize how flattering it is as I haven’t looked at it since I left Chungking, but this is the latest, so to speak. Anyway, I want it to convey my affectionate friendship and thoughts.

Wishing you all the best and do keep me posted, please!

As ever,

Soong Ching Ling

45 rue Henri Riviere

Jan. 31, 1947

亲爱的迈克尔:

这张照片就是我之前向您提到的剧照。离开重庆后,我就再没有看过了,都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么美妙。可以说,这就是最新的了。无论如何,我希望它能带去我对您的深情厚谊和思念之情。

祝您一切顺利,请随时联系!

永远的,

宋庆龄^②

①② 此处为宋庆龄亲笔签名。

恩利和路 45 号

1947 年 1 月 31 日



海外译文



魏璐诗回忆录《游走在历史的边缘:忆我在华岁月》选译

黄立派 译

【编者按】

魏璐诗(Ruth Weiss),犹太人,1908年12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原籍捷克斯洛伐克。1933年来华,在来华船上结识美国共产党的领袖斯蒂夫·纳尔逊(Steve Nelson),由此成为她革命生涯的起点。在上海,她协助史沫特莱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参加了史沫特莱、路易·艾黎等在上海秘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35年农历新年,她通过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相识。抗战爆发后,她离开上海到了四川,并于1939年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国籍。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父母被投入集中营遇害。中国抗战胜利后继续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1946年赴美,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回到中国,先后任中国国际新闻局(外文局前身)和人民画报社专家。1955年恢复中国国籍,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委员。2006年3月6日在京逝世。骨灰安葬在宋庆龄陵园内的外籍人墓园。魏璐诗1999年在德国出版的回忆录《游走在历史的边缘:忆我在华岁月》(*Am Rande der Geschichte—Mein Leben in China*)回忆了她在华73年的生活。这本个人回忆录内容较为琐碎,大量的个人生活、各地风土人情以及中国历史背景的叙述,对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经历着墨不多。本文选译了她关于来华初期上海岁月的回忆,对研究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活动,尤其是国际友人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等问题可提供参考。

我很幸运,通过一个偶然认识的人进入了一个外国人圈子,这个圈子不热衷于赚钱和剥削。他们定期在新西兰人路易·艾黎(Rewi Alley)处聚会,他当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的工厂监管员。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WCA)的一些秘书也在他那里参与聚会;路易的上司实际上也参加了YWCA。有一位英语流利的YWCA中国女士也属于这个圈子,还有那么一两位有社会兴趣的中国男士。不知不觉中,我找到了理想的温床来孕育我对中国的正确理解!

我需要理解的第一件事情居然是接纳震惊,数十年过去了,却依然无能为力:路易·艾黎带我和一位来自维也纳的解剖学教授,后者和我乘同一艘船来到上海,作为顾问就职于红十字医院,定期检查一系列工厂。在一些很难称之为住所的破墙烂屋中进行着“合法”的生产,实际上完全是违规操作。当然,如果工厂主们乐意,他们完全可以按照路易·艾黎提供的建议改善条件,但他们完全不需要这样做。总之无法检查,也不会执行建议。路易向我们讲述,就在这里,一家胶鞋厂里,一台锅炉爆炸了,死伤了许多许多人;而在另一个地方,由于把后出口堵住了,工人完全无法逃出,一场火灾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不仅工作条件极其不人道,工人还经常直接睡在他们工作的机器旁,最好的情况就是蜷缩在像鸽笼一样直接固定在工作区域上的板上……在上海的湿热气候中,人们是如何熬下来的,完全无法想象!

不仅如此。我还逐渐了解到,有幼童在纺丝厂里站在大蒸锅旁缫丝;还有女工带着她们的婴儿在工作,这还是非常幸运的已经获得准许的情况。通常情况下,怀孕的女工都会被直接辞退,因为总有饥荒地区的人们涌进来!

上海有着最多的工业企业,企业主有中国人、日本人,最多的还是西方外国人——英国人。工会被严格禁止,密探到处都是,用棍子虐待那些想透口气的反抗者。相比起来,连但丁的地狱都属于度假屋了!

通过路易·艾黎的小组,我了解到,YWCA在努力教授纺丝厂和织布厂的女工们读写,以让他们中的大部分有可能过上体面一些的生活。这意味着这些妇女在一天的漫长工作后,每个晚上还要花1到2小时时间来读写,这完全是她们创造的奇迹!而且并非所有女工都住在工厂里,经常能看到他们中的6个一大早就推着独轮车去上工……

在靠近城市的静安寺路(Bubbling Well Road)上坐落着面向外国人(包括年轻人)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在那里设有泳池大厅和泳池,我们这些年轻女性可以一周两次去那里休闲放松,中午做体操,之后畅游一番。然后可以在餐厅享用午餐——有沙拉和一些简单菜肴,还有司康饼和玛芬蛋糕,当然小餐包也是必不可少的。

上海美食众多,也包括许多地道的外国餐馆,“占美厨房”(Jimmy's Kitchen)是市区一家非常著名的午餐好去处。在南京路上还有一家巧克力店,一种咖啡替代品;在法租界里则是俄罗斯酒馆和餐厅的天下……

对于单身的人,中餐不太友好——一次只能吃一个菜!但是如果大家围坐在一起,摆上满满一桌菜就非常享受了——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受邀参加宴会。

董显光曾邀请我去他家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来了好多外国记者,珍馐美味无数。(尽管谴责这道菜有点令人尴尬,我还是要谴责其中的鱼翅汤,我对此深感无力,一开始并未认出来,看起来就像面条汤!)当然少不了美酒相衬,下文中我会再次提到其中的绍兴黄酒,我还学会了划拳,对我来说也是全新的。

划拳至少有两种方式:主人邀请客人之一,双方都用手指比划一个数字,谁猜出来正确数字谁赢,输者必须喝一杯酒作为惩罚;或者是石头剪刀布游戏,布包住石头就赢,石头砸碎剪刀,剪刀剪碎布……作为新人在如此愉快热烈的氛围中,几乎每轮都输,不得不喝了无数杯红酒作为惩罚。《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的出版人 J.B. 鲍威尔(J.B.Powell)就坐在我旁边;每位客人除了喝指尖那么大一杯红酒,还喝同样大小一杯茶。我小声地向 J.B.求救:“救救我,看在天国的份上!”他做得太好了,完全没人注意到他交换了这些小杯子。用这种方式我喝了约 24 杯“酒”(茶),董显光都震惊了,一位女士居然能喝这么多酒。随后我就很受他青睐,多年后证明这很有好处,不过得在特定地方。

在维也纳,对于酒精,我的概念就是葡萄酒,葡萄种植者在秋天会挂出一捧树枝(云杉枝),表明在他的酒馆里有“新酿的酒”出售。我也向中国人描述了当年喝新酿酒的情形:和朋友们一起在室外举杯小酌,通常是在葡萄园里,闲坐话桑麻……在中国,一边喝酒一边划拳是为了避免喝晕头,真是有趣的活动!

虽然维也纳报很失望,但我非常享受在上海的生活。我在上海的第一个生日(12

月11日)时,我认识了中国银行总秘书戴志骞博士(在哪个派对上我不记得了)。他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第一段婚姻给他留下了一双已成年的儿女,他的第二个妻子是北京协和医院的图书管理员,他们一年只有几个星期能见面:当她来上海出差时或他去北京时。他对我非常客气,说必须要尽地主之谊,他也遵守了他的诺言: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他经常来找我喝一杯茶;当他要接待省内外的客人时,他也经常且非常乐意邀请我。尽管按照叙事时间,提到这个有趣的例子还为时尚早,不过还是要说,他的朋友熟人们都管他叫 T.C.。(甚至到现在我还有一个友人的丈夫管他叫“T.C.”!)

还有一个:我和志骞有次去吃晚饭,我们开着他的车去电影院,在那里遇到了一对夫妇。丈夫是中国东北某个城市的银行经理。志骞很清楚地说:“来见见魏小姐”,但是至少那妻子理解成了“见见我的妻子”,她很感兴趣地说:“噢,她正好从北京来了?”我很冷静地说:“为什么这么说,我就住在上海”,很显然妻子认为志骞和我,用维也纳当地话来说,是“情人”关系。不过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纯粹就是两年时间的好朋友。这段友谊在1935年画上了句号……不过在时间顺序上应该放在相应正确位置。

不过志骞居然还故意戏弄我!他做得很巧妙:在某个派对上他向所有人讲述,“露丝(Ruth)在非常勤奋地学习中文,也有一个中文名”,然后他说出了我的老师给我起的名字,发音是“dsilu”。结果全场大笑。我感到很奇怪,外国人用这个名字就有错吗?这发生了很多次,直到最后志骞确定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中文名字后,才跟我解释:“现在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一提到你的名字,大家都会心一笑,因为在上海话发音里,‘dsilu’就是猪,这当然不是什么雅致的词!”呐,现在很清楚,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喜剧效果了!另一方面,志骞也提到了我的名字的中文字,意思是“仁慈的露水”。但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被上海话叫作“dsilu”,第二天早上我跟我的老师吵了一顿。他作为北方人自然是没有想到上海发音,很惊讶地说“啊呀!”并向我道歉,给我改名为“lu shi”,这个名字沿用至今:用“魏”来表达我的姓,之前“仁慈的露水”也是如此。中文中的名字表达和匈牙利语一样:先是姓,然后是名;不过要注意的是,中国人很少用名来称呼,年轻人在姓前加一个“小”,年长好友则在姓前加一个“老”。中国人也非常看重家庭,在大家庭里每个人都序齿称呼:大哥、二哥等,女孩也是一样。好吧。现在我的中文名魏璐

诗已经叫了五十多年了,魏与英文“way”发音一样,也是旧王朝名,音节“lu”的汉字指的是一种玉,“shi”则是韵文、诗或颂。也许我还应该说一句,《圣经》里的名字 Ruth 在中文中翻作“路德”,与“勒德”非常相似,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用这个中文名!

这当然只是开个玩笑。我从欧洲移居到亚洲并研究中国,我的社会批判知识用在了何处?当人们驶过维也纳时就能看到,维也纳的社会民主党当局管理处为工人建造了住房,设立了保护母亲和儿童的设施。例如最大的住房开发项目是海利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的卡尔·马克思院(Karl-Marx-Hof),通往克洛斯特新堡(Klosterneuburg)的铁路就从这里经过。在学习期间,我还认识了著名艺术史学家之子克里斯托夫·提兹(Christoph Tietze)。克里斯托夫加入了共和党保护协会组织,还试图说服我成为奥地利社会党(SPÖ)的成员。但是我不喜欢党派组织,我对于劳动阶级的同情更多的是基于感觉,这就是在小孩子们染上肺结核后,我一直要求工会提供半天家务帮助来协助母亲们的原因。(我父亲对我的这个干预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会导致我找不到男朋友!)维也纳大学解剖学教授,同时也负责维也纳医疗健康的谭忧黎(Tandler)教授对上海的社会状况很感兴趣——路易·艾黎向他和我展示了属于路易检查区的所谓的工厂,我这时才真正感到我之前的做法很正确!

在上海我也通过路易·艾黎的朋友圈了解到了很多相关情况。但是,即使是如慈父般照顾我并邀请我参加各种聚会的戴志骞也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他有时会向我讲述,他前一天晚上和朋友玩扑克赢了或输了200墨西哥元!而我的中文老师曾提到过,一个人一个月有2个银圆就能过得还不错!中国货币叫墨西哥银圆,因为银圆上饰有袁世凯头像,且在墨西哥制作^①(袁世凯曾任共和国总统,不过复辟后最终未能称帝,而是暴毙于1916年,还未来得及展开其他阴谋)。比方说,我来一趟上海,路费是2.4个墨西哥银圆。

路易·艾黎可以搞清楚全天下的阶级区分,他得到了戴志骞的经济支持。此处我最好还是插入一个解释——墨西哥银圆是中国的官方货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它被兑换成一定数量的铜板,这个数量每天都在变化,由货币兑换商确定——这些人如同股票交易商对待股票一样处置兑换数量……铜板是中国劳动人民接触最多的硬币。可以将

① 这段说明与史实不太相符,有可能是作者本身有所误解。——编者注

之视为无处不在的剥削的具象化表达。

即使在文明的中欧,工人阶级也在受苦受难——1934年2月,距我离开维也纳还不到半年,总理多尔夫斯(Dollfuß)领导的基督教社会政府用大炮镇压了工人阶级的起义,炮弹从维也纳森林射入卡尔·马克思院!共和党保护联盟不顾一切地寻找可能藏在某处的武器,但工人领导人没有透露秘密,因此工人们遭到了武力镇压,直到他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机枪射完最后一弹……

1927年,维也纳的工人放火烧毁了正义宫,因为他们认为仅是归咎于几个人根本没用。1934年2月,反动的多尔夫斯基督教社会政府抓住时机推翻了令人不快但强大的维也纳社会民主党及其保护联盟。但报应在这种情况下来得太快,国家社会主义流氓杀害了多尔夫斯,他在漫画中被称为“小梅特尼奇”——因为他的个头如此之小,以至于他的总理办公室都显得过于宽敞了。

与 SPÖ(社会民主党)联系紧密的谭教授在得知暴动后立即回国,他在中国(上海)待了不足半年时间。据悉,他被监禁但很快被重新释放;他真的和1934年春天的动乱无关!

从1934年开始,我在上海有了一个新的社会学研究环境——新认识的人给我介绍了一份上海犹太人学校(Shanghai Jewish School)的教师职位!这个机构在各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要全面了解后才能描述(我自己也是在慢慢了解那里到底在运行什么)。

这所学校标榜“慈善”。阿拉伯犹太人建立了它——这意味着阿拉伯区的犹太人在上海变富有了。其中最重要的名字有沙逊(Sassoon)、哈同(Hardoon)和嘉道理(Kadoorie)。他们的财富来自土地投机,还有传言说来自于鸦片生意。1917年俄国革命后,许多犹太家庭来到哈尔滨和上海。与其他白俄罗斯人一样(从政治角度来看),他们依靠自己的双手来工作,只有少数人可以依仗资金开始做生意。所以,慈善捐款到位了,尤其是孩子抚养方面。根据犹太教教义,富人圈子通过慈善事业获得功德。俄罗斯犹太人几乎是上海外国人的最底层——这些人主要是被雇用为司机、夜间守卫等。上犹太学校的孩子一天通常只能吃一顿热饭,所以学校里的午餐也是福利之一。女校长是位老处女,关于她没什么可说的。拉比·布朗(Rabbi Brown)是实际拥有发言权的人。他向我介绍了我的“职责”:我要教授所有学科,使用的还是英国的教学计划!此外拉比·

布朗还希望我教授希伯来语,尽管我可能只比学生的进度超前了指甲盖那么一点。在维也纳我学习了一年现代希伯来语;当然在上学时的宗教课上必须学习祷告词……实际上,学生都来自东正教家庭,他们的希伯来语比我熟练得多!

在上海的俄罗斯孩子按照英国教学计划学习历史和算术运算,简直太怪异了,在货币换算方面必须使用英镑,当时1英镑等于20先令而1先令等于12便士。自从1928年在英国待过,便士就令我十分头痛。孩子们对自身环境一无所知,却谈论着历史书中的巨石阵。有时候真让人觉得十分魔幻。

孩子们非常明显地营养不良,运算成为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我不得不把某些任务分解成小块,从而实现对整体的理解。

我记得,某次霍勒斯·嘉道理(Horace Kadoorie)爵士在我的保护人蔡金(Tschaikin)夫人的引领下前来“视察”,对我没有完全遵循教科书这件事儿感到很惊讶。他不明白我想让孩子们学习得更轻松的苦心,勒令我必须遵循教学计划和教科书!

如果男孩子们不守规矩,就可能会被送到拉比·布朗那里,他会给他们来一顿英式风格的打屁股,称之为“荆条教育”。在上海犹太人学校工作的6个月里,我只有一次让班上的男生接受了那样的惩罚,然后就一直没摆脱掺和到这种老古董教学法中的罪恶感!学生们却不介意,他们觉得这是学校的一部分。女孩们和男孩们都觉得我跟别的老师比起来更和蔼。

据我所记得,包括学校的老师在内,就只有一个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所有人都很欣赏这个体系,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两位朋友——黛比·布卢姆菲尔德(Debbie Bloomfield)有一个英国父亲和一个日本母亲;朱迪丝(Judith),她的姓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是哈瑟(Hasser)?]……黛比的姐姐还嫁给了一个英国情报人员,黛比声称不想再和姐姐有任何关系……不久后这种“局势”也改变了。

随后发生了一件事,其虚伪程度简直令人发指,就是拉比·布朗试图说服我必须在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参加礼拜以“作为孩子们的榜样”。我回答说,犹太教并非我信奉的宗教,我也不愿意由于外部原因而假装犹太教对我而言很重要。拉比·布朗却认为做一个表面功夫即可,但我不同意。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孩子们喜欢我的课程。

在这所学校上班的好处是,学校离我的住所很近,走路过去都很方便。当然如果不

想步行的话,出门就可以叫到黄包车,我的懒惰思想对这一点很赞同。总有人说绝对不愿意坐黄包车——一个人怎么可以让另一个人拉自己!不过我认为既然有黄包车夫这个行当存在,就说明他们需要通过这个谋生。不过有一天我也觉得没法继续坐黄包车,因为这段路是新铺的——遍布尖石,等着浇上热沥青。黄包车夫没有穿真正的鞋,而是只穿了草鞋,我无法眼睁睁看着车夫走在尖石上!我下了车,给了车夫整段路程的钱,然后步行过去。黄包车夫肯定以为我疯了……

在暑假快要来临时,那所犹太人学校通知我“六个月的试用期结束”,不再聘用我为教师。我高兴得跳起来——当然是在家里。这些先生主动将我赶走,我就不需要再犹豫不决了,也不需要再继续参与这种令我作呕的伪善。但是我还是要求了一件事:解释我被解雇的原因。我自己当然知道——我曾希望发起一次教师罢工,但是并非每位教师都认同这一点。我也知道我在课堂上足够“东正教”。但是我还是想知道人们如何评价我。于是在一个天气很好的下午,在拉比·布朗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场极其不愉快的会面,霍勒斯·嘉道理爵士和他的一位同僚参与了这次会面。在给出答案前,提到了一个很荒谬的理由——我无法教授希伯来语!这真的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转向拉比·布朗,那个无视我意愿的人。我慷慨激昂地表达了我的失望,上海的犹太孩子大多数来自俄罗斯,却按照英国教学计划上课,所谓的“慈善”只是伪善。学校应该感到庆幸,我是来自犹太家庭的,否则将会出现第二个希特勒!然后我摔门而去,扔下了一句“再见,先生们”,最后一个词发音非常讽刺,相信在场的人都可以领会到我真正的意思。几周后,我从朱迪思·哈瑟(Judith Hasser)那里听说,当先生们谈到教师队伍的空缺时,我的名字令他们如鲠在喉。这也令我很高兴!现在我终于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地去体验中国了……我暂时没有计划。事实上我有一个机会去写字楼当秘书——但是那对我毫无吸引力,我来中国不是为了来干这些讨厌的事的。

有一个从维也纳来的中国熟人,他接受了一个教育任务,建议我在世界文化合作学院^①(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任职,这听起来还有些意思!我了解到,该学院与国际联盟的法国同名学院展开合作。国际联盟当时还存在,虽然只是名存实亡。不过那时我对于国际事务的观感不像现在这么迷茫——哪怕是现

① “世界文化合作学院”是法国学院名,李石曾此时在沪设的相关机构中文称为“世界学院”。——编者注

在,我也时常感到,对于所有那些国际谎言和阴谋来说,我还是太天真……

1934年夏天:那个从维也纳来的熟人——李熙谋带我见了世界学院的发起人李石曾。他看起来像中国版的圣诞老人,有一把大胡子和威严的外表。随着对他的了解后来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和正直及无私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他自然是表现出了最好的一面。他建议我应该立即开始工作,而不是在休完暑假后。学院希望编纂一份关于教育学的参考书目。我利用学院的图书馆应该可以很好地完成。

该学院坐落于法租界西部,我的直接上司讲英语,一切看起来都非常有意思和国际化……我也马上就开始了工作。但是我发现,李石曾没给我时间度假,他自己却度假避暑去了——伪善不是犹太学校的专利!

上海是个彩色万花筒,每次转动都能看到不同的新图案。在我的生活中一切都井然有序——我有一份工作,还有一个任务:编纂教育学的参考书目,除此之外我还要阅读和了解发生了什么事……

参考书目和工作完全是幻象——我很勤奋地把所有东西归整到一起,打包为文件包递交给我的上司——后者只是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将文件包放进了下层抽屉。这就结束了。我很快找到我应该致力于什么——学习中文,尤其是汉字。学习中文时,除了形式和含义,还有第三个元素必须要考虑到:发音,它和字形完全没有关系。我的办公室里还有一个或者两个中国同事,其中一个充满热情的海豹木雕爱好者——他刮擦木屑的声音今天还犹在耳边!慢慢地我发现“文化合作”只是一个噱头;我对此已有准备。尤其是在1934年秋天结识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后。

有一天她来找我,个子瘦高,戴着一顶宽檐帽,低低地拉下来遮住脸,她作了自我介绍。这名字对我来说如雷贯耳,我早就读过她的自传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在德语里译作 *Eine Frau allein* (只是一个女人)。她就像一个热情四射的光团,只要在她身边,就会被拉入热情的漩涡。我知道她是作为《法兰克福报》的通讯员来到中国的,她还和印度解放运动关系匪浅——印度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

现在,因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在中国了,所以她致力于中国人民的解放运动。可能是路易·艾黎向她提起过我,我是刚加入的新人。

艾格尼丝来拜访我不久后,就给我分配了第一个任务:她给我带来了一大堆小册子,让我按照她列出的清单分配并派送。我提前清空了梳妆台的整个抽屉以藏下这些小册子。涉及的是经济统计,由“工人通讯社”出版,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别名。(现在我还收藏有一份小册子样品作为纪念。)

我从维也纳还带了一枚橡胶图章来,跟孩子们玩的一样。我利用可改变位置的字母伪造了一个发件地址,以让信封更逼真。艾格尼丝和我之所以参与其中,只是因为当前情况下,外国人比中国人有更多回旋余地。那些进步人士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接下来就是确保不会遗漏周围的远近邮箱——一个邮箱里不能放入太多封!后来有件很有趣的事,一位定期参加路易·艾黎讨论组的YWCA秘书讲述说,她试着给信封上的地址回信,发现上面的地址根本不存在!我自然是保持缄默,但心里充满了喜悦,小册子显然到达了它的目的地。

无意和/或有所倾向,我以一种自然的方式,我想说,是无意识地过上一种双面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进步思想在中国是绝对的禁忌。外国人自然也同意,共产党的思想——共产主义是一种诅咒!在我认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前,我还结识了一位德国共产党人伊琳·魏特迈(Irene Weitemeyer)。她经营着一家书店,人们可以在那里买到德语、英语及俄语的进步书籍,例如威利·布雷德尔(Willi Breidel)的著作。艾琳也让我的想法有了一些改变,她说,思想进步的女性也是女性,也希望用口红和其他化妆品让自己更美丽。我一直以来都很朴素,我也不知道原因。

这一小群思想进步人士之间肯定有联系,他们之间互相认识但不会刻意宣扬,这是一个默认的规则。原理很简单,“我不知道的就不会伤害我”。如果某人被捕,他/她也不会出卖更多其他人。我反感写日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甚至是通讯录和笔记本都会让人们成为怀疑的对象……

据我所知,伊琳·魏特迈早就不在上海了,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人知道……

通过这些联系我有了一个“双面”圈子:对外我继续回到我在世界文化合作学院的工作中,与像蕾莉及她父母这样的人交往,也包括戴志骞和李熙谋;另一方面没人知道我去参加了路易·艾黎的讨论小组或前往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居所以及我做了什么。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住在当时的霞飞路上的培恩公寓里。这个建筑群有前后多个

入口。艾格尼丝非常有理由相信国民党在监视她(她声称她公寓对面可能有一个配有摄像机的秘密站点),去拜访她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也就是说,必须记清楚从哪个入口进入的,然后绝对不可以从同一个口离开!我几乎想不起来我在艾格尼丝那里结识了什么人,除了一名来自江西省的红军战士,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名为“苏维埃”的根据地。蒋介石的国民党自然将之视为眼中钉,他们竭力通过灭绝运动来结束这场“闹剧”。此时有两名德国军官作为他们的顾问——先是冯·西克特(von Seeckt)将军,接着是冯·法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将军。1927年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领几百名同志移居井冈山,由此创建了中国“苏维埃”。中共中央委员会信奉的是旧理念,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却是工业无产阶级成为了先锋。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秘密团体和外国圈子的“善款”帮助下,背叛了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还有一个关键性因素是,蒋介石显然转投了卫理公会,作为一名“优秀”的基督教徒,屠杀起无神论共产党人来毫无心理负担。

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游击战术,所以针对在井冈山作战的中国苏维埃军队(当然和苏联完全没关系,只是同名)的“围剿”一直未能成功。直到中共中央发起阵地战,蒋介石的军队才得以继续推进他们的包围圈,将中国苏维埃军队限制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内。

也许当时的关联还不是很明朗。1934年秋天,革命根据地的人们从包围的政府军里突围而出,开始了长征。大家都从小道消息知道了这件事。

小道消息是一种中国特色,无时无刻不在,甚至可以跨越大陆。“小道消息”指的是口口相传的消息和事件,不知来源。但以闪电般的速度传播,当然是私底下……

我在金山区住了有两年时间,那地区的人们都认识我了。某次甚至有一位住在转角处的一位商人问我的房东,我怎么可能和一名中国人手挽手走在一起——他某天看见了我和戴志骞一起回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某天突然告诉我,我应该自己住在没有电梯的房子里(电梯男孩经常会秘密服务于国民党,向他们报告谁曾进出过)。1935年夏天,我在一幢3层楼里找到一个单间公寓,离法租界的希腊东正教教堂非常近。我跟我之前的房东解释说,新住所离我的工作地点更近,所以要搬过去。当然我得自己布置,不过这也不太困难——当时在上海可以淘到便宜家具、藤制安乐椅,房间里还装有一个大壁橱,我现在终于独立了!

某天艾格尼丝叫我去口译——她要采访谁,我之前并不知道。我用嘶哑的声音给办公室打电话说,我的嗓子很痛,必须卧床休息至少一个星期。然后我带着大包小包搬到了艾格尼丝那里,发现她临时藏了一个来自革命根据地的人。

那个男人讲述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资料被写入了艾格尼丝的书——《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中。今天我还在疑惑当时的我居然有勇气去口译,不过我的工作在其中一定发挥了作用!

这个男人离开艾格尼丝的住所时,艾格尼丝站在街边充当警卫,手里握着左轮手枪!她想要实现的或者说她真正在做的事情我其实并不太清楚——但她的决心令我震撼!

1935年年初,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给我寄了一封孙中山夫人的信——在信中她自称宋庆龄,落款也是如此。我在欧洲时就已耳闻过孙中山博士,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曾为他写过传记,记录了他对中国现代化的追求。孙博士于1925年逝世,他的遗孀竭尽全力地继续他未竟的事业。她是赫赫有名的宋氏三姐妹之一;还有3个兄弟,其中宋子文最为出名;宋庆龄在所有兄弟姊妹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当她称他们为“亲戚们”时,我就觉得怪诞而有趣,仿佛她和他们并不太熟!在我首次获准到她在法租界莫利爱路的家里拜访时,正是农历新年,她家提供了一道华南小吃——杏仁乳,这是我第一次吃到。

上海的新年也是一个特色,当时人们一年可能会庆祝4次新年,而是往往还是不同时间:1月1日雷打不动;中国新年跟西方复活节一样,时间不定,可能在1月末,不过在2月初和中旬的时候也很多。俄罗斯新年在西方新年后两周;犹太新年则在收获后的秋天——早在1917年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之前,在上海就有很多犹太人。

在孙夫人那里我还结识了吴彼得(Peter Wu)^①,他曾留学德国,德语非常流利。在上海旁的吴淞有一所德国支持的大学——同济大学(“文革”后又恢复运行了)。

上海是兼容并蓄的,无论是好还是坏。差异性最大的不同国籍人士生活在一起,不过并没有住在一起,这是我来了不久就发现的一点。对我来说,1932年日本人进攻上海是绝对的暴行,彼时我未在上海。但是那些所谓的慈善家向我保证“只有日本可以管

^① 即武剑西(1899—1973),原名武兆镐,别号吴觉先,化名彼得、彼得拉舍夫斯基(俄文 Петрашевский、英文 Petrashevsky)。——编者注

理好中国人”，但现实是中国人一度都不敢在人行道上行走！当我反驳道，上海毕竟是中国城市，凭什么日本人可以将中国人从人行道上驱逐出去，那些人不同意我的意见，并口口声声地说，没有外国人就没有如今的上海，中国人根本办不到！

在有产阶级眼里，将中国人作为平等的人对待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也就是共产党被视为非法的原因……

尽管我“明面”上的合法生活也很有趣，因为它和我在维也纳的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但我的“非法”生活更吸引人。例如我接受了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一项任务：查看一位牧师被没收的笔记本——那是用意大利语写成的，牧师和他的同事被裹挟着参加了一段中国红军的“长征”。这笔记不是凭空出现的，可能含有红军的秘密信息。偏远地区的传教士撰写了报告，甚至还发表在《字林西报》上，但是人们却只能称之为强盗故事——他们恐惧造反分子，剥夺了他们希望进行社会变革的权力。我的意大利语水平很有限，但我学过拉丁文和法语，所以在词典的帮助下可以看懂。据我判断，牧师一直在抱怨他的状况不佳——腹泻等。红军将这两位高贵的先生带了很久，我已经不记得了。将他们随便找个地方释放了也不奇怪，因为红军已经太困难了，根本不必去照顾充满敌意的外国人。

“丢脸”也是一个人们必须熟悉的中国特色。当然，即使在西方，人们也可能会出丑，让公众无法接受；但在中国，人们可能转眼就丢脸了，例如：某个人训斥他的下属，这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对于他的下属来说就是丢脸……根据儒家教义，父亲可以揍他成年的儿子，但儿子不允许还手！这是我第一次看曹禺的戏剧《雷雨》时得出的结论——戴志骞邀请我去看的。志骞对我的“中国化”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尽管他的初衷并非如此。在我们坐在一起喝杯茶或享用晚餐时，我们没进行过深入的社会政治谈话，不过他的一些评论很值得关注。例如：“中国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外国势力的控制，如果要我在英国、法国等帝国主义之间选择一个，那我宁愿选择日本帝国主义！”原因很简单，日本人至少是亚洲的，比起西方帝国主义，选择日本没那么丢脸。戴志骞在美国完成了博士学位，有一个挪威妻子。他很乐意和我一起出去——但是基本上来说，比起西方帝国主义，他更喜欢亚洲帝国主义。但所有帝国主义都应该反抗而不是接受奴役这一点，戴志骞似乎完全忽略了。

但还有另外一种人,想法完全不同——海外华人,就是那些在几代前就已经移居国外的中国人,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落地生根,却始终感觉自己是中国人的。我认识的陈氏兄弟姐妹就是第一个这样的例子,他们都非常爱国。陈父是陈友仁(Eugen Tschen)博士,在很久之前就移居特立尼达并在那里成了家,他和一个克里奥尔人结了婚,生了4个孩子,两男两女。一个女儿在苏联参加电影拍摄,没有和3个兄弟姐妹一起来上海。所有孩子都颇具艺术天分:二女儿是一个舞蹈家,大儿子是有艺术家爱好的律师,四儿子作为画家在苏联接受过美术教育。当时的苏联是不同种族和国籍的人和谐共处的典范。

西尔维亚·陈(Sylvia Tschen)做了一个关于苏联妇女的演讲(她反复说到“那边”,这让上海人更能接受一点,没有那么忿忿不平)。她讲述道,女性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她那低沉有力的声音将一切都娓娓道来时,非常令人信服!在演讲的尾声,听众们可以自由提问。这时,一位上海名媛切斯特·弗里茨(Chester Fritz)夫人站起来,她是一个股票经纪人的妻子,咄咄逼人地问道:“你说女性可以找到所有工作,那么如果一个女性不想工作,那谁养她?”房间里响起了一阵低低的偷笑声。

西尔维亚·陈表情严肃地回答道:“如果一个不想工作的女性找到了一个准备好养她的男人,同时她也可以忍受,那么一切都很好办。不过在那边,人们认为,谁不工作,谁就没吃的!”切斯特·弗里茨夫人默默地坐下,气氛又恢复了。她显然认为女性出去工作是很丢脸的。我现在还能想起来,一个和我同乘一艘船从欧洲来上海的医生妻子,当然她坐的是一等舱。她用敞篷车载我去兜风时,异常不满地向我抱怨上海的生活道:“在维也纳洗地板都比在这儿生活强!”她想在我面前表现出一些优越感,但我的反应让她觉得我完全堕落了:“是的,那你为什么不留在欧洲,而是来上海呢?”这一切都只是空谈,她在上海有一大堆人伺候,可以享受阔太太的生活……

这些在上海的小插曲——可以独立写完一本书!不过这根本不值得,因为这已经不是外国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感谢上帝。让他们如此放肆的原因是治外法权,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被带到中国的法庭上,而只会是他们自己的领事馆……停泊在外滩外的炮艇进一步加强了“高高在上的神”的感觉。并非所有国籍的人都享有治外法权,但是所有外国人都被笼罩在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等的便利光环下。第二次世界

大战将这些谰言妄语一扫而空,甚至香港也将在1997年回归中国……现在人们都谈论着,21世纪会是太平洋地区的主场。日本人已远胜欧洲和美国……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中国自治的可能性很小,其他亚洲地区更不用说。印度是英国的,新加坡被视为不会被攻克的英国海上要塞,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则被称为荷兰殖民地,等等。

1935年我的“非法”活动还包括一个政治学习小组。一般来说,我们都是4人一组——海因茨·格里兹(Heinz Grzyb)是领导者,当然他的搭档卢秋迪(Trude Rosenberg)也在,来自美国的乔治·海德姆(George Hatem)位列第三,然后我完善了这个团队。我把海因茨让我们学习的马克思列宁著作中的材料都打出来。海因茨·格里兹被说英语的朋友称为汉斯·希伯(Hans Shippe)。他住在柏林,以笔名“亚细亚人”(Asiaticus)写作,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将他的文章发送给国外杂志外,除此之外,实际上我对他的来历一无所知。乔治·海德姆就熟悉多了。他也是1933年来的上海,出生于纽约州的布法罗,他的父亲来自黎巴嫩,乔治也因此贝鲁特上学——不过他的博士学位是在瑞士取得的。在我们的圈子里,他是一个一直在搞笑的人——某次我们4人一起在日本餐厅吃晚饭,当然是要坐在地板上,他讲了非常好笑的话,笑得我滚到了旁边,衣服从中间撕开了!我里面只穿了一点点——那是炎热的夏天——我不得不拢着衣服,满脸尴尬地坐出租车回家了……

不过乔治·海德姆也有他严肃的一面,我们随后才知道。路易·艾黎现在的注意力放在了工厂的工人身上,工人们由于镀在金属上的铬而罹患严重的皮肤病。当上海莱斯特(Lester)研究所发布此报告后,至少在上海公司中,这一弊端得以消除。乔治·海德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都在处理医疗卫生方面的事情,并且经常能解决问题,在后文相应地方会进行叙述。

我学到了各个方面的很多知识——海因茨的学习课程让我了解了卡尔·马克思和列宁的思考方式,并将之与现实进行比较。通过政治经济学习,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摘自《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虚伪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但不是一个西方势力在控制,而是被西方列强瓜分殆尽。当时英国在中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话语权……我们学习小组的进度紧跟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中国都还保留着封建主义或至少说封建思想,所以那流传了数千年之久的剥削劳动人民的方法在当时威力巨大,与之相比,西方在中世纪才了解到的剥削方法就逊色多了……

历史唯物主义和研究小组带给我们的辩证思维方式让我意识到,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揭示人类发展历史的真正意义。在我漫长的一生里,我只确定了一点,我必须以这种方式逐渐完善自己,正确看待事物。当然不能保证每件事都能按这种方式完美进行。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中聆听卡尔·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的评价;同时看到中国的劳动人民被剥削(通常从童年就开始了),以满足有产阶级的贪欲(中国和西方都一样);了解列强如何迫使清政府向自己“借钱”,用于向胜利方支付战争赔款。最终人们认识到,这样的事情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了;在中国已延续数百年的封建思想终于被更现代的观点取代。

蒋介石作为卫理公会派教徒很受西方列强欢迎,这只能表明,中国的统治阶级的伪善是多么假惺惺。我的朋友戴志骞特别推荐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榜样——这使得他的很多同胞发自内心地为他说话。这让我们这些外国人学到了,一个人要营造他的正直形象,就必须站在被剥削者一方,绝不妥协。这就简单了——因为我已经拒绝继承家里的财产,所以内心毫无波动。

中国的人民群众主要由落后的没有受教育机会的农民组成;在我们的纪元存在前就已经存在了 500 年的儒家却是上层阶级的供养者!现在正是这些农民要在中国掀起一场变革,这让日常政治事务变得更有观察价值。

1935 年年底,听说北京的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那是 12 月 9 日。一周后也扩展到了上海——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给我们带来这场示威的第一手消息。自 1919 年 5 月 4 日起,中国学生在政治事件认知中越发领先,当人们阅读中国近现代史时就能发现一点。因为学生可以读写,所以他们是知识分子。1919 年大家关注的热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在凡尔赛条约中将德国的殖民地胶州湾划给了日本,而不是归

还给中国。1926年,中国学生再次抗议——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反动措施。

1935年12月,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服从引起了愤怒,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1931年,日本人占领了华北^①省份并继续进犯中国核心地带,1932年他们入侵了上海等城市。但是蒋介石还是坚持要先“安内”——消灭中共,再“攘外”。

1935年12月16日,一群年轻人在南京路上的中国百货大楼前集会。他们并没有武器,即使后来英国警察声称他们有武器。我看到有一个学生摇的甚至是没毛的鸡毛掸子!突然,传单从百货大楼屋顶上如雪花般落下,等警察赶到时,“罪犯”已经杳无踪迹。当然也逮捕了一些人……

12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示威活动也不太平——据说那里的警察已经为此出动。在北京,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学生从门槛下方滚过去,然后拔掉城门门闩,学生们才得以从内部打开关闭城门而脱身。当天的“女英雄”现在是友谊集团的管理层,满头白发却依然充满活力——她叫陆瑾。

北方和南方的学生并没有止步于一场示威——它成为了真正的民族运动,随着新事件的发生,越来越多地表达出人们的愤慨,这种愤怒在日本人继续侵吞中国领土时达到了巅峰。“我们不想成为亡国奴!”这是经常能听到的口号之一。

人们是如何绕开“禁止集会”禁令以及假装散步的人群是如何突然汇成了一条长长的示威队伍的,对于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的我来说,一直是不解之谜……示威者对于警察的反应——中国人(在上海的中国部分)每次都是手无寸铁,连块厚饼干都砸不开,人们只是冲中国警察喊道:“中国人不要对付中国人!”

在这座中国城市里的一次示威中,我站在一名警察的身后,也许是学生的某个口号激怒了他——他居然想拉开他的手枪的保险栓!尽管我站得很近,但是作为外国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幸运的是,他的杀人武器卡住了,学生们得以安全向前行进。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积极地参与了这些“暴乱”,我也被带动参与了进去——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佩吉(Peggy)[当时化名为尼姆·威尔士(Nym Wales)]那时就住在北京,给予了学生们支持;作为外国人,他有比中国人多得多的回旋余地,他也将材料尝试性地发给了我,看起来比发给中国学生的少一些。

① 应是“东北”。——编者注

我也将收到的材料转交给了艾格尼丝……^①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最令我着迷的是,中国年轻人在数千年的儒家孝道教条下如何反抗长辈和国家统治者。我们家乡的年轻人也许也在抱怨现在的政府,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无拘无束地自由生长……

也许正是这种古代观念与现代理念的交错吸引我留在中国?我肯定不是唯一一个因着迷于中国的古老文化而来到这里的人!

学生运动并没有停止,而是试图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例如,在1936年1月或2月的某天,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安排我去接应一群学生,他们打算从上海出发,步行穿过村庄去往南京,让更多的人警醒,了解到中国所处的危险——日本由于缺乏原材料,很乐于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过那时关于经济因素的讨论并不多,问题很简单:如果没有日本割据,中国是不是就能保持国家完整?

我要接应的这群学生是在农历新年快到时出发的——这段时间里,农民无需下地工作,有空闲来关心国家大事。

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学生就是中国“面团”中的“酵母菌”,让更多层面的人士参加到运动中来。1936年年初,是时候向村庄里的农民(他们构成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宣传了,如果不反抗日本,不反抗侵略者,中国将陷入如何悲惨的境地。

按照我的理解,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给我安排的任务是去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找到那个学生团体,然后通过艾格尼丝将他们的计划公布出去,避免学生们受到伤害,同时让整个运动都能得到关注。这时候快到农历新年,也就是1月末(中国的农历新年跟西方的复活节一样,时间是变动的),驶往目的地的火车十分拥挤,我差点没能从人群中挤出来下车……显然没有人怀疑我的意图,到处都是节日气氛!我的运气极好——不知怎么地,我居然真的在一个庙里找到这个学生团体。天气非常糟糕,细雨蒙蒙,显然警察和特务们都认为待在自己办公室里更好些。在学生们面前,我将自己的身份合理化为同情者(反对者不会跑来),还参加了一个会议。带着我的笔记,我返回上海见到艾格尼丝——她劈头盖脸地责备我说,为什么不继续跟着这个学生团体进行深入交流!我目瞪口呆——她事先并没有告诉我,我应该参加那个穿越村庄的游行。另外,显然,

^①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主要凭借其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在新中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实际上他对新中国的贡献还可以追溯到数年前——当时的中国青年主张中国主权,任何一个有民主思想的人士都不能不参加进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大元帅还在优先“安内”,对日本人完全不抵抗,放任其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原注

有一名外国人和学生们在一起对他们也并不好……不过反正他们也没能走出多远：在距离上海 1 小时火车车程的苏州，学生们就被警察用铁路遣返回上海了，遭受牢狱之灾的可能性非常大。学生们并没能到达南京，但是至少拜访了上海和苏州之间的村庄，这个计划得到了最低限度的实现……

不知何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代表知道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该联盟是一个致力于“救国”的全国性群体组织。我们还由此结识了浙江银行家章乃器和教育家陶行知教授。章乃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被称为爱国主义资本家，没有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凶。像那些有资本头脑的人——如同我的朋友戴志骞，也是属于此类。不过章乃器这样的人也跟普通民众一样在国民党统治下吃尽苦头，因为他们支持国家不可分割，这与蒋介石的主张完全相悖，他宁可接受日本侵占越来越多的中国领土，也不愿和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共产党沟通和解。并且同时蒋介石的政府又被中饱私囊的蠹虫所把持，他们通过自己的国家领导职位攫取了难以想象的财富。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好也有坏，但是民族资产阶级是进步力量之一。陶教授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门下求学，他的教育理念和他在西方受训的普通教师完全不同——陶教授认为教育必须服务于人民！

我们已经遇到了两类中国独有的人群，这种相遇令我受益良多。我们收到了关于全国范围内为抵抗日本侵略所作的努力的报告；我们也听说了这两类人群如何将他们的爱国主义落到实处——中国曾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现在，散沙不再各行其是，而是汇聚成一个完整的国家！

在此期间我也暗地里买了一个油印机，将章和陶传递给我们 4 个（我们的学习小组）的消息复印出来。我们将自己命名为“中国之友”，并将我们的研究结果转交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向全世界发布。在我的个人“归档”中仅有 4 期这样的汇编，后来就再也没有推出。我记得，我们每两周编写一次这样的出版物，所以我们的工作为期两个多月……

在后文中还会写到我们的这两位联系人；从陶教授那里最初了解到，他在推行“小先生运动”，学徒在漫长的一天工作后可以接受定期培训，学习到知识的人必须将知识

传授给另一个人！这也是让“散沙”保持凝聚力的一个办法。

1936年年初，关于中国国家权益的报告不断见诸报端——格兰尼奇(Granich)夫妇——马克斯(Max)和格蕾丝(Grace)，从美国来到上海，创办了一份半月刊，名叫《中国呼声》(*Voice of China*)。

首刊号发于1936年3月15日。所有的朋友都为它撰文，大多使用的是化名，尤其是西方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化名“Rusty Knailcsm”(改写自“锈迹斑斑的指甲”)；路易·艾黎则在不断地发明新的中文名字……在首刊号中，陶教授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教育及其需求的文章。这本半月刊的主要素材都来自东北，那里自1931年起就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抒发了家乡在满洲的中国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的渴望。

众所周知，尽管并没有书面记载，当时蒋介石不仅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这东三省拱手送与日本人，还命令“少帅”张学良率领他的部队从东北撤出前往西安。我还有一张照片——是当时我去接应那群想徒步前往南京的学生团体时收到的——背面印有非常血腥的表述：日本正在把中国撕成碎片。

《中国呼声》在能阅读英语的中国人中获得了许多读者，因为他们从官方报纸上永远也无法获知真相！

这本半月刊出版时，我的生活也掀开了新篇章。明面上我跟格兰尼奇夫妇并不熟，尽管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我还每天都在他们家进进出出。任何一个在上海住了几年的人都可以为之做点事情和提供帮助。我的一生都像一本美国小说里的人物“吉米·希金斯(Jimmy Higgins)”一样，总是在场边帮助，从未站到过聚光灯下。

事实上，一切都必须保持一种平衡。现在出现了一本合适的杂志，揭露了蒋介石政府的冷漠，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军队的抵抗意愿。但是很快，艾格尼丝和格兰尼奇夫妇之间的分歧就变得尖锐起来。某天我在家里的底部抽屉里发现一封信，告诉我应该将信件交给艾格尼丝，而不是通过《中国呼声》。我惊愕地匆匆赶到格兰尼奇夫妇家并询问格蕾丝，她却否认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然后我去了艾格尼丝那里——她也没说出真相，但从她不停地来回走动就可以看出她很生气；她唯一说的就是她不能容忍法西斯主义者，特别是伪装成进步人士的法西斯主义者……这意味着

什么,数年后路易·艾黎才向我解释清楚,艾格尼丝已经多次收到汇款用于创建一本合法杂志,但这些钱都被她用在了她认为更重要的地方。显然艾格尼丝被拿去和格兰尼奇夫妇进行比较了……

我知道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有自己的想法。不过到今天我也无法下结论说,她做了有损于中国的事情。她也“只是一个女人”(她的作品《大地的女儿》的德语译名),她以她的方式为中国人民作出贡献,尽管她有时候太过情绪化(虽然她认为自己很冷静),不过尤其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开放”(1991!)。我认为格兰尼奇夫妇,尤其是妻子格蕾丝的行为太过于教条和冷酷。曼尼,我们这么称呼她丈夫,过于被妻子牵着鼻子走。尽管格蕾丝在数年前已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但我不能以“逝者为大”这句话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到今天我还不能接受,人们谈及逝者时只允许说好的方面,无论他/她生前对别人造成过多大的伤害……近年来有足够多的例子让我感到,思想进步的人士对待那些犯了错的人也难破旧例。不过这也许是我们这些“信徒”的问题,当我们看到某人固守一种思考方式,以及之前都恪守自己的原则和理想并严于律己地生活,就认为这人是品德超凡的。实际上周边环境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果环境里没有诱惑,那么保持有道德的生活是很容易的!

通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我还认识了现代作家、社会评论家和艺术赞助人鲁迅……她自己不能带我去见他,那太引人注目了。所以她委托了一个年轻作家姚莘农带我去,实际上我早就认识他,但是从没想到他居然也是进步分子,他的穿着非常考究。鲁迅住在城市北边的排房里。因为一开始我对中国的认识很肤浅,所以既无法与鲁迅进行深入的交谈,也没办法提出本质性的问题。但是他的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又单独去见了鲁迅,他的妻子安静地坐在他身后,他的小儿子海婴无拘无束地在我们面前玩耍。我记得某次去拜访他时,鲁迅向我展示了一本大幅画册,用细腻的宣纸(吸收墨水或墨汁的效果很好)制成,上面转载有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的画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所作的序言……珂勒惠支在欧洲颇有盛名;这样的一件艺术品居然只售两个银圆,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不过鲁迅解释说:“两个银圆对于我们的朋友来说已经很多了!”深渊再次凝视着我们,它的名字叫上海——人们的生活是如此的两极分

化,却完全没人关注! 尽管鲁迅使用白话文写作,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读不懂他的作品。直到后来有了英语翻译版本,甚至德语版本,我才得以更了解这位作家。我有点心虚,我知道得太少了,面对他时几乎不知道该说什么……直到 1985 年我才写了一本书阐述我从他的作品中获得的感悟——这本书是用英语写成的,书名为《文豪鲁迅》(*A Writer for All Times*),由新世界出版社(New World Press)出版。

1936 年 12 月的某个早上,凌晨三四点的样子,我接到了一位男士的电话,听起来是用法语在询问什么。我的法语在一天的寻常时段也不是很好,在凌晨时分我更是完全不在状态,最后终于我听出来了他是律师史良的那个讲法语的男朋友。他问我说,史良被捕了,也许我的上司李石曾(就是那个上海“圣诞老人”)可以救出她? 我把我知道的关于李在哪儿的全部信息都告诉了他。然后我的大脑重新恢复工作——如果史良都被捕了,那么必定有很多进步人士被牵连进去了! 我去了格兰尼奇家并确认——包括史良在内的“七君子”确实在 11 月 22 日被捕,因为他们是“救国联合会”的成员……蒋介石不遗余力地打压反对他计划的人! 被捕的七君子中也包括银行家章乃器,我们小组的两个联系人之一……

被捕的人中有 3 名律师、多名教师,还有仗义执言的记者。很显然,蒋介石想让所有反对领袖都闭嘴!

这样的挑衅不可能被平静接受。据悉,孙中山夫人和数位志同道合的人去了苏州,“七君子”被扣押在那里。孙夫人建议说应该把她也关起来,因为她也持有相同观点……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因为共和国创始人孙中山的遗孀当然不可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被对待。这种勇敢的举动在民众间引起了轰动。更喜欢自称自己为宋庆龄的孙夫人在数次历史转折点处都表现出可贵的勇气,去反抗那些与她的亡夫的理念背道而驰的政治势力。那时候的妇女普遍没有权利,像宋庆龄这样的高级别人物实难企及。(后来据悉,监狱长是“七君子”之一的老友,所以尽力照顾了他们。)

当然是否有人秘密对孙夫人做了些什么就不得而知了。格兰尼奇夫妇某天问我和克劳德,我们是否愿意在孙中山居所前进行夜间巡逻警戒。我也被委以重任:给法租界(警务)管理处写信,要求确保宋庆龄的安全。然后管理处的某个人来到孙夫人家向她保证,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她的生命安全。

尽管我的法语被评价为不太地道,但是有人做出反应这个事实,就已然是一种成功!夜间巡逻也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如果冷静地考虑,让克劳德,一个美国武装部队成员,介入是有风险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国际”冲突,而并非个人事件吗?)但是这种提议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1936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事件,跟“西安事变”一样重要和影响深远,却很少被提及,不应该这样——鲁迅,作家和社会评论家,逝世于1936年10月19日,享年仅55岁!我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那儿了解到,他长期患有结核病。她和其他朋友曾试图说服他去苏联,去克里米亚疗养,但他们失败了。认识他之后,我也去拜访过他几次;10月8日,即他去世前的11天,我在一次木刻展上见到他,年轻艺术家们高兴地环绕着他询问他的评价,没有人认为这是最后一次!鲁迅之死对我冲击也很大,尽管我当时对中文和中国的了解都非常少;我在上海生活了3年,学到了非常多,我知道,这样一个人的离世对他的国家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他最后一次出席木刻展也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木刻艺术对于挣扎中的中国很有意义,他有一些不属于侵略者的日本朋友,其中的内山完造为这些中国年轻人开设了这门艺术课程……这个损失对每个人而言都是沉重打击。

鲁迅的遗体告别堂里到处都是痛哭的人。尽管鲁迅是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但是无数的人仍坚持来为他奉上最后的哀荣并表示他们将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为这个古老的国家战斗。

送葬的人中有日本人鹿地亘,他自称自己是鲁迅的学生。那个年轻人悲恸欲绝,木立当场,宛若石化。他也不属于侵略势力,对他来说,鲁迅就是来自邻国中国的老师,而中国曾给予日本那么多文化启迪。内山完造和他的妻子井上美喜子也一直颇有好评……

唯一没有哭泣的人是鲁迅的遗孀,许广平。她是他的学生,20年代北京女子学校的学生针对不当限制进行示威抗议时,鲁迅支持了她们。尽管已有恐怖势力威胁他,甚至已经有几个年轻女孩因此死亡。当时鲁迅正在写作他的散文《无花的蔷薇之二》谴责段祺瑞政府扫射手无寸铁的年轻人,他在散文的最后落款道:“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几个月后他又写了散文《纪念刘和珍君》来向罹难的年轻女学生表达

他的敬意。他还公开表示了对这位女青年的钦佩,无视危险,竭力实现自己的理想。

许广平是爱国同志会的成员,在揭发反动女校长及其背后的政府支持者的斗争中站出来抗议日本侵略。后来鲁迅离开了北京,前往南方城市厦门并在那里的大学任教,许广平也不再留在北京——她去了广州,鲁迅也来了。正值此时,蒋介石发动了对左翼积极分子的屠杀。鲁迅有足够多的证据揭露当前政府的罪行,而后者却把每次示威都描述成非法暴乱。

1936年鲁迅去世了——他必定是有所预感,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写了一篇关于死亡的散文。在其中他说道,曾有西医检查过他的身体并断言,他应该在5年前就死于如此严重的结核病!

现在这话应验了——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最沉痛的悲伤中,但是许广平泪流满面地对我以及其他人说:“现在还不是哭泣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他未竟之事!”

鲁迅和许广平之子周海婴还不足7岁,他的父亲就已经离他而去……(鲁迅只是众多笔名之一,当时鲁迅这个名字是用来逃避审查;他的真实姓名是周树人。)

应该是没过多久,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我的名字是王安娜,您不认识我,但是我想来拜访您……”原来安娜是王炳南的妻子,他们在大学时相识于柏林。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她当时生下的小儿子必定继承了鲁迅的灵魂,因为王黎明正是在鲁迅去世的那天出生的!他的父亲并未同行至上海,而是留在西安——在西安事变中,他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个婴儿当时约有两个月大。在上海收到西安事变的第一条消息时,王安娜就想要赶到西安去,尽管当时是隆冬时节,交通也十分不便。但在那时我已经有一个感觉:如果谁能在那个动荡时节到达西安,一定是王安娜。披荆斩棘在所不惜!事实上她确实做到了——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她搭乘上了货车,婴儿就藏在篮子里……王黎明现在已经55岁了,他来北京开会时还顺道来探望过我好几次;现在他生活在汉堡,他的母亲于1989年也在汉堡去世了。有时候会觉得世界在变小,相较于欧洲国家,中国发展得越来越迅速。尤其早期时,交通工具不太发达,加深了这种印象。如今,铁路、国内外的航班,都已是司空见惯……就连越洋电话也不是什么稀罕事。电子技术飞速发展,尤其是在“二战”后……几乎不到50年!

在30年代时,还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当然也有飞机,蒋介石还曾坐飞机飞往西安,

但是普通人的生活却比现在要受约束得多！那时候的旅行都得持续数天，路上经常在老鼠横行的小酒馆里过夜……几年后我也熟悉了这种旅行方式，在国内非常常见。

在我第一次遇到王安娜之时，我刚经历了鲁迅之死，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读了《中国呼声》上刊登的关于鲁迅之死的内容——全国各地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都是在盛赞鲁迅并且表示，会将捍卫中国的自由和主权不可侵犯视为己任。看到一个人对与他同仇敌忾的同胞的影响如此巨大，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尽管有时候他不信任他们会做好事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鲁迅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鲁迅也有勇气公开表明他的观点。

30年代我在上海的3年里并没有学到太多东西！我跟如此多的人交谈过，有些甚至能被称之为慈善家，无一例外都对中国工人不怀好意；那些在1917年革命前逃离俄罗斯的人，是的，像我的房东女儿蕾莉那样的人，在看到有一个中国小孩睡在关闭的商店门口前，也只是说：“不，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个中国人！”在上海的外国人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个国家正像一个巨人般慢慢站起来，苦难中的工人都开始反抗日本侵略……1936年夏天，日本纺织厂里发生了罢工，人们不再消极容忍监工的暴行。YWCA帮助女工们摆脱文盲身份，增长她们的见识，呼吁朋友们对此进行捐款。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通过艾格尼丝和/或路易·艾黎也关注到了这些。

在此期间，犹太人学校的一位老师黛比·布鲁姆菲尔德(Debbie Bloomfield)也加入了我们的小组。这对我们来说是可以理解的——她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英国人，不过她姐夫是公共租界情报机构领导，黛比声称她和他完全没有关系。但是现在日本棉纺厂正在进行罢工，有一天她来找我说，她的姐夫想知道谁是罢工的幕后黑手……我微笑着向她解释，在日本工头等人的压榨下，中国工人的条件是如此的不人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必要向外人解释，什么是剥削。但是黛比坚持询问她想知道的，我言简意赅地拒绝了她，我们小组也从此和她划清界限。她的行为证明了她所宣称的世界观完全是谎言。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个人圈子里遭遇背叛，不过这并不是最后一次。黛比最后怎样了，我并不清楚，也没兴趣知道。

不过我们的学习小组随着乔治·海德姆的离去而解散。他去了西北，海因茨·格

里兹教授我们的课程也结束了,我们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看待中国有了大概的了解,也知道了西方列强如何操纵中国——通过各种不平等条约所签下的巨额外债,这些“借来的钱”从未到过中国人手中……中国不是殖民地,但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是一片丰饶的狩猎场,在中国获得的利润高得难以置信。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来体验中国,有助于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理解中国是如何振兴起来,有幸见证了这番激动人心的破旧立新。

就是这样——中国远没有摆脱封建制度,孔子的教义仍被奉为主臬。蒋介石甚至用它来使他的“新生活运动”合法化。他的重点并不在于让他的人民过上轻松体面的生活,一切只是流于表面——在炎热的夏天,黄包车夫也不允许打赤膊,必须穿着长衫(还必须把扣子全部扣上)!如果颁布的规定不是在那么残暴冷酷的背景下,还没有那么荒谬可笑。并没有尝试通过教授知识、阅读和写作将工人真正从泥潭中拉出——而是仅仅做一些表面功夫,想让他们知道怎样举止得体!这所谓的“新生活运动”真是令人作呕,不仅没有减轻人们的负担,反而让他们不堪重负。他们应该整洁、衣着得体——可这笔消耗的“小钱”从何而来?这是一个险恶的计划,也许会让富裕的外国人发现到一点点改变,但中国人民依然深陷在水深火热中。

我本可以通过新闻方式来支持这个“运动”!我那来自维也纳的朋友李熙谋再次邀请我去共进晚餐,晚餐后我们一起去百乐门跳舞。这时他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新生活运动”的教父,我也认识的,希望我能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我很客气地向李熙谋表明我的态度,我不想为任何人写这方面的文章,因为我认为“新生活运动”非常不现实……这样我才不会陷入自责中。我对李熙谋的信任也因为这次的建议而产生了动摇……

我可以为《中国呼声》撰写艺术、书籍、戏剧和电影方面的文章——但对于“新生活运动”这样的,要擦亮眼睛,绝对不可能写!

我再次了解到了上海生活中令人作呕的一面。YMCA 每周四都会举行一场外国人参加的就时事展开的辩论会,一位主讲人为正方讲述,另一位作为反方进行辩论。有一个晚上的主题是关于女性的,讨论女性是否应该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我参加了这次辩论,当然是正方。还有一次的主题是“独裁政权意味着灾难”,讨论了德国的希特勒政权。我参加的讨论正好是康拉德·费德恩(Konrad Federn)描述的纳粹计划,从欧洲带过来的,当时在进行展示。希特勒向工人们承诺的并未做到,而是服务于蒂森

(Thyssen)、克虏伯(Krupp)等资产阶级。对我而言,这场辩论的规则和其他一样,即使这个主题是剑指纳粹统治。但是有一天我却发现这让我陷入危险中……

我母亲通过熟人捎了一个包裹给我,我和蕾莉一起到港口去接这个人并拿到了包裹。在我们等待船进港时,蕾莉介绍了一位绅士给我,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对着我们一脸熟稔的样子,应该是已经听说过我的名字。我却说我不记得以前见过他。那位年轻人说:“你最近是不是在YMCA的辩论里发过言?”我说,是的,我经常去。然后回答令我十分意外:“我们在上海的德国人都认识你!”

很显然,他认为我会构成威胁。这对我没有太大的伤害,但我认为这可能会给当时仍在维也纳的父母带来不便。我对自己说……知道纳粹在上海也有据点,这也是很有趣的。我当时以为我很快会回老家。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他也曾在奥地利任职,但奥地利仍然是独立的……

我在离开维也纳时相信我将会在6个月后回家,但事实是上海为我提供了有趣的生活。

我甚至有过机会采用成熟的古老的中国方式返回欧洲!少帅张学良曾和大元帅飞往南京(之前我已讲述过),不过还有同谋的省最高长官杨虎城,会怎么处置他?对他的不服从的“惩罚”是让他和家人出国去游学!我所在的世界学院院长、“圣诞老人”李石曾作为中间人参与到这个欧洲游学项目里,而我作为欧洲人理应作为秘书或翻译陪同杨家人前往欧洲。我也可以协助杨少夫人学习了解西方的风俗习惯……

某天我也被邀请去吃午饭,参与这次外国游学的商议。“圣诞老人”也到场并主持了商谈。我差点惊呆了!我发现了谁?杜月笙!他实际上是黑帮之王,不过在我能与他交谈之时,他已经洗白上岸成为了一家私人银行的老板,也以慈善事业闻名;在他的鞭子下驱策有大量工人,各种见不得光的生意没有杜月笙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的(在1927年他亲手应对了蒋介石的背叛!他还属于一个秘密社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幕后操纵者)。我不知道杨虎城的出国之行为何要咨询他——也许杨省长清楚自己性命堪虞。

杜月笙面如金纸——看起来真可怕!大多数时候他都沉默着坐在那里,他的出现似乎足以让每个人都了解到局势的严重性。

他们建议我作为秘书全程陪同这次旅行,我花了时间仔细思考——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返回欧洲看望父母的机会,也可以向他们表明我在中国如鱼得水……但是王安娜——她的丈夫王炳南跟杨虎城来自同一个省并且是杨虎城的顾问——告诉我仅仅是计划让我担任杨家小孩子的家庭女教师,这让我一下子就兴趣乏乏了!当然,我无法判断是否真的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总体来说(根据杨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这在下文会讲到),安娜的推测很合理。我很礼貌地表达了拒绝——我已经在中国了,再去欧洲我也得不到什么,在这样的旅程中我实际上不会太自由,作为秘书我必须翻译、陪同他们四处走并解释所见到的一切……而且恐怕也说不通我的父母让我继续留在中国。长远来看,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不过随机事件总是在“调剂”我的生活……

尽管我只见过一次杜月笙,却始终能听到人们谈起他,听到的都是人们自己想象的黑帮之王的形象。在合适的时候会再谈到他。不过道貌岸然的“圣诞老人”在商议国外政治旅行时认为有必要邀请黑帮之王到场,这本身就十分怪诞!这就是上海,政治非常自然地 and 鬼蜮伎俩交融在一起……

不过也可以理解为我不喜欢李石曾的这一面。据说,他参与了将艺术珍品抢救出北京的行动,以免这些珍品惨遭日本人掠夺……

(1937年)新学年在9月份才开始。某天我遇到的一位欧洲女士告诫我,不要掐着最后期限离开。这警告来自卡尔·奥古斯特·威特弗格尔(Karl August Wittfogel)的妻子奥尔加·朗(Olga Lang),她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奥尔加不得不照管着威特弗格尔教授那些珍贵的书籍和资料,他本人几个月前才乘坐“威尔逊总统”号从上海前往美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听说过威特弗格尔教授的名字,他著有一本孙中山博士的传记。我在我的医生那里认识了他,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负责人也来了,于是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曾有封建主义的辩论,非常激烈。尽管我对此认识尚浅,但这位名人居然会否认这个事实还是令我非常惊奇。总体来说,他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出众。他还讲述了纳粹分子囚禁了他,共产党人将他营救了出来。不过他是这样描述这件事的,当然这件事其实一点儿都不容易:“呐,他们知道他们救出来的是谁”,仿佛把他从纳粹手里营救出来是天经地义的。任何读过威利·布雷德尔(Willi Breidel)的书的人都能想象出,营救行动

有多大的危险。一个共产党人如此骄横自负地谈论营救行动,实在令我难以置信。

后来我认识了奥尔加女士,对他的性格和思考方式有了更深的了解。他的工作(当时在编写中国朝代编年史)非常重要,奥尔加必须去适应他的行为准则,而她自己想从事摄影方面的工作,却无法实现,因为必须先确保他的书籍等无虞!

在上海的最后几周我是在小旅馆度过的,奥尔加·朗也住在那里。我的单间公寓里的家具都卖给了一个熟人,我带去小旅馆的行李都是我准备要带去四川的——包括来自我妈妈家的一口大木箱!这口箱子到1991年时还在并且还装了东西,我想我拥有它的日子快结束了……在我漫长的一生里,除了一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就收集了这些。啊呀!

没过多久就证明奥尔加·朗的警告多么正确,我应该早点出发,以能顺利到达内陆。日本侵略者似乎准备发动新的侵略,上海的中国人民“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小道消息满天飞!到处都能看到装得满满的手推车——从东到西,从北到南,或者反过来,看起来大家只是在茫然地奔走。奥尔加也刚从北京过来。事情只要还没发生,人们就永远不知道日本人在计划什么阴谋。在被占领的东北地区还建立了所谓的“满洲国”……

1937年8月13日周五,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需要下午就登上中国轮船前往重庆,如果我2点或3点(记不太确切了)时没赶到,船就直接开走了……

格蕾丝·格兰尼奇开车送我去了外滩,她听说要准备开始挖壕沟,看起来形势越来越不妙,而且蒋介石还完全不可信……13号周五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带了很多行李,然后非常恼火地发现我可能数错了,有一个装有我的很多重要物品的帽盒找不到了!前往重庆的轮船不再停靠在外滩主干道边,而是在黄浦江的对面。在我气喘吁吁地赶到时,发现几乎没有乘客,看起来我还可以拥有一个单独的舱室(太好了!)。船上还有一大家子人和一位来自四川大学的中国教授,后来了解到他娶了一个德国人;这就是我们到达南京前的旅伴了……

我的生活掀开了一页新篇章。